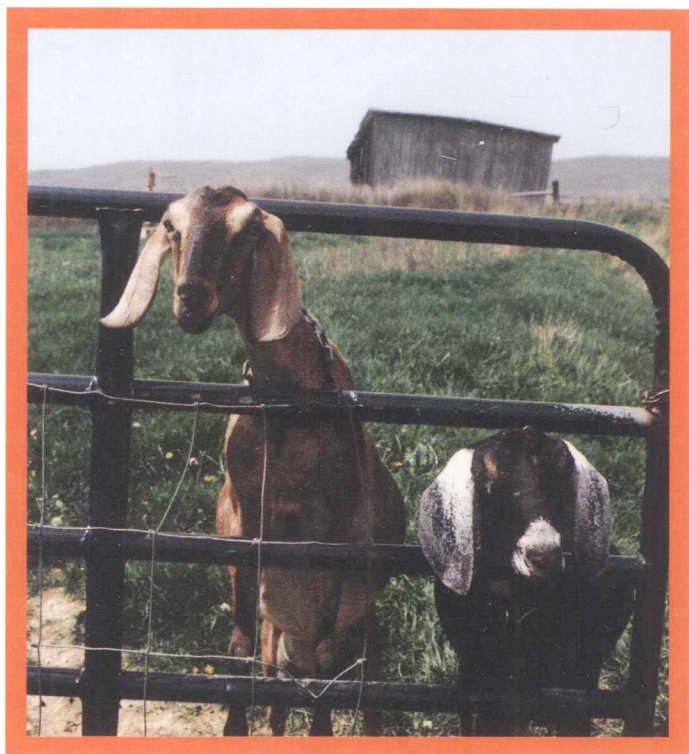


汪 芸 / 译
[美] 罗根·沃德 / 著
Logan Ward

See you
in a
Hundred
Years

我们没疯！ 一起回到 1900年生活吧



一百年有多久？简单的冒险，艰难的浪漫
一段珍贵的复古农庄生活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茹

封面设计：lemon



手机、电脑、信用卡统统再见，
每天帮山羊挤奶、赶走惊人的土拨鼠与不时出现的蛇，
头发永远洗不干净、在户外用粪坑上厕所时永远觉得屁股凉飕飕的，
最低的文明需求是卫生纸，
这场浪漫冒险游戏为期一年，时间一到就会回归现代。
跨越一百年，暂停一下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乐趣？

这本书的价值，不是怀旧，不是乌托邦的自然之梦，而是表达了如今不少人对城市文明焦虑中的反省，用行动去反思生活，让我们看到手工农作的美好与限制。

——作家 韩良露

本书以抒情笔调描绘21世纪远离尘嚣的生活，比任何电视实境节目中的荒野求生情节还要更真实，对人更有益处。

——《出版家周刊》

这本书融合了自然文学作家梭罗、旅游作家布莱森（Bryson）与《普罗旺斯的一年》作者梅尔（Mayle）的优点。

——狄恩·金（Dean King），《荒漠骸骨》作者

从逐渐领会农场动物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到思考该如何使用难以捉摸的木柴炉；从了解自给自足的生活是有可能实践的，到成为这类社群的一分子；从努力挽回貌合神离的婚姻，到一起庆祝真正许下承诺的结合……随着这家人的生活体验，读者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一样，不希望这段生活走向终点。本书从头到尾充满了热情、嘲弄的幽默与客观的描述，如果有任何一家图书馆，不管是公立或私立的，竟然不想购买本书作为馆藏，将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

——《图书馆月刊》

作者记下他和家人认真展开1900年生活的经过。本书笔调优美，情节感人。书中章节环环相扣，毫不造作地展现出作者一家三口在弗吉尼亚州经历的一段珍贵的复古农庄生活。

——《波士顿环球报》

（本书封面及内文所有图片均为作者及其朋友在当时拍摄时所得。）



上架建议 畅销

ISBN 978-7-5112-5198-5



定价：39.00元

013069245

1712.65
171

See
You
in
Hundred
Years

我们没疯！ 一起回到 1900年生活吧

[美] 罗根·沃德 / 著
Logan Ward

汪 芸 / 译



1712.65
171

光明日报出版社



北航

C167752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没疯! 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 / (美) 沃德
(Word, L.) 著; 汪芸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9

书名原文: See you in a hundred years
ISBN 978-7-5112-5198-5

I. ①我… II. ①沃… ②汪…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5755号

版权登记号: 01-2013-5487

Copyright © 2008 by Logan War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dy Rein Book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我们没疯! 一起回到1900年生活吧

著 者: [美] 罗根·沃德 (Logan Ward) 著 汪 芸 译

责任编辑: 杨 茹

封面设计: 柠 檬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31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yrranyi@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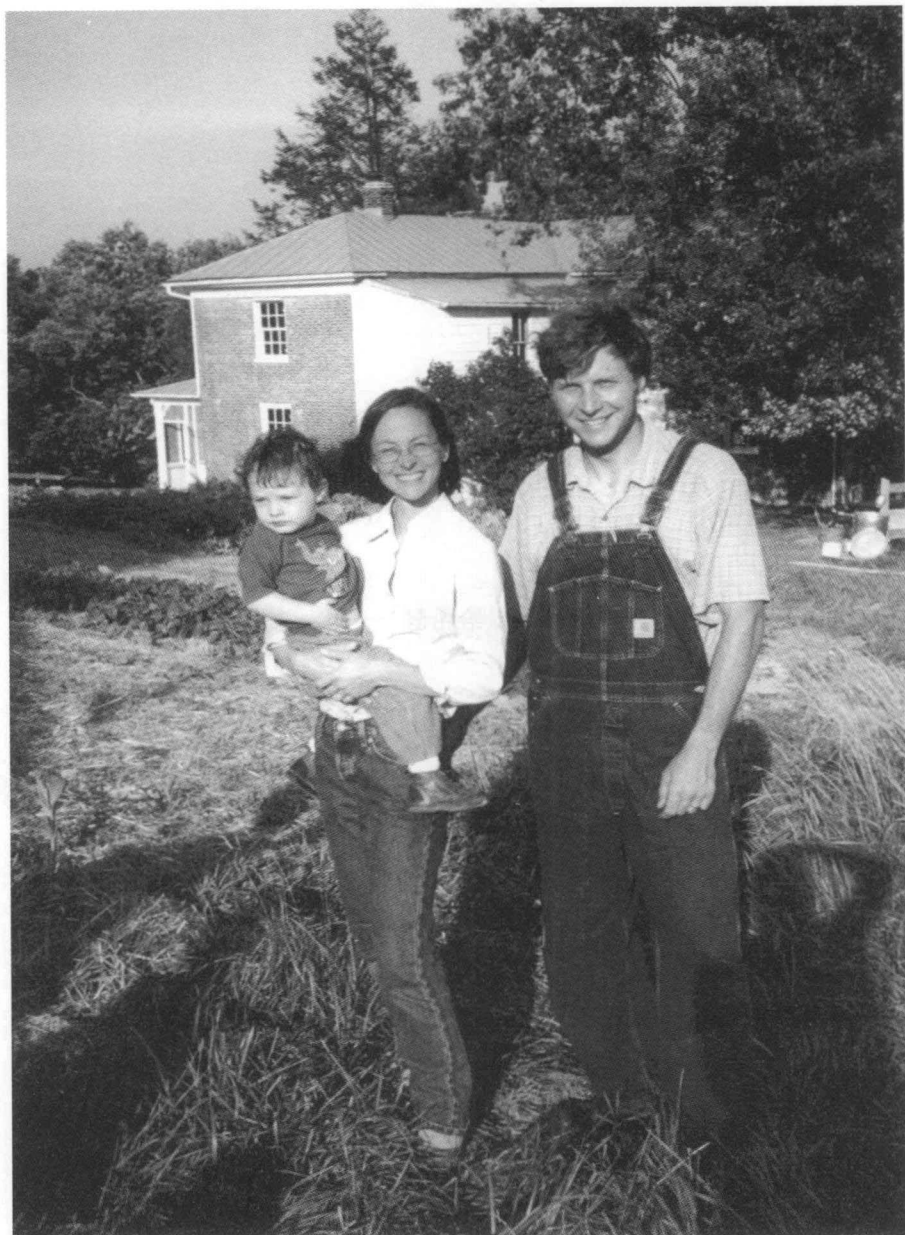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12-5198-5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献给希瑟 ——



我和妻子希瑟、儿子鲁德在农庄前留影。刚搬来时，农庄四周杂草丛生，毒蛇出没；前门小露台松垮，篱笆缺了一大段；屋内地板腐烂、爬虫处处……但我们没有却步。除了住之外，我们穿的衣服质料也很1900年：棉、羊毛、皮革和橡胶。（Peter Aaslestad/摄影）

CONTENTS

目录

I 前言

第一部 绿意初萌

002 第一章 纽约，再见

我要……离开21世纪的世界 / 一路向南 / 真正的绿洲

019 第二章 除夕迎旧年

贝儿来了 / 你怎么会没有电话 / 我不是你的员工 /

妈咪和爹地正在……挤奶 / 最后一站：古老的二手货店 /

不久，黑暗就会降临

044 第三章 探索未知之地

欢迎进入1900年 / 全身的肌肉都在抗议 / 扮兔子的“纵火狂” /

还是剩下一大堆樱桃 / 来自音乐的酷刑 / 我很确定：不卖 /

突发“羊顶人”事件 / 贝儿的眼光

074 第四章 学会驾马车

结婚请帖 / 见到负重马专家 / 带着脚踏车，去赴约 / 往前走，贝儿 /
试驾 / 大卫的理想 / 再次赴约，这次骑马 / 被削弱的成就感

104 第五章 等待下雨

菜园快要干涸了 / 拔草、杀虫和冷战 / 曼哈顿计划 / 好女孩，贝儿 /
干旱，持续 / 快乐，妈咪！快乐，爹地

第二部 渐入佳境

128 第六章 采摘，洗净，去皮，去壳

送给希瑟的手环 / “好”邻居 / 新“来客” / 贝儿的小探险 /
除莠 / 布鲁克林的老朋友 / “守护天使”

148 第七章 来自未来的消息

恐怖分子挟持了飞机 / “挡泥板”被困 / 鲁德决心要大便 /
希瑟的外婆 / 鲍伯和艾默斯 / 是谁

169 第八章 枪声响起

这，属于我们 / “不给钱就捣乱” / 坏消息 / 冬天的储备 /
枪声 / “大剪刀”不见了 / 去杀鸡 / 投票日 / 我笑了

188	第九章 回家过节
	爸妈来了 / 感恩节 / 转变 / 鲁德发烧 / 水果蛋糕和圣诞树 / 礼品手作 / 希瑟的双亲 / 送给鲁德和希瑟
211	第十章 严冬
	寒流 / “不能碰的木头” / 新的仪式 / 玩滑板长大的男人 / 险遭劫难
232	第十一章 交配的季节
	希瑟的疼痛 / “星星”在寻找爱情 / 支持与友善的距离 / 掉进柔软的草堆 / 要不要打电话 / 准备就诊 / 没有怀孕 / 心情不太好
248	第十二章 回到未来
	希瑟看诊 / 农场欢乐日 / 我想去——另一个地方 / 猎杀了一只土拨鼠 / 角色交换 / 散步 / 关于农场的构想 / 活马拉坏车 / 一百年后，再见
274	尾 声

后记及其他

278	后 记
285	希瑟的改良黑水果蛋糕食谱
287	致 谢



在特林柏农场晒衣服的日子，晾衣绳上挂着我们自己做的两块尿布和一件T恤。

前 言

我们乃是凭借自己的过去来界定自己。或许我们可以——若有良好的理由——花很大的力气，试着逃开它，或是逃开它所包含的那个不好的部分，然而只有在我们把某种东西加到它里面，使它变得更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地摆脱它。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温德尔·拜瑞 (Wendell Berry)

20世纪是从一个星期二开始的。

——美国作家伊恩·弗雷泽 (Ian Frazier)

我站在弗吉尼亚州雪伦多亚谷 (Shenandoah Valley) 一座破败失修的农庄后面。这座农庄的院子里长满茂盛的野草。一座巨大的灰色谷仓若隐若现地矗立在远方。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鸡舍附近有个东西急促地动了一下。有一条蛇倒挂在橡木上，正在来回地摆荡。它把它的身体往前伸，攀上一扇没有玻璃的旧窗。在木条窗格之间，这条大蛇把身体胀大了一倍，它把头放在鼓凸的身体上，吸收这一天最后的几丝阳光。我像被催眠了一样，

轻手轻脚地沿着花园小径走去，想看得更清楚一点。许多黑影如“地精”^[1]一般在植物之间匍匐。这条蛇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舌头无声地吞吐。它真的是一只巨大的生物，有我的上臂那么粗，可能有一点八米长。它的身体是棕黑色——虽然在渐暗的天色之中，很难看出它的颜色——上面还有模糊的菱形纹路。我身后传来“嘎吱”一声，我迅速转过身去，看到鲁德摇摇摆摆地走过来。“把一拔。”他用他那刺耳的声音说，伸开双臂要我抱他。一瞬间，我突然惊觉，他幼嫩的脚刚刚走过茂盛的草丛。我赶紧一把将他抱起来，快步走向主屋。

不久以后，在我们回到古代的旅程中，我们将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危险，包括用力挥动斧头、结果竟砍到小腿上；用木柴炉烤肉，以及被我们那匹运载东西的马儿踢到——三周后，我们就要经历这些事。然而，在诸多危险当中，最让我感到忧虑的事，就是遭到蛇吻。雪伦多亚谷常见的毒蛇有两种——响尾蛇和铜斑蛇。这两种蛇都属于颊窝毒蛇^[2]，对于三岁以下的儿童来说，它们的毒液都足以致命。我儿子上星期才满两岁。

在我们想办法做出种种安排，以便按照预定计划出发之际，疑虑的思绪也深深困扰着我。夜里我无法入眠，被眼前浮现的一幅景象所折磨，那就是鲁德摇摇晃晃地踩过一堆腐烂的篱笆桩子，而这堆篱笆桩子底下盘着一条巨蛇——那闪电般迅速的攻击，那纯真无知的孩子的尖叫。鲁德会说的词汇很有限，我们有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因为被蛇咬了而惨叫。然后，当那条腿肿起来，开始发黑，我们那个地方距离小镇很远，没有电话，而我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可能是我，希瑟会留在家——抱着孩子狂奔到最靠近我们的一栋房子敲门求助。我祈祷房子里有人；如果没有，我只有再度狂奔，去敲另一栋房子的门。

我走进厨房，尽管鲁德用尖叫和拳打脚踢表示抗议，我还是把他放到儿童椅上，为他系上安全带，以免他爬下来。这天稍早，希瑟曾说我让她

[1] 地精（Gnomes），传说中在地下守护财宝的侏儒精灵。

[2] 颊窝毒蛇（pit viper），头部两侧有颊窝的毒蛇，如响尾蛇、百步蛇、腹蛇等。颊窝为介于眼与鼻之间的凹窝，左右各一。

觉得快窒息了，她必须暂时脱离我们这种疯狂的准备工作，不然她一定会发疯的。她一言不发，满怀怒气，把旅行车开得飞快去上瑜伽课，把我留在这里，让这些许多尚未完成的事情继续烦扰我，让我着急慌乱——安装火炉的管线，建造一栋户外厕所，把青豆和玉米的种子撒到土里，好让我们这一年能撑过去——还要应付鲁德。真该死，他究竟为了什么尖叫个不停呢？

我回到鸡舍前，各种东西的影子拉得更长了。那条蛇已经走了。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第二天早上，我叫鲁德和希瑟留在野餐桌旁边，将一把锄头攥在手中，自己大步走到鸡舍前。走到距离这片高高的草丛还有三步远的地方，我停下来，一动也不动。有一条跟上次那条模样不同、体型也比较小的蛇，正在阳光下曝晒它的鳞片。

“这里有一条蛇。”我说，我的眼光集中在这条蛇身上。从蛇头的颜色和形状来看，我确信它既不是响尾蛇，也不是铜斑蛇，然而这个事实一点也不能让我的手停止颤抖。“我要试试看，看能不能抓到它。”

“为什么要抓它？”希瑟问。

“这样就可以把它送走，不让它靠近鸡舍。蛇会吃蛋。”几星期后，我们的小鸡会住进鸡舍，加上我们的住处距离超市很远，我们不能允许鸡群中出现这样一个窃贼。

我估量这条蛇的体型大小，试着回想，过去我有没有抓过活生生的蛇？我依稀忆起，某次学校远足时，看过一条身上有着浓淡相间条纹的袜带蛇，还有，我手上沾了一种永远也洗不掉的恶臭。好吧，我想。扣住头，抓住脖子，就像马林·帕金斯^[1]经常做的动作。但是当我扬起锄头时，这条蛇突然向后一跃，唰唰地把身体盘起来，尾巴不停颤动，脑袋从锄头尖甩动着移

[1] 马林·帕金斯 (Richard Marlin Perkins, 1905-1986)，20世纪美国动物学家，以主持电视节目“欧马哈的相互野生王国” (Mutual of Omaha's Wild Kingdom) 知名。

开。我像喜剧里的小丑一般，踮着脚四处弹跳，完全没法占到一点优势。

“弄死它不就好了？”希瑟不屑地说。

不可以杀死没有毒的蛇，我想。但是我觉得自己很急躁，觉得此刻我的处境很尴尬，我的无能令自己感到困窘。怒火涌上心头。我把锄头举到头顶，用力砸下去，砰的一声，砸在这个盘卷的身体上。然后我又砍了一次，这条蛇看起来很困惑，它发出“啞啞”的声音，嘴巴张大了，身体流出血来。砍下去！砍下去！不久，它的头仅有一丝血肉与身体相连，它的身体躺在那里，被切成好几段。我的手臂在发抖，因为发出重击而感觉刺痛。狂怒的情绪如蒸汽般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当下涌出的羞惭之心。



在往后的几周，我们彻底投入各种日常生活的劳务中，斗嘴、发火，来回奔走于那条通往小镇的单车道的乡村道路——同时，蛇的威胁仍然萦回不去。我发现有一条蛇的蜕皮挂在二楼鲁德房间窗外的一根粗枝上，宛如一枚巨大的保险套，另一条蜕皮从后院屋顶落地的排水管口伸出来。我发出“嘘嘘”的声音，把谷仓里和房子四周草丛里的蛇驱赶到别的地方去。有一条褐色纹路的小蛇蜿蜒着横越我家的车道，它看起来可能是铜斑蛇。我听到一声尖叫，赶紧冲出去，希瑟的手指着一一条肥大的锦蛇，它正在后门的阶梯上作日光浴。“它们不来烦我们会死吗？”她说，她差一点就踩到它。当我晓得，到了冬天，蛇会悄悄进入房子里取暖的时候，我立刻在房子里四处查看，把T恤裁成细条，将木头地板的孔洞塞紧。有一天，过去看管这片农场的老人家提出一项警告。“几年前我在谷仓后面宰了一条响尾蛇。”他说，“当口渴的时候，千万要小心！等到那个时候，它们就要从山上下来找水喝了。”

第一部
绿意初萌



第一章 纽约，再见



我要……离开21世纪的世界

在这个城市里，你不会凝视星辰，做白日梦。你不会在早晨外出散步后，埋头翻阅平原野花手册，寻找一种途中看到的、绽放璀璨蓝色花瓣的喇叭花花名。你不会在雪地上搜寻动物的足迹，或是在这片冰封的森林里停下脚步，闭上眼，聆听五子雀觅食的啁啾。在这种时刻，你可能会忘记有蛇这种生物的存在。这种感觉就像纽约被包在一个巨大的塑料泡泡里，人类身上带着信用卡和《查氏餐馆指南》^[1]，端坐在食物链的顶端。本地的野生动物？不过是蟑螂、鸽子、老鼠而已，都是传染疾病的媒介，都应该被扑杀。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泡泡里展开的。

当时是2000年，一个新的千禧年露出曙光。社会各界几乎已将人们对Y2K^[2]的恐惧抛在脑后。经济前景看好，失业率降到历来最低点，美国政府

[1] 《查氏餐馆指南》(Zagat guide)，美国著名餐饮评鉴杂志，每年选出全球数百家最佳餐厅。

[2] Y2K问题也可称为千禧年虫，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计算机科技无法有效解决由1999年12月31日到2000年1月1日进位时所产生的信息系统混乱问题。

对破纪录的财政盈余多有夸耀，纳斯达克指数超过五千点，使得社会发出一阵振奋活泼的欢呼。股市让每个人都变得富有——至少在账面上是如此。在历史上最富裕的时刻，生活在这个全球最富裕国家中最富裕的城市里，希瑟和我应该觉得很快乐。其实不然。

因为这个缘故，有一天我发现我坐在出租车里，沿着公园大道前行，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因为心中藏着一个好消息而显得太过兴奋。我从车窗外看到有几头奶牛站在安全岛上的郁金香花丛里，在它们的后方，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巍巍矗立。那些是玻璃纤维做的牛。有一头奶牛身上画着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旗花纹；另一头牛的身上画着蒙德里安^[1]式的几何线条。出租车司机朝着后视镜歪了歪头，跟我对看了一眼，然后用发音清晰、音调毫无高低变化的孟买口音说：“我总是想不通，这些奶牛究竟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艺术。”我朝着隔开前后座的塑料防护板大声嚷嚷。

“在我的国家，牛是给人吃的。”司机说。我突然想到，印度把牛看成神圣的象征，所以他一定是巴基斯坦人。

我发现讲话不必用喊的，便说：“有时候我在想，城市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汉堡是用什么做成的。星期天我推着婴儿车，带着我那一岁大的儿子去布鲁克林动物园，那里有一个女孩——她看起来绝对有十二岁了——瞪着农场动物区里的一头奶牛，竟然说不出那是什么动物。”

“一头活的牛？”

“对，一头活的牛。它只是一头小牛，但它显然是一头牛。总之，这个女孩的妈妈觉得很挫败。她一直说：‘别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这时，我儿子尖叫着说：‘哞，哞。’我简直没法相信有这样的事。”我的背靠着座位往下滑，心里想着，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绝对不会，我感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不会的。然后我再次俯身向前：“我没有留在那里，看看她能不能认出山羊来。”

[1] 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新造型主义派画家，擅长运用几何形象掌握画面。

“在我的国家，”他说，“羊肉是最受欢迎的。”

就在这时，有一辆出租车突然插进我们的车道。“喂！”载我的司机大声喊叫，他猛然踩住刹车板，用手腕重重按着喇叭。车身的倾斜和颠簸让我的身体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到了路口，我们放慢速度，穿过四面八方快速行进的路人，他们像想要盗垒的棒球选手般，快速地冲过马路。在人行道上，人们看着自己的脚，匆忙前行，嘴里喃喃自语，手上比着各种手势。老烟枪们聚集在另一栋商业大楼的柱子四周抽烟，他们的模样令人同情，烟瘾让他们魅力全失。

他们看起来都是一副走到尽头的样子，不管是抽烟的还是不抽烟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是衣冠楚楚的还是肮脏衰败的。每个人都显得很急切，很狂乱，仿佛快要走进坟墓。穿梭于这片水泥、玻璃与钢铁构成的风景之中，穿梭于拥挤的人群之中，他们的心思放在别的事情上，无法察觉自己的状态。直到最近，我一直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如今我离开了，走出了这个人群。

“我的孩子将会知道，牛是什么样的生物。”我做出这项宣告，我觉得我不能不跟他分享心中的好消息：“我太太和我就要搬到一座农庄去住了。”

“你是个农夫？”他一面说，一面怀疑地看着镜子里的我。

“不是。但是我要学着去做一个农夫。我敢打赌，在你的国家里，许多人还是以务农为生。我指的是一般人。为了养家活口。”然后，我的精神更加振奋，我想到这个人，还有他离开祖国到这里定居的决定：“你有没有过一种感觉，就是厌恶这里的情况，觉得再也受不了了？厌恶塞车，厌恶生活在锁紧的大门后面，厌恶那些可恨的事情？老天爷，你是开出租车的。你的每一天一定充满了一件又一件可恨的事情。”

司机猛然转到人行道旁，停下车子。他从镜子里看着我。我正要对他的开车方式提出抗议时，我看到了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发现我们已经到了。我付了车钱，一把接过收据，在红灯亮起、车流涌过来之前，匆忙地冲过街。

我与下班人潮走着相反的方向,走进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大厅,一个人搭电梯到17楼。在17楼,我走进《国家地理·探险》(*National Geographic Adventure*)杂志的办公室。这是一本新创刊的入门性质杂志,是那本深受敬重、封面有着金黄色边框的旗舰杂志《国家地理》的姐妹刊。探险——这种消遣,这种态度——现在很热门。欧内斯特·萨克里顿^[1]置身冰天雪地的豪壮英雄史诗,还有攀登圣母峰时发生的悲剧,在书店的陈列架上随处可见。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不再是一个地区,而是一种赶上流行的宣告。在这本杂志推出前的秘密运作时期,我曾跟一位编辑见面,当时这本杂志的名字仍在严格保密中。“我敢打赌你能猜出它的名字。”他狡猾地咧开嘴笑,“它用了一个字,一个你最近随处都能见到的字。”

我对探险感到着迷。

我从小就爱看探险故事,《鲁滨孙漂流记》《一千零一夜》《山中岁月》——这本书叙述一个住在纽约曼哈顿的男孩离开城市,来到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卡兹奇山脉(Catskills)地区,住在树洞里的日子。我曾在野地寻找印第安人的箭头,跟着我父亲在河中用盘子淘洗矿砂,想要找到金子。我曾站在父亲身旁,看着他用手枪连续开火,打死铜斑蛇。对于一个害羞的男孩来说,尽管他置身于一个死气沉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小镇,但是想要逃离这个社会的种种限制,来到荒凉狂野的大自然当中,这样的念头仍然在他心中激发了无限的想象。大学毕业后,我搭机前往肯尼亚,身上带着一个活页夹,里面装满地形图——用红笔圈出荒野地区的学校,还记载了如何前往两位美国教师的住所。我在那里找到一份教书的差事,在那一年中,我用桶子收集雨水,用煤油炉煮东西吃,在烛光下写短信,用无线电传送信息回家。回到美国以后,我搬到曼哈顿,担任一份推出不久的文摘《南方农夫年鉴》(*The Southern Farmer's Almanac*)的编辑。(我是南方人,然而我对编辑工作和农务一窍不通。)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但我还是努力写文章,想办法登出来。最后,过了十年以后,《国家地理·探险》派

[1] 欧内斯特·萨克里顿(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以探索南极出名的英国探险家。

我去乌干达和厄瓜多尔等地。

此刻我坐在该杂志的会议室里，心中怀着另一种探险的想法，我努力寻找合适的字眼，向坐在对面的这位年轻编辑说明我的计划。

“詹姆斯，”我说：“你知道吗？这个国家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夜里看不到银河。”

“不知道……”

“你不觉得这件事让人感到很丧气吗？”

“是，我想是吧。”他一面说，一面皱起眉头，“但是我们今天见面，究竟要谈什么？你让我好奇得要命。”

我停下来，看着许多张用图钉钉在墙上的杂志封面。俊男美女搭配色彩缤纷的户外装备，在冰河、瀑布与半月形的海湾前，摆出各种姿势。“我再也不能写《国家地理探险指南》（*NGA Guide*）了。”

詹姆斯点点头，身体向后靠到椅背上。“我知道写这个要做很多痛苦得要死的研究调查工作。”

“不是因为这个。”我比自己预期的还要紧张，我顿了顿，“我要……把我自己带走，离开21世纪的世界。”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我已经被榨干了。希瑟和我正在慢慢地杀死自己，以便跟上世界的脚步。我们想试着去过另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你知道的，在我们还算年轻的时候。”我向他解释我们的计划——我们想要用曾祖父时代的方式，去过自耕自食的农民生活。我们有很多细节要解决，这是当然的，但是这个计划的基本前提是：1900年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就不用。

“这意味着，”我说，“我们不会有电子邮件、电话、计算机、信用卡、水电账单和汽车保险。”

“太了不起了！”詹姆斯说，“听起来像一场货真价实的探险。”

希瑟的主管梅若是个在纽约皇后区长大的公益律师。一星期后，希瑟告诉她这件事并提出辞职时，梅若的反应却跟詹姆斯不一样。“你，”梅若说，“你疯了。”

也许我们确实是疯了。就像我们认识的任何一个纽约人一样，我们工作得太拼命了。每天晚上，我们带着工作压力回家。周末的时候，工作压力依旧尾随不去。希瑟在这家司法改革智库的工作，还有我自由接案、忙着替杂志写稿的工作，让我们不是被绑在计算机前面，就是必须到外地出差。过去两年当中，除了澳洲和南极洲，希瑟每一洲都去过了，她飞到这些地方，与当地警员进行访谈，跟政府官员举行会议。即使在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情况下，她仍到爱尔兰发表演讲，之后飞回纽约，并在抵达纽约的当天飞往阿根廷。我们住在北半球，而她匆匆赶往的国家位于地球的另一半。我们心想，万一她生下早产儿，我们得用丢铜板来决定，孩子是在夏天还是冬天出生。

最后，鲁德算是准时在曼哈顿一家可以鸟瞰东河的医院出生。孩子才四个月大，就交给保姆照顾。我们对于必须雇用她来看孩子，对于我们只能支付她微薄的薪水，感到双重的罪恶感。（当另一位妈妈告诉我们，这位保姆把婴儿车的安全带绑上，不让鲁德下来，好让她在公园里跟人畅快聊天时，我们心中的罪恶感就更强烈了。后来我们叫她离开，把鲁德送到托儿所。）

我们花了太多钱在房子上，到户外走动的时间太少。我们从抽屉里拿出外国菜餐厅的菜单，周而复始地打电话叫外送餐点来吃。我们在转角的一家录像带店，跟隔在防弹玻璃后面的老板租来一些令人失望的电影。我们的生活里失落了某种东西——我们的感情也一样。然而我们太忙了，没法面对这个问题。至少我们是用它来当作借口。于是我们整日辛勤工作，很少谈话，到了晚上，我们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楼上公寓里两情缱绻、弹簧床“嘎吱”作响，让我们无法入眠。然而我们累极了，实在没力气让自己的床铺也这么响一下。

这不是身体的疲惫。许多世代的先人努力追求美国梦，令今日的我们受益匪浅。我们放弃了南方小镇家乡的农场和工厂的活计，用来换取接受教育和都市生活的机会。让我们受苦的不再是开拖拉机的时候出了意外，或是在生产线不停转动的残酷机器辗断了一只臂膀或一条腿，在我们这个时代，折磨人们的是跟压力有关的疾病：焦虑症、忧郁症、电子邮件上瘾症，与有所亏欠的罪恶感。我的焦虑感在计算机挂掉的那一天达到高峰。

我的米色戴尔台式计算机——我谋生的工具——嗡嗡地停止运转，屏幕一片漆黑。我内心的慌乱越来越强烈，我用力敲打键盘，把开关键按了又按，完全没有反应。我的手指沿着插座上的电线，摸索到计算机的主机上。插头没有松脱。想到这部我不甚了解的机器，它那满是金属线的肚子里装了我所需要的大量数据，不禁感到一阵晕眩：一页页的调查研究，访谈手稿，一篇三天前就该交稿、马上就可以完成的文章，写书的构想，许多认识的人的地址，朋友和编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家人的合照，工作相关的数据，税务的数据……对我来说，这部计算机就是一切。我真是笨蛋，竟然没有作备份。

刚知道计算机挂了以后，心里冒出一阵惊慌的情绪，等这阵情绪平息后，我马上想到我爷爷。他是一位乡村医生，也是个养牛的农夫。他生于1886年。今日所谓“节省时间”的科技当时尚未出现，包括让人们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完全无法离开工作的手机，以及让人们半夜还在回复电子邮件的计算机。当人们手上使用的是以铁、钢和木材用手工制造而成的器具，他们怎能掌握现代使用锂电池的数字设施虚无缥缈的本质呢？这就是我爸爸的爸爸——在我们中间，有着这一整个时代的人——成长过程中的那个世界，跟我所理解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我领悟到，没有人知道现代化生活长期的后遗症是什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适应这一切耗尽脑汁的变迁？科技的种种进展、大量兴起的城市、日常生活飞快的步调，还有我们购买的东西和吃下的食物——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逐渐由手工全面转为机器制造。也许我不应该为了内心对科技的矛盾情感（还有计算机宕机时，我所感受到的强烈恐惧）而觉得羞愧。我心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嘶喊：停下来一分钟！你盯着计算机屏幕太久啦。你前一次挖掘泥土，或是走过田野，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更不要提你是否种过东西给自己吃了。也许我们跟自然界失去了联系，使得我们心思混乱，迷失了方向。如果是这样，也许这件事就能说明，近来我为什么如此的不快乐。也许我只是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方式顺利进行。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一天我就是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我还是很本分地打电话给戴尔计算机的一位技师。我有妻小，有事业要追求，我还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几星期后，在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在一瞬间清醒了，这个时刻改变了一切。当时我正在阅读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主题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报导英国有一家人正过着19世纪伦敦居民的生活，并描述他们如何努力对抗这种生活的种种严酷考验。我想到我的计算机危机，这个问题依旧在脑中萦回不去——我究竟能作什么样的选择？我领悟到，原来我答案就在这里！答案不是这个真实故事的本身，而是它的核心观念——采用过往的生活技能。如果我是这么渴望有所改变，何不回到过去，用这种方式作为重新开始的起点？

我觉得，1900年是个合适的年份。我想摆脱某些科技，但我不想当拓荒者，不想徒手建造一栋小木屋，或是自己挖一口井，1900年——算是还可以回想到的时期——非常合适。我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证明我的直觉是对的。在1900年，农村的人口数仍然超过都市人口。在1900年，务农仍然是最主要的职业，当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小农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种植、蓄养他们三餐所需的食物。在1900年，汽车——也叫作“路程计”（viamote）——仍然是件新奇的玩意儿。在美国农村地区，当时还没有电视、电话，当然也没有个人计算机。人们还是用手写信。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在1900年，你能买到卫生纸。

一个星期六，在布鲁克林一家窄小的酒馆里，我们轮流抱着烦躁吵闹的儿子。我很紧张地把这个构想说给希瑟听。她听后微微一笑，这让我记起了，我是为什么爱上她的。

一路向南

四个月之后，我们往南走，在布鲁克林一皇后区的高速道路上，越过一个个坑洞，颠簸前行。在我们那辆满布风霜的福特金牛座旅行车的后车

镜上，整片的曼哈顿摩天大楼在微微颤动。希瑟坐在前座，鲁德在后座扭动。其他的每一寸空间都塞满了东西。还有一辆搬家货运车会把其他东西搬过来。我的视线从镜子里的世贸大楼，移向车子里堆积如山的运动手提袋和装满泰迪熊的塑料袋，这些袋子随时可能倾倒，把鲁德坐的儿童安全椅淹没。前一天我在弗莱布什大道的西尔斯汽车用品店买的塑料车顶行李架，此刻在车顶上嗒嗒作响。在快速移动的车流中，我左钻右挤，寻找插入车道的缝隙。

我们都很兴奋，一起唱着歌。

“王老先生有块地，伊一呀一伊一呀一唷，他在地上养……”

“养了一头活生生的牛。”我大声唱道。

伊一呀一伊一呀一唷。

三天后，我们已经在探索弗吉尼亚州了，这里是托马斯·杰斐逊^[1]的家，他曾写过：“农夫是最善良、最具独立精神的公民。”尽管希瑟和我还没有开始务农，我仍然觉得，几年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如此的独立自主。

我们在里士满市（Richmond）西边下了州际公路，车子从农庄、旅行拖车，以及破败的加油站旁呼啸开过，这种地方还在卖活的蟋蟀，还有装在大盐水罐里的醋腌蛋。

“鲁德，你看。”我敲敲身旁的车窗，指向一些在草地上吃草的动物。可是他对自己手心里的金鱼状小饼干更有兴趣。不久，我们下了州际高速公路，让旅行车慢慢开进一座铺满石子的停车场。它位于一栋小屋旁边，小屋前方有露台，还有一个光秃秃的院子。我们把布鲁克林的公寓卖了，兴奋地带着这笔钱来到这里，第一次跟人约了看房子。

杰瑞·柏德个子很高，黑发修剪得很整齐，下巴蓄了一撮黑色的山羊胡。他穿着高尔夫球衫及装饰着缨穗的平底帆船鞋；古龙水的香味笼罩他

[1]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主要的起草人。

全身，飘扬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妻子艾许莉打扮得好像是要去参加鸡尾酒会，在这间尘土飞扬的路边办公室里，她的模样实在有些奇特。她的手腕、脖子和耳垂上挂了许多珠宝。她的头发高高耸立，好像一块用僵硬卷发做成的糖霜饼。除了卖房子，这对夫妇也卖保险，还出租储物用的铁皮屋。这些铁皮屋位于办公室后方的山腰上。他们是一对从红土地上起家的企业家。

现在是十月，我在打包时准备了长袖的衣服和毛衣，最后却发现天气很热——29摄氏度。最近这些天，我都是穿着行李箱中唯一的一件夏季衬衫，它已经开始有味道了——可是并非古龙水的味道。那些时髦滑头的村民和我们这种城市乡巴佬之间的差异，就像他们停在这片铺石子停车场的崭新闪亮福特探索者休旅车，跟我们这辆装满垃圾、车里到处是饼干屑的金牛座之间的差异那么大。

“我想到有几间房，非常适合你们一家人。”杰瑞说。我们嘎吱嘎吱地走过石子地，走到他和我们的车子旁边。希瑟和我心照不宣地对看了一眼。我们没有对他说出我们的计划。对他来说，我们是对城市生活失望、渴望找到绿野的都会夫妇。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他并跟他说，我是个想在乡下买房子的纽约客时，他眼中很可能闪着钞票。

我们大约开了16千米，走的都是狭窄偏僻的乡村道路。杰瑞开车，我记笔记。希瑟和鲁德坐在后座。杰瑞跟每一辆经过的汽车和卡车挥手打招呼，无一例外；有些车子经过时，他还会把食指从方向盘上竖起来，向对方致意；对于另一些驾驶，他则把四根手指从方向盘上轮流举起来。

我的好奇心终于征服了我。“这里的每个人，你全都认识？”我说。

“不全认识。”杰瑞说，他的目光从头到尾一直盯着马路，“也许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认识。在我这一行，你不能不跟每一个人打招呼。星期天上教堂的时候，你会碰到某人，他们会说：‘前几天我碰到你，杰瑞，可是你没有跟我打招呼。’”他说，他父亲连碰到马都会打招呼。

我回想我的童年时光，那时候，我住的小镇上，每个人都会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我不知道那边的人现在是否还会这么做。这里的景观也让我想到少年时代的家乡，那长满松树的山脚下——那片红土地、葛藤蔓生、灌木遍

布的新生森林。童年时代周末跟着父亲和兄弟到野外活动的回忆涌上心头：大热天在地上挖掘有着烟云纹路的水晶石；在被人遗忘、长满浓密树木的墓园里，寻找遍布青苔的墓碑；走遍新耕的田地，搜寻印第安人的工艺文物。我仿佛看到我父亲弯着腰站在土地上，大声叫我们过去：“孩子们，我找到了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我们站在犁沟旁，看着他用缓慢而戏剧性的手法，一小撮一小撮地挖开土壤——“耐心地把它挖出来。”他这么说。那是一枚半截埋在土里的箭头，我们的眼珠子几乎鼓出来，好希望它是完整无缺的。

“你有没有在这里找到过任何印第安人的工艺品？”我问杰瑞，“我敢打赌，这边的野地上到处都是鸟型的箭头和陶器的碎片。”

“当然。”他说，“在这附近，你可以找到佛卡威族（Fukarwi）印第安人留下的东西。”

“真的？”我兴奋起来，仿佛他正在挖出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那个族的名字怎么拼？”我把笔竖在记者专用的口袋型记事簿上，准备写字。

“不要问我。”杰瑞说，“我只知道他们是游牧民族，四处流浪。”

“真的吗？我从没听过‘佛卡威’族。”

“是真的。传说中，这一族的首长会站在山坡上凝视着地平线。”杰瑞把手举到眉毛旁边，慢慢地转动脖子。然后大声喊着说：“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

杰瑞狂笑起来，用空着的那只手响亮地拍打自己的膝盖。至少有三辆汽车开过，他都没有打招呼。

杰瑞带我们去看的地方，是一座地处荒僻、占地有22公顷大的农场，这是一座货真价实的垃圾场——玻璃窗四处散落，涂着灰泥的天花板杂乱地堆在地上，户外则是一丛丛荆棘、藤蔓和灌木交缠在一起。就我们所知，它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处荒僻。第二个地点同样令我们失望，只是失望的原因恰恰相反。它有32公顷大，包含了一栋完美的老旧农庄，还有几栋美到无法想象的户外库房。这里的屋况维持得不错，不久之前房子才空出

来。但是农庄内部看起来太新，农场距离小镇又只有几千米，而且还紧靠着一条有岔路的四线道高速公路。这就是我们面对的情况。

我们在这一州四处穿梭，寻找地图上红色与蓝色线条——高速公路——以外的白色地区。我们虽然跟杰瑞道了再见，但我们又找了一些房屋中介公司的人，在其他的荒凉小镇寻找合适的住处。后来看的房子跟杰瑞最初带我们去看的差不多，这些农庄不是太破败，就是太现代。我们逐渐觉得找到合适房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厌倦了住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拿撒糖粉的甜圈圈当早餐以后，我们开始怀疑那座理想的农庄可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要求非常苛刻，竟然想在这个时代买到一片适合过百年前生活的房产。近年来小型农场已经非常稀有，老旧的农庄纷纷重新装修厨房和浴室，架上小耳朵，用电动泵抽取井水，积极设置各种现代化配备。有了冰箱和小型超市提供的种种便利之后，农民从此不再使用地窖来储藏根茎类蔬菜。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座名叫以琳（Elim）的农场，看到它以后，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以琳位于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的南方，靠近宽阔、水色深黑的詹姆士河（James River）。这座农场从远处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一条路旁种着雪杉的车道，蜿蜒地穿过地形起伏的草地，来到山坡顶端。那里矗立着一座两层楼的木屋，前方的露台从房子的一侧延伸到另一侧。房子的后方连接着几栋饱受风雨侵蚀的户外库房，再过去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菜园残迹，还有一棵不知名的果树，蜜蜂在四周嗡嗡地飞。草坡下方是一条小溪，对岸有一片浓密树丛，朝着水面怒张枝丫。

我的房屋中介是一位名叫芭芭拉的中年妇女。她说，这座农场的屋主是里士满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的教徒，一共有九人。他们买下这座农场的目的，是为了迎接《圣经》所预言的世界末日。

《圣经·启示录》中说，当新的千禧年来临，世界末日也会同时降临。“以琳”这个名字来自《圣经·出埃及记》第15章第27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在世界即将下地狱时，以琳曾经是他们的绿洲——直到Y2K没有造成任何问题，农场生活便逐渐失去魅力。如今他们在找人买下这个地方。听完这番话，希瑟和我相

视而笑。我们跟这些人一样，也在找一片绿色的净土，在寻觅圣殿，在想办法从困境中寻找活力。

然而，我们越接近这个理想，在我们的耳边就听到越多的缺点。其中最刺耳的一个声音就是粪便。这里到处都有“黄金”——院子里到处都是鸡屎，门口的露台上孔雀的粪便斑斑点点，好像地铁站台地上黏附的口香糖，还有一坨不怎么新鲜的大便（狗的？猫的？小婴儿的？）在其中一间卧房的破旧地毯上迎接我们。这栋房子快垮了。我们看过太多房子，多半是用刚烤好的饼干香味来让可能的买主上钩。然而这个地方闻起来像一个肮脏的狗窝。

在家庭活动室里，这位房屋中介伸手指向一个黑色铁制的庞然大物，它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上方伸出几条管子，宛如铝制的昆虫触须。“屋主有一间卖金属加工品的商店。”芭芭拉说，她尽力保持愉悦的态度，“这炉子是他自己做的。”这座炉子所用的燃料符合我们追求1900年生活的标准，但是它的外观和体积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风格。我原本想象的景象是：我们一家三口围绕在古雅的富兰克林炉^[1]旁取暖。然而这个大怪物看起来更像“科学怪人炉”（Franken-stove）。

想要赶快找到一座农场住下来的心理压力，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即使我们明天就签下购屋合约，我们还是至少得等一个月，才能完成整个手续——装设所有的水电管线、在户外挖一个坑作为厕所，还要进行适应那个时代所必需的种种调整。我们的房子外头有一片菜园，必须在春天来临之前动手整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尽管我们内心怀着种种琐碎的顾虑，我们仍把心思放在以琳的优点上——它的位置远离尘嚣，地形混合了牧场和森林，有一条溪流灌溉这片土地，有几栋实用的户外库房，有一些果树，还有，它的售价我们负担得起。在短程的距离外有一家商店，它不仅卖必需的食物和菜园用的种子，也卖各种五金商品。往另一头去，沿着一条静悄悄

[1] 富兰克林炉（Franklin stove），约1740年美国开国元勋暨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的一种燃烧木柴的火炉。

的、铺满沙子的路走上一万米，就会抵达一家卖禽畜饲料和农作物种子的商店。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里会有这样一家商店，它令我们受益匪浅。以琳甚至有一间储藏根茎作物的地窖，至少卖房子的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这些信仰虔诚的铁匠造了它。它在房子后面，入口是一扇及胸的黑色金属门，这扇门看起来像是一座从泥土里浮出来的潜水艇指挥塔。但是我们看房子的那天，这间地窖——不管那扇黑色的门背后藏着什么——锁上了，而芭芭拉没有钥匙。“我们一定要进去看看。”我们说。我们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我们心里都觉得，要是没有地窖，一个1900年的家庭很可能会全家都饿死。我们必须有一间情况良好的地窖。

在她四处找钥匙的时候，我们开车去到那家卖饲料和种子的商店。希瑟留在车上陪着在儿童安全椅上睡午觉的鲁德。我走进店里看看。

“我能为你服务吗？”一个古铜色皮肤、身材结实的男人一面说，一面从摆商品的架子后面走出来。他有五十来岁，穿着褪色的休闲衫，外罩一件扣扣子的工作服，看起来像个带点弗吉尼亚州贵族气的乡村居民。

“是的。”我说，“我太太和我想买下这条路过去一点的那座农场。我想在你店里看一看。”

这位男士的脸上掠过一阵夹杂愉悦与怀疑的表情，“你打算用哪种农耕方式在这里务农？”

我没有答话，我不想现在就在这里大肆宣扬这个1900年生活的构想。“我们想用自己的双手，在田里种东西来养活自己。”

“是这样吗？”他说。

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他也是。所以我猛然转过身，随意摆弄一些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东西，然后故意将它们放回原位。察看一下这家店似乎是很重要的事情，然而我不太确定为何要这么做。

“最靠近这里的家畜拍卖场该怎么走？”我终于说，“我想买一头奶牛。”

“你们确定要一头奶牛？”这人说，扬起了一边的眉毛。

“为什么不呢？”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口气不要露出防卫的意味。我太想知道他的答案，几乎要把笔记本拿出来记录了。

“嗯。”他说，“你必须给奶牛挤奶，一天两次，一个星期七天，不管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都必须挤。如果养的是猪、鸡、马，你可以休息一天，对它们来说差别不大，但是养了奶牛的话，这就是一年365天，每天两次的事了。”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到如释重负。当然，你必须每天挤两次奶，我想。我很感谢他没有说出某种我所不知道的关于奶牛的事，没有让我们的计划受阻。如今我们已经把过去的生活连根拔起，我每天都在担心，是否会挖出一些属于现代生活无法缺少的事项，使得我们的计划显得不真实，对它造成致命的破坏。之前在纽约的时候，希瑟和我一开始就详细讨论这项改变激烈、企图逃离现代生活的计划——我们真的能做到吗？我们有胆子这么做吗？我们给自己一周的时间，提出一个让这项计划失败的理由。结果我们一个理由也想不出来——至少我们想不出任何一个我们克服不了的理由。过了一个星期，我们为公寓找到了买主。

这位好心的陌生人并不知道，不管我们要搬到哪里去，只要没有车，未来一年当中，我们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住处附近，即使是感恩节或圣诞节也一样。我们的食物必须仰赖那种“一天两回”的事。

“喔，我们准备好了。”我说。

他的神情仍然充满了怀疑：“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南卡罗来纳州。”我说，“最早是。我太太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

“只要你们不是从北边来的，”他答道，“只有这件事，我没法忍受。北佬陆续搬进来，造成土地价格上涨，税也随着涨。”

太好了。

“事实上，”我说，“我们在纽约住过。精确地说，住了十年。”听起来我们好像是被关在那里的监狱一样。

他笑了，摇摇头。“就是这样，对不对？在纽约致富，然后搬到南方来。在这里，你们的钱显得更有价值，对不对？”

“不是，不是这样。”但他只是看着我，沉思着，仿佛在说，是啊，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想做农夫的城市佬。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这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等着瞧吧。

在以琳那边，芭芭拉打电话给屋主以后，找到了地窖门的钥匙。我移开门闩，打开这扇沉重的铁门，门的中央有一个窥视孔。我沿着铁梯走下去，里头是一间狭窄的地下碉堡——之前是一座水泥蓄水池。

“看起来如何？”希瑟用充满希望的口气说，她从地面的入口探头往下望。

“你自己来看。”我答道。

她走下铁梯，环顾四周。“喔，我的天。”

这片空间——大约长三米，宽一点八米——阴暗潮湿，由于入口突起的部分吸收了阳光，里面连凉爽也称不上。靠墙的轻薄架子上摆着塑料瓶装的灯油、汽车电池，还有3.7升膨胀、爆浆的桃子和西红柿罐头。地面和四边的墙上有许多蟋蟀和长腿蜘蛛爬来爬去。食物腐坏和电池酸液的臭味，让我几乎吐出来。

“这里不是存放蔬菜的地窖，”我说，“这里是防空洞。”想到这栋房子的九口人全挤在这个肮脏不堪的地狱里，等待着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令我毛骨悚然。

真正的绿洲

这座危险的水泥地窖让我们买不下手，也让我们更加担心，觉得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适合的农场来进行这场实验。然而，我们离开以琳不久后，就找到了一片真正的绿洲，它位于雪伦多亚谷史威普（Swoope）的蓝岭山脉（Blue Ridge mountains）。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栋1885年砖造农庄的售屋传单，看到这栋房子的门口有座小小的迷人露台，还有手工锯出的尖顶木头篱笆，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

是的，这里也有一座存放蔬菜的地窖。它让人回想到旧时的岁月，这座凉爽的砖墙地窖就在房子底下，它耐心地等待着，希望有土豆再次填满它的

箱子，有一罐罐的蜜饯果酱在它那没有刨光的粗糙橡木架上成排地摆放。看到那部生锈的热水器和角落的那堆塑料管，我们并不担心。它们只是暂时是这样，如同松木横梁之间结下的那些蛛网。往后的几个月中，我们会清掉这些东西，还有20世纪以来逐渐累积的点点滴滴。

张其成诗五首

第二章 除夕迎旧年

贝儿来了

贝儿在六月的一个晴朗星期天来到这里，我们预计在一个星期后结束21世纪的生活。在七天之内，我们就要跟这辆没有车轮盖、里程数高达28万千米的旅行车金牛座说再见。它将会被贝儿所取代。贝儿是一匹一吨重的佩尔什马——这种负重马的品种源于“征服者威廉”^[1]时代诺曼底人的战马，她^[2]将拖着一辆古董级的木造马车。关于马，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站在它们后面。当贝儿的主人马歇尔·柯佛把她从他那棕色的长拖车里牵出来的时候，我所知道的这件事显得非常重要。我的老天，我想，她绝对不是夸特马^[3]。只有笨蛋或瞎子才会在她粗壮臀部的后方的范围内悠闲地

[1] 征服者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威廉公爵击败英国国王哈罗德，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王，创立诺曼王朝，史称威廉一世。

[2] 贝儿和后文中讲到的两只羊“星星”和“甜豆”，以及一只猫“挡泥板”，作者在原文中均用了拟人话称呼“her”。本书保留了作者原有的风格。

[3] 夸特马 (quarter horse)，四分之一英里的竞赛马，仅善于短距离冲刺。

停下脚步。

一周前，我在西弗吉尼亚州买下这辆木造马车。在此之前，它被摆在一间谷仓里，放了许多年，上面的灰尘积得很厚。刊登这则分类广告的男子面露惊讶之色，仿佛不太相信，怎么会有人真的想买下这辆马车，怎么会有人愿意给他1100美元现金，自己把这辆马车拖走。问题在于，我完全不晓得如何将这辆双轮马车，还有正在我家前面草地上“施肥”的这只动物连接起来。买马的时候，我不敢跟对方说出这件事。那样太没面子了。我在这里过了几个月，在这段期间，我上网问别人，如何才能建造一座户外厕所；我试着为山羊挤奶；我向农村合作社的人提出许多问题，他们不是露出困惑的笑容，就是不耐烦地皱起眉头。几个月之后，我就能用比较自在的态度，承认自己的无知。但是此刻我还没有对马歇尔说到这个1900年的构想，我也不想说出来，因为我害怕受到他的批评——或者，更糟的是，被他教训一顿。我心中有一个微小的声音：不要说，你可以自己完成这件事。

或许马歇尔察觉到我心中的不自在，他用牙齿咬住一根没有点燃的雪茄：“你要我把她套到马车上吗？”

“既然你人在这里，那就劳烦你吧。”我说，这话让我有了台阶可下，我不禁松了口气。

在谷仓旁边，马歇尔把整套的马具套到贝儿宽而平的脊背上。

“你也要仔细看，”他对希瑟说，“他很可能把其中的某个部分给忘了。”

他把贝儿从头顶到尾巴的扣环扣好，把她肚子上的马鞍带子系紧。然后，他让她往后退到马车的车轴前面，又扣上一些扣子，绑好一些皮带。在他的手下，她像小猫一样乖顺。

不久，马歇尔和我就坐上马车，沿着车道往前走去。马车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我握着缰绳，操纵马车的方向。

“咕！”我说，刻意把声音压低，模仿马歇尔的声音。“咕”在驾驭马的语言中代表“向右转”的意思。贝儿真的照着做了，她转向右边，走上那条紧邻我们农场的石子路。那条路的尽头是死路。到了那条路的尽头，我对她说：“喝！”她乖乖向左转。“哇！”我说，她停下来，等着我说出下一

个指令。

“对她说‘向后退’。”马歇尔说。

“向后退。”我喊道。贝儿向后退了几步，马车和马像货柜车一样，对折成九十度角。我的脚本能地上下踏着，在放脚的地方寻找刹车踏板。

“哇。”马歇尔叫道。

“喂，她还会倒退啊。”我紧张地笑了一声，紧紧抓着缰绳，我的姿势一点也没有说服力。

然而他只说了一句：“往前走。”贝儿就小跑步地往前走去。

我们走到距离农庄不远的地方，这位卖马人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你的技巧很不错。”他说：“让它们保持在很好的、稳定的状态。你会成为很优秀的马车驾驶。”不管他这话是否出于真心，我都为此感到兴奋。此刻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件事，而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害怕自己无法胜任。我手心感受到的皮革触感，让我觉得很舒服。他为椅垫装了三套椭圆形的弹簧，马车开过这条颠簸的路时，只是轻轻地摇晃着。除了车身漆成宝蓝色，加上车尾吊着一个荧光橘三角警告牌不太完美之外，它那高高的、纤细木条的车轮，镶着嵌板的后方载货区，让它看起来非常优雅。

我学会握着缰绳驾起了马车，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一整年都不上小型超市买东西，这是一回事。当然，我们会尽全力种植自己要吃的农作物，然而，这件事的失败，严格来说，意味着我们会饿死。但是这种危险，就像为读幼儿园的孩子准备大学学费，将这笔钱存好的时间往后延一样，会让你时时刻刻都摆脱不了它所带来的焦虑感。另一方面，驾着一辆前方有一匹马驮着的马车，几乎把我崭新而干爽的连接工作服全弄脏了。但是，我们若是认真地想要重建1900年的生活，就得掌握1900年的人使用的交通工具。“那时不是没有汽车吗？”一位在纽约的朋友关心地问我。对，当时美国有近7600万人口，却只有8000辆汽车。一般美国农民驾驶汽车的概率，大概只比水电工开着两人座潜水艇来你家修理水管的概率高出一些。

我签了一张支票给马歇尔，作为买马的费用。然后我跟他说明再见。希瑟站在前院，鲁德在她脚边摇摇晃晃地绕圈子，我对着她高兴地笑了。鲁德



2000年，我们决定回到1900年生活——没有现代化电器，一切生活所需都靠农耕手作而来。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找到了一座建于1885年的砖造农庄，它有木头篱笆、露台，与存放蔬菜的地窖。图为从远处眺望我们的特林柏磨坊农场。（Meryl Schwartz/摄影）

很高兴看到这个东西——一辆成人用的马车，还有一匹活生生的马，披着马鞍，身上的马具发出叮叮的金属声。尽管我几乎完全没有驾驶马车的经验，我还是没法放过这个全家人坐马车出去兜风的机会。

鲁德舒适地坐在我和希瑟中间，从马车上往下看，我们摇晃着，沿着小路走回去。特林柏磨坊农场（Trimbles Mill Farm）在我们面前延伸开来。它是我们的舞台。我们买下这个地方以后，便仔细察看这栋房子，结果发现前门的迷人小露台已经松垮下垂，角落上砖砌的柱子已经颓圯剥落，只剩下铁棍支撑着。篱笆的木条有半段不见踪影。房子里到处是大便：大小老鼠留下的粪球散落在露台的松木地板上。还有厨房的地板因漏水而腐烂，陷入红土中，并爬满小虫。大部分涂着灰泥的墙面，都被之前的屋主钉了夹板。有几间卧房的壁炉旁墙壁上，钉了一些长1.2米、宽0.6米的橱柜。

但是这栋房子的梁柱很牢固。除了颓圯腐坏与之后加上去的俗丽设置，



我们的特林柏磨坊农场，从谷仓望去的北山风景。（Logan Ward/摄影）

房屋原有的墙壁、窗户、门，以及铺着宽木板的地板，都是完整无缺的。我们把这外加的东西一层层剥去之后，发现了一个居所，就像美国作家霍桑的七角楼^[1]，这座房子仿佛也有“自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与阴森的回忆”。它那木工的手迹，它的砖块和灰泥，在自豪地展露历史的伤口与风霜。即使窗户上的玻璃，也是最初建造时留下的。今日我们从这些带着气泡、由工人吹出来的一格格窗玻璃里望出去，它们仍像百年前一样，让那片遥远的山丘呈现出扭曲的线条。

这是一栋很典型的房子。这座山谷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房子——两层楼的屋宇，用红砖砌成，结构对称，金属屋顶上有垂直的焊接痕迹。这些住宅所拥有的少量装饰通常出现在门前的露台上——这栋房子一开始吸引我们的地方，就是露台边上的那排尖顶的篱笆，还有墙上的托架。这些住宅建造得很

[1] 七角楼（house of seven gables），霍桑以他出生的小镇的一座七角楼为背景，写下他的名作《七角楼》（*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坚固，房子挺直地矗立在地上，那些从容不迫的工匠们建造这些房屋的时候，是为了让人们在里面长久居住。这些房屋证明了，这座山谷里农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孙，真的还继续住在先人的房子里面。特林柏家的第一代，于18世纪30年代从爱尔兰到美国，经过宾夕法尼亚州到史威普定居。当时他们在这里造了一间小木屋，还有一座碾磨谷物的磨坊。1885年，他们的生活获得改善，造了这栋砖房。杰斐逊写道：“一个国家的建筑物若都是用木材建造，这个国家永远也无法产生可观的进步。”特林柏家的人在1970年卖掉这座农场，结束了这个家族在这栋房子里连续住了230多年的时光。当年的小木屋和磨坊——一栋四层楼的木造建筑，装着一个直径5.5米的大轮子——都已化为尘土。只有这栋房子留存下来。

看到这房子四周的环境时，希瑟和我也觉得受到冲击。它紧邻雪伦多亚谷西边的阿利根尼山脉（Allegheny Mountains）矗立着。这座农场横向坐落于一块朝南凸出通往北山（North Mountain）的斜坡上，而北山是阿利根尼山脉的第一座山。在这片房产东边的尽头，中央河（Middle River）从旁边流过，奔向雪伦多亚河（Shenandoah River），流了几百千米后，注入奇沙比克湾（Chesapeake Bay）。过去几千年当中，这条河逐渐侵蚀这片凸出的斜坡，我们的农庄和连接它的几栋小屋，就坐落在这片高高的、陡峭的河岸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潺潺水声。农场的车道与此处的陡降地形（这是另一件对鲁德造成危险的事情），及陡坡下方薄薄一层页岩之间的唯一区隔，仅仅是一排木头围篱，还有几棵树。

我们一开始想象的农场，要有一条长长的车道开进去，里面有一栋隐藏在树木后方的隐秘农庄——这里一共有六棵树，包括一棵银色的枫树和一棵巨大的核桃树。

事实上，我们第一次去看房子的时候，只有一辆车从外头经过，那是一辆绿色的拖拉机，车子后面拖着一大捆圆柱形的干草。是的，它的确是暴露在马路旁边，也紧邻旁边的那片草地，但是我们对于它的人迹罕至感到惊讶。它就这么隐藏在阿利根尼山脚下林木繁茂的山坳里。如此僻静。事实上，到了夜晚，农庄便彻底被黑暗所吞没。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几星期后，

我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从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暂时寄住的公寓，开车到这里来打探环境，以便列出一张跟这房子有关的待办事务清单（修理露台、厨房地板要换掉等）。我坐在前门的台阶上，打手机给希瑟，通话的收讯不佳，我跟她说我在这里四处走动的情形。有一刻，我打了个呵欠，背靠到后面的台阶上。“哇！”我说。

“罗根，怎么了？”

“那些星星！你不会相信它们有多亮。”北斗七星、猎户座大星云，其他的星星我全不认识——除了天上那条灿烂宽广的白色拱形星河。“你还记得，我曾经在《时代》杂志上看到的那篇讲银河的文章吗？”我说，“嗯，我们马上就要加入能看到银河的人的行列了。”

此刻，当马车的车轮向前滚动，我的视线跟随着我们拥有的16公顷原野向前移动，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拥有过一大块土地。它缓缓地往上方延伸，连接到一条山脊。在路的另一边，一条小溪潺潺流过邻居那长满春天碧草的原野。我们的马车转了个弯，越过一座小山，便看到“雪伦多亚营地”门口的一对图腾圆柱在迎接我们，那是美国童子军组织的营地。营地后方是7300公顷的山区公有林。如果以琳是尘世里的一小块地狱，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只静静倾听马蹄铁踏在石子路上的金属摩擦声。我们沉浸在新的感动里，很高兴彼此能暂时停止争论，这些冲突已经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婚姻和这项计划，让我们觉得这两件事都有点不可行。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真的做下去了。”希瑟说，她露出开怀的笑容。我们深深地注视对方的眼睛，我们的目光头一次久久地相接在一起。

“我也没法想象。”我说。我看了鲁德一眼，他的下巴放在胸口上，随着车身轻轻地上下晃动。他睡得很熟。

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计划里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各就各位了。厨房里有一座烧柴的烹饪炉子，一对产奶的山羊在谷仓旁吃草，六只小鸡在朝南的鸡舍里走来走去啄食小虫，花园有独立的出入口，屋内有挑高的空间，橡树和松树的原木建材散发着古老时代的魅力——简而言之，这里绝对不比我们



这是户外厕所。使用时，我们往往无法放松，因为黄蜂会在厕所的角落做窝，而蜘蛛会在座位下方的暗处爬来爬去。

（Kenny Speirs /摄影）

早先在曼哈顿住的公寓差。从这栋房子看出去就是那座拥有百年历史、像高中体育馆那么大的谷仓。户外厕所建在一个刚挖好的大洞上。凿井工不久就会来施工，挖一个手工打水的井，并安装手动泵。这个泵以铸铁制成，漆成消防栓的鲜红色，侧边向外伸出一根长长的压杆。我们以邮购买下它，前几天寄到了。它看起来很像电视剧《衬裙交叉点》^[1]里的道具。

这项计划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们把21世纪生活的各种用具，从生活

[1] 《衬裙交叉点》（Petticoat Junction），美国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

里一件件地剔除。我开始感觉到，一切都在蜕变。

我让希瑟和鲁德在农庄前下车，然后慢慢地驾着马车，来到谷仓前面，这时，我的幻想在一瞬间猛烈地喊了刹车。仿佛我是马，有人拉着缰绳，发出“哇！”的声音，要我停下来。突然间，我想到马歇尔已经不在这里了，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此刻我在这里，我有一匹马，但我毫无驾驭马匹的经验，同时，我没有使用手册可供遵循。我的马此刻以一团神秘难解、乱糟糟的皮带和扣环，连接在我所坐的马车上。由于急着想实现这个计划，我没有为此刻做好准备。我怎么会愚蠢到没有事先学好驾驶马车，怎么会像个傻瓜一样，在马歇尔说贝儿会教我怎么驾马车时，竟然深信不疑？无论如何，马歇尔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没错，就一匹受过良好训练的马来说，她知道怎么照着我发出的指令去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叫她掉头，也不知道怎么为她套上马具，再把她套到马车上。在前一刻，我还是一个即将展开远征旅程的探险家。此刻我却觉得自己是个不负责任的浪漫主义者，惊慌感不断扩大，这种感觉把我带回大学毕业后，正要搭机飞往肯尼亚，展开为期一年的教书工作的那一天——我的第一趟探险活动。不料抵达纽约后，却发现忘了带护照，被迫中途下车。当时至少我还有两个朋友做伴，尽管他们无情地取笑我。现在我虽有希瑟作为伴侣，心中却感到异常孤独。

更糟的是，马歇尔所保证的，贝儿的个性“非常随和”的话，听起来不过是卖马商人挂在嘴边无伤大雅的夸大言辞。介绍我去找马歇尔的那个家伙说，贝儿是“防弹的”。他也是买卖马匹的商人，我把他的名片随身带了好几个星期，才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

“防弹？”我对着话筒说。

“是的，防弹。你知道，她是那种不会乱踢，不会突然站起来，也不会弄翻马车的好马。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马。那个为我做事情的家伙，不久前买到这匹马。”

“那个家伙”就是马歇尔。此刻马歇尔这匹“防弹”的、个性随和的好马，就是不肯好好地站着不动。好不容易才把她哄住了，让她愿意停下脚步来。我跳下马车时，她几乎把马车拉翻，差一点就压到我的脚。

“女孩，不要紧张。”我一面说，一面把涌到喉咙口的强烈恐惧感压下去。我所带过的最大动物是黄金猎犬，但是现在我必须让这匹马卸下马具，走到牧草地上去。如果贝儿只是一般的乘骑用马——体型高瘦的那种——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她的体型相当于两匹马的总和。她就像一头没有角的犀牛那么粗壮；她的一个蹄子若是不小心踩到我脚上，就足以把我的脚骨踩碎。只要踢到我一下，就可能要了我的命。

我解开连接马和马车的四条皮带。贝儿往前走了几步。

马车长长的车轴落到地上。我决定把她系在篱笆上，这时，她的身上仍然套着马具。

任何一个养马的人都会告诉你，笼头是马具中最基本的部分，它是一组皮带，只能用一种方式，套在马儿的三角锥形头部。这就像你只能从某一个角度穿上长裤一样。我试着把笼头从贝儿的脑袋朝上拉，即使用尽全力，还是没法解开这玩意儿。我只有惊惶地把它放下。

也许我可以把缰绳绑在某个东西上。然而贝儿走开了，长长的缰绳从我手中脱落，我发现我跟在她身后，我觉得我怎么也不该落到这步田地。我用力拉住左边的缰绳，大声说：“喝！”要她向左转；她向左走了一步，然后不停地向左转，绕起圈圈来，仿佛想要走过来踩我。“咕！咕！咕！”我叫起来，要她向右转，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毕佛^[1]着急的时候发出的尖叫声。

我终于把她带到篱笆旁边，将缰绳绑在凸起的木板上。我一把拿起笼头，快步朝着房子跑过去，想赶紧找到希瑟。“怎么了？”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问我，“贝儿在哪里？”

“这玩意儿到底该怎么用？”我一面说，一面举起笼头，仿佛它是一件魔术胸罩。我们合力解开笼头上的皮带，理清纠缠的两端。我紧紧抓着这些皮带，以免拿歪了又功亏一篑。

我往谷仓走去，希瑟在我背后喊道：“打电话给琴妮。”琴妮是个深色

[1] 毕佛（Beaver Cleaver），美国20世纪50年代电视剧《小英雄》（*Leave It to Beaver*）的主角。

头发的女子，在史威普担任邮差。她家跟我们家只隔着一座农场，她跟她母亲一起养奶牛。我们看过她骑着马，让牛群聚拢到一处。她一定知道该怎么处理贝儿。

“不要。这件事我可以处理。”

“打电话给她！”希瑟说，她用既生气又恐惧的眼光看着我。

我瞪回去，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猛然转身，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回去，一个人面对贝儿。

回到谷仓旁的院子以后，我绕着棚子转圈圈。贝儿就在这里，没有系在原来的地方，臀部抵在篱笆上，缰绳拖在泥巴地上。她垂着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废物，试试看我的厉害，试试看就知道。”我瞪回去，因为内心恐惧而感到瘫软，我不仅害怕被贝儿践踏，也对未来这一年的日子感到惧怕。在我们一家人坐马车兜风的时候，让我觉得充满希望、心情振奋的生活，如今显得非常真实，非常可怕，而且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我脑中有个声音在低语：“算了吧，你这个笨蛋。赶紧认赔了结吧。”

你怎么会没有电话

在纽约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报道，从登山自行车到山区健走，访问杰出的田野生物学家和全球知名的伟大探险家。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在任何一方面有过优异的表现。这些受访对象在追求自己热爱的目标时，曾经赤手空拳跟鲨鱼搏斗；勇敢地面对拿着机关枪的反抗军；忍受肺部积水的痛苦。而我呢？我因为持续的压力而受伤——用计算机造成网球肘。出外旅行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无论我怎么努力说服自己，要自己相信我不是，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这个探险计划——我是这么称呼它的——我将证明我能够逃离我那舒适旁观者的角色，做一些艰难而密集的事，且要坚持到底。这是关于自力更生的事。

直到不久之前，事情的进展都很顺利。

我们切断跟纽约的关系以后，就开始进行重现1900年生活的必要步骤，借着一些可以实行的要点，把我们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落实到具体层面。到了一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座农场，也定下了5月15日正式展开新生活的目标。我们在邻近的小镇租下一户带家具的公寓，把清单上的待办事项一件件地完成：让这栋房子可以住人，而且设施符合1900年的生活；挖一个户外厕所的大坑；装好抽地下水的手动泵；采买好老式工具；建好畜栏；除去整片及腰的杂草，将它整理成菜园。然而，我们完成的事情越多，清单上待办的事务也越来越多。把腐坏的厨房地板修好以后，我不得不挖出一条六米长的暗沟，以免积水再次侵蚀地板。在我们买小鸡之前，我不得不把鸡舍的屋顶换掉，在里面隔出一些空间，作为母鸡生蛋和公鸡住的地方。不久，我们必须做的许多环环相扣的琐碎事情，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格列佛一样，受到许多束缚^[1]。

在使用大槌和铁锹干活儿的空当，在撕壁纸、挖土坑、劈砍杂草、用锄头耕地的空闲时间，我们开始阅读相关书籍。我们决心要学会这套全新的（同时为大多数人所遗忘的）生活方式。要是用21世纪典型的做法，我们会想办法迅速地了解该怎么做，用大学生修一个学期课的时间，就把许多个时代累积出来的务农知识全部吸收。我们不仅大量阅读历史书籍，翻阅百年前出版的杂志期刊，寻找有关1900年生活的线索——当时有哪些工具可用，某些东西是到了哪一年才被发明出来，在杂货店能买到什么东西，邮购能寄来什么东西，还有日常生活的习惯、烹煮食物的方法，年节假日的习俗等。我们也研究现代社会的农耕指南，跳过拖拉机、电动工具和禽畜抗生素的部分，寻找能帮助我们安稳度日的建议。尽管我们读了许多书，我们最重视的一本仍是卡拉·爱默瑞（Carla Emery）的《乡村生活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Country Living*）。这本书在20世纪70年代“回归

[1] 格列佛是名著《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主角，该书描述主角周游大人国、小人国等四国的奇遇。本句的比喻来源于该书一开始描述，格列佛在南太平洋航行时巧遇暴风，人在海洋中漂荡了好几天，当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警觉手脚和身体被紧紧地钉在地上，原来他已成为小人国的俘虏。

土地”运动兴起时出版，书中探讨的主题包罗万象，从“荒僻森林分娩”到“如何安置死去的家人”，不一而足。

我们到农村供销合作社去，拿了有关使用罐子腌制食物的宣传小册，也上了晚间的种菜课程。我们在网络上听那些回归乡村、擅长务农的人聊天，学习他们目前的耕作方法。我们脑中充满了各种事实和数字，该做的与不该做的事情。拿地窖来说：应该把胡萝卜埋在一层层潮湿的沙子里，把苹果储存在木箱里。不应该把两种食物放在一起，要不然胡萝卜吃起来会有苦味。应该把土豆储存在地窖的木箱里。不应该把南瓜存放在地窖里，因为它们会烂掉。应该把南瓜放在阁楼上，但是不要让它们被寒气冻坏。最会下蛋的母鸡，我们现在知道，有着潮湿的直肠，尽管对我们来说，该如何运用这项建议，仍然是一个神秘难解的谜。

就像过去的小镇居民一样，我们也在重新学习美国农村生活。史威普的人口数为五百人，最近有人出生或死亡，会让这个数字稍有增减，这些人就住在这片丘峦起伏的辽阔农地上。尽管此地曾经有一间罐头工厂、一家杂货店和一所邮局出现在火车站旁，今日的史威普，村子中央的聚落已经消失了。开往西弗吉尼亚州的运煤车，还有驶向芝加哥的美国国铁火车，仍然嘎吱嘎吱地从小镇旁边开过，产生的蒸汽（比喻性的说法），攀越亚利根尼山脉。但是火车站已不见踪影，杂货店和工厂也消失无踪。最后剩下的社区聚落遗迹是那间邮局。不久之前，希瑟打电话去邮局，提出一项要求。后来发生的让我们领悟到，史威普是个步调多么悠闲的地方。

你知道，我们想出一个好主意，就是把我们的信箱从“童子军巷”移到将近一百米外的“特林柏磨坊路”上，这样的话，我们的地址就可以跟我们农场的名字一致了。特林柏磨坊农场，地址：特林柏磨坊路，史威普镇。多么古雅而有趣。因此希瑟在电话中间邮局说，该怎么做，才能把信箱移过去。

“哦，我不确定能不能这么办。”邮局的女局长蛮横地说，“你得跟邮差谈谈这件事。而且你必须打电话给911紧急救援热线的人，要他们把地址改过来。总归一句，你干吗要这么做？这个信箱就在你们家的车道旁边。”

我们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过了几天，希瑟到邮局办事的时候，这位女局长却说：“你们打算把信箱移到另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发现，她很清楚这个信箱的位置。她父亲曾为特林柏磨坊的主人雇用，在这里帮忙农事。即使希瑟再三向她保证说，我们已经改变主意，不想挪动信箱了——真的，实在太麻烦了，她还是朝着负责我们那个地区的邮差点点头说：“跟她讨论这件事。”

“所以，”这位深色头发的迷人女士说，“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会想把信箱挪到另一个地方呢？”这就是我们认识邻居琴妮的经过。

对我们，以及我们的这项怪异的计划，这个慵懒小镇以养牛为生的镇民，他们会有什么看法？每一次我从我们的院子里看出去，凝视唯一看得到的邻居家时（琴妮住在将近一千米外的一座山丘后面），都忍不住这么想。我可以模糊地辨识出来，那是一栋小小的、类似鳕鱼岬^[1]的砖房，隐藏在北边的一片云杉林后面——万一鲁德被响尾蛇咬了，我第一个会跑去求救的地方，就是那里。可是我想象得到，到时候可能不会一切顺利。我的肺会像燃烧一样，头发蓬乱得像疯子；我会穿着肮脏的衣服，脸上流露出恐惧到发狂的表情。我仿佛看到自己在敲门，结果一个乡下人拿着猎枪对着我，他气极了，因为我破坏了他看电视的兴致。你住在哪里？你怎么会没有电话？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所知道的关于我们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是从纽约来的，这让我想到“佩斯牌莎莎酱”（Pace salsa）的广告词：“纽约市？”牛仔们喊道：“扔条绳子给它！”

我不是你的员工

贝儿来到这里的那天，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计划预定的开始日期。修篱笆的工人延后完工时间，加上清单上最后阶段的待办事项不断增加，让我们

[1] 鳕鱼岬（Cape Cod），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半岛，形状像一个鱼钩。

的开始日期被迫往后延。如今有些种子已播入土中，夏季不久就要来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犹豫不决。我还得为厨房的炉子装上管线，如果我再不把鸡舍通往户外鸡场的通道建好，我们那座宽敞的鸡舍很快就会成为尸横遍野的死鸡堆积场。

这些压力也让希瑟和我的关系恶化。我们精疲力竭，暴躁易怒，由于鲁德夜里经常醒来，我们都睡眠不足。这种情况是从我们搬出之前租下的舒适住所，到这栋农庄定居之后，才开始出现。希瑟和我以平等的伴侣关系，展开这项探险，就像我们在纽约的时候一样，我们试着保持男女平等的关系，两人都工作，一起分担照顾小孩的事。但是，由于整修房子带来的大量灰尘和噪音，以及担心鲁德的安全，加上要让每一件事准时完成——几乎无法做到的强大挑战，在某些时刻，我开始表现出发号施令的态度。

一天早晨，我们在给土地施肥。院子里长着杂草，泥泞满布，简直是乱成一团。我们为每一件事发生争执——什么地方该种什么作物，两排种子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多少，都可以吵。

“让铲子随着你的脚步铲下去。这样做起来比较快。”我说，一面看着她拿铲子朝着泥土乱戳，浪费她的力气。她咬着牙，把她想说的话吞回去。我们把土铲到独轮推车里，她往前推，嘴里咕咕哝哝地发着牢骚。车轮在泥巴里卡住了。

“看这里，”我从侧边走过去，握住把手，“像这样。”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把车轮拉出来，希瑟就发脾气了，“我不是你的员工！”她尖声说。

“我从来没有说你是！”我也快要爆发了。我紧紧握住独轮车的把手，用力往空中一提，嘴里发出响亮的怒吼。独轮车“砰”的一声落到地上，朝着希瑟弹过去。她没有向后退，只是站在那里，两脚牢牢地扣在地面，双臂在胸前交叠。“你别想，”她发出低吼，“吓倒我！”

这一天过后不久，我们庆祝结婚七周年纪念日——七是幸运数字，除了在婚姻里。

妈咪和爹地正在……挤奶

我们再次把这个计划的开始日期往后延——这次延到6月11日。

6月10日的早晨，我在厨房里，用螺丝、起子将一部古典风格的咖啡磨豆机固定在墙上。

“这该死的老东西。”我说，我想磨一点咖啡豆，一个不小心，手指的指节撞到墙壁上，“明天以前，我们一定要办好这件事。”

“什么事？”希瑟说。

“买一部磨咖啡豆的机器。这一部坏掉了。”

“我们来不及的。”希瑟说，她不高兴地吐出一口气，仿佛把责怪的意思重重地丢到我的肩膀上，仿佛这部磨豆机坏掉了——还有最近进行不顺利的每一件事——全都是我的错。

“你的意思听起来像是，你觉得我们根本做不到。你有没有试着去做做看呢？”

“我当然有试，罗根。这几个星期，我做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累死了。”

“我们不能再把开始的日子往后延了。我们说过，要在春天开始的，而春天在十天内就要结束了。我们必须开始了。让我看看那张清单。”我从她手上一把拿过单子。先做哪一样？哪一样不做算了？我的目光一行一行地往下移：割草，到自助洗衣店洗衣服，把垃圾送到掩埋场，整理房间，买邮票，把不是1900年的用品（电动割草机、球鞋、娃娃车、塑胶玩具、盥洗用具、清洁用品、计算机）放到我们租的仓库里去，把租来的卡车还回去，在计划开始前，买好最后一批日用品（包括，我在心中加了一样，一部咖啡磨豆机）。我究竟要到哪里去，才买得到这种该死的老式磨豆机呢？这时，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目光。

“用吸尘器把地板吸干净？”我说，“饶了我吧。在1900年，我们可以用扫帚把房间扫干净。”

“等一下！”希瑟尖声说，“这是我们的清单。你不能不跟我商量，自己就开始删除里面的项目。你这种态度让人觉得，这个计划只属于你一个

人。这样太不公平了！”

鲁德在楼上尖叫：“妈——咪——！”

我冲出屋外，跳进旅行车，把车开到车道尽头，开出去，到了有停车标志的路口，我几乎没有减慢速度。要上拱桥的时候，我突然减速，车子发出“轰”的一声，我心想，谁在乎这个！反正以后我不开车了。我打开收音机，找到播放摇滚乐的电台，风刮着我的脸颊，我深深吸进一口带着牲口粪便味道的空气。

我把车开回去，不发一语，带着愤怒的目光，车上又多了一个纸袋，里面装着保丽龙杯的咖啡，几小包奶精粉，一瓶橘子汁，还有几个夹蛋的比斯吉^[1]。

“我们12号开始。”我说。希瑟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甚至没有看我一眼。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我们这次的小小冒险，原本应该让我们更亲近的。

还有别的事也带着反讽的意味。为了减轻压力，我们来到这里，却给自己找来大到受不了的压力；我们拼命赶工，是为了让生活步调慢下来；我们借着现代科技的助力，重建过往的生活面貌；我们丢掉之前的生活用品，用1900年使用的大量器具（具有强烈的梭罗式苦行主义^[2]色彩）来取代。在户外耕种原本应该让我们脚步轻健，两颊红润，然而希瑟却因为在这里辛苦工作，深受腕管综合征^[3]之苦。

要怪就怪山羊吧。

这两只努比亚母山羊（Nubian goats）叫甜豆和星星。它们有着宽阔的鹰钩鼻、软垂的耳朵，大而圆的眼睛上覆盖着重重的眼皮，肚皮像马背上鼓鼓的鞍囊，从腹部的两侧凸出来。贝儿来到这里的几天前，我们开着租来的货车，把这对同母异父的姐妹花从养殖山羊的农场带回来。这两只羊放在卡

[1] 比斯吉（biscuit），指软烤饼，小圆面包，此处为音译。

[2] 梭罗式苦行主义（Thoreauvian asceticism），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曾在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畔独自筑屋耕种两年余，著有《瓦尔登湖》。

[3] 腕管综合征（Carpal Tunnel Syndrome），常见的手部神经病变，症状包括手部疼痛、麻木、沉重感、感觉迟钝及水肿。



甜豆和星星：永远好奇，永远饥饿。（完全无需证明）

车后面，我蹲在旁边，一面抓着她们脖子上的项圈，一面担心地想，不知道山羊会不会咬人。

至少这两只山羊不咬人。它们两个，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甜豆，生来就亲切可爱，而且敏感。那一天，我们开车把它们带得离她们的“妈妈”越远——这位女士（育有11名子女）在她家起居室的长沙发上，把这两只小羊当成小婴儿一样，用奶瓶喂她们喝奶——她们的神情越是惊慌，她们瞪大凸出的双眼，舌头自嘴边垂下，发出几乎跟人类一样的尖厉叫声。每当我们因为转弯而减慢速度，或是在路口停下的时候，我会蹲伏下去，因为我害怕别人听到她们的尖叫，会以为我在虐待小孩。

她们来的第一天下午，由希瑟负责挤奶。她拿了桶子和有盖的盒子，勇敢地大步走到谷仓里我们称为“挤奶室”的那块地方。她只尝试挤过几

次奶，在这方面仍是新手，而且这两只山羊还在想家。这两种情况加起来，是一场灾难。甜豆一站上挤奶的台子，就用后脚站了起来。她紧张地扭动身躯，用脚乱踢。我奋力抓住她的两条后腿，希瑟则不确定地捏住她的一对乳头，往下拖，羊奶便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

以这样的速度，要把她们身体里鼓胀的奶汁给挤干净，似乎要花上无法想象的漫长时间。然而，希瑟必须每天挤两次，将她们的奶汁挤干净，否则这两只山羊的身体就会非常疼痛，而且会有细菌感染的危险。1900年，在医学界研发出抗生素之前，乳腺炎（感染导致的乳房发炎）往往会夺走羊的性命。此外，我们若没有每天都去挤奶，渐渐的，这两只羊就不再分泌乳汁了。而我们既不懂得如何繁殖羊，也没有时间等她们怀孕。

甜豆扭来扭去的时候，这些念头飞快地掠过我的脑海。甜豆一只沾满粪便的蹄子落到羊奶桶里，希瑟发出一声尖叫。我呻吟了一声，把我的肩膀塞进甜豆的肚子底下，把她顶住，压在墙上。这段时间里，鲁德一直站在约一米以外的地方，他看起来很困惑，很害怕，他发出尖叫，要我们注意他。

“等一下！”我咬着牙说，“妈咪和爹地……正在……挤奶！”

希瑟挤完甜豆的奶，把她从挤奶台上带下来，让她进到畜栏里去。我们还没能喘过一口气来，星星就莽撞地冲过来——她的年纪比甜豆大，体型也比较大，个性更是执拗——她狐疑地把脑袋向左边摇，向右边摇，又坚决地将四只蹄子死命地固定在原地。我嘴里咕咕哝哝地发着牢骚，把她放到挤奶台上，将她的头摆在支架上。于是这段痛苦的考验再次展开。希瑟把奶挤进一桶已经脏了的奶水里。我们都明白，等一下还是不得不放弃这桶羊奶，将它倒到篱笆外。

她挤完了以后，我们把桶子集中到一处。我说：“你会越做越好的。”我的本意是安慰她，但是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漠，不太有安慰的意味。鲁德还在哭，我把他抱到怀里，试着向他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表现出似乎在攻击这两只羊的举动。

过了一周，希瑟挤奶的技术的确有所改进，她的手也因为操作农事而开始发麻，灼热的疼痛感从手腕蔓延到手臂。一天早晨，她用力做了二十

分钟甩手臂的运动，好让手臂的血液流通。然后，她一把提起几个装羊奶的桶子，走向谷仓。我跟鲁德留在屋里。十分钟后，我听到希瑟大叫说：“罗根！我需要帮忙。”

“我没法叫贝儿离开挤奶室。”我抱着鲁德走进挤奶室的时候，她怒气冲冲地说，“她一直把头伸进来吓甜豆。”

我利用手里的一把谷子，将贝儿引到她的畜栏里，再把门关紧、上闩。我听到甜豆的咩咩叫声与蹄子在木造的挤奶台上摩擦的声音。

“不要！”希瑟尖叫，“停下来！”

然后我听到一种没听过的声音。我走到那扇可以独立开关的上下两扇门前面，悄悄地推开上面那扇门，看到希瑟啜泣着，把身子伸到甜豆的肚子底下，试着哄她，好挤出最后几滴奶。

“我的手痛死了。”她揉着两只手的手腕。鲁德往后退，他的脸被恐惧笼罩。

“你可以教我。”我说，“没道理让自己这么痛。”

尽管我接手了挤奶的工作，每天跟这两只羊奋斗两次，希瑟的手还是痛。希瑟知道，再过不久，她就再也不能挤奶了，因此她去看了医生。医生诊断说，她的疼痛是因为患了腕管综合征。这个病是挤奶引发的，不过之前拿锄头、用铁铲、推独轮车和撕壁纸，也都有关系。

对希瑟来说，这消息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她向来喜欢亲自动手做。在纽约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在翠贝卡办公大楼（Tribeca office tower）工作，只不过是一个齿轮，每天穿梭在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世界里，与争夺补助金的知识分子为伍。希瑟读大学的时候，春假的时间都在当义工——教英文、为危地马拉难民油漆房子，还在佛罗里达一所监狱担任翻译人员。稍后她在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的古巴难民营工作。帮助苦难人士的经验启发了她，让她拿了人权方面的研究所学位。她很习惯自己一面感到全身酸痛，一面咧开嘴露出感谢的笑容，她将这些感觉视为自己把事情做得很好的象征。在纽约，当她健康状况最好的时候，她共事的上司是个从小表现异常优秀、把部属当作奴隶般驱使的人。那时希瑟的问题只是脖子痛，这是因为

压力太大，夜里磨牙造成的。之后她就戴着橡胶护牙套睡觉，以免磨牙伤到牙齿。

希瑟向来不怕挑战。她小时候就自律地、专心致志地学习芭蕾舞，参加全国各地的节庆活动表演。在纽约的时候，她和我都接受体能训练，参加纽约马拉松比赛。（这次参赛的前一年，我也参加了，她则没有参加。我们第一次跟对方说“我爱你”，是在两人都汗淋淋、泪流满面、快速奔跑时，互相拥抱而说出口的，当时我大约跑到马拉松的第29千米，而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她。）如今希瑟渴望再次接受这项能带来具体成果的挑战。她抓住这个机会，尝试回到那个体能的劳务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时代。然而她的身体却出了问题。

最后一站：古老的二手货店

在11号的夜里，重新涌现的思绪——关于希瑟的疼痛，我的挤羊奶障碍，害怕要面对贝儿的恐惧——让之前困扰我的魔鬼再次活跃起来。我的意思是，看看我们。我们的同侪都在拼命存钱，作为退休金和小孩上大学的学费，我们却在做什么？拿我的收入——加上希瑟全部的事业——来换一块前不着村、后不搭店、占地16公顷的土地。我已经开始觉得这里像一座监狱了。我没有把内心的疑虑告诉希瑟，尽管来到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决定，我还是觉得，应该受到责备的是我。也许是我的错。也许这个构想是一种受到长久压抑的鲁滨孙式的幻想——逃离社会，靠着自己的智慧活下去，带着妻儿一起浪迹天涯。我曾飞到肯尼亚过了一年。希瑟和我交往不久后，我就说服她辞去工作，跟我搬到厄瓜多尔，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当然，这些都是不同凡响的经历，但那时我是不是在逃避现实？现在我会不会也是在逃避呢？我究竟在干什么？

还有眼前的这个隐忧。我们的探险，严格来说，才刚开始。

清晨的确拥有强大的力量，能让一颗烦扰的心灵变得清明。我在12号

的早晨醒来，觉得神清气爽，于是我重新开始思考那些还没有做完的事情。我跳进旅行车，开最后一趟车到镇上。去邮局买邮票。到银行提一千美元现金。最后一站是主街上的一家古老的二手货店。除了咖啡磨豆机，我们还需要削铅笔机，还有蘸墨水的钢笔和墨水，因为不久后，写信将会成为我们跟所有超越呼喊距离的人联系的唯一方法。

我推开店门，门上有个铃铛叮当作响，我看到老态龙钟的店主乔治正在摇椅上打瞌睡。我是在附近的巡回拍卖会上认识乔治的。希瑟和我在这个拍卖会上，买到了我们需要1900年时期的大部分工具。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鬼魂，我摇了摇一个装满锈蚀万能钥匙的锡罐。

乔治受到惊扰，醒了过来。“嗯，哈啰，年轻人。在史威普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对我们唯一的了解，就是我们在小镇的西边有一座农场。我没有对他提起我们的计划——只是没想到要讲。然而在此刻，我突然想到，我将有一整年的时间，不会到乔治的店里来。

“一切都很好。”我答道：“努力不让杂草淹没我们。”我跳过闲聊，对他说：“喂，我要找几样东西。你有老式的咖啡磨豆机吗？”

他慢慢走到一张桌子旁边，桌上堆满陶瓷的烹饪用具、陶盘瓦罐，以及许多有金属密封盖的玻璃瓶。他找出一个盒状的木制磨豆机。标价的纸牌上写着90美元。

“这个能用吗？”我问。

“我也不太确定，孩子。”他歪着头，用嘲弄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几乎能听到他心里在说，这是哪门子的问题？这玩意儿是古董啊。

太贵了，而且可能没法用，我想。我不希望自己像以前追求新产品一样，花大钱只是为了买到古时的用品。

“有削铅笔机吗？”我说。

“削铅笔机，嗯，让我想一想有没有。”他缓步走到一个放满小摆饰的玻璃柜前面。我的时间紧迫，但是乔治一点也不赶时间。

“这里有一部。”他终于说，他拉出一部小小的、廉价的铸铁福特T型

车^[1]，车尾有削铅笔刀。它一点也不旧，只是做出旧货的样子，就是卡车休息站的礼品店卖的那种怀旧的廉价摆设。标价牌上写着12.5美元。

“这个可以用吗？”

乔治用逗趣的眼光看着我。“我们来看看能不能用好了。”他从柜子顶上拿起一个装满铅笔的笔筒。它削出了尖头，不过不太尖。

“我出10块钱买它。”我说。

“嗯。”他停了一下，从容地说，“这部小削铅笔机挺特殊的。我不想削价卖。我卖你12块好了。”

“好。”我又看到一个玻璃柜里有两支木质笔身、笔头是钢铁制的钢笔：“这两支钢笔我也要。”

“这两支笔一定可以用，”他说，“只要你有墨水。”

我把一张50美元的钞票递给乔治，尽可能耐心地等他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找我。我一把拿起买好的东西，准备走出去。

乔治说：“听着，你再考虑一下，要不要买这部磨豆机。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磨豆机了。”

“我会找到的。”我一面说，一面转身往门口走去。

“这个星期五你会去绿谷（Green Valley）吗？”他大声说，他指的是那个拍卖场，有一天在那里，我和他都出价想买一辆古董三轮车，结果我赢了，为此他对我感到又敬重又憎恶。

我停下脚步，把手放在门上，转过身面对他。“不，我想我不会去，乔治。”我一面微笑，一面扫视成堆的老式工具、乡村风格的家具、橱窗里的古老橡木冷藏箱和我几乎买下的那部手摇式唱机。当时我想，等我们没有了插电的音响，这唱机若能带来一点音乐，不知道有多好。我的目光移向那个插了生锈的耙子、铁铲和锄头的大桶。我该走了。

“你很快就会回来的，年轻人。”他说。

“我会的。”我没有说真话。

[1] 铸铁福特T型车（Model T car），美国福特汽车于1908—1927年推出的车种。

不久，黑暗就会降临

我开快车回家，一直到我家前方那座横跨中央河的桥才放慢速度。我的口袋里还有961美元，前座纸箱里摆着我们最后一顿外带餐点。这时，我看到琴妮，这位邮差兼养牛户的邻居骑在马背上，手里拿着一束橘色的金针花。她穿着紧身牛仔裤，脚蹬马靴，上身是西部牛仔衬衫，浓密的黑发绑成马尾。她的脸因为在户外工作而晒成古铜色。琴妮可能有四十岁了，我们只跟几个本地人说过这项1900年的计划，她就是其中的一个。身为史威普唯一的邮差——因此她的角色相当于社区布告栏——她帮忙把这个消息传开。我们不在意她这么做，因为这为我们省去了许多困窘的时刻。很高兴认识你。是的，我们刚搬来。顺便提一下，你知不知道，我们……

上个星期，我们每次碰到琴妮的时候，她都用一种不只是好奇的口气问我们，我们的计划要在哪一天正式开始。“如果不在星期二开始，你们要让我知道。”到了星期六，她这样对我们说。显然她在筹划某一件事。

我把车子开进我们家的车道，停了车走到琴妮的坐骑旁边，希瑟和鲁德也在那里。这时，我明白她准备做什么了。

“小马快递！”她把当天的邮件交给我们，然后把花递过来。

“所以之前你计划的就是这件事？”希瑟说，“你真可爱。”

琴妮比较习惯别人说她直率而不是可爱。她说：“对，我之前就跟你们说，如果日子改了，就要告诉我。”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没有真的改。我现在就要去把车停好，以后就不开了。我必须买削铅笔机。”

“也许你应该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希瑟说，“每天骑在马背上送信。”

“我可不干！我没有发疯。”琴妮拉拉缰绳，不让她的马吃我们的草，“你们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我可要去洗我的热水澡。”

我坐上我们的旅行车，把车停到一块上坡地的库房里。这栋存放各种器具、摇摇欲坠的小屋立在草地上，比比萨斜塔还要倾斜。之前我们打算卖掉这辆车，但是因为太忙，而且不久我们就发现，已经来不及刊登卖车广告

了。此外，一年以后的今天，也许我们梦醒了，会回到开车的生活。我们打算用车子。同时，我心中虽不免想到，也许有一套适当的防护措施可以让它不致朽坏，但我还是关上小屋的门，就这么走开了。

我们也不想用电话，因此，在取消信用卡、汽车保险和网络账户以后，我们把电话收到抽屉里。不过，经过多次的辩论，我们决定保留电话线。希瑟和我都没法摆脱一幅景象，就是鲁德——年幼、好奇、脆弱——被响尾蛇咬到，被黑寡妇蜘蛛蜇到，被贝儿踩到，被木柴炉烫到，从两层楼高的干草棚上摔下来，或是掉进中央河里。高死亡率——1900年的儿童死亡率比今日高出15倍——是我们不想重建的1900年生活层面。此外，只要我们不把电话重新装上，这样做就不算作弊。

那天下午，电力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穿着灰色的工作裤，头戴黄色硬壳帽——来敲我们家的门。“公司说，你们要剪断电线。”他用疑惑的口气说。

“对。”我开心地说。

“你们要我把电线剪断？”他再说一遍，他的目光望向我身后的厨房，里面堆满了食物、家具，还有许多人类即将在此定居的迹象。

“对。切断它。”他耸耸肩，走到电表后面，拨弄了一些东西。五分钟内，他就做完了，把他的小货车倒出我们家的车道。这件事看起来进行得太快，太轻而易举，然而它所带来的剧烈变化，将对我们产生全面的影响。我曾读过一篇文章，上面说，一个普通家庭使用的电力，等于一百个仆人工作的总和。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这支强大的家用军队已经消失无踪。

我拨动厨房的灯光开关，没有反应。我们几乎算是达成目标了。不久，黑暗就会降临。

第三章 探索未知之地



欢迎进入1900年

啁啾鸟鸣自窗口涌入。一缕缕阳光轻触屋角的沁凉气流。空气里有某种东西存在着，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显示我们的小世界牢固地扎根在中央河上方的这块土地上。

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也许是因为我此刻躺在床上，内心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安慰。希瑟依偎在我身边，鲁德安详地睡在隔壁房间里。我们的筹备期已经结束，它所带来的压力，至少也暂时随之消失。不再需要跑来跑去买生活用品，不再需要跟人会面，处理杂事。不再开车。电话铃声有一年的时间不会响。这种情况让我觉得简直像获得解放。尽管我内心那个固执的清教徒^[1]仍然盘桓不去，试图破坏这个宁静的时刻，我仍没法摆脱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正在度假，度一个露营的假期。

[1] 清教徒（Puritan），16—17世纪兴起的英国国教派的一支，教徒遵守严格戒律，把快乐或奢侈视为罪恶。

那个小小清教徒不肯放我干休，他跳出来提醒我，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完：菜园的种子只撒了一半，户外小屋里堆满垃圾，贝儿没人管。我们原本可以永无止境地研究19世纪的农耕方法，持续修补摇摇欲坠的户外小屋。就像那些热爱铁道模型的人，我们原本可以永无休止地改进这个生活的模型，让它越来越完美，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刻，我们还是得拉开舞台的布幕，展露出我们疯狂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后的成果。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我转过身，面向着希瑟，她安闲地打了个呵欠，微微一笑，仿佛送给我一个和平的献礼。“欢迎进入1900年，”我说，“早餐吃什么？”

“看情况而定，”她答道，“看你能不能让炉火点起来。”我们匆忙地开张，我根本没有对烧饭的炉子进行测试。然而，从我开始洗刷这具炉子时，我就想测试了。我用铲子把炉子上的灰铲掉，用钢刷刷掉上面的煤灰，用补炉台的接合剂补好破洞，将黏在灶台下方破洞里的几只已经变成皮革的鼠尸刮掉，把炉子放到该放的位置。但是总有其他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直到昨天，炉子的烟囱管还一段段地平放在地板上。

我去拿木柴时会经过厨房，在这座涂着白色搪瓷、以铸铁造成的粗糙炉台旁边，我停下脚步。没有开关、转盘或按钮。这炉子是个厚重铁板做成的谜。它的顶上有两个托座，上面有包着搪瓷的加热支架。在炉子后面，黑色的烟囱管竖直，呈九十度转弯，从地上的管子摇身一变成为烟囱。炉子平放在那里，冰冷而沉默。

在谷仓里，我在堆成一座小山的木柴前面站住。罗伯特·李^[1]在考虑是否要担任华盛顿学院（后改名为“华盛顿与李大学”）的校长时，坚持校方每年冬天必须为他的住宅提供40堆木柴。依照我的计算，我们尚未劈开的木头，大概足够劈出13堆木柴，尽管数量不如前者，这些木柴的数量仍然非常多。由于我们的土地上没有树林，我付钱给一个家伙，让他用小货车为我运载木柴。这个人在小货车的保险杆上贴着贴纸，上面写着：“不要逼我揍你！”他的个头高大粗壮，牙齿参差不齐——仿佛他在婴儿时期整天拿着剪

[1]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知名南军将领。



这座以铸铁造成的木柴炉，表面涂着白色搪瓷，上面托座，与包着搪瓷的加热支架。在炉子后面，黑色的烟囱管竖直，成90度转弯，从地上的管子摇身一变成为烟囱。（Deb McConnell/摄影）

水管的扳手当奶嘴吸。我一定是表现得很愚蠢，因为他一次次地问我是否确定要的是没有劈开的原木，“两个价钱是一样的。”

我伸手去推动这堆木柴，这时，一根橡树的树枝刺进我的手心。“该死。”我说，我的身体向后缩，血从树枝尖端涌出来，这幅景象提醒了我，我们不久前才放弃了快速到急诊室的方式。从今天开始，我必须更小心才行。

我走到户外小屋里去拿手套。这时，贝儿以小跑步绕圈圈，在她的猛踏和吼声之下，地面开始震动，仿佛在说，我的早餐呢？

“早安，贝儿。”我一面努力用交情匪浅的口吻跟她说话，一面让开，免得挡着她的路。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仍是那个负责提供谷物的蠢蛋。

她嘶喊了一声。

“好吧，好吧。我来了。”我在一大堆垃圾里翻找——乡村拍卖会上买的一盒盒工具，五金行买的一袋袋备用物品——直到找到一副园艺用的帆布手套。回到木柴堆的途中，我走进挤奶室，从一个做过防鼠处理的金属罐里，挖出一勺浸在糖浆里的贝儿的饲料。再过去的一间畜栏里，星星和甜豆濒临疯狂，她们把前脚两只蹄子撑在下半截的门上，像两个站在卖糖果柜台前的孩子，伸长了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她们咩咩的叫声回荡在谷仓的深暗角落，让我的神经紧绷到几乎受不了。然而她们必须等到挤完奶后，才能吃早餐。

在谷仓这边，贝儿拿鼻子去拱她这勺饲料，差点就把饲料撒了一地。我冲进马厩，把这些谷物倒进一个金属盆子里，盆子四周的地面铺满木屑。她转动身子遮去了门口的光线，将臀部对着我，把嘴巴埋进盆子里。我从她的腿旁挤过去，她的腿几乎可以把我的胸口钉在橡木墙上，将我踩扁，只剩下一件衬衫。

现在小鸡开始喧闹起来，我绕到鸡舍，为它们拉开那扇通往院子的活门。它们癫狂地拍动翅膀，每一只都想第一个在泥土里啄到早起的小虫。我走回斧头旁边劈柴，决心要让早餐端上桌。

此刻，两只山羊像婴儿一样地尖叫。

就像我必须学会的大多数1900年的技能一样，对我来说，劈柴也是一件相当不熟悉的差事。我之前在不同的地方劈过柴，大多是在周末到山区小屋度假时，为了好玩而做的。举起斧头，往回拉，啪嗒一声，爆裂开来。木头飞上天，从大块变成小块。简单得很。

然而，就在我挥动这把重达约四千克的斧头时，斧头的斧刃过了头，

越过这块木头，斧头的把手“砰”的一声落下，可悲地撞到这块竖直的木头较远的边上。如同打高尔夫球的人站在发球区挥动第一杆的姿态，我扭过头去，查看这件糗事是否被看到了。贝儿的确看到了，她站在厩栏的暗处，默默地朝外头看，窥视我的举动。

“你在看什么？”我怒吼道，我们中间隔着一扇上闩的门，这让我勇气倍增。我检查斧头的把手，发现斧刃下方的木柄有些地方碎裂或向内凹进去。

经过大约十分钟举起斧头、劈砍下去的过程，其中至少又有两次砍过头而导致斧头把手受创，最后，地上终于出现了一小堆大小可以塞进炉子的木柴。我捡起木柴，放到我那个35升容量的圆形篮子里，吃力地朝着我们住的房子和喝到咖啡的期待走去。

进了屋子，希瑟正在等我。

“你全身都汗湿了。”她说。

“我必须劈柴，火炉要用的。”我把篮子放到地上，“山羊在大喊大叫。她们的奶快要胀破肚皮了。炉子的火生好以后，我得回那边去。”

这炉子能用吗？我在炉子下方的窄长火箱里塞报纸，把几根小木头摆成十字形。我拿起一根火柴，点燃这堆报纸，然后关上火箱的门，等待着。

炉子顶上的铁皮缝隙渗出烟来。我大声咆哮。

“出了什么问题？”希瑟从洗手间朝着厨房看，一面拿毛巾擦脸。

“空气吸不进去。”我以手扇开烟雾，将炉子正面和侧面的通风口开开关关，希望能改善火箱里空气对流的情况。我把炉子顶上的排烟管用力地来回扳动，然而这具旧炉子仍旧喘着气，继续冒烟。

然后我想到，烟囱管中段的地方有一个风门。我打开它，烟就不冒了。火箱里的木头噼啪爆裂，四面溅射。我走出去，往上看。烟囱冒出翻腾的烟雾。

“我想可以用了！”我拿起肥皂，把手放到搪瓷脸盆里，脸盆里还盛着希瑟的洗脸水。

“很好，”她说，“我来把咖啡放到炉子上。”

鲁德原本紧紧抱着希瑟的大腿，此刻他受到橘色火焰闪动的吸引，悄悄走向火箱。“停下来！”我尖叫一声，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将他拉回来。他放声大哭。

“很抱歉，宝贝。”我把他抱起来，紧紧拥抱他。

“不要！”他用力捶打我的肩膀。

“喂，炉子很烫。我不希望你被烫伤。”

“你看，鲁德。”希瑟假装用手摸炉子，然后猛然向后退，做出疼痛的模样。“烫！哎哟！烫！”不让他摸炉子，未来将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希瑟想要有热水可以洗脸，这是当然的——如果炉子持续地跟我们合作，我们可能从此就有热水可用，但是她没有抱怨。她似乎跟我一样，对于之前的准备工作终于能够宣告结束，也感到轻松许多。我们来到一个里程碑的前面，虽然这跟我们真正过完一整年1900年的生活不完全相同，展开这一年的起点仍然让人感觉非常值得。希瑟跟我一样，她也不清楚我们究竟要贮存些什么——如果要在冬天不觉得冷，我们需要多少热水；我们要清洗多少条尿布；还有，要料理好三餐，得花多大的力气。在这一刻，我们没有油腻碗盘和脏衣服等着洗，没有任何农作物等着收割，没有信件等着回。我们只有在眼前展开的未来，这个未来跟我们在纽约面对的未来截然不同，跟我们上星期的生活迥然相异。

希瑟把鲁德抱在侧腰上，走到屋外的厕所前，她向左右看看，检查是否有蛇。我跟在后面，拿了罐子，在厕所后面盛水的木桶里装满水。她带着鲁德走进这栋狭小的木屋，完全没有要关门的意思。她在坐垫上坐下来——还是对下方那个黑洞感到有点焦虑——鲁德从角落一个老旧、凹陷的提桶上抓起一把覆盖物^[1]，扔到她的脚边。

“不要这样，鲁德。”她敏锐地说，“不要摸那个。”

他笑出来，又抓了一把覆盖物，丢到她旁边的坐垫上。

[1] 覆盖物 (mulch)，又称护根，农夫以树皮、木片、松针等材料覆盖于土壤表面，以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此处是指用于坑式厕所的覆盖物。

“不要。”她再说一次，一时之间被脱到脚踝的长裤困住了。我没有插手帮忙，只是一面把水桶装满水，一面拿眼角瞄着他们，照看着情况。

鲁德脸上的表情变得坚定起来。“不要。”他模仿希瑟的口气，用他那调门很高的刺耳声音说。

“鲁德，甜心，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那是覆盖的东西。它是从那些大树那里来的。妈咪和爹地上好厕所以后，要把这个东西撒在这个洞里。所以必须让它摆在桶子里，不去动它。你明白吗？”

“布盖。”他试着说出这个字眼。

“对了，覆盖。”希瑟和我对鲁德的语言能力感到兴奋。他开始把一些字符串成句子。到目前为止，我们最喜欢的句子是“鲁德喜欢派”，这是他最近脱口而出的句子，他一面说，一面把苹果派里的苹果馅抹了一脸。

他抬眼看着希瑟说：“鲁德喜欢派。”然后拿起一把深褐色的覆盖物，丢进她的裤子里。

“鲁德！”

一个小时后，咖啡还没有煮沸。有一次我在为期十天的露营活动中，因为没有咖啡而几乎撑不下去。从头到尾我的头都在抽痛，我像青苔一样，瘫软地躺在地上不能动弹。如果我们煮不出咖啡来，我就要取消这个整个计划。

但是到最后，在我给山羊挤完奶，把羊奶倒进容量一加仑的瓶子里，将它放到凉爽的储藏地窖之后——我们借着一把图西^[1]巧克力软糖恢复了活力，这是我们为了特殊场合准备的——搪瓷咖啡滤壶终于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了。不久，咖啡壶盖开始嗒嗒响，阿拉比卡咖啡豆散发的天堂般香气充满了这间小小的厨房。现在，厨房因为炉子烧东西的热气，加上炙热的六月太阳，令我们汗流浹背。让我们意外的是，冷冷的、黏糊糊的羊奶麦片粥竟然非常美味，配着咖啡一起吃非常合适。我们用搪瓷杯子盛咖啡喝，但咖啡实

[1] 图西 (Tootsie Rolls)，是创立于1896年的美国知名糖果工厂，其代表性产品即图西巧克力软糖及图西棒棒糖。

在太烫，不得不用一块布垫着杯子。尽管这样，咖啡还是烫嘴。想办法用1900年的食物喂饱自己，我们做到了。虽然我不敢为了这项成就扬扬自得，我还是感到心满意足。也许是咖啡的缘故。

全身的肌肉都在抗议

那天晚上，希瑟和我就着油灯的微光，在房子后面的木头篱笆旁边刷牙。希瑟说：“刚才是谁来了？”当时她把鲁德放到地上。她看到窗外有两个人。他们是那栋类似鳕鱼角的砖房的主人，一对退休的教师夫妇——绝对不是那种舞刀弄枪之辈——名叫比尔和佩姬·罗伯森，我们几天前才认识他们。比尔非常喜欢园艺，而佩姬则开着一辆老式的斯巴鲁汽车，车子的保险杆上贴着贴纸，上面写着：“我♥埃塞俄比亚。”

“是罗伯森夫妇。”我说，“他们只是过来看看。跟车祸现场那些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一样。”他们很有礼貌，没有用太多的问题来为难我。他们扫视院子，目光从水桶移到我们用来洗澡的水槽，然后是枫树下那张旧工作台，那是我们用来擦干碗盘的地方。他们的目光里带着恐惧。他们给我们带来一罐新鲜的、去了皮的英国青豆。

“这话说来可笑，”希瑟说，“但是当我从鲁德的窗户里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来告诉我们，他们家有人去世了。”

“在我们开始不用电话的第一天，就来向我们报丧？”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一直感觉到，我们住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一定会发生某种不幸的事。跟世界隔绝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我喝了一小口水，把嘴里的小苏打粉渣漱掉，将水吐到暗处。“你知道豆子不喜欢热天吗？”

“知道。我记得我读过这样的文章。”希瑟说，“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它们真的不喜欢这样的天气。恨死了。罗伯森夫妇昨天把他们的豆子从土里挖出来。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它们已经没有用了。”今

天我们还费了很大工夫去为我们的豆子除草，它们目前只冒出了小芽。它们绝对长不大的。“他问，如果我们的食物吃光了，我们会怎么做。”

“你怎么对他们说？”

“等我们到了这步田地，我们会走过那座桥去求救。”

我们朝着房子走去，油灯的铁片碰到金属线的把手，发出当当的声音。今天热得要命——根据我挂在屋后一棵树上的温度计所显示，最热时至少有35摄氏度。一整天下来，我不断用一条大手帕擦额头。现在我全身酸臭。我的头发里黏着许多干掉的汗粒，变得硬邦邦的。太阳出来以后，希瑟和我一直都没时间洗澡。现在外面一片漆黑，天气变得凉爽了，泡一个澡，啪啪地溅水出来，这幅景象已经不如白天的时候那么令我们兴奋了。从地下汲出的井水只有12摄氏度。早晨用完炉子后，炉火就熄灭了。要重新把火生起来，让我们有足够的热水洗澡，还得花上几个小时的工夫。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拿水拍拍脸，提起油灯照路，踏着沉重的脚步爬上二楼睡觉。

我躺在床上，把怀表摸出来，就着油灯的橘色微光看。指针指着9点50分。经过了漫长的一天，不停地劈柴，用泵抽井水，弯着腰在菜圃种菜，我全身的肌肉都在抗议。

在一片寂静里，怀表的嘀嗒声听起来很响。这是两星期前我生日的时候，希瑟送我的。我把它那光滑的表身包在手心里，感觉这只二手货的振动。这支表象征此刻我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它所使用到的科技很单纯，每一个部分都是手工细心打造而成，没有电池，没有连接网络。它仅仅靠着我们的动作而运转。如果某一天我们忘了为它上紧发条，它就不走了，我们只好问邻居现在几点。这让我想到罗伯森夫妇的来访。如果我们真的吃完了所有的食物，那该怎么办？我太累了，没法思考这些后果。我翻了个身，伸手去拿油灯。

“我要把油灯吹熄，可以吧？”我低声说，音量小到只会干扰怀表的嘀嗒声——没有电风扇或冰箱的嗡嗡声，没有冷气不时传来循环送风的声音。

“希瑟？”

没有声音。她已经睡熟了。

扮兔子的“纵火狂”

接连过了几天，早晨的头痛加上迟迟上桌的早餐让我们领悟到，如果想要早餐在适当的时间端上桌，我们当中必须有人——就是我——清晨就得起床生火。这表示在天亮以前就要起来。除非月亮把我的路照亮，否则我就跟瞎了一样，要不然就得点燃火柴——如果前一晚我记得把火柴摆在床头的小茶几上的话。

到了第四天，我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这个房间里是死亡般的漆黑。没有火柴。我用手摸索着我的短裤和T恤，嘴里小声地咒骂着，希望没有吵醒希瑟，或是隔壁房间的鲁德，他常在夜里醒来，尖叫着要我们给他点一盏夜灯。我摸索着走出房间——现在放轻松，慢慢地。我的两只手沿着墙摸索凉凉的灰泥，一路摸到楼梯上那排低低的胡桃木栏杆（我的膝盖猛地撞上了它）。我慢慢地往下走，往下走，心里一面祈祷，鲁德没有把木头火车或小熊的填充玩具留在楼梯中间。我继续走，绕过楼梯的柱子，走上地板嘎吱作响的走廊，绕过转角——噢！——我撞到了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向下斜过来，与楼梯接合在一起。我慢慢穿过走廊，进入零星摆着几件家具的客厅。我能感觉到这房子的年龄，我的手指摸索着窗户的边框——那凹凸不平的、宽阔的、手工刨出来的木框。

在厨房里，我闻到洋葱和咖喱的味道，听到老鼠咬东西发出的嘎嘎声。从我开始驱赶黑蛇以后，我们这里就有了鼠患。我们不时发现，奶酪的角上出现咬过的齿痕，厨房的餐桌上有一点点鼠粪，天花板上有爪子走过的声音。火柴呢？我渴望摸索到电灯的开关。或是感觉到手电筒的开关按键在我的大拇指底下，发出令人安心的咔哒一声。我没有摸到这些东西，只是以两只脚摩挲地面，让这只老鼠晓得我在这里。我把手伸进篮子里，伸进结了蜘蛛网的缝隙里，摸索那个熟悉的长方形盒子，里面装了许多有砂质火柴头的火柴。我没长眼睛的臂膀弄翻了几个杯子和瓶子。炉台上方架子里的一样东西“唰”的一声被我扫到地上，摔碎了，发出金属的碰撞声，那是几盏油灯当中的一盏。我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想把碎玻璃捡起来。它还是完

整的。

我在清洗室的柜子里找到一盒火柴后，回到炉子旁边，把油灯弯曲的地方扳回来，然后点了一根火柴。黑暗就此消融。

那天晚上，在上床睡觉之前，我像一个在复活节扮兔子的“纵火狂”，尽可能地每个房间的架子上和碗柜里，藏了许多盒火柴，免得被鲁德发现。

不只在这一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也一样，在我们展开这段生活的最初阶段，我们摸索着前进，从用别针替鲁德固定布做的尿布，到与啃噬卷心菜的绿色菜虫奋战，一切都是在尝试与犯错中学习。我学会了每隔15—20分钟，就把一块木柴送进火箱里去，这样炉子就能保持一定的热度。希瑟学会了早上就把三餐做好，在热辣辣的太阳下山之际，让炉火熄掉。我们储存了一些干燥的物品，这些东西都是1900年的一个典型家庭能在杂货店买到的——咖啡、茶、糖、麦片、米、肥皂、小苏打粉等。我们买了很多，因为不再有杂货店让我们补货。希瑟使用一些尺寸不合的炊具——铸铁的大锅和长柄煎锅、缺了角的长柄炖锅——做出了早餐，有麦片、用煎锅加热的吐司和煎蛋。她用水在锅里煮饭，炖煮干燥的扁豆或腰豆，把菜园里的甘蓝菜或花椰菜蒸来吃，烤玉米粉做的面包。她把做好的每一样食物盖起来，放在保温架上，直到午餐时间。晚餐就吃中午剩下的冷菜。我们喝的是井水，把水装在瓦罐里，用长柄勺舀来喝，瓦罐摆在厨房的一个台子上。

希瑟吃素，所以我们今年不必杀鸡宰猪。尽管1900年的典型农家是吃肉的，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人食用的肉品数量远比今日少。加工的猪肉和偶尔会吃的鹿和负子鼠，对于撑过寒冬至为重要，鸡肉和牛肉则是少见的佳肴。在这个国家，素食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受欢迎，然而吃素早就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情。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波普写道：“没有一件事会比这种景象更令人震惊，更让人觉得恐怖，那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厨房都血滴四溅，大限将至的受害者的嘶喊充盈室内，死去动物的肢体散布各处，悬挂在不同的角落。”19世纪时，美国有些基督教派开始推行素食。美国作家梭罗只吃少量的肉，他有一句名言：“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命运，在他逐渐进化的过程中，不再吃其他的动物。”

我们没有养猪，不过我们的确是用木柄的猪鬃刷来刷牙。当我们在一本专卖自然产品的目录上看到这种刷子的时候，我们兴奋极了。当我们了解，在取得这些公猪毛的过程中，并没有伤到它们，让我们更加欢喜。我们把这些刷子泡在小苏打水里，用它们在屋外刷牙，再把水吐到木板的篱笆外面。在个人卫生的其他方面，我们使用搪瓷盥洗盆，用“象牙牌肥皂”（这种肥皂是在1879年上市的）洗手洗脸。我们把这个脸盆放在一个破旧的维多利亚式橱柜里——这是我们放盥洗用具的台子。洗脸水一样倒向篱笆外，然后用小桶从贮水的大桶里舀水出来，倒到洗脸盆里。洗澡又是另一回事了。

从我第一次泡澡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了。我拿了一块肥皂、一桶水、一个漱口杯，还有一条当毛巾用的方格桌布。由于1900年的时候还没有厚绒毛巾，洗完澡的人都是用斜纹布擦干身体，这种布料的四周通常打着粗粗的穗结作为装饰。1897年西尔斯百货公司的目录上，有一个男人在用一块宛如餐厅窗帘的布料擦干脸，这幅广告没有提到这块布的柔软性或吸水力——现代社会对毛巾视为理所当然的标准，相反的，它吹嘘这块擦巾是多么粗糙：“泡了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澡之后，用一条浴巾好好摩擦一下身体，可以让你得到新的生机与活力。”这张图片的广告词写着：“没有一样东西能像它一样，让皮肤散发红润的光泽，加速血液循环。”

我脱光身上的衣服。沾满尘土与汗水，衣服变得像一层硬壳，即使脱掉也能直立在地上。我窸窸窣窣地走过草地，跳进一个两侧加高、镀了一层锌以防锈的椭圆形水槽——本来是家畜专用的水槽。我竖起一只耳朵，随时留意汽车的声音。我用杯子舀起寒冷的井水，举到头顶，倒下来。我叫了一声，全身颤抖。然后是第二杯。第三杯。我的皮肤紧缩，身上起了几千个鸡皮疙瘩。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变得僵硬——除了一个部位，它像一只害怕的甲鱼一样，缩进了自己的壳里，完全看不到了。就在我断断续续发出哀号的时候，我听到花园那边传来一阵阵大笑的声音。希瑟正在那里拔草。她拉住鲁德，不让他踩到豆子刚冒出的嫩芽。我站起来，从头到脚涂上肥皂，洗洗晒黑的脖子，抹掉双手和膝盖上结块的泥巴。我用沾满肥皂的手指尖，抠掉脸上的污垢。我是肥皂广告的搞笑版，躺在后院的马槽里，全身泡沫，疯

狂到了极点。

有一个问题是，残余的肥皂渣会留在头发里，这跟浴缸四周留下的那圈污渍是同样的东西。希瑟从洗完第一次澡后，这件事就让她难以忍受。她试过卡斯提尔皂^[1]，但是情况更糟了，简直像用牙膏一样。古法提炼的松焦油皂味道就像，嗯，松焦油，连甘油皂都会让头发变得黏腻。她试过用橄榄油当润发乳，却发现又得用肥皂来洗掉这层油。用白醋浸一下头发，让发色比较有光泽，却也让她身上闻起来有酸黄瓜的味道。

就各方面来说，希瑟都在跟她的外表搏斗。她的身材苗条，加上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和褐色的头发，别人都觉得她是个美人坯子。然而对她来说，完全不化妆，穿着皮靴和沾满煤灰的短裤砰砰地走来走去，这种情况可能太过自然了一些，也许这是她近来态度冷漠的原因。希瑟和我决定不穿那个时代的服装。重点不在穿成什么样子。不过我们发誓不穿那个时代没有的服装和鞋子，包括慢跑鞋、以高科技制成的外衣、比基尼式的女性内衣、短裤型的男内裤，还有一切在今日的标准下是时髦热门、距离那个时代却很遥远的衣服。希瑟穿的紧身短裤型男用内裤和无袖T恤——这是她对1900年的那个时代女性内衣裤的诠释——无法让她表现出性感诱人的模样。（“这是我的亚奇·邦克^[2]造型。”她说。）希瑟以前比现在美丽。但是对我来说，她还是很美。如今外貌似乎不是最重要的事。

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不穿马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行为。1900年的时候，已有诸多证据显示，紧身胸衣会造成肋骨裂伤，肺部塌陷，肝脏移位和子宫下垂。当时有一份报告指出，一件合乎时尚的紧身胸衣对人体内脏造成重达十千克的压力。女性主义者针对这种改变身材的内衣进行强烈的抗议活动，这就像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反对女人穿胸罩（始于1914年）一样，她们认为，胸罩压制了女人形体的发展。希瑟是个女性主义者，

[1] 卡斯提尔皂 (castille soap)，卡斯提尔位于西班牙，为著名橄榄油产地，卡斯提尔皂为纯植物油手工皂。

[2] 亚奇·邦克 (Archie Bunker)，20世纪70年代美国知名电视剧《四海一家》(All in the Family) 的主角，是一个固执、保守、爱家的蓝领工作者。

但她不久就开始缅怀她的胸罩，对于那种女性社运分子极欲从其中获得解放的罩杯和交叉肩带念念不忘。

然后是月经的问题。上流社会的女性家里有人，可以整天躺在床上休息，但是农村妇女没有一天可以赖床，躲过早上该做的事情。古代埃及人用经过软化程序的灯芯草做成的草纸，做出世界上第一片可丢弃的卫生棉，根据古希腊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希波克拉底在公元前五世纪所写，古希腊人用的是包着软麻布的木片，而现代的卫生棉要到1929年才问世。在月经来的头一两天，希瑟不再吃止痛药，用别针把布条别在内裤的内侧，继续干活。

希瑟的活儿——烹饪、打扫、洗衣——是刻板印象中女性要负担的典型工作，我的活儿则是传统上男性要做的事：劈柴、打水、照顾牲口。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分工是正确的，但我们的做法与其说是计划好的，还不如说是出于偶然。我们动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的做法效率最高。希瑟花了40分钟，才打出来75升的井水，我只要15分钟就能做到。我们的活儿从天亮到天黑，一整天都忙不完，因此效率非常重要。

还是剩下一大堆樱桃

我们找到这座有储藏地窖的农场时，心中感觉放下了重担，然而我们房子底下这间空荡荡的地下室，仿佛也在不停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想到眼前面对的挑战。在夏季结束之前，我们必须在里头的架子上摆满根茎类蔬菜，还有密封贮存的罐装食物。现在我们全部的心思都花在种出这些食物上。以后再担心装罐的事不迟。

然而，当一辆没有装消音器、车身挂着“农场用品”招牌的小货车隆隆地开进我家车道时，情况就改变了。乔·威尔逊下了车，他就住在几千米外的地方。他留着牛仔式的下垂八字胡，穿着靴子和牛仔褲，格子衬衫，头戴宽边帽，看起来活像在怀俄明州开车驱赶牛群的时候，转错了一个弯，来到我家门口。

乔的儿子汤米是个头发硬而直的青春孩子，他把一个容量20升的桶子搬到我们面前，桶子里装满了樱桃。“我们不能拿这个。”我说，我脑中开始想象，20升桶装闪亮饱满的樱桃，在纽约市的一间韩国餐厅里，要花多少钱才吃得到，“给太多了。”

“拿去吧，”乔恳求道，“我们得忙奶牛的事。还有，即使我们不把这些樱桃送掉，它们也会被鸟吃掉。”

这些樱桃是金黄色的。威尔逊的小货车还没有开出车道，我就用手舀了几把，放到有滤网的蔬果清洗盆里，用冰凉的井水洗一下。希瑟、鲁德和我围坐在野餐桌旁，吃了一个又一个，把樱桃籽丢到野地上。鲁德已经从使用有细口的塑胶杯喝果汁，改成用搪瓷杯喝白开水，他吃的东西也从含有大量糖分的美国主流食品——早餐谷片、花生酱和葡萄果酱三明治、水果优格、各种饼干——转变成花椰菜、青豆和玉米做的面包。这时，鲁德疯狂地想吃樱桃：“还要，还要，还要！”他大叫，脸上全是红色的樱桃汁。我们根本来不及帮他果核拿掉。然而，即使有鲁德帮忙吃，还是剩下一大堆的樱桃。

那天晚上，鲁德睡了以后，在大多数美国人坐下来看晚间精华时段的电视节目时，我们没有像前几天一样，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过去一星期以来，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没有上床睡觉，而是坐在露台上给樱桃去核，用手指把果肉从果核旁边剥下来。我们决定试着用人工去核的方式制作罐装樱桃，心里一面祈祷，希望这具需要一小时才能煮好咖啡的炉子，可以连续25分钟保持足够的热度，好让我们把樱桃煮熟。夜幕落下，唧唧的蟋蟀声不绝于耳。风唰唰地掠过树叶，油灯的火焰随之闪烁。凉风让我们精神一振。我们用搪瓷杯啜饮波本酒——这是一个朋友寄来给我们的礼物。我把几颗樱桃捏开，丢进我的酒杯里。这是一星期以来，我们头一次一起欢笑。这份樱桃礼物让我们觉得我们非常富有。到了午夜，我们还在为樱桃去核，我们的手红得像战地医生沾满鲜血的双手，我们决定上床睡觉。

隔天，我们五点就起床，准备把樱桃装罐。我在炉子上点火。快速燃烧的小树枝有可能提供我们需要的热度。我们的动作里包含着一种无声的兴奋

感——给玻璃罐消毒，将煮玻璃罐的大锅装好水。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种出食物来，只要把这些食物保存起来，我们就能度过冬天。

到了早晨六点，厨房里已经非常闷热。火焰在狭窄的火箱里滚动，它吞噬木头的速度，快到我把散发光泽的木柴送进去，立刻就被烧掉。我把火炉其中一扇圆形的门打开来偷看。火焰在里面以水平方向快速移动，尽管烟囱管风门在猛力往上吸，火焰仍顽强地抗拒，不愿从圆形的出口朝着上方垂直升上去。

一小时后，蒸汽让玻璃罐的盖子嗒嗒作响。我们展开行动，把玻璃罐加热（这样它们就不会裂开），装满果泥，加入糖水，旋紧盖子，轻轻地把罐子放进滚水里。我们在昨天夜里努力去核，结果做出了3.7升的果泥。为了杀菌，让罐子里没有空气，我们必须煮上25分钟。我不断把木柴送进火箱，好让火焰熊熊燃烧。

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新的任务里，很害怕搞砸了。我们不得不暂时不理睬鲁德，他已经醒了，跟我们一起待在很热的厨房里。他“啪”的一声躺到地板上，用拳头和脑袋捶着木头地板，尖叫着：“妈咪，抱抱，爹地，抱抱。”

简陋的烤箱上面的指针写着315摄氏度，不久前它还不到148摄氏度。炉子发出轰轰的声音。盖子嗒嗒地响。蒸汽滚滚翻腾。成功了！现在炉子热了，希瑟在三个煎锅里放进酥油，在烤箱里加调味料。与此同时，她还煮了滚水来洗尿布。

我花了两倍的时间多劈些柴。那天晚上，我们一直给樱桃去核，直到清晨，为了支撑疲惫的头颅，不让它倒到餐桌上，我们的脊背非常疼痛。在被风吹得当当作响的油灯照明下，我把用罐子封好的樱桃拿到地窖存放，一直运到早晨才全部搬完。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把5.6升的果泥装罐，这些果泥我们要在今年冬天用来做樱桃派的馅——如果希瑟学会做派的话。果泥冷却后，我把这一罐罐在阳光下闪耀着红宝石般光芒的果酱搬到地窖里。我自豪地把它们排放在架子上，摆在干燥食品和几罐手工做的蜜饯旁边，这些蜜饯是朋友和亲戚祝贺

我们的礼物。这是我们的新货币。不再有薪水的支票可以存进银行，不再用现金消费。我们流下汗水，发出辛苦的呻吟，换取自己的食物——还有牛奶、喝的水，以及炉子的燃料。我用守财奴计算财富的方式，计算玻璃罐的数目，尽管数量并不多。地窖就是我们的银行，橡木架上一排排的食物就是我们的安全保障。

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心思完全被菜园占据。我们的菜园是一片平缓的斜坡，大约长21米，宽15米，菜园向后延伸，就在我们的房子和谷仓的门之间。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菜园的每一寸土地上都长着浓密的及膝的草。许多年来，奶牛一直在这里吃草。我们拼命除掉这些草，翻动土壤，把谷仓里铲起来的干粪混进泥土里。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菜园里拼命干活。

这些杂草的生命力非常强韧，远比以前有人在这块地上耕种时还要厉害。杂草的种子可以在凉爽的土壤里静卧几十年，等待被翻搅到靠近地表的泥土里，到时候阳光带来的暖意便能让种子发芽。阳光照到土壤以后，杂草和藜便冒出来，如同粗毛地毯一样浓密。我们试着赶上它们生长的速度，在工作的空当，我们跪在菜园里，把杂草一棵棵拔掉。我还没拔完一排杂草，另一排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专注地把菜园的杂草彻底拔一遍，但是当我们拔到了另一头，这头又长出了新的杂草。这就像用一根刷子去给整座旧金山金门大桥涂上油漆一样枉然。

种菜会让脊背痛得要命，但是在许多层面来说，它能带来丰富的回报。其中一项是设计，用铅笔和纸画图决定哪种作物要种在哪个位置，在菜园里沿着一排排的种植位置往前走，想办法让农作物之间保持距离，并决定留多大的空间作为菜园里的小径。然后是跟泥土有关的事，一切丰富强烈的感受都包含在这个部分——双手握住木柄锄头的触感，锄头的刀刃富有韵律地刮擦泥土，翻开土壤时散发的丰饶气味。播种的时候，我们把一条细绳绑在两根树枝上作为指引。我把其中一根树枝插进土里，希瑟也把另一根树枝插进土里，我们看到绳子在菜圃上拉直了，便用钉锤把树枝打到土壤深处。我们沿着绳子，在泥土里戳出小洞，把青豆或玉米的种子埋进去，再用泥土盖

住。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这些封在小纸袋里的东西，可以在未来一年中喂饱我们的肚子。这些种子看起来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无足轻重。

事实上，我们慢慢学到，种子是一种相当强壮的东西，只要它们能得到足够的水分。但是问题也在这里。此地的气候类似地中海地区，没有虫害，刚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的这种天气——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户外用餐，目瞪口呆地看着满天星斗——却非常干旱。我们没有电动抽井水的装置，没法给这么大一座菜园浇水。我们能力的极限是好好地播种，然后用水桶从井里打水上来，倒进水罐里，再用水罐洒水到菜苗上，让它们湿润一点，这样来来回回，周而复始。到了六月下旬，天气变得非常炎热干燥，这些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耗尽我们的力气，我们只有到了晚上再浇水，太阳一下山，我们就提着油灯，或是在炎夏夜晚的无声闪电照耀下，嘎吱嘎吱地来回奔忙于菜园小径上。

来自音乐的酷刑

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的公寓里永远飘扬着音乐。拉丁舞的音乐、巴西巴萨诺瓦的音乐、REM乐团^[1]的歌曲、马勒的交响乐、迈尔斯·戴维斯的爵士乐。但是，如今我们的音乐供给切断了，我成为自己脑中冒出来的每一段曲调的囚犯。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乐曲，不过大多数曲调仿佛只是为了折磨我而出现。

第一段持续出现的曲子是UB40乐团^[2]的《红红的酒》（*Red, Red Wine*）。有一天我在种豆子的时候，它浮现心头，一连好多天挥之不去。我根本不喜欢这首歌，但可能是它的旋律简单，以及雷鬼节奏的因素，让它黏着我不放，那饶舌歌一般的合唱在我脑中不断地重复播放：红红的酒，你

[1] REM乐团，20世纪80年代美国另类摇滚乐团。

[2] UB40乐团，20世纪80年代英国雷鬼乐团。

让我觉得舒服极了。你让我不停地摇滚摆动。我不记得其他的歌词，所以我想了些句子，让这首歌能持续地唱下去：红红的酒，我想依靠你，依靠你，直到我的脸色发蓝。如此这般。这条界线打破了，这只猴子窒息了，巴——巴——巴——巴，巴，巴——巴——巴。耶——。

我用锄头锄地的时候，嘴里哼着《红红的酒》这首歌，跪下来拔掉杂草的时候，我的嘴巴低声地唱着《红红的酒》。我紧闭嘴唇，不让《红红的酒》冒出来，然后，我听到它在我的头脑内部回荡，“红红的酒，让我如此的……”给我闭嘴！我比被我们抛在身后、纽约的那些嘴里喃喃自语的疯子还要糟糕。我试着用过度戏剧化的歌声，假装我可以让这首歌唱最后一次，之后我的酷刑就会结束。然而它就像那些狡诈的生日蛋糕上的烛火一样，不断地卷土重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另一首比较好的歌曲取而代之。《乌鸦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1] (*Blackbird singing in the dead of night*)，我咬着牙唱，紧跟着这首歌的曲调，就像基督徒紧握住十字架。我干活的时候，把我所记得的披头士乐团的《白色专辑》里的歌全唱了，借着《乌鸦》 (*Blackbird*) 和《慈母之子》 (*Mother Nature's Son*) 这两首歌，隔开这片红酒之海。

然而我的自由寿命十分短暂。另有一些偶然出现的曲调悄悄爬进我脑中，填满这份空白：空中铁匠乐队的《走这边》 (*Walk This Way*) 以饶舌版本出现；还有Go-Go's乐团的《我们抓到拍子》 (*We Got the Beat*)。简直令人快要发疯。我们人在这里，试着忠诚地重现1900年的生活，但是在我劈柴或打井水的时候，我嘴里哼的却是老美剧《斯坦福父子》 (*Stanford and Son*) 的主题曲，或是给《笑警巴麦》 (*Barney Miller*) 的歌曲打拍子。

奇怪的是，大多数挥之不去的曲调，都是我小时候听来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广告歌、比吉斯乐团 (Bee Gees) 的歌曲、“海军准将”

[1] 此处应是作者写作时写错了，这首歌的名字是后文提到的《乌鸦》，而此处是这首歌的第一句，并非歌名。——编者注

乐团 (Commodores)，还有凯西与阳光合唱团 (KC and the Sunshine Band)。这些乐曲跟1900年一点也不相配。如果我们的这段经历做成音乐专辑，它应该像肯·柏恩斯^[1]收藏的那种余音袅袅的曼陀铃乐曲。享受这音乐，宝贝。跳一点舞，做一点爱，今夜躺卧下来！

我很确定：不卖

有一天，我在花园拔草的时候，一辆白色的房车开到我们家旁边停下来，一个宽肩膀的高大男人从车上下来。他打着领带，穿着短袖衬衫，戴着金属丝框的眼镜。他的眼镜上夹着活动的塑胶太阳眼镜镜片，他把镜片压下来盖住眼镜，以僵直的步履朝着我走过来。我想他大概又是耶和华见证会 (Jehovah's Witnesses) 的教徒，来发传教的小册子的——最近我们收到大量的传单，告知我们世界不久就要毁灭——我准备礼貌地请他离开。但是他伸出湿黏的手跟我相握，然后大声说：“尤金·吉布森，美国童子军。”

尤金·吉布森负责掌管美国童子军的“史东威尔·杰克逊委员会”，其中包括雪伦多亚营，这个营地就在我家隔壁。只是过来打个招呼，他说，但是说了一分钟左右笨拙的客套话之后，他就谈到正题了。

“你们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他用手指指谷仓那边。

“嗯，”我慢慢地说，“我们才把它的屋顶油漆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用它当作贩卖木工艺品的商店，或是手工艺工作室。”

“我是说这一整个地方。”他不耐烦地说。

他是否听说了我们的计划？他想怎么样？“我们准备种出自己要吃的食物，”我说，“给自己一个机会，花一段时间去过简单的生活。”

“你们家后面的这块土地，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你们计划拿它来做些

[1] 肯·柏恩斯 (Ken-Burns)，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作品有《二次大战》、《爵士乐》等，曾获两届奥斯卡金像奖及七次艾美奖。

什么？”

“你是指篱笆外面的那块三角锥形的野地吗？”我说。

“有将近4公顷大。”他迅速地补充一句，仿佛这个数字需要质疑，“你计划在这块地上做些什么事？养牛吗？”

“我们没有计划要做什么，”我也开始不耐烦了，“你为什么问这个？”

“嗯，老实说，我们想要这块地。”吉布森说，“我今天来，不是要对你开价，不过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为什么这4公顷地这么重要？”“几年前我们想要买下它，”他解释道，“在我们买下旁边的65公顷地的同时，但是这块地的地主不肯卖。他是从新泽西州来的。他紧紧抓着这块地，想要待价而沽。当他发现我们很想要它，他就同意卖掉，但是他把价钱提高了很多。我们准备花这么多钱买这块地。他真是个贪钱佬。”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块地？”我问。

“我们的营区必须扩建，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的计划是，他说，建造一座会议中心和一些停车场。“此外，我们想增设幼童军的营地。要搭建一些有帐篷的平台。还有一栋房子作为公共浴室。这些洗澡间必须让妈妈们觉得很好用，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对我眨眨眼睛。

他的意思，我太明白了，同时，我也听多了。他想找一块风景绝美的地来开发。他有没有想过，这片草地看过去的景观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每一次我走到这块草地上，都会想唱出电影《真善美》的主题曲。“吉布森先生，我得回菜园去干活了。”我说，“必须在下雨以前，再播些种子到泥土里去。”

“喔，没问题。我不想耽搁你的时间。”他再次伸出粗壮的手与我相握，这一次，他的手里多了一张名片，“请考虑一下我的话。如果你肯卖，我有把握我们可以谈出一个结果来。”

“我会想一想，不过我很确定我们不会卖。”我把名片放到口袋里，然后重新戴上拔草的手套。尤金·吉布森这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知道，我应该随时记住他那个童军组织的座右铭——事前做好准备。

突发“羊顶人”事件

对于一个生着两条小短腿的两岁孩子来说，从我们家走出去，穿过高高的草丛来到井边，可是一趟货真价实的健走。但是我希望鲁德能自己走过去。我每天有许多活儿要干，没法抱着他四处走。

我停下来，催他往前走。我看着四周的草地和山峰，胸口因为纯然的喜悦而感到疼痛——我们终于做到了！——我领悟到，我儿子不是待在托儿所，而是跟我在一起，我不是被绑死在计算机前面，我和儿子在一起，在户外，走路去打水。多么单纯！就连开着粉红花的野蓟也展开枝叶，纯真地迎向阳光，这种纯真超越了它那多刺的名声。

“来吧，鲁德。爹地必须给山羊弄点水去。”我等他过来，然后再开门。他停下来看小鸡在鸡舍里啄食。你有什么好赶的？我想。

我停下来倾听。在纽约的时候，我试着想象1900年生活中听到的声音，跟我们住的这条布鲁克林区街道上种种不谐调的杂音有什么不同——这条街上有汽车警报器响起，摩托车轰隆隆驶过（引发了汽车警报器），调到低速挡的卡车呜咽地辗磨地面，飞向拉瓜地机场的喷射机咻咻地飞过，醉汉在街灯影子下吵架，还有住家后院的狗在矮篱上方朝着彼此怒吼，试图咬碎对方的狗脸。现在我们来到这里了，这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声音？我听到小鸡拍动翅膀，燕子啁啾鸣叫，一阵和风掠过谷仓的金属板屋顶，发出柔和的翻腾声，这些声音对我产生的影响，就像心理治疗一样——直到两只山羊哀叫着要水喝。

不久，我们就来到井边，我开始用泵打水，鲁德蹲在地上玩石子。要从地面以下约25米深的地方，打出约一升的水，每压一下都不轻松。经过15次重复的动作后，我停下来喘口气，甩甩肩膀上的三头肌。

我打的家庭用水，借着重力原理，从一条水管流到一百多米外盛水的金属桶里。这条水管是我的一项非正统的设计，用以解决水井太远的问题，如此就不必在房子旁边再钻一口新的井（不论是否钻得到水，钻下去就要一万美元）。要不然，就得一次提两桶水回去。一个世纪以前，任何一个称职的

农夫都会足智多谋地设计出解决问题的类似装置。

我继续压泵，然后，我扭紧阀门，让水不再流到通往菜园的水管，转而流向泵的大水龙头套管。之后再压的水，会流进挂在水龙头下的7.5升桶子里，桶身经过镀锌防锈处理。这就是我们要喝的水。

洒溅的水声吸引了鲁德的注意。他把手伸向水桶，这时桶里已经装满水。桶子轻轻摇晃，水泼到地上。“不要，鲁德。”我说，“爹地在打水。我们需要这个，才有水喝。”

“你要水喝！你要水喝！”他恳求道，他把主语说错了，两岁的小孩经常如此。

我放低了水桶，让他就着桶子边缘啜饮一口。他的手扶着桶子边。水浸湿了他的T恤。冰凉的水让他发出尖叫。气温升高了，我把水桶举到唇边，把冰凉的水灌进喉咙，让水浸湿胸口的衬衫。“很舒服，对不对？”我说。

“还要，还要！”他开心地尖叫。我再次放低水桶，他的手扶住桶子边。这一次他喝了一大口水。他又叫又笑，跳上跳下。

回到家门口，我打开厨房的门，一阵热气和煮东西的味道涌出来。苍蝇朝着墙上飞过去。我小心地把要喝的水倒进立在角落里的一个瓦罐里。趁着地下水的凉意还没有消失，我用长柄勺给自己舀了一杯水。我从厨房的玻璃窗往外望，看到希瑟戴着宽边草帽，蹲在菜园里拔除杂草。午餐和晚餐摆在有盖的锅子里，这些锅子排成一排，在炉子的暖架上暖着。我饿极了，就从锡罐里抓了一把图西糖出来吃。

提水去给山羊喝的途中，我把鲁德放在肩上，他坐在上面，一面用脚踢我的锁骨，一面扯我的头发。到了谷仓里，两只山羊跟在我后面，嗅我的小腿。我放下鲁德，我们走进黝黯的羊栏。羊粪散布在木屑上。两只羊在门口磨蹭，把鼻子伸进来。我把水桶里的水倒进水槽，提着空桶，带着鲁德走出来的时候，她们正在羊栏外的水泥地上蹦蹦跳跳地玩耍。

我们回到井边，把水桶装满。回到谷仓里，鲁德跟在我后面，提防贝儿的突发动作，她正站在谷仓远处的角落，漠不关心地啃着草。他转过头去，看看贝儿，然后快步跟上我，嘴里喊着：“哦——爹地！”他的声音听起

来快要哭出来了。我随时都注意着他的安全，如果贝儿表现出要攻击他的迹象，我随时会插手。两只山羊在羊栏附近惊慌地打转。她们看到我们，便慢慢地大步跑过来，闻一闻水桶，用腿推我的胯下。这让鲁德感到惊慌。

“爹地！”他尖叫道，一面紧紧抓住我的大腿后侧，“上去。上去。背我。”

“羊儿很乖。”我把水桶放到地上，“她们不会伤害你，明白吗？”我蹲下来，一只手揽住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拍拍甜豆平滑的褐色毛皮。她们很柔顺，比大多数的狗还没有危险性，尽管星星，那只体型大的黑羊，在我们带她回家的第二天，的确好玩地拿角顶了鲁德一下。我对这件事不以为意，确实也没有时间在意。从那时起，我就不停地叫鲁德不要害怕。他必须学习与动物自在地相处，这样对他有益处。

“上去，上去。”他哀叫道。我不理他，转过身去，打开谷仓的门闩。突然间，我从眼角看到星星用后脚站了起来。一瞬间，她的头向侧边昂起，身体向前压下来。她那长着角的脑袋落下，直接撞上了鲁德，“砰”的一声，额头对额头，力量之大，让鲁德飞了出去。他落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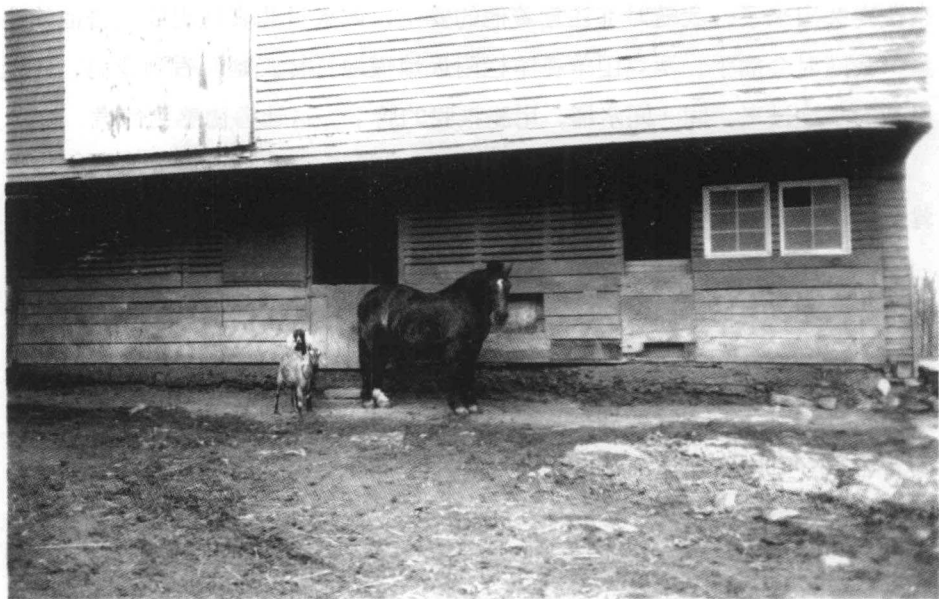
“星星！”我大叫一声，用力踢她，跑到鲁德身边。他的脸皱缩发红。一声尖叫从他的肺部鼓胀开来，终于破口而出。我一把将他抱起来，气得发狂。我把鲁德紧抱在胸口，一面追赶这只羊，一面踢她。然后，我逐渐恢复理智，朝着希瑟跑过去，她站在菜园门口。

“星星用头撞他！”我把鲁德从矮门的上方交给她。没有流血，骨头也没有断。

“她以前就拿角顶过他，你在那里为什么还把他放下来？”希瑟对着我怒吼。然后，她的声调柔和下来，轻声安慰鲁德，一面抱着他左右摇晃。他仍然不停地尖叫。

“我不知道！”我喘着气说，“我简直没法相信，她会这么做。”

我追着星星跑，想要再踹她一脚，结果出脚的力量过大，反而自己飞了出去。“砰”的一声，我重重地落在石子地上，力量之大，足以让我的肺脏破裂。落到地面后，我滚了几下。星星跑到谷仓深处。我跟过去，伏着身



贝儿与星星、甜豆站在谷仓边。贝儿的骨架很大，她的腿几乎可以把我的胸口钉在墙上，将我压扁。至于星星与甜豆，我原以为羊是不咬人的，但有一天，鲁德惨遭星星攻击，被她的羊角撞飞……（Michael Dolan/摄影）

子，以后卫球员的矫健身手快速前进。她扯着嗓子咩咩叫，舌头伸出来，左右摇摆，面露铤而走险的顽皮神色。我像野兽般挪动身躯。她试着从我身旁跑向前方，但是我一把抓住她那硬而短的尾巴，继而抓住她的脖子，把她推进羊栏里。

我一面拼命地把空气吸到肺里，一面走出去，去找希瑟和鲁德。

他们坐在那棵银色枫树下的野餐桌旁，鲁德已经平静下来，不过希瑟仍然抱着他。

“星星顶鲁德。”鲁德噘着嘴说，“爹地叫星星暂停。”

“没错。”我试着用欢乐的口气说出这句话，“一个长——长的暂停。”但是我内心实感恐惧——为了我竟让这件事发生；为了事情发生后，我又情绪失控。一定是因为我太累了，我对自己说。我几乎没法面对希瑟。我转过身，走回谷仓里。两只山羊需要水喝，贝儿也需要。我需要吃午餐，

然而现在还不行。

我走进谷仓的时候，贝儿在谷仓的另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贝儿的眼光

我发誓，贝儿在评判我。一切都始于她那种眼光。

在见到贝儿之前，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有关马的事情。有些人会跟自己的马建立深厚持久的感情，有些人会在马的耳边低声说话。马应该是一种聪慧灵敏的动物，尽管我不是那种爱马的人，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贝儿有一些深奥难解的地方，显示她拥有知觉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像个孩子，她所要求的事情，还有她不喜欢的事情，都是很基本的。她喜爱甜食，不喜欢被绑住，也不喜欢听到人对她发出命令。她的心情起伏不定，个性固执。有时她的静默、她头部昂起的姿态，还有那对深不可测的黑眼睛，让人觉得她的智慧和成熟度超过儿童，在这种时刻，如果她的嘴里说出话语来，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羊顶人”的事件发生不久，有一天我朝着贝儿的马厩走去的时候，一只老鼠悄悄爬过。尽管我在我们吃的奶酪上看到过肥大的鼠粪和齿痕，但是自从我在纽约看到老鼠以来，我在这里还没有见过一只老鼠。在纽约的那次，我在地铁站看到的景象，让我终生难忘。那天深夜，我独自快步走在黑暗中，穿过弥漫着刺鼻尿臊味的通道，这时，许多黑色的老鼠从走道的一边爬出来，走过一排斜斜的柱子旁边，爬向走道的另一边，把自己肥胖的身体挤进下水道的排水口里去。它们是从靠墙的一整排成堆的破布和硬纸板中间爬出来的。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我领悟到，这堆东西是一排在睡觉的游民。我停下来，大声叫——喂！喂！——我想把藏在暗处的老鼠吓跑，然后，我朝着出口跑过去。

此刻我心里想着那幅景象，眼睛看着这只谷仓里的老鼠。它在发抖，于是我想到，它吃了我撒在谷仓里的绿色毒药。在白天的明亮光线下，看着

它那珠子般的眼睛和肥胖无毛的尾巴，我的心不禁怦怦地跳。我拿块石头扔它，却没有丢中。老鼠快速移动，虚弱却怀着坚决的意志，蹲伏在谷仓的地基旁，凸出的双眼充满恐惧。我的肾上腺素大量分泌。我不想让它跑掉。我需要终结我对老鼠的恐惧。我又拿起一个石头丢过去，没有丢中。老鼠没有动。我又试了一次，终于成功了，血涌出来，好像用力踩破快餐店的小包西红柿酱。老鼠抖了一下，不动了。

我也在抖。大自然的血淋淋和暴力让我感到震撼——当一只动物拿了我们的食物，或是撞了我们的孩子时，我理解到自己的本性里所包含的暴力。尽管希瑟和我没有天真无知到以为这一年会过着田园诗里描述的天堂般的幸福生活，我们仍然没有对自己内心的这种原始反应做好准备。主要是恐惧，而我让它牵着我的鼻子走。

我抬起眼往上看，贝儿站在暗处，再一次用那对大而黑的眼睛看着我。那一天不久就要来临，到时候我必须面对她，而我绝对应该赶紧做好准备。

第四章 学会驾马车



结婚请帖

我们的1900年生活展开了两星期之后，信箱里出现了一封完全没料到的邮件：一张结婚请帖。更好的是，这个婚礼茶会的地点距离我家只有三千米。冰凉的啤酒。现场演奏的音乐。我们要去！我们不理睬邀请函上所印的回复电话，写了封短信作为答复。附上一句：有地方让我们停放马车和马吗？

威廉·魏乐特和夏妮是史威普本地人，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他们俩要共结连理。他们不久前才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搬回来，现在带着他们四岁大的女儿艾蒂森，住在史威普邮局后面一栋租来的小屋里。威廉是个自由接案的面包师傅，他们在他们屋子后面的一间库房工作，一个面包坊。里面有一部面包店专用的搅拌器，还有一台烤比萨的烤箱。夏妮的小腿上有一朵兰花图案的刺青（这是代表她生日的花）。她的车跟比尔和佩姬的一样，也是斯巴鲁，车子的保险杠上贴着盾形纹章的贴纸。她每个星期六到镇上的农民市场卖威廉做的长条酵母面包。她说话时声音很响亮，对每件事都有意见。威

廉则很随和，喜爱文学，他的软底皮鞋上总是沾着面粉。

有一天他们拿着冰凉的啤酒和一条热热的长条酵母面包来拜访我们，他们自我介绍，同时想弄清楚，附近的谣传是不是真的——我们究竟是不是某种精神失常的活化石。我带他们去参观户外厕所、菜园和木柴炉。我们一见如故。

然而，这封邀请函仍然让我们措手不及。这种反应或许显示出我们过度乐观，以为我们真的可以驾马车到那里去。事实上，除了每天早晨把食物倒进贝儿饲料桶的时候，我几乎没仔细看过她。她的整套马具仍然堆在库房里，其中有一条皮带在我们跟她第一次相会所发生的格斗中已宣告断裂。

幸运的是，我们家过去的第二户人家是全雪伦多亚谷对负重马最有办法的人之一。这里的人都说，这个男人什么样的负重马都能搞定，不管个头有多高大，脾气有多坏。

克莱德·提尔曼绝对不是那种在马的耳边轻声细语的人。这个扮演救火队的七十高龄男子借着威逼欺凌——嘶吼、咒骂、殴打——来掌控对方。他戴着一副义齿，装着一颗玻璃义眼，嘴里经常说着粗俗、渎神的脏话。至少我听他说话时是这样。提尔曼的祖先在18世纪中期到这里定居，至今他仍然住在山腰上的这块土地上，只是土地越来越小。这块地就在我家南边不到一千米的地方。他住在一栋油漆剥落的木屋里，房子的石灰岩地基和高大的身姿显示出它拥有足以自豪的过往。他用马耕地，用马拖运木柴，不时前往大西洋中部各州^[1]参加马匹拖运大赛。“克莱德·提尔曼是另一个世纪的人。”一位史威普的居民对我说，那时他还不知道，我们也正在走向另一个世纪。

就某方面来说，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会交上这等好运，竟然有一位负重马专家做我的邻居；另一方面，我可给吓坏了。我们的计划开始的头一两个星期，我的恐惧战胜了一切。即使我需要克莱德·提尔曼的协助，我也没法去向

[1] 大西洋中部各州（Mid-Atlantic），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以及西弗吉尼亚州。

他开口。他是百分之百的本地人，他的家族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了几百年之久。我却是百分之百的外地人，带着小包袱匆匆逃离纽约的住所，在这里玩起过传统农村生活的游戏。必须等我证明自己有所作为之后，我才能面对他。

那个派对的日子越来越接近，我仍然避免跟贝儿接触，也不去看那套皮带破裂的马具。我把自己的拖延归咎于家里和菜园的事情太多。幸运的是，琴妮是我的“第二良心”。她开车送邮件来时，会把车子用力调到倒挡，让车子倒着开上我家这条陡峭弯曲的车道，她的吉普车引擎轰轰作响。她的方向盘在右边，倒车开过来时，她旁边的车窗正好对着我们家，她只要摇下车窗，把邮件递给我就好。送咖啡磨豆机来的这一天，她也是这样做。我们看了一份专门卖东西给亚米希人^[1]的俄亥俄州邮购公司的目录，买了一部咖啡磨豆机。东西装在纸箱里寄达，但是纸箱太大，没法放到信箱里。

“贝儿最近情况如何？”她问。

“脾气跟平常一样坏。”我拿着纸箱，纸箱顶上放着几封信。

“还是很胖？”

“她不胖，琴妮。她只是骨架很大。”

“你必须让她走动走动。”她摇摇头。琴妮也常念我，要我清理贝儿的蹄子。“你有把她的脚拿起来清一清吗？”

“还没有。”我答道。琴妮的蓝眼冷冷地瞪着我，她那不耐烦的笑容仿佛在大叫，你这个没用的懦夫！

“你必须赶快清理她的蹄子，”她说，“我可以给你我的马蹄铁匠的名字，但是万一贝儿不让他清理她的脚，他会很不高兴。如果她踢到他，那就是你的错。”她把吉普车往前开：“嗯，我得走了。今天是星期一，你知道。”然后她加快速度，把车子开出车道，“你最好赶快处理那匹马！”“我会的，”我说，“我把手边这些活儿做完以后，立刻就去处理。”但是她已经走远了，她快速地把车开向下一个信箱。

[1] 亚米希人（Amish），亚米希为18世纪门诺教派的一个分支教派，信徒不用电，不开车，不接触现代文明。

见到负重马专家

撞见克莱德·提尔曼，完全在我意料之外。那一天我从他的房子旁边走过，看到他正用胶带把一面以手写字体写的“汽车出售，1200美元，车主自售”的牌子，贴到一辆黄褐色、约为1975年份的雷鸟汽车驾驶座旁的玻璃上。我头一次注意到，这栋房子是多么肮脏破败——谷仓凹陷，拿金属板当户外厕的墙；垃圾从车库的出口溢出，仿佛铁钉从翻覆的木箱里戳出来一样；生锈的犁、圆盘耙和割草机淹没在深及大腿的杂草里。一只瞎了一只眼、毛皮上有斑纹与大块斑点的杂种狗从午睡里惊醒，发出粗糙刺耳的叫声。它用那只能看的眼对我射出仇恨的目光，朝着我冲过来。就在我打算跳上汽车的引擎盖时，这只狗的身体抽动了一下，大叫一声，突然停下来，原来它被铁链拴住，勒到了喉咙。

提尔曼不理这只狗，也不理会我的反应。

“哈啰！”我试着用平静的口气说。

他穿着肮脏的深蓝色工作服，他的皮肤晒成古铜色，像皮革一样坚韧，且带着一点油腻。这个老人往前走，仿佛我完全不存在。他那没有表情、熏猪蹄髯般的面孔，让我想到安东尼·霍普金斯在电影《沉默的羔羊》中扮演的食人魔汉尼拔医生。

“哈啰，提尔曼先生。”没有反应。

就在我准备大声报出自己名字的时候，他抬起眼看着我，露出一排完美无瑕的白牙，我不确定他是因为很高兴看到我而露出笑容，还是想要狠狠地咬我一口。他用低沉平静的声音说：“我听见你在压你们家那口井的泵。”

“是的。”我说，“是的，我们是有在压。我们装了一个手动式的泵。”

他摇摇头，仍然微笑着，用锐利的眼光穿透我。他一定是听说了我们的计划。

没有人说话，这段沉默让我觉得紧张。“打自己要用的水，这是很好的运动。”我说，话一出口，我就希望我没有说过这句话。哪有什么农夫需要运动的？

“让我弄清楚，”他说，“你打掉了屋子里的厕所，去建一个户外厕所？”

“对。”

他放声大笑。

我对他说了贝儿和马车的事，但是我没有向他求助，相反的，我说：“我希望你哪天能跟贝儿见面。”在一阵比刚才还要久的沉默后，我决定离去。

“很高兴认识你。”我说。

提尔曼一句话也没说。他转过身，走向他的房子。

带着脚踏车，去赴约

举行派对的那一天来临了，显然我不会驾着贝儿拉的马车过去。距离只有几千米，我们可以走路去，让鲁德坐在他的小小红色拖车里，由我们拉着一一起去。

到了午餐时间，天气热得让人寸步难行。在那个红色的烤盘上待个十分钟，足以把鲁德娇嫩的幼儿肌肤晒出水泡。我们放弃了走路去的计划，开始干活。到了下午4点30分，我正在劈柴时，比尔·罗伯森开车来到我家。

罗伯森夫妇不久前曾请我们去他家里吃晚餐。用餐前，我们在一个摆着黑檀木雕塑和蜡染布制品的房间里吃花生米配啤酒。这是佩姬的“非洲室”。于是我领悟到，之前我对这栋鳕鱼角般钓钩型砖房的主人，抱着可笑而谬误的假设。比尔曾任高中数学教师，他种植金针花和各种蔬菜，会做苹果酱，会烤面包，会喂食流浪猫，帮忙照顾他女儿的马“黑檀”。他女儿莎拉多年前就对黑檀失去兴趣，目前她在日本教英文。他是个温和的人，有一双平静的蓝眼，举止从容不迫，对于他那精力充沛、在知性方面如饥似渴的妻子来说，他是最完美的帮衬。佩姬也当过老师，手边能拿到的任何东西，她都会仔细阅读。那天晚上，她伸手拿了一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集，看

到一首有关用镰刀收割庄稼的诗。不过她特别喜爱女性作家，谈到美国南方的小说家李·史密斯（Lee Smith）时，也是热情洋溢，无法自拔。当佩姬谈到她在大学毕业后，去刚果教了一年书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听到我说起我在肯尼亚的经历，也觉得非常惊奇。跟我们在史威普最近的邻居有这么多的相同之处，让我觉得怪怪的。比尔和佩姬受到史威普的吸引，喜欢这里的平和与宁静，他们来此定居已有30多年。在我们搬来之前，有十年的时间，他们跟特林柏磨坊的住户完全不相识。但是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接受了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过来打个招呼，要不就是带点东西给我们。他们做派的时候，都是佩姬负责做派皮，比尔做馅，这种合作方式是他们互补式伴侣关系的最佳范例。

“我们来照顾鲁德，”比尔说，我放下斧头，拭去脸上的汗水。“你和希瑟去参加那个派对。”我们又可以去参加了！

现在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把一桶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去，然后把胡子刮干净。

用一把直直的剃刀赶着刮胡子，实在是个天大的错误。慢慢刮都已经够危险的了，我在刮了头几下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个道理。我不断调整拿剃刀的姿势和刀片的角度，每一根胡子似乎都被刀片中硬拔出来，我的下巴不禁往后缩。这证实了英国诗人拜伦对于刮胡子的看法：“每日的灾难，总计起来，也许大体上与分娩一样。”

此刻，我坐在野餐桌旁，面对着这个我扮演绅士的戏剧性画面——刮胡子用的肥皂和刷子、磨剃刀的皮带、剃刀、脸盆、洗脸布、靠在水桶上的镜子——思绪飘到派对现场，我想象自己在那里，啜饮第一口自家酿造的冰凉啤酒。我的思绪回到眼前，手动了几下，从耳朵移到下巴，然后——哎哟！——右边的鬓角下方刺了一道约2.5厘米长的口子。这件事让我重新集中注意力，但是我的手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稳一点。等到我刮完的时候，一堆新的伤口把我的T恤和短裤染得点点殷红，盆子里的水也变成淡红色。

“啊——”希瑟畏怯地拿起一块吸血的纱布，轻轻地点着我脸上各处。我有点担心她会晕倒。她一看到血，头就发晕。“为什么要让你自己受这种

罪呢？”

“在非洲的时候，我试过留胡子，”我说，“行不通。”

“你说的行不通是什么意思？”我几乎能听出她脑子里的念头：你什么也不用做。胡子会自己长出来。

“会痒——而且很糗。”我向她解释，我嘴唇上方的胡子太少，留起来活像亚米希农夫，不过这么说也许还很合适。我的朋友把这种胡子称为“细条胡”，简称“细条”。

我们迅速地换上最干净的一套衣服，把鲁德送到比尔和佩姬家，然后骑着脚踏车出发。

一路上风景十分美丽。我沿着山坡滑行而下，绕过弯道，从琴妮家旁边经过，山谷在眼前豁然开朗。奶牛躺在铁丝网内的畜栏里，听到骑脚踏车的声音，一头接着一头站起身来，踏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一群黑色小鸟飞上天，同步转弯，飞向山峰。几星期以来，我没有用这么快的速度前进过——我们不再开车以后，这是我头一回来到琴妮家的这片山坡的顶端——我的心翱翔着，渴望挣脱农场里的种种责任。

我彻底沉浸在这种崭新而强烈的喜悦里，没有注意希瑟在哪里。我想此刻她必定也在享受一种属于自己的欣喜。

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

“罗——根。”她微弱地叫道。我停下来，转过身去。她站在远处，好像地平线上的一个火柴棒小人。

1900年的脚踏车看起来跟今日的脚踏车非常相似。有车轮、刹车、踏板、曲柄、车架（分成男用和女用两种）、不舒服的坐垫——每一个部分都差不多。我们在为这项计划做准备的时候，四处去找样式古老却还没有老到可以当收藏品的脚踏车。我们要的是便宜、车体比较重、没有变速装置的脚踏车，美国半数车库角落里闲置不用的那种生锈脚踏车。无数的庭院旧货拍卖和旧货店卖的脚踏车大都是越野单车，要不就是把手垂着彩带的粉红色自行车。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在拍卖网站上买了两辆大约是1970年份的脚踏车。它们被拆成许多零件，装在塞满碎纸的纸箱里寄过来。两辆车都不太

好骑。在计划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我又付了相当多的钱，把一辆重新修复、非常拉风的1950年份的“海滩车”^[1]拖回家。这辆车的轮胎外侧有白圈，车上有篮子。因为它的车身比较高、比较适合我，所以这天下午由我骑着这辆车，希瑟骑的则是一辆小小的女用蓝色脚踏车，它的后轮轴承好像吊在花生酱里。

“这玩意儿踩不动。”她赶上我以后，就气急败坏、气喘吁吁地说，“我连下坡的时候都必须踩踏板。”

“我来看看。”我们互换脚踏车。我站在踏板上，用所有的力气踩下去，却没法让踏板出现前进的弧度。她骑上海滩车，箭一般地往前方骑去。

我们来到派对现场的时候，我是走过来的——一半是推着脚踏车，一半是大汗淋漓地靠在这辆小小的蓝色脚踏车上。我浑身汗湿，棉质衬衫紧紧黏在胸口和背上。我的卡其裤脚塞到袜子里，免得被脚踏车的机油弄脏。一群穿着无袖连身裙和紧身短裤的宾客转过身来看着我们。他们的表情显示，我们是第一对没有开车来的客人。

经过了这趟脚踏车之旅，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渴过。我扫视四周，寻找啤酒。一座派对用的帐篷下，有许多长形的餐桌上摆着食物——绿色蔬菜做的沙拉、泰式风味的面条、墨西哥式的七层蘸酱、玉米片，还有许多豆腐做的餐点。房子前方的露台传来不插电乐器的乐声，那里有一名男子随手拨弄吉他，一名女子和着拍子摩擦洗衣板。一群小孩跑过去，让我们对于没法带鲁德一起来而感到遗憾。我简直快被这一切淹没。这三个星期当中，只要是醒着的时候，我都在搬东西、劈柴、打水、用锄头耕地、挤牛奶、拔杂草，或是抓蛇。我们只见过少数几个邻居，每次见到的人不会超过三个。现在面对着自助餐、现场演奏的音乐，还有一群正在聊天、梳洗得很干净的人，我觉得自己像个住在洞穴里的原始人，意外闯入了别人的花园派对。

我终于找到了啤酒，我用贪婪的眼光盯着两罐啤酒，仿佛我是从撒哈拉沙漠里走出来的，而不是从我的农场骑脚踏车过来的。

[1] 海滩车（cruiser），一种轮胎较宽的复古型休闲脚踏车。

我一口气灌下半杯啤酒，然后把杯子放在装啤酒的小桶上。我找到了希瑟，把剩下的半杯递给她。“这东西的味道有说不出的好。”我又喝了一口。

“什么样的味道？”她说。“我不知道，某种琥珀色的东西。”我就着杯子，又喝了一大口，然后对着她笑，嘴唇上镶了一道泡沫形成的小胡子。我打了个嗝儿。“对不起。”

“放轻松，罗根。我们只能在这里待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最好赶快开始。”我又喝了一大口。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啤酒，如此的美味，如此的冰凉，如此的醇厚。我看看四周的人群，大部分都没有见过，然后，我再次举起杯子。“我去续杯。”

喝下几杯啤酒后，希瑟拉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一片斜坡的草地上。“我们去跟威廉和夏妮打个招呼。”这对新婚夫妇才跟一位戴深色太阳眼镜和巴拿马草帽的老先生说完话。希瑟说：“恭喜！这个派对非常成功。”

“嘿，你们真的来了！”威廉穿着浅灰蓝色瓜亚贝拉^[1]薄布衬衫和卡其裤。他的鞋子上没有面粉。“那匹马呢？”

“我们骑脚踏车来的。”我感觉到令人沉醉的酒精让我变得大舌头，“也许这样反而好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喝醉酒的时候驾过马车。”

“对，比较起来，醉酒的时候骑脚踏车可是安全多了。”夏妮说，我狂笑起来——有点太大声了，我从希瑟看我的眼光里察觉到。我发现自己盯着夏妮紧紧裹在身上的连身黑裙和布满乳沟的亮片瞧了又瞧。“我希望你会戴安全帽。”她加上一句。

我几乎要开口跟他们说明，1900年的时候脚踏车安全帽还没有出现。但是，该死的，我可是来这里找乐子的。食物、啤酒、不插电的音乐——这些东西在一个世纪以前都有了。放松心情吧。

我离开人群，去倒续杯啤酒。我答应希瑟去拿一碟食物，过来跟她会面。但是我没有回来。我在酒桶和人群间摇摇晃晃，一会儿去续杯，一

[1] 瓜亚贝拉(guayabera)，中南美洲常见的一种布料。

儿跟人聊天，我一口东西也没吃，就这么沉浸在四周的一切当中。每个人似乎都听说了我们的计划，每个人都想知道，这种生活给人什么感觉。你们怎么买日用品？（我们不买。）如果你们生病了，那该怎么办？（不知道。）你们的马车和那匹马呢？（在家。）老实说，我厌倦了老是谈这个话题，我真的只想开心一下。我漫步过去再倒一杯啤酒。太阳下山了，天气变得凉爽宜人。

三个星期以来，我头一次停止了流汗。

有一刻，一列火车隆隆地驶过，距离摆放食物的帐篷只有将近30米。一个世纪以前，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从这段火车轨道到镇上去。狗儿逃开。小孩子攀到篱笆上观看；大人话说到一半，察觉到火车声，微笑着停住，等到隆隆声消失了再继续说。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充满运煤列车猛力向前推动的画面，可以轻易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里，用梭罗的话来说，那是个“铁做的马……用它的脚撼动大地”的世界。当时梭罗对火车感到震撼、惊讶，至今火车仍是速度与人类运输的奇迹。

最后一节车厢过去了。我睁开眼。火车的隆隆声在我脑中回荡，我的头更晕了。天是否突然间变得更黑了？

“罗根！”希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她的声音里带着惊慌失措的意味，“你看了表没有？”

“没有。”

“已经八点半了！我们告诉过比尔和佩姬，我们八点以前会去接孩子。你还得挤奶呢！”

“该死！我们该拿那辆蹩脚的脚踏车怎么办？”我无法忍受要把它骑回去的想法。

“留在这里。”希瑟做主了，“威廉说，他可以把他的脚踏车借我们用。现在他到山坡上的库房里去取脚踏车，还要调整一下才可以骑。”

一枚光秃秃的灯泡照亮这栋发霉的库房，里面有割过的青草和汽油的味道。威廉弯着腰在弄一辆橄榄绿的登山自行车，他一下又一下地猛力压着手压式打气筒，为前面的轮胎打气。这辆自行车的车体是用某种高科技的合金

制成，饰以各种机件装置——放打气筒的架子、装水罐的底座、时速表……这辆自行车的配备，我用两只手的手指头都数不完。光是看着它，就有一种亵渎教堂圣物的感觉。

“谢了，威廉，可是我们不能用这辆车。”我说。

“罗根！我们得走了。”希瑟插嘴道。库房外的天色越来越黝黯。没有月亮为我们照路。两只山羊的奶恐怕快胀破肚皮了。

威廉继续为轮胎打气。“他妈的！”他喊了一声，一手捂住另一手。血从指节旁渗出，他的手指撞到轮辐了。打气筒出了问题，这位面包师傅身体向后仰，怒火中烧。他用力压打气筒，软管的喷嘴发出“啪”的一声巨响。他弯下腰，查看轮胎上的气嘴。汗水从他的下巴滴落，机油染污了他的瓜亚贝拉衬衫。

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心中跟不同的选择奋战：走路回去，还是骑脚踏车？突然间，我仿佛走出了五里雾，脑筋变得清楚了：今天是威廉大喜的日子，而他现在却使尽吃奶的力气，帮我们处理脚踏车的问题。我们已经毁掉了他的衬衫，我不想造成更多的损害。

“威廉，”我说，“你去找夏妮，我自己弄。”他把打气筒交给我。我把软管动了动，手忙脚乱地拨弄了一番，把喷嘴用力推进气嘴，又把它拉出来查看，最后，终于听到一个深沉的咝咝声，显示有空气进到轮胎里去了。我像疯子一样，死命地压着打气筒。我又流了一身汗，努力跟时间赛跑。

库房外聚集了一群人。我们向大家道谢，像灰姑娘逃离舞会一样地快速离去，只是我们那颗该死的蓝色南瓜奇迹般地变成了一辆跑得飞快的橄榄绿“马车”。为了让眼前的情况符合我们的规则，我把这辆自行车放到最低挡，一路上辛苦地踩着动作缓慢的踏板，大腿感到灼热疼痛，就这么回到家。

我骑到琴妮家那片山坡顶上的时候，听到两只山羊在惨叫。我沿着特林柏磨坊路，摸黑冲下山坡，借着银河的星光向前行。我摸索着走进屋里，找到一盒火柴——我擦破了皮，觉得自己快要吐出来——我赶紧拿起水桶，桶子相撞，发出当当的声音，山羊听见了，叫得更大声。

我在月光下挤奶，整个人被汗水浸透，我身上的这条裤子，原本我小

心保持它的干净，想留在重要场合穿的，现在它沾满尘土和油渍，又皱得要命。然而，我毕竟赶回来了。

我把山羊赶去睡觉，将贝儿叫到谷仓里，把草地上的门闩好。我看看鸡舍里面，举起油灯，让光照到比较远的那面墙上，看到六只鸡挤在一起，睡在让它们栖息的木头上，我这才放心。我停下脚步倾听，有人在说话，那辆金属做的“马车”发出嗒嗒的声音。希瑟和鲁德回来了。

往前走，贝儿

我不仅没有开始学习驾驶马车，而且还必须向威廉、夏妮，还有我在那个派对上见到的每一个人承认，严格来说，我和希瑟原本应该是乘马车过去的，但是我完全不晓得该怎么驾马车。马车的事，触及痛处，引发不安，使我思考这个计划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在假装自己生活在一百年前的时代。我们研读了1900年的科技史和农村生活的资料，然后制定出一些规则。我们有一种预感，就是只要我们尽可能达到历史上的正确性，等到这一年结束后，我们就会获得某种重要的成就。有些例外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例如擦防晒乳，尤其是给皮肤白得像百合花的鲁德擦擦，因为今日的臭氧层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能够有效地阻隔有害的紫外线。其他的例外做法则是带着自欺的意味——不去学怎么叫贝儿拉着马车走，就是其中的一项。我不能只是因为内心害怕，就把她长期“停放”在草地上。

不久，一辆车身挂着“农场用品”牌子的熟悉绿色小货车开到我家，给了我一个得到救赎的机会。

蒂娜·威尔逊是之前曾给我们送来一大桶樱桃的“牛仔乔”的女儿。她带来另一份派对邀请函给我们，他们家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七月户外烤肉派对。能够被请去参加派对，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们还在慢慢认识史威普的这些邻居。如果我能用文明而优雅的交通方式到他们家，而不是狂乱地踩着儿童脚踏车出现，也许我就能挽回一些颜面。参加威廉和夏妮派对的大多

数客人都住在镇上，威尔逊这个派对的客人则大多是养牛的农夫，其中包括一些史威普地区最古老的家族。我必须驾马车去。

三天后——7月4日，星期三——希瑟、鲁德和我在屋子外头的野餐桌旁吃早餐：玉米面包，地窖里存放的最后几个柑橘，还有希瑟以罐子的盖子为模型并洒上白醋做出的完美水煮蛋。威尔逊家的派对将在这个周末举行。拖延了一个月之后，我今天终于要尝试把贝儿套上马车了。

就在我快要喝完我的咖啡，努力让自己鼓起勇气的时候，一辆白色旅行车开进我家的车道。两名男子下了车。其中一人是克里斯，他很年轻，之前在巴尔的摩担任教师工作，目前在附近一座肉品牧场当学徒。另一人是个高大粗壮、头发散乱的陌生人，从他的“细条胡”和服装来看——直角领的衬衫、细平棉布的长裤，裤腰上系着吊带，头戴宽边草帽——是亚米希人，不过他全身的衣服都是白色的，他的裤子膝盖上也有一些不小的破洞，裂口有布片垂下来。他叫大卫。

我从厨房里拿了几张木头椅子出来，我们一起坐在院子里。

“我听说你们在纽约赚了几百万美金，决定试试当农夫的滋味？”大卫的眼里闪着狡诈的光。

“不完全是这样。”我的身体僵硬起来。我听过这句话。我第一次见到“多元农场”的主人乔·萨拉丁^[1]时，他就说过同样一句话，说的时候还咧开嘴笑，肩膀上粘着一块大大的土豆片。我很难责怪乔这样的人，他一辈子都在史威普务农，自然会对我们这种新来的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这家伙是谁？“对，我们之前住在纽约，现在我们住在这里。我们正在努力学习过去那个时代的做法。”

“这个地方一定花了你一大笔钱？”他看看四周。

克里斯不自在地在椅子上扭动身躯。

“你是农夫？”希瑟想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大卫身上。“我对务农

[1] 乔·萨拉丁 (Joel Salatin)，美国农夫、演讲家与作家，著有数本著作，他在弗吉尼亚州史威普区雪伦多亚谷经营的“多元农场” (polyface) 不使用具有潜在性损害的化学物品。

略知一二。”他那种自大的口气活像傻子派尔^[1]，“对于以前那个时代的做法，我也略知一二。”他在多元农场当过学徒，他说，现在他回到此地，帮忙萨拉丁家的人筹备一个大规模的周末工作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有心从事有机农业的农夫将会参加这项活动。他提到他的家人，他们是尤达^[2]的信徒，住在马里兰州西部。我把他归类为亚米希的叛徒，离开了教徒聚居的地方，自己出来闯，成为亚米希人所说的“现代人”。

我不习惯早晨闲在那里虚度时光，尤其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必须让自己学会驾马车。”我宣布，一面站起身来，把早餐的盘子叠在一起。

“如果你们想一起来，欢迎。”我虽然喜欢有克里斯做伴，但我希望他们能让我独自应付这件事。

“你有一匹负重马？”大卫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可以示范给你看，教你马车要怎么驾才行。”

“你也懂马？”我用怀疑的口气说。

“当然懂。”

我抬眼看看贝儿，她站在谷仓旁边，用鄙夷的眼光望着两只山羊，她们正开心地用头上的角顶着对方，她们的耳朵啪啪地拍动。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家伙，但是我还能怎么做呢？

“来吧。”我说，我们三个朝着库房走去。

大卫从库房的地上拿起这套饱受忽略的马具，他用专家的手法，把马具抛到肩上，大步走进谷仓，来到贝儿面前。

“她叫什么名字？”他问。

“贝儿。”

“哈啰，贝儿。”他说，一面抚摸她的脖子，“我们要出去走一下。”然后，他对我说：“看起来这玩意儿对她会发挥点作用。她真是胖。”

15分钟之内，贝儿就上了马具，被套到这辆蓝色的马车上。先前不可捉

[1] 傻子派尔（Gomer Pyle），美国20世纪60年代电视剧集中的角色，为一名头脑简单的加油站服务员。

[2] 尤达（the Yoders），指信奉美国门诺派神学家尤达（John Howard Yoder）的和平主义信念的人。

摸的一组皮带，现在全都听话地各就各位，该拉紧的地方拉紧了，该扣住的地方也扣住了。她的牵绳绑在篱笆的柱子上。她来的第一天跟我搏斗时弄断的那条肚子上的皮带，现在也修好了。大卫在皮革上钻了几个洞，将细绳穿过去，绑住马肚子。情况看起来好转了。

“你的马鞭呢？”大卫问。

“我的什么？”

“你的鞭子。”

“我没有。”他摇摇头，单脚跃过木篱笆，猛地折断一根树枝，在空中频频挥舞——咻！咻！——宛如一名剑术家在测试他的长剑。

我大声呼唤希瑟，她跟鲁德待在屋里：“我们马上就要驾着她走了。到门口跟我们会合。”

大卫显然知道，我对马匹的事所知不多。然而，我们爬上坐凳，即将出发时，他还是把缰绳交到我手里。好吧，我想。保持镇定。这件事我做过。

“咭”代表向右转。“喝”代表左转。

问题在这片山坡。那时马歇尔和我是在平地上起步的。现在我们要沿着这条陡峭的石子路往下走，这条路绕着河边的绝壁延伸过去。就在篱笆的另一边，有一片12米高的绝壁，绝壁下是一摊浅水。

我的手在发抖。“往前走。”我说。贝儿还是站在原地。“往前走！”我嘶吼道。完全没有反应。

大卫轻轻地甩动树枝，打了贝儿硕大的臀部一下。马睁大眼睛，向前一跃，我们的脑袋随着往后仰。我们沿着车道往前走，马蹄铁重重地踏着石子路。手上没有方向盘可以握，脚上没有踏板可以踏，我觉得彷徨无助。我感到惊慌，伸手去压刹车杆，我希望借着紧压这根包着橡皮的杆子，就能给车轮施加压力，让我们的速度慢下来。但是，就在我伸出手去的时候，右边的缰绳从手中脱落。贝儿往左转，笔直地朝着篱笆走过去。我仿佛看到我们冲破篱笆，从绝壁顶端坠落。大卫一把抓住缰绳的皮带，猛拽一下：“咭，贝儿！”她猛地向右转，挺直身子，沿着车道铺平的部分，来到山坡下。在这里，克里斯、希瑟和鲁德在台阶上等着我们。

“哇噢！”我尖声地喝了一声。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拿着一条缰绳，大卫握着另一条。我们同时往里一拉。“哇噢——！”

贝儿停住了。大卫放声大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我简直忘了这件事有多好玩。”

“忘了？”我说，我感到狼狈，仍不确定应不应该信任他。“有多久了？”

他不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只烦扰贝儿的马蝇。它停在大卫的手臂上。“啪”的一声。“我打到它了，贝儿！”他的口气里带着一种狂躁的热情。他举起手，向贝儿展示手上的一抹血。他把血迹抹在自己的白长裤上，发出低沉的吼声：“咱们走！”

克里斯跳上马车后方的运货区。我再次握住缰绳。“往前走。”我说，这一次，我们出发了，沿着童军巷，以一种速度越来越慢、令人昏昏欲睡的步伐前进，就跟一个月前我驾马车带着我们全家人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只是不想让马车走得更快一点，最后大卫终于握住了缰绳。“看着，”他说，“我做给你看。”就像一个喜欢开快车的人终于不耐烦地挣脱了堵塞的车阵，他“啪”的一声，手臂一弹，抖了抖几条比较长的皮带当中的一条。

“小跑步，贝儿！”她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竖了起来，她开始跑，连我也看得出来，我们正以超越小跑步的速度前进。

“这家伙没有教我那个指令。”我紧紧抓着马车座凳旁的一条细细的铁棍扶手。

“你必须要有办法叫她走快一点。”大卫再一次抖抖缰绳，催促她往前走，仿佛我们要逃离一群暴徒的攻击。只要她的脚步慢下来，他就用这根嫩枝拍打她。我们走到这条路的尽头，转了个弯。不久，我们就在我家的车道旁停下来。“上来，希瑟！”我说。

克里斯抱着鲁德跳上来。希瑟蹲在马车后面的运货区。我们沿着这条路，从相反的方向迅速地往前行去。大卫负责驾马车。

“我完全没有想到，贝儿可以走得这么快。”希瑟说。

大卫专心地注意路况，同时善意地跟这匹马开玩笑。小跑步，贝儿。往

前走，贝儿。

“要右转。”我说，我们来到特林柏磨坊路的暂停标志前面。“我想去见一个人。”

我们一走到这栋房子的石子车道上，提尔曼的狗就疯狂地往前冲。我担心贝儿会受到惊吓，然而她对这只绑着铁链的狂吠的狗不以为意。真是匹好马。

我们走进屋里，一位老妇人拨开布帘，靠在助行器上。那是艾伦，提尔曼的妻子。

然后，睡在满是垃圾的车库入口的折叠椅上，双腿张开、手指交叉、胸口一鼓一鼓的，就是那个我不了解的谜。他从7月4号国庆节的午睡醒来，看到一幅奇特的景象，三个眉开眼笑的人——其中一个穿得像个亚米希地区的冰激凌小贩——在一辆宝蓝色的马车上。这个老农把自己僵硬的身躯从椅子上拉起来，慢慢走到贝儿面前。贝儿鼻子喷气，露出紧张不安的神情。

“哈啰，提尔曼先生！”我试着掩饰心中的兴奋，“我敢打赌，你没想到会看见我驾着马车。”

他没有说话，只是慢慢地在马车和马旁边绕圈子。

“你觉得她怎么样？”希瑟问。没有回答。然后，好像他耳朵聋了一样，希瑟大声地再问一遍：“你觉得这匹马怎么样？”

提尔曼不理她，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大卫用打包的绿色细绳捆紧的那条断裂的皮带上。“你有没有见过代顿镇的那个开马车店的家伙？”他的声音很平静，几乎是甜蜜的。

“柏克荷德？”我问，我想起了那家门诺派教徒开的商店，我们想买马车的时候，去过那家店。

“我想他有卖单块的皮子，你可以绑在这里，从马肚子底下包过去。你可以要他卖一块给你。”

“我不会用别种绑法的皮带来叫她拉车，”我说，“必须靠这条绳子撑一阵子。”

我和提尔曼谈话的时候，大卫慈悲地保持静默。他看着提尔曼用来训练马匹的橇子上堆满了水泥块。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提尔曼的马，谁都能想象得到，它们得有多大的力气，才能拉得动这么重的东西。

我转过身，面对提尔曼。“嗯，你觉得她怎么样？”

“她很肥。”

贝儿显得坐立不安。该走了。我握着缰绳，一走出提尔曼家的车道，我就试着对她发出新的指令。“小跑步，贝儿。”我说，她照做了，撒开步子，稳健地跑起来，很快把我们送到家。大卫跳下马车。他和克里斯必须回萨拉丁农场去了。

“很感谢你的帮忙。”我跟大卫握手，我的兴奋情绪融化了最初的排拒。他临走前又给了我一些指示：放松、专注，用柔和而有明确目标的口气，对她发出指令，而不是用充满感情的语气恳求她。把马鞭抖一下，来加强指令的力量。这样，不久以后，我就不需要用到马鞭了。除了马鞭的部分，这些都是很好的教导性的建议。

“还有，要随身带很多打包用的绳子。”他大声说，然后坐进克里斯的车子。

再一次，人们离去，剩下我跟没有套上马具的贝儿在一起。感谢大卫，这一次我有了准备。

那个派对将在三天后举行。

试驾

羊奶的分子很均匀。它的乳脂不会浮到表面。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奶油，因此我们买了一部手摇式离心机。借着每分钟让牛奶旋转九千次，它能把牛奶里的那些小脂肪球萃取出来。一天早晨，我把这部廉价的俄国制离心机抹了油，固定在野餐台上。鲁德站在旁边看。

“从这里倒进羊奶。”我把5.7升的羊奶倒进离心机顶端的漏斗里，

这个漏斗有一个装爆米花的盆子那么大。“然后我转动把手，让牛奶转圈。”鲁德的眼睛睁大了，看着这部机器开始嗡嗡地运转。

我的身子弯下来，手转得越来越用力，越来越快。厚重的乳脂从管口滴出来，脱脂奶从另一个管口滴下。我转得更用力了。机器发出更响亮的嗡嗡声，桌上的瓶瓶罐罐和金属碗嗒嗒作响。我转得越来越快。羊奶流过漏斗的边缘。乳脂流下来。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弄完？我转得更快了，但是当我调整重心，换个姿势，让自己舒服一点的时候，我那只空出来的手不小心碰翻了装羊奶的漏斗盆。哐当一声！羊奶以每分钟九千圈的速度，洒得到处都是。

“啊——！”我尖叫道。希瑟从清洗室冲过来，看到我从下巴到靴子上斑斑点点全是奶渍，不禁捧腹大笑。我把倒扣在地上的盛乳脂碗捡起来，用力摔在桌子上。

我们一次次地向鲁德示范那句谚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鲁德也不再为防漏的婴儿塑胶杯可用。吃午餐的时候，我已经把野餐台那边清理干净了，鲁德摆出用手摇离心机的姿势，嘴里发出“滋——滋——”的声音。

“爹地打翻奶奶，”他说，“爹地疯疯。”

“我没有为打翻的奶哭泣，”我说，“不过我不该为了这件事发脾气。”

同一天，在我读过亨利·赫伯特（Henry William Herbert）于1859年出版的指南《如何饲养马、骡和小型马》（*Horses, Mules, and Ponies and How to Keep Them*）后，我准备自己一个人驾一趟马车。在我让全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爬上马车之前，我需要练习一下。

等到我把钩子钩到马车上，已经是下午了。我又热又累，心情恶劣。羊奶飞爆事件发生后，我推着我们那部生锈的旋转式割草机，在房子四周割草，借此消耗体力，让自己精疲力竭。由于我太久没除草了，使得杂草因为顶端太重而下垂。我握着割草机猛推猛拽，直到青草平到可以看见蛇。然后我重重地躺到吊床上，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浑身是汗，不认为自己现在有能

力去驾马车。

此刻，在我给贝儿系上缰绳以后，我想不起大卫教过我的安全结该怎么打。他用这个结把贝儿拴在篱笆旁，万一贝儿受惊了，只要猛力一拉，这个活结就会解开，如此她就不会撞破篱笆，或是摔断自己的脖子。我拿着绳子拨拨弄弄，一直搞不定，贝儿开始紧张了。等我取了笼头回来，牵绳已经拖在地上。

“哦，贝儿，你解开了我的结。”我装出很有自信的样子，心里却提防着她突然跃起跑开。但是她站在那里，让我重新绑好结，然后继续站在那里，让我把笼头套到她巨大的头上，让我不安地拨弄这些皮带。

棘手的部分在于起步。贝儿听大卫的。而此刻，当我把脚放到铁制的踏板上，准备爬上驾驶凳的时候，贝儿竟迈开步子往前走。“哇！”我喊道。我向后倒，摔到地上，我猛拉缰绳。她跟这些皮绳奋战，脖子扭来扭去，脚步却不停。就在我们快要从这条陡峭的车道往下冲的时候，我爬上了移动中的马车。不过，这一次我保持镇定，用力拉着缰绳，稳稳地握住绳子，嘴里不断地说着：“哇！”直到她停在车道的中点。好女孩。

“很快就回来。”我对希瑟喊道，她从厨房的门里探出头来。

“罗根，拜托你小心一点。”她说。自从希瑟听说有个名叫马克辛·库明（Maxine Kumin）的诗人因为马匹惊逃，从马车上摔下来，脊椎严重受伤，几乎性命不保的事情后，她就一直担心我驾马车会发生意外。在我们准备展开这项计划的那段日子里，库明所写的有关养小鸡、照顾菜园和修补篱笆的散文，帮助希瑟撑了下来。但是他从马车上摔下来的意外事件把她吓坏了。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会小心，别担心。”我说，尽管我们心里都明白，附近这些狭窄、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经常有追求刺激的青少年和缺乏耐心的镇民经过，因此我的安全并不完全操之在己。还有，童军的营队活动已经开始，来往车辆大量增加。

我很快地从比尔和佩姬家的砖房门口经过。我“啪”的一下，用嫩枝轻打贝儿，她就记起了她的新指令。比尔跪在他种的一区西红柿旁边，抬起头

对着我笑。“我没法停下来！”我叫道。

我过了一道没有栏杆、横跨中央河的桥。我用嫩枝戳戳贝儿，要她往上走，转个弯，沿着一条陡峭的石子路往前走。要是从另一边掉下去，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别紧张，贝儿。”我拉拉缰绳，又把刹车杆往里拉，将它放在第一个凹槽里，包着橡皮的刹车杆带来适当的阻力，让马车不致冲到贝儿身上。这是大卫教我的另一个诀窍。来到平坦的路面后，我把刹车杆放开。

突然间，贝儿在路中间停下来。她用后腿站起来，脑袋前后摆动。“发生了什么事，贝儿？往前走！”

她不肯向前走，反而试着向后退，车轮在地面辗磨扭动。有东西吓着她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一条狗、一辆车子或拖拉机。也许她是从眼罩边看到了一间老旧的库房逐渐逼近。我用马鞭要求她往前走，我把缰绳左拉右拉，好让她的头朝着正前方。从库房旁走过去以后，她安静下来。一个这么大、这么黑的一团东西这么靠近路边，她心里一定很疑惑。不是有“防弹”的东西吗？那么有“防库房”的东西吗？我的心还在猛烈地跳动，然而马车很快就恢复稳定的节奏，继续前行。

回去的那段路平安无事——直到我来到特林柏磨坊路。在这里，一辆红褐色的厢型车在我后面发出隆隆的声音。在我这双缺乏经验的手握着的缰绳掌控下，贝儿在马路上一会儿向左转，一会儿向右转。厢型车的驾驶不耐烦地猛按喇叭，要我让他超车。我的眼睛看着前方，一只手伸到马车侧边，在空中向下压了压，仿佛在拍一个小孩的头。慢慢来，我已经看到我家的车道了。只要他有点耐心，30秒内就能安全地超到我前面去。然而运气不佳，我向右转的时候，他加速前进，从我的左边开过来，掀起一阵尘土。贝儿保持着镇定，但是对方的动作吓到了我，我提起肩膀和双手，用我过去经常对纽约那些莽撞的出租车司机所摆出的“你在搞什么东西”的姿态。“浑蛋！”我大喊，厢型车从我旁边冲过去，车子的保险杠上贴着的一张“美国童军”贴纸，对着我闪闪发光。

回到谷仓里，我觉得很累，也很满足。我解开笼头皮带的扣环。贝儿

不需要用绳子拴住，就能听话地站在我面前。我用柔和的语调赞美她。真听话，贝儿。

大卫的理想

威尔逊家举行派对的前一天，大卫出现在我家门口。同样的褴褛白衣，同样的草帽，裤腿上仍有先前那块抹开的蚊子血。我们正要出外散步，顺便采些黑莓回来，于是便邀请大卫一起去。我们很高兴上次他帮了忙，也很高兴现在有他相陪。

这位有着狂野眼神的陌生人，今天的神情似乎比较柔和，他原本的那种急躁易怒、傲慢专横的个性，缩成了圆滚滚的一团和善。鲁德坐在我肩膀上，我们沿着石子路，走进农场后面的森林。我们一面走，大卫一面教我们认识树木和花草的名字，同时还述说他家里的故事，那些尤达派的信徒，还有他们的马。我们走到那道篱笆前面，篱笆下的莓果垂着肥硕的紫色果实。这时，希瑟转过身面向大卫，说：“那么，在亚米希社区长大是什么滋味？”

“尤达派吗？”他说，“我不是在他们那边长大的。我只是在他们的农场里住了几年。”

“那么，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呢？”她惊讶地问。

“我吗？我是在马里兰州德的查维·蔡斯区（Chevy Chase）长大的。”

大卫——大卫·弗雷格，我们这才知道——跟我们一样，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思想探索历程。他是市郊生活的产物，从小生长在高贵时髦的华盛顿特区“睡房社区”^[1]，妈妈是一位律师（“信任和决心。”他说。），他父亲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读完自然文学作家温德尔·拜瑞所有的作品后，就从大学辍学（“我父母快气疯了。”），选择古代务农的生活方式，

[1] 睡房社区（bedroom community），指华盛顿特区南方八十千米内的许多富有的小小区。

作为对照追逐事业与消费主义外的另一种选择。他是个流动劳工，不过他的生活方式不完全像果园的主人，也不像为这种人摘苹果的墨西哥工人。他受过良好教育，有波希米亚的气质，不缺钱（不过当时看起来像是破产了），是个走遍全球各地、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他跟萨拉丁家签了约，要在雪伦多亚谷的这个农场、艾奥瓦州的一座农场，和新西兰的一间乳制品农场工作。有一次他还到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去跟他崇拜的比尔·莫里森^[1]见面。莫里森创立了一个名叫“永续文化”（Permaculture）的永续农业运动。他跟尤达派教徒一起生活了几个季节，这件事说明了他为何穿着这种服装，还有负重马为何这么听他的话。

“如今你父母对你的选择有什么看法？”我问。

“嗯，我们来看看，”他说，“我今年二十七岁。从大约二十岁开始，我就在做这件事，所以我想他们已经适应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觉得大学文凭是安全保障，有了文凭，就能得到工作。”

大卫脱下帽子，翻过来拿着，如同教堂招待人员拿着收取信徒献金的盘子，敏捷地将帽子装满莓果。他的姿态很像鲁德的一本小熊维尼硬纸板童书所述，小熊维尼发现一丛结了莓果的悬钩子，却没有桶子可以装，于是就把莓果装在自己睡觉时戴的帽子里面。他的棱角变得柔软了，之前傲慢自大的那个大卫，如今让我联想到的是小熊维尼。他每摘下两颗莓果，就把一颗送进嘴里用力咀嚼，另一颗放到帽子里。

我问大卫，最近他在看什么书。他凝视我：“你听过彼得·德鲁克吗？”

“他是个经济学家之类的，对不对？”“一位管理学大师。”大卫一面纠正我，一面为这个话题暖身，准备展开长篇大论，“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思考像是一种数学问题。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叫德鲁克的家伙的想法，但是我不相信他在他的方程式里引用的数据。事实上，对于他所说的生命中有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我完全不同意。”

[1] 比尔·莫里森（Bill Mollison，1928—）生于澳洲塔斯马尼亚，是个作家、科学家及自然学者，于1974年提出“永续文化”的农业及生态设计方法，也被称为“朴门农艺”。

大卫有一个梦想，而他对德鲁克的反省，还有他的种种范围广阔的农耕经验，都包含在内。大卫希望有一天他能经营一家乳品农场，产品来自吃青草的家畜。这个观念实行起来远比听起来更为激进，因为今日乳品农场的规模都非常大，大批奶牛关在牛圈里嚼食极为廉价、受到政府补贴的谷类饲料。他的梦想还不止于此。这座乳品农场还得为一所手工艺学校提供经费。让我提醒你，这手工艺学校可不是普通的学校，而是为坐过牢的更生人而设的学校。这座乳品农场与更生人手工艺学校的地点要靠近华盛顿特区。（也许他们也会录用一些从政界退下来的人？）在这里，牛奶、奶酪和牛油，还有更生人做的手工艺品，应该是有市场的。他会雇用一位营销学老师，教导这些出狱的工匠如何把他们的作品卖出去。这所学校里会建一所零售的手工艺购物中心。此外，学校还要为参观者提供导览服务。多么疯狂的计划。我喜欢！

“我需要成立这两个地方的经费，”大卫热烈的神情黯淡下来，“需要很多钱。”

我们往回家的路走去，大卫把他的帽子——现在帽子里装满了莓果——重新戴到头上。这个衣衫褴褛的谜一样的陌生人所追寻的理想，让我深感惊奇，也让我想到我曾经有过的理想。（希瑟和我甚至讨论过，当我们回到21世纪以后要开一家小礼品店，专卖山羊奶做的奶酪。）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我们最需要大卫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谁晓得他能不能把这个浪漫的理想化为现实？但是这家伙目标如此远大，光是为了这个，你就没法不喜欢他。

再次赴约，这次骑马

威尔逊家要举行派对的那天下午，我们轮流在枫树下的水槽里洗澡。我用那把直挺挺的剃刀刮胡子，把自己的脸刮得伤痕累累。希瑟洗好的时候，身上一股醋味。我们多准备了一些布尿布和别针，将它们装进袋子里，又带了一些菜园里摘的卷心菜做的沙拉，还有一捆打包用的细绳。然后我们出发

了，马车嗒嗒地驶出车道，鲁德坐在马车的木头椅凳上，在我和希瑟中间。

在马车上，我坐直了身子，很有自信地跟贝儿说话。从我第一天驾马车开始，从那天我带着希瑟和鲁德沿着童军巷走了一回开始，我一直觉得，我可能再也不会驾马车带着他们出去了。尽管我对贝儿完全没有那种好搭档的情感，我仍然觉得，有她在这里，我感觉比较安心，同时我也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也有了改变。

贝儿走到中央河的第一座桥边，不敢再向前走去，突然转向桥边的栏杆。希瑟不禁发出一声尖叫，但是我哄住了这匹马。马车安全地过了桥。贝儿的注意力全放在她耳边嗡嗡叫的苍蝇身上。她的尾巴不停地挥动。每一次她挥动尾巴，试图赶走头顶的苍蝇，马车就转了方向，朝着路边的水沟开过去。希瑟试着用谈话来掩饰紧张的心情。她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知道我们等下会见到哪些人。我听说来的人对农耕都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会谈到很多关于天气和奶牛的话题。”又跟鲁德说：“我敢打赌有很多小孩也会去，甜点。那不是很好玩吗？”

即使坐在一辆坐垫松软、有空调设备的汽车里，作为乘客，看着别人驾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刻希瑟坐在距离地面1.5米的半空中，在一辆颠簸摇晃、由一只动物拖拉的马车里，死命地抱住我们的儿子，不让彼此从狭窄的木凳上滑落。而我至少还紧紧握住缰绳，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拥有某种程度的掌控感。希瑟的命运则是完全操控在这匹马上，以及一个由木头轮子带动、不停晃动的大箱子，和她那不专业的丈夫手上。她一次次往下看，每一次车轮从阴沟旁边险险地擦过去，她就深深地吸进一口气。

然后，我看到它了——那座老旧的库房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远方。往前走，贝儿，我想，我催促她向右转，希望这个动作能让她不要看到那座库房。

然而，这座破烂的小屋进入了她的视线。她的头向后仰，身体突然僵住，一动也不动地站在路上。“放轻松，贝儿！”我说，我使劲地把她往相反的方向拉，好让她的身体能对准正前方。她大声嘶吼，鼻子喷气，头部左右摆动，我则是拼命抓着缰绳，免得掉了。

“罗根！”贝儿把我们朝着水沟拖过去的时候，希瑟发出尖叫。

“往前走！贝儿！往前走！”我必须让她从这栋小屋旁边走过去。不能转弯，她会在这条路面倾斜的小路上翻车的。“嗯——爹地！”鲁德哭起来。这条凳子太窄了，我的手臂挥动的时候，手肘“砰”的一声，撞到了希瑟。她把鲁德抱在胸口，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凳子的侧边。贝儿往右边猛拽。车轮因扭力而发出呻吟。

“往前走啊，贝儿！”我猛地一抖她腰侧的缰绳。“呀！呀！赶快走。”她往前走了——一面抽动，鼻子一面喷气，脑袋扭个不停——但她总算往前走了。“好女孩。放轻松，好女孩。”当她看不见这栋库房，就恢复了平静。“很好，贝儿。那不过是一栋小房子而已。一栋小房子伤害不了你。一切都没事了。”我温柔地安慰她。“你们还好吧？”我对希瑟说。

“罗根，”希瑟喘着气说，“刚才可把我给吓死了。”

“我也是。对不起。贝儿不怕汽车，也不怕狗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栋小屋真的让她非常害怕。”我顿了顿。我们已经谈到这里了，不可能就此打住。“也许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到时候该怎么办，你知道的，如果情况非常糟。”马克辛·库明的阴影笼罩我心头。

“你是指什么？”希瑟问。

“要把这么大一辆马车弄翻，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关键在于不要惊慌。”我们决定，万一发生了，要撑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再跳下马车。我们两个大人没问题，我想，但是鲁德呢？

我驾着马车继续走，让贝儿保持稳健的小跑步，同时心里祈祷着，不要让我们碰到任何一辆车。

被削弱的成就感

有一头牛守在威尔逊家的大门口，贝儿进不去，我们只得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来到一栋白色小屋前面，这里是伊许塔·亚贝尔和她已经成年的女儿

莉夏的家。

我们第一次造访伊许塔家的时候，坐在屋前宽阔的露台上啜饮柠檬汁，享用盛在瓷盘里、对切成三角形的鸡蛋沙拉三明治（给鲁德做了花生酱三明治），我们立刻就觉得在这里很自在。伊许塔是个胖嘟嘟、七十出头的快活女人，厚厚的眼镜无法掩盖她眼里发出的光。她出生在创立《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家族。在某一个时刻，她和这个富有的家族分道扬镳。对于这个自由自在的灵魂来说，金钱和社会地位似乎都不重要。伊许塔喜欢游泳，喜欢读诗，她把她的猫取名为爱德娜·米莱^[1]。她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住过，包括20世纪60年代在澳洲的树林里过夜，当时还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负责监督美国政府在当地设立一所机密的人造卫星侦测站。她听说我们的1900年计划之后，并没有对我们提出建议（就像许多怀着善意的人们那样），她问了一些问题。“真是明智。”她终于说。那时我真想亲她一下。

然后我们谈到她的名字。

在出生后到六个月大的期间，伊许塔没有名字。家人只是叫她亚贝尔。“我有两个姐姐，”她解释道，“我爸爸希望有个男孩子。我生下来以后，他对我妈说：‘你带其他两个。这孩子是我的。’”她父亲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族这座乡间庄园里打猎和找乐子。有一天他和一些朋友一起喝鸡尾酒，听老式唱机里的唱片。有一段古典音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场有一位男士听出来，这段音乐来自一出名叫《伊许塔》（*Ishtar*）的歌剧。“‘就是它！’我爸说。他们一起把我带到河边，让我接受浸礼，给我取名为伊许塔。”伊许塔是古代巴比伦的爱之女神。

我猛力让贝儿向左转，走上伊许塔和莉夏家的石子路车道，然后，我跳下马车，能够重新踏到地面上，我觉得非常感恩。我站在贝儿的脑袋旁边，握着她的笼头，抚摸她的鼻子，低声跟她说话。希瑟下了马车，扶鲁德下来。“哈啰，亲爱的！”伊许塔发出颤音。她和莉夏拿着饮料走出来——装

[1] 爱德娜·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美国20世纪女诗人及剧作家，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

在玻璃杯里的汽水威士忌，杯缘嵌着小块的楔形柠檬片，冰块叮叮作响。她们热情洋溢，咯咯地傻笑，与我们紧紧拥抱，亲切地拍拍肩膀，仿佛我们是降落在法国的林白^[1]。她们的欢乐庆祝的心情感染了我们。等到莉夏和我取下贝儿身上的马具，把她跟莉夏的马彼特一起关在一块有两公顷大、四周有围栏的土地上；并把围栏的门关上时，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面对派对里的人群了。

这个派对里的人——大约有50个人，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其中有一半的人戴着大而硬的牛仔帽——坐在威尔逊家宽阔车道上的铝制折叠椅上啜饮冰茶。很显然的，跟我们这种如同器官移植的都市移民相较，农夫们可不喜欢草地。他们种植草地，为草地施肥，在上面养牛，割下草来制作干草，但是当他们要放松身心的时候，他们比较喜欢干净可靠的水泥地。

这是一个“自备椅子”（Bring Your Own Chair）的派对。我们家没有比较轻的椅子，也没有折叠椅，因此我们必须向威尔逊家借椅子。我们在车库前坐下。伊许塔从她的冷藏箱里拿出两罐啤酒。“商标上写着，1829年就开始生产了，”她低声说，“所以我想，这个没问题。”在车库里，可折叠的桌子因为摆满了食物而嘎嘎作响。在众多的奶酪焗烤肉类之中，希瑟的那盆卷心菜丝沙拉看起来有点孤单。鲁德高兴得快发狂了，他跟在大孩子后面跑，适时地放慢脚步，吃点汉堡或热狗。希瑟也许是吃素的，但是鲁德和我从来没有彻底禁绝肉食，他热爱这里的烤肉架。尽管我们一次次地警告他，他还是摸了，然后尖叫着跑开，一只手烫出了水泡。

我没有喝太多啤酒，心里惦记着等一下要驾马车回家。但我还是出了差错。等到我们再度穿过伊许塔和莉夏家车道旁的白色松林时，每一样东西在黑暗中都变得模糊。贝儿发出哀鸣，鼻子伸到篱笆上。莉夏忙帮我把她套到马车上。我们道再见的时候，一辆白色小卡车慢慢开进车道。一个男人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假装乡下人的口音说：“对不起，先生，你知道你的头灯

[1] 林白（Lindbergh），美国20世纪飞行家，于1927年从纽约飞到巴黎，成为全球第一位不落地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

没有亮吗？”

这人是麦可·葛佛瑞和他的太太维多莉亚。他们住在附近的一栋名叫“小麦地”的农庄里。

“我会检查一下。”我开玩笑地说，心里却急着回家。

“说真格的，”他不再用那种口音说话。“我们不放心你在天黑的时候，驾着这个玩意儿回去。我们送你们回去如何？”

“我们没问题的。”我说，我厌倦了老是感觉到别人在可怜我们。威尔逊家的椅子、伊许塔，和她的1829年啤酒，每个人都是出于好意，我也很感激，但是，在1900年，不会有人护送我们回去。是我们让自己陷入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我们也要靠自己走出去。

希瑟低声说：“大白天来的这趟路已经够可怕的了。我们跟着他们后头走好了。”

“我们坚持要这样，罗根。”维多莉亚坐在前座说。

我觉得受到众人的压力，正要再次拒绝的时候，我突然被实际的状况撼动了。在没有头灯的情况下——也没有尾灯、仪表板的灯光，或是大灯——我们怎么能怎么做到没问题？我们也不能走路回去。鲁德几乎已经睡熟了。

“好吧。”我说，“你们带路。”

我们跟在他们尾灯的红光后面。他们走过石子路，爬上山坡，下了坡，转了好些弯路。在黑暗中，贝儿没有注意到那座小屋，这让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一辆汽车在我们后面很快地开过来——也许是另一个人从派对中离开了——然后，这辆车刹住了。我想到，如果我们在黑暗中独自前进，可能会发生什么后果，这让我全身颤抖了一下。到了童军巷，麦可停下来，摇下车窗。

“你可以从这里自己回去吧？”

“我们没问题的。”我说。

“如果你们需要任何东西，可以来找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催促贝儿，要她沿着这条路往上坡走，走进我们的车道。我听到山羊在咩咩叫。我做到了，驾着贝儿去了。我觉得如释重负，然而我的成就感被

削弱了——因为我们把马车停在伊许塔家，走路过去；因为我们需要人护送我们回来。在我们伪装的1900年当中，我们还要依赖这些仍然活在21世纪的人多久，日子才能顺利地过下去？我还要花至少一个小时来挤羊奶，还要做其他的杂事，然后才能上床睡觉。我把贝儿赶到月光照耀的谷仓里，解开她身上皮带的扣环。两只山羊的鸣叫穿透黑夜。

第五章 等待下雨



菜园快要干涸了

这是七月的一个下午。我跟鲁德在菜园里，希瑟在金属水槽里泡澡，这时，北方的天空暗下来，风把陡峭的河岸边那排树吹得唰唰作响。狂风扫过山谷，像一群看不见的动物奔驰而过，把玉米的茎秆吹倒，把甜菜吹得零落碎裂。云朵像沸腾了一样，可能有龙卷风要来了，我感觉到兴奋的战栗带来一阵刺刺麻麻的感觉——邻居们最近还在谈论几年前来袭的一个龙卷风——还有渴望。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盼望老天下雨。

天空在逗我们开心。夜里，我们流着汗躺在床单上，风越来越大，云朵像得了便秘一样，壅塞在北山上空，遮住了月亮。雷声隆隆，豆大的雨滴打鼓般落在铁皮屋顶上。我终于睡去，心里期待大雨滂沱，梦到菜圃之间积出小水潭。然而醒来后发现毫无动静，只有夏虫——热得发昏的臭甲虫——嗡嗡飞舞。从我们刚种下的菜，可以看到夜间降雨的期待再次落空的证据，刚冒出的嫩芽要再度面对烈日曝晒。我们无助极了。

我们的菜园快要干涸了。小黄瓜和南瓜长得非常慢。玉米提早结了穗。

整株西红柿变成褐色，起了斑点，皱缩枯萎，新结的果实被腐烂的蒂给毁了。我们取得的所有书面资料都说，蔬菜每星期需要浇2.5厘米的水。然而过去三星期当中，一滴雨也没有下。干得像什么一样。在此之前，有过少数几次雷雨。尽管我早就被老天爷糊弄过，这次的云朵看起来比较黑，比较确定会下雨的样子。我心中的盼望越来越强烈。

“你看，暴风雨要来了！”我对鲁德说，他跟着我到处走，手里提着的空金属桶在地上拖行。我用嘴巴模拟下雨和刮风的声音，搔他的肚皮，直到微笑布满他的脸庞。今年春天大雨来袭时，打雷响亮的噼啪声、隆隆声和闪电的亮光，让他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从此以后，只要雷声低吟，希瑟和我就会努力地安抚他。

“雷说了什么话？”我问。

“要下雨了！”

“对。”我把他抱到我的腰侧，“这些植物好渴。”我转过身，面向希瑟，她蹲在水槽里，用搪瓷杯舀水，冲掉头发上的肥皂沫。她闭着眼睛，我凝视了一会儿，看着肥皂水从她的脖子和背上滑落，流到她的乳房上。最近这些日子干燥缺水，我们都有点紧张易怒。尽管这一阵子我跟希瑟天天相处在一起，身体的距离比以前接近多了——我们都是在家工作——但是就心理的距离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么遥远过。我再度看着天空，说：“你最好在被雷打到以前洗好澡。”

这片乡野最近的降雨量远低于年平均雨量。只要有邻居来访，一定会提到这个话题，因为在这个以农耕为主的乡村地区，天气的好坏是一件大事。现在天气对我们也很重要了，于是我们也加入这样的谈话。

对我来说，敬拜雨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我跟大多数小孩一样，小时候都唱过一首童谣：“雨，雨，请离开，换个日子再来。”当你的食物来自超市的罐头、纸箱和袋子里装的东西，下不下雨一点也不重要。气象播报员用乌鸦嘴预报周末会下雨时，我相信他，尽管他的话会毁掉周末的计划，影响运动比赛，造成假日游行活动宣告取消。这是我们明朗阳光的美国作风的一部分。当你有洒水设备和市镇单位提供的便宜自来水时，谁会需要雨水来让自

家草地和路边的草木保持碧绿？

突然间，我们需要雨了。我们必须抽取地下水，但是即使我们组织一支拿着水桶的军队，我们的运气还是不太好，泵出了问题。打出几升的水以后，它就罢工了。

我在屋子里冲过来冲过去，为暴风雨做准备。我把露台上装木柴的箱子盖好，把玻璃窗拉低些。我从鲁德的窗口凝视剧烈翻腾的雷雨云，心里想着，这一次非下雨不可了！我头一次体会到那种驱使人们起身跳舞祈雨的急切心情。今天晚上我不想给菜园里的芽苗浇水，而是想早早上床，让打在屋顶的鼓点般雨声哄我入眠。

吃晚餐的时间到了，雨还是没有下来。风把铁皮屋顶吹得嗒嗒作响，然而没有下雨。我提早点亮了油灯。希瑟把鲁德抱到楼上，让他上床睡觉。我在清洗室洗盘子。还是没有下雨。然后，云朵分开，天空亮起来。等到晚上九点，我去挤羊奶的时候，风变小了，星星在平滑的天空闪耀。

“不要那么好命好吗？”当我把滤过的羊奶提到地下室以后，扑通一声，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时，希瑟说：“我们还得去提水。”

“为什么不下雨呢？”我把头埋在臂弯里。

“一定会下，”她说，“总有一天会下的。”

拔草、杀虫和冷战

我们的问题不只是干旱。有些生物已经开始在我们的菜园里宣战。小小的绿色毛虫狼吞虎咽地啃噬卷心菜。甲虫滋滋地咀嚼土豆的叶片。几乎每天早晨，当我走到屋外小便的时候，同一只兔子都会在两排豆株中间昂起头，突然停止了动作。每一天早晨，我都扔块石头过去，想把它赶开。我在豆畦之间走动，像年老的麦奎格先生^[1]一样，四处查看菜园里的灾情。我跪在地

[1] 麦奎格先生 (Mr. McGregor)，《彼得兔》(Peter Rabbit) 系列故事里经常被欺负的老农夫。



开始种菜之前，我们去上了种菜的课程，然而，在回到1900年生活的计划刚开始时，我们的甘蓝菜饱受虫袭，还面临雨水不足的考验。（Meryl Schwartz/摄影）

上，把土块塞到犁沟的鼠洞里。

“这些虫快要杀死我们了。”一天早晨我对希瑟说，她做好今天要吃的东西，走到菜园里，站在我身边。

她往下看着我沾满粉红色黏污的手指：“这是什么？”

“虫子的内脏。你看。”我把土豆的叶子翻到背面，找到一堆甲虫的幼虫，我用手指把它们捏烂。啪嗒一声。粉红色的黏稠物质喷到她的大腿上。

“好恶心，罗根。”

我着迷地继续捏下去。无论何时，只要我从菜园旁边经过——去挤奶，去打水，还是劈柴——我都会绕到铺了草秆的小路，去捏烂一些甲虫的幼虫。如果我看到那些背壳上有条纹的甲虫成虫，我就用捏死蟑螂的方法，嘎吱一声捏死它们。如果有日本丽金龟飞来，我一样捏死它们。但是不久以后，又有几千只大声咀嚼、热烈交配的甲虫加入这场丽金龟的飞行派对。我开始觉得，捏死甲虫根本是徒劳，情况简直不可收拾。首先，它们把我们的两棵榆树咬得遍体鳞伤。然后我发现，它们聚集在我们种下的梨树、苹果树和樱桃树四周。几小时以内，它们就能把整棵树的叶子咬得像蕾丝一般布满小洞。我们不能用化学物质，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菜园，我们必须用尽各种方法，甚至靠两只手，也在所不惜。

希瑟的精力大部分花在烹饪、洒扫和照顾小孩等诸多事情上，她对这件事抱着不同的看法。“你真的觉得这么做有任何好处吗？”一天下午，看到我用手指捏死一只虫的时候，她说。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你把所有闲暇的时间都拿来追这些虫，在你这么做的时候，杂草已经到处飞长了。”

“如果我们希望这座菜园会结出点东西来，”我说，“我们就得找时间做这两件事——拔草和杀虫。”

“没有多余的时间，罗根。我们又不是整天坐着看杂志。我们天没亮就起床，一直做到天黑，还差点做不完。我还是没办法掌握洗衣服这件事。你知道吗？我已经五天没有穿内衣了，因为它们全穿脏了。”

“你必须把事情的优先级排好，”我说，“排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洗衣服。把你打算洗衣服的时间告诉我，那个下午就由我来带鲁德，让你洗衣服。”

“优先级！我要排优先级？每隔五分钟就跑过来捏死这些虫的人是你。”

我不得不整个下午躲在库房里，做一把捕蝴蝶的网子。自从我发现这些在菜园里飞舞的小白蝴蝶下的卵会孵化成那些绿色的毛毛虫，当发现这些毛毛虫幸福地钻到卷心菜的菜心里，会拉出斑斑点点的绿色粪便时，我就决心要阻止它们。我们打算把卷心菜存放到冬天，如果将幼虫一并储存的话，卷

心菜会被毁掉。

一开始，我在菜园的小径上爬来爬去，把叶片翻到背面，用捏死甲虫幼虫的方法，捏烂这些毛毛虫，我的手因此沾满绿色内脏和幼虫粪便，还有散发酸腐臭气的卷心菜。过了一阵子，我开始抓这些蝴蝶，我频频用双手扑打它们，几乎让我的手肘脱臼。我拿着扫帚朝它们用力地挥过去，然后在地上抹擦。速度太慢了。我需要一件适合的工具。

我从库房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捕蝶网。这张网由粗麻布制成，用铁丝绑在一根分叉的树枝上。我的心头不禁涌上一股扬扬自得的感觉——因为我有先见之明，晓得要用到一卷粗麻布（看起来很合适，很能派上用场）。也因为我拥有漂流到荒岛的落难者的足智多谋。

鲁德非常喜欢这把网子。“我的！我的！”他发出尖叫，伸手来抢这件粗糙的工具。

“现在不行，鲁德。爹地必须先抓到那些蝴蝶。”我说。我在菜园里爬行，狂热地挥动网子，发出咻咻的声音，脸上一直挂着疯子般的笑容。

希瑟摇摇头，我心里明白，她觉得我这种行为荒谬可笑，但我装作不知道，继续用滑稽的模样逗鲁德开心。

“你负责找白蝴蝶，鲁德。我负责抓。我们合作。”

“哼！哼！”鲁德说，一面用手指着一个白色的小点点，它正在一棵卷心菜的上方慢慢地飞。

“哗”的一声！蝴蝶迅速飞走。圆圆的卷心菜在茎秆上摇晃。

别的蝴蝶也让我扑个空，它们在最后一刻突然飞走，仿佛被一条看不见的木偶线抽走。它们宛如一只只有翅膀的笑容，毫不费力地飞着。不久，我就在犁沟上跳来跳去，狂乱地摇晃身体，扑打这些四处飞舞的白色笑容。这就像用一颗棒球丢向一根羽毛。我那双愚蠢的脚丫子对卷心菜造成的伤害，远超过这些蝴蝶幼虫。我挫败地把网子一扔，拿起一把土，扔向我看到的下一只蝴蝶，把它打到地上。它躺在地上，动弹不得，我扑过去，攫住它。抓到你了！它在我的掌心里。然后，我用手指捏住它，“啪”的一声，它裂开了！

我的可笑行为拉大了希瑟和我之间的距离。问题不在于我这种控制害虫

的努力缺乏说服力，使她的耐心受到考验，问题在于我表现出来的不可抑制的强迫性行为。她抱怨道，她负责煮东西吃、洗碗盘，还有洗衣服，我负责“特殊项目”——捕蝶网。我建造洗澡台，并以钉锤和老虎钳在户外进行有趣、有创意的东西，但是我也拼了老命去劈柴、打水、割草，还得忍受贝儿的恶劣态度和山羊不停咩咩地发牢骚。还有，我也分担洗碗的工作，许多时候也是我带鲁德。她不该抱怨个不停。

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奶油吃了。在七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我决定再给这部乳脂离心机一个机会。我把它放在枫树下的野餐台上，拧紧螺丝，并把盛乳脂和脱脂奶的大碗摆到桌上。我努力地转动把手，转了又转，费力地弯着腰，一只手酸了，就换另一只手去做。我很小心，注意不要又把顶端的漏斗盆弄翻了。装脱脂奶的大碗快满了，我伸手去拿第二个碗。不在那里。我忘了准备。

“希——瑟！”

“什么？”她在厨房里喊道，她已经在厨房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在那里蒸绿色蔬菜糊，煎茄子，做白煮蛋，烤玉米面包，用刚摘的黑莓烤水果馅儿饼。

“把放在晾碗盘的木头架子上的大碗拿来，”我停了一下，又说，“最好快一点。”她来了，汗水浸透的发丝黏在额头上，围裙上满是面粉，她沉默地把碗递给我。

不久，我就应该再把羊奶倒进机器顶端的大漏斗，只是我忘了羊奶——它还在炉子上的大锅里热着。“我还要羊奶，现在就要！”

“如果你事先跟我讨论过，会比较好一点！”

“你明明知道我今天要做奶油。”我的手仍然不停地摇动乳脂离心机的把手。

“我们事前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罗根！”鲁德跟在她后面，用手抓着她围裙，嘴里模仿她怒吼的话。她把羊奶拿过来，我继续摇把手，她一言不发地把奶水倒进顶端的盆子里。

脱脂的程序完成后，我把稀薄得令人失望的乳脂取出，走进凉爽的地窖

里，在那边待了一小时。我试着不停地摇晃装乳脂的罐子，借着这个动作来制造奶油。然而没有用。花了这么大的工夫，却做不出奶油来。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各自干活，闷闷不乐地沉默着，内心酝酿着怨恨。

尽管我们体验到小小的欢乐——在炎热的天气里，用勺子从瓦罐里舀水出来喝，在信箱里寻找朋友和亲人写来的信，割下花椰菜新鲜爽脆的茎，拿来作晚餐——然而我们的生活里充满挫折，对彼此的怨恨越来越强烈。我原本相信，等到这个计划展开后，我们在准备期间对彼此的憎恨就会消融，但是情况越来越糟。我还记得，希瑟以前的主管梅若听我们说到这个1900年的计划以后，她的反应是：你们一定真的很喜欢对方。曾经有一度，我们是相互喜欢的。我们努力建立平等的伴侣关系，两人都认为，我们婚姻的理想是让对方持续当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的感情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从希瑟和我开始恋爱到现在，我们难道真的变了这么多？我们在亚拉巴马州她老家的一个婚礼上坠入爱河，在那个幸福的周末，我们频频从团体活动中脱队，我们凝视彼此的眼睛，交换到国外的冒险故事。她在西班牙和危地马拉的阿蒂特兰湖（Lake Atitlan）旁边住过，每天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走，去跟原住民妇女一起工作。我曾在肯尼亚教书，在非洲东部登山与搭便车旅行。我们都觉得，必须跟喜欢的人在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起生活过而没有问题后，才能跟对方共结连理。

我们还有其他的共通点。我们在青少年时代都渴望逃离自己生长的南方小镇。我们都要求父母送自己去读寄宿学校，希瑟去了康涅狄格州。学校里有人对她说：“好好地说句话。”同学们随即哄堂大笑，嘲弄她的南方口音。之后，她很快就改掉了自己的口音。我进了弗吉尼亚州的一所男校，在那里，我跟她一样，感觉自己是孤立的，因为同学们都是里士满来的富家男孩。我们读的是同一所美国南部的大学，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交往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但是直到我们都到国外探索冒险过了，才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共享一种渴望逃开的感觉，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

那天晚上，在婚礼茶会上，希瑟和我悄悄走出会场，坐在田纳西河畔，一排游艇和滑水艇随着水波起伏。八月的夜晚很热，我们很年轻，我们仰

躺在草地上凝视天空，我的脸因为爱情、欲望和美好的未来而涨红了。就像举行婚礼的俱乐部会所飘来的《星星坠落在亚拉巴马》（*Stars Fell on Alabama*）的旋律，天空里瞬间充满了流星。绝对是真的！我们稍后才知道，那是英仙座流星雨，每年八月的那段时期都会出现。但是在那天晚上，我敬畏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泪水从眼里汩汩流下，我深深地相信，这位美丽的女子和我注定要白首偕老。

之后的那个周末，希瑟到纽约来看我。我们乘火车离开市区，到康涅狄格州住进一间民宿。入住的时候，我们带着顽皮的笑容，签下“罗根先生与罗根太太”的名字。一年后，我们在“地狱厨房区”^[1]租下一间小公寓，公寓的卧室非常小，双人床的两边靠着墙，没有空间走动，我们必须光着脚跳上跳下。不久，我悄悄地买了一枚订婚戒指，八月的时候，我们到阿帕拉契亚山脉去看英仙座流星雨。在这次旅行中，我向她求婚。而且，我们信守承诺（尽管我们当时忘记了，曾经向对方作过这项承诺）。在订婚期间，一起到第三世界生活。我们把公寓转租给别人，搬到厄瓜多尔住了一年半，靠着经营“南美洲探险家俱乐部”来换取食宿费和一个月250美元的薪水。我们搭便车；睡在两块钱一晚、床铺凹陷的脏乱地方；在阿米巴原虫引起的剧烈腹泻发作时互相照应。后来我们搭飞机回美国结婚，这场小镇婚礼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意味——跟我们爱上对方的那场婚礼一模一样，同一家假日大饭店，同一家俱乐部会所，同一家提供鲜花花店。在跳第一支舞的时候，我们随着《星星坠落在亚拉巴马》的旋律，用不怎么优雅的舞步摇摆舞动。

但是，我们现在的的生活里没有音乐了。实际上，我们都不会弹奏乐器，也没有歌本。我们只记得几首童谣，还有一些宁可忘掉的流行歌的片段。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充满了该做的工作和照顾小孩等事情，日子以一成不变的灰色调沉重辛勤地度过，只有少数短暂的快乐时光。尽管我们已经拥抱了1900年生活中粗粝磨人的现实，我们仍然没有料到，这个生活里包含了这么多的劳务与忧虑；我们更没有想到，会面临旱灾的考验。

[1] 地狱厨房区（Hell's Kitchen），纽约中城的一个地区。

还有，我们变得神经质。我们把臭鼬从高高的草丛里赶出去，到了晚上，感觉有动物掠过肥料桶。有时还会踩到蛇（我仍对那个老人的警告耿耿于怀，那就是：干旱的时候，响尾蛇会从山里出来）。我们经历过的事情，让我们体会到大自然的残酷，仿佛每一种生物都想夺走一些我们拥有的东西：蚜虫聚集在柔嫩的萝卜叶上；吃的东西做好了摆在厨房里，苍蝇在食物上嗡嗡飞舞；老鼠啃噬我们的奶酪。使用屋外的厕所时，也没法放松下来，黄蜂在厕所的角落做窝，蜘蛛在座位下方的暗处爬来爬去。有一天我正在上厕所，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嘎、嘎、嘎声，近在我耳边——原来是一只木蜂正在大啖白杨木的壁板。在这座农场上有一栋很大的库房，在蜂儿一年年的啃噬之下，松木横梁化为瑞士奶酪，最后屋子崩解倒塌。因此我总是提高警觉，在防着某种东西。

来到这里，我还是像在纽约时一样，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无法集中精神干活。我虽然不再像以前一样，忙着立即回复电话和电子邮件，在各种截止日期到来前完成任务，想办法让支票进来，努力支付各色账单，然而现在的我转而整天烦恼天气和昆虫的问题。我觉得很挫败，很愤怒，而且觉得自己能力很差。看到我们种的38棵西红柿逐渐枯萎，我的肚子仿佛被重重打了一拳，觉得自己遭到拒绝，1900年的生活没有接受我。

曼哈顿计划

其他种菜的人都没出现什么问题。维多莉亚·葛佛瑞就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在谈论她的菜园。

有一天，维多莉亚路过我们家，问我们要不要养小猫。他们家谷仓的那只猫不久前生了一窝小猫。几天后，我做完了手上的活儿以后，就到他们的农场小麦地去，想带几只猫回来抓老鼠。

在他们家笔直的车道入口，有两根砖砌的柱子像卫兵一样地站立着，其中一根柱子嵌着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小麦地，1811年”字样。两根柱子之

间有一道防止奶牛出去的围栏，因此我要贝儿穿过另一道门，走到主屋前方的草地上。麦可和维多莉亚从屋里走出来迎接我。

这对新婚夫妇不久前才搬到史威普来，尝试以有机的方法来养牛。麦可相貌英俊，身材结实，留着整齐而斑白的络腮胡。他大约六十几岁，但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他的父亲是亚瑟·葛佛瑞，一位早期的电视界名人。不过他从来不提他父亲，我也不问。麦可是个热心的自然主义者，他写过一些原野旅行的指南，制作过一部受欢迎的赏鸟录像带；他会弹感声吉他琴^[1]（我发现这种乐器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间世时，感到很失望）；他看到干掉的动物粪便，就会很兴奋。如果你跟他走在一起，他会把一个膝盖跪在地上，把骨头、牙齿和毛一点一点地捡起来，猜测是哪一种动物将它们存放在这里。维多莉亚的年纪跟我相仿，她有着深色的长发，热情的微笑，还有一种跟她丈夫一样冷调、刻薄的幽默感。她将我们的时空旅行实验称为“曼哈顿计划”^[2]。

“邻居，欢迎！”麦可说，他戴着老旧的白色牛仔帽。这对夫妇用轻快的步伐回到屋里。我们颠簸地越过一片尘土飞扬的放牧场，走向这栋非常气派、有两百年历史的砖砌大宅。然而，真正吸引我目光的是那座菜园。我把贝儿的牵绳绑在篱笆的柱子上，解开连接马车的钩子，然后慢慢地走进菜园，以便看得更仔细一点。

这个茂盛的园子——让我想到伊甸园——让我们这项实验自惭形秽。铺着厚厚稻草的小径整齐地隔开一排排成熟的作物。大棵的萝卜和甜菜从肥沃的土壤里冒出来，叶片如孔雀羽毛般舒展开来。南瓜和小黄瓜在地上堆成一座小山，如同财宝箱里倒出来的宝物。浓密的辣椒叶片垂下，结了长而硕大的辣椒，有红色，有绿色，好像大自然的圣诞节饰品。维多莉亚希望有一天能把种辣椒当作营生，她种了225棵辣椒。她告诉我相关的数据——每亩种了多少棵，每棵结了多少千克的辣椒，每一千克值多少钱——她说得非常

[1] 感声吉他琴（dobro），一种共鸣器式的六弦吉他，名称来自它的发明者Dopyra兄弟。

[2] 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开展的一项机密军事计划，制造出第一批原子弹，后于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沙漠试爆成功。

快，我听得头都晕了。当我同时在心里估算我脚边的蔬菜可以做出多少顿美味的菜肴时，要我专心听她说话是很困难的。旱灾？我心想。什么旱灾？如果我们有电动洒水设备就好了。

“你的菜园情况如何？”维多莉亚问。

“哦，还可以。”我说，“我们的起头晚了一点。”

“我们的收成多到吃不完，”她说，“你要不要带点回去？”

虽然照她说的，吃不完的蔬菜可以丢进堆肥堆里，我们还是能自给自足比较好。我们选择用这种方式过生活，想看看能否做到自给自足——也想尝试体会这种生活的滋味。如果变成1900年是接受慈善协助的对象，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但是还有一个老问题，我吃腻了卷心菜与晒干的花豆，最近我还吃了好多鸡蛋，我几乎能感觉到动脉开始变硬了。

“当然好，”我说，“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答应我，顺道来我家拿些山羊奶回去。”

维多莉亚交给我一个杂货店的纸袋，要我自己拿。我把萝卜、甜菜、胡萝卜、几种不同颜色的安第斯土豆、瑞士甜菜、芥菜、青豆、洋葱、黄瓜和一大把茴香头塞进纸袋。她又给了我一些罗勒、西芹和一把新剪的鲜花——可能是甜豆的花——我把这束花放在蔬菜上面。

我把纸袋放到马车上。我们走路去找麦可。

“进来。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他站在一座优雅的户外库房门前的车道上。他们家有四栋这样的库房，沿着农场里的石子路而建。我看到一沓沓蒙尘的谷仓用木板、一张做木工用的板凳，还有宛如在一堆刨花木屑的海浪中载浮载沉的古典木工刀具。他伸手指着摆在角落里的一件巨大的木制品。它看起来很古老，是以手工用一棵树的树干制成。“我把它从北卡罗来纳州运过来。这玩意儿在我家露台上摆了好多年，所以看起来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

“这是什么？”我说。

“哎呀，这是货真价实的刨工台。”他用乡下人的口音说，故意表现出自贬的滑稽模样。他为我示范操作方式。他跨坐在刨工台的粗糙坐凳上，把

一块松木送进去，用一只脚控制一把左右摇摆的木槌，用木槌将木板夯紧，然后他用一片有两个把手的刨刀——一把双柄拉刨——敏捷而熟练地把这块松木刨光。他把刨刀朝着自己的方向拉（就我不专业的眼光来看，这么做非常危险），木屑随之飞舞，隔了好一会儿，他松开木槌，把木板翻面，然后又开始专注地刨着木板。

过了一段时间，麦可停下来，审视这块木板，嘴里喃喃地抱怨，模糊地咒骂着，他怎么会把那把该死的锯子放在那该死的小卡车上。他抬起目光。

“罗根，假装你没有看到。”然后，他打开开关，一把锯子隆隆地动了起来。他偷偷摸摸地锯了一下，就关上开关。锯子在咻咻声中停止运转。接下来，麦可继续进行刨光的工作，他流了更多的汗水与制造更多飞舞的银色木屑。“再把眼睛闭上一下。”他站起身来。我面带微笑地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只是为了希瑟和我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我顺着他的意思，背过身去。有几秒钟的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只听到锯木板的嘎嘎声。

“好了，你瞧。”麦可的手里拿着一根木匙，非常光滑美丽，闻起来有一种“特林柏磨坊”古老松木地板的味道。“这只是一根木匙，不过你们那个时代的人会用刨工台来制作木瓦、斧头的把手和马车的轮辐。这是一门失传的艺术。”

维多莉亚把头伸进这间工作坊里。“你最好去把那些猫抓来，麦可。”她说，“罗根可能得回去了。”

“对。”我想到贝儿独自被拴在草地上，“我应该去看看那匹马。”

但是维多莉亚说，她返回农庄的路上，会去看看马。过了几分钟，就在我们刚把两只小猫放进我的篮子时，一声微弱的叫喊传来，我们赶紧冲出谷仓，朝农庄跑过去。维多莉亚站在草地上，举起双手。

“贝儿不见了。”她说。我们跑到她面前。她手里拿着一条牵绳——或者说半条牵绳。这条绳子的其中一端，在贝儿的猛力拉扯之下，纤维散开了。不久，我们就找到了贝儿。她站在一排树后面，用力地扯下长长的青草，然后停下来咀嚼，然后继续用嘴巴扯下青草。她几乎没有抬头看。我慢慢地走过去，用安抚的口气跟她说话，我试着不要表现出不安的样子，但是

我可以感觉到，维多莉亚在我背后目不转睛地盯着。“需要我帮忙吗？”维多莉亚说，她在跟马相处方面很有经验。

“不用，我必须学会自己处理她。”

我伸手去抓她笼头上垂下的绳子，她跳开了。我又试了一次。我们如此角力了几分钟，最后她像个青少年一样不甘愿地屈服了。我把拉断的绳子打了个结，重新连上，再拉一拉，测试它是否结实，然后，我牵着她回到马车旁边。

麦可又去抓了一只猫过来，这只是成猫。我们原本只想要两只就好，但是他们如此慷慨，拒绝他们的好意似乎有点不礼貌。我把贝儿套上马车的时候，维多莉亚跑到厨房里拿东西给我们。她拿着另一个礼物回来——用报纸包好的两罐冰透的啤酒。麦可从谷仓走过来，他的手里抱着一个约有一只手臂长的枕头套，里面有东西在动来动去。他诅咒着，脸涨红了，前臂被抓了长长一道血痕。

“罗根，”他把这袋东西交给我，“介绍你跟‘挡泥板’见面。”

挡泥板曾经是一只家猫，当时她叫“棒球手套”，跟着维多莉亚的一位亲戚，在新泽西州的修特希尔过着丰足的生活。后来这人离了婚，棒球手套被送到小麦地来（这件事证明了，有些宠物真的会落到住进农庄的下场）。在这里，维多莉亚将她改名为挡泥板，因为她四条腿的后方都有肉褶。

她的新名字很适合她，但是乡村生活则不然。挡泥板到了特林柏磨坊后，一从枕头套里出来，就跳开了，偷偷摸摸地躲在篱笆后面，沿着篱笆往前走，一面不高兴地看着我们，我们则是笑着跟两只小猫玩。鲁德将两只猫取名为“斑鸠琴”和“皮克”。

现在我们的羽翼下有一打动物要照顾：六只下蛋的母鸡、两只产奶的山羊、一匹马，还有三只猫。身为这群动物的主要照顾者，我开始觉得自己很像杜立德医生。我用话语来安抚贝儿，跟小鸡聊天，把山羊哄上挤奶台，再哄下来。她们需要我提供安全的保障，提供食物让她们吃饱。我感觉到照顾这些动物的责任非常重。因此，当动物的食物快要耗尽时，我感到非常惊慌。

我们的农场虽会制造出青草给马吃，有青草和馊水给小鸡吃，有羊奶

（还有老鼠）给猫咪吃，然而这样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谷类的农作物或苜蓿芽等富含蛋白质的豆科植物作为饲料，我们没法让山羊持续地产奶。因此我们很早就决定要给动物们吃饲料补充营养。我们跟本郡另一边的一家饲料店说好——这是我们所能找到愿意外送、地点最靠近我们家的饲料店——每个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送过来。我们没有说明为什么我们家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代步。查德——这家店沉默而文质彬彬的司机——也从来不问。但是他该来了的日子早就过了，我写了好几封信去问，他也没有回信。

我开始对两只山羊实施食物配给，她们立刻察觉了，用鼻子挑衅地来回摩擦空无一物的谷物盘。该从挤奶台上下来的时候，她们将四肢钉死在地面，昂起头，身体靠在支柱旁边，对我怒目而视。

有一天，两只山羊中体型比较大、个性也比较乖戾的星星，就是不肯从台子上下来。我必须扭着身子挤奶，而且今天还有好多事等着做。我没有心情看一只山羊的脸色。我猛拽星星的尾巴，她发出一声害怕的咩叫。她的蹄子在木板上摩擦，死命地留在台子上不肯动。她踩了个空，脚努力往下寻找着力点，然后头先着地，重重地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我吓呆了。

如果我们家的山羊在吃东西这方面跟其他的山羊一样也不错。吃罐头？还是旧皮革？这两只山羊连看到青草，也会把鼻子扭开，不屑一顾。她们之前的主人，那位养山羊的女士，把她们交给我的时候，给了我明确的饮食指令：要吃有甜味的谷物，要吃晒干的甜菜粕来摄取纤维质，要吃做成干草或小球的苜蓿芽来摄取蛋白质，要吃海藻粉来摄取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在海藻这里喊停。这玩意儿听起来很健康——如此的健康，我自己都考虑吃了——但是它非常贵，两只山羊都被宠坏了。

我试过把星星和甜豆关在谷仓后面的一块小小的草地上，如此她们除了吃青草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结果她们两个不停地惨叫，好像受到酷刑的折磨，完全不接受！如果我人在附近，她们就心满意足地啃着杂草，把头伸出来，看看我是否还在那里。我一走远，她们就尖叫。现在我是她们的妈了。

她们俩像一对猴子——有强烈的好奇心，很淘气，脚步轻快，充满活

力。如果我在谷仓里干活，她们就四处闻闻嗅嗅，直到闯祸为止。有一次我在劈柴，甜豆爬到柴堆上。她不断地用鼻子去拱我堆放在独轮推车里的细柴，最后把一整堆都推倒了。她赶紧用轻快的步伐跑开，耳朵啪啪拍动。我从谷仓旁边经过的时候，她们在我前面依序走进去，然后突然停下来，昂起头，查看我是否还在那里。如果我手里拿着一样沉重的东西，像是提着一桶水，我就会撞上她们，我们三个就像《三个臭皮匠》^[1]的三个主角一样摔成一团，把水洒得到处都是。

小鸡们对我非常冷淡。我一走近，它们就机警地自动让开，仿佛我随时会抓起一只来丢到沸水锅里。但是至少它们在饮食方面没问题——它们什么都吃，我把凝结变质的羊奶和厨余倒进一个旧便盆里，它们吃得津津有味。它们向盛饲料的金属盆进攻，一会儿就吃光了。它们狂乱地把头浸在饲料里，将糊状的饲料洒得到处都是，然后冲向鸡舍的门，把鸡圈院子里的草剥掉一层皮，在泥土里挖小虫吃。鸡圈如今光秃如月球表面，但是我不让它们离开鸡舍，因为我担心它们会毁掉菜园。

我们有六只母鸡，它们每天下两到三个蛋，每星期的产量不到两打，这样是不够的。我们体力的消耗很大，经常感到饥饿，每隔一阵子才能够真正地吃饱——就像那些从没有听过“胆固醇”这个字眼的人。一顿早餐就可能用掉半星期生产的鸡蛋。

我们需要更多的小鸡。

好女孩，贝儿

有一天，我决定再去买一些鸡。我给贝儿套上马具，驾着马车到萨拉丁家的多元农场，我们刚开始养的六只小鸡就是在这里买的。在半路上，我停下来跟附近的一个农夫聊天。他从我对面的方向过来，把他的两只拉布拉多

[1] 《三个臭皮匠》（*The Three Stooges*），美国20世纪初期到中期的知名喜剧短片。

犬放在卡车后面。这两只容易激动的狗现在正好跟贝儿面对面，它们亢奋起来，大声吠叫，不停地绕着密不透风的圈子。狗主人大吼一声“闭嘴！”它们才安静下来。

“这让我想到克莱德·提尔曼拿的鞭子，好像比你这个大一些。”他微笑着，凝视我手中的嫩枝。

我正要答话，贝儿就往前一跃。

“哇，贝儿！”我喊道。然而她不听我的。我用力拉缰绳，她的脑袋往后扭，但她固执地往前冲。

我开始转圈圈。我说：“再谈吧。”一面努力掩饰我的窘状。然后我说：“小跑步，贝儿。”

走到距离萨拉丁的农场还有几百米的地方，我想到了那座桥。它横跨中央河，位于这座农场的入口处。这座桥的桥面上，每两根沉重的橡木之间，刻意留了15厘米宽的空隙，以防牛只跨越。没有一匹马能过得了这座桥。

我驾着马车，慢慢驶离他们家大门口的路面，我找到了足够的空间，来停放这辆4.5米长的马车和马儿。我把牵绳绑到树干上的时候，贝儿的脑袋不停地动来动去，四只脚紧张地踩踏，仿佛地上着火了。我觉得又热又生气，动作越来越暴躁。我的手闪电般伸出去，紧紧箝住她的鼻梁，这个动作是跟我们的蹄铁匠学的：“不要惹我，贝儿。我现在心情不好。”她的耳朵竖起来，身子站得笔直。我打好结，从马车后面拿了一个篮子和一些铁丝网，小心翼翼地走到桥面上，朝着桥面空隙底下流逝的褐色水流瞧了瞧。我几乎打了退堂鼓，我不能就这么让她套在马车上，用活结绑在树干边。但是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已经走到这里，我们需要小鸡。

我回来的时候，篮子里装满了身上布满黑色斑纹、嘴里唧唧叫的罗得岛红鸡。贝儿静静地站在那棵树旁边。

“好女孩，”我抚摸她的脖子，“刚才我不是故意要对你凶。”

回家的路上，我来到山坡顶端，那位农夫不在这里，这让我松了口气。终于有一次能独自瞭望北山长长的棱线。在下午的阳光下，这道山棱仿佛在

燃烧。我看到“水牛沟”，多年前拓荒者乘着马车，车轮辘辘地沿着这条路往西部行去。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大概正在前往布鲁克林拥挤的地铁列车上，一面想办法用手肘抵住旁边的人，给自己一点空间，一面得意扬扬地想着事情。然而此刻，我驾着马车嗒嗒地回家去，车上带着一整篮的小鸡，还有车前一匹慢慢开始尊敬我的马儿。

在我的前方，克莱德·提尔曼沿着他家的车道缓缓走来。他是要走过来跟我见面，我想，我在马车上挺直腰。但是这位老人把手伸到他家空荡荡的信箱里，然后转过身，往屋子走去，根本没有往我这边看。他停在一棵树下站住。等我走近了，他果然又走到路边来。我放慢马车的速度，停在路肩，如此来往车辆可以轻易通过，同时，万一贝儿决定要往前走，我也不至于被拉进草丛里。

“你好吗？”我说。

提尔曼没有跟我打招呼，他上面那排义齿发出啪嗒一声，然后他说：“你需要弄一顶黑帽子来戴。”

就在这时，琴妮的红色吉普车隆隆地开过来。她把车停在马车旁边，把提尔曼的邮件交给他。他站在我们中间，臂膀斜斜地放在马车左边的车轮顶端。拜托，贝儿，我想。拜托你站着不要动。

他把更多的体重压在车轮上，仿佛这是他家厨房的台子，嘴里开始叙述他去参加一项类似门诺派宗教仪式的经过。“我一辈子没看过那么多门诺教徒。他们全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黑长裤、白衬衫、黑帽子，没有穿外套。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他们却没有带伞。”

琴妮把眼睛藏在她脸上的雷朋太阳眼镜后面，耐心地听他说。我的注意力转移到贝儿身上，我发现自己在卑躬屈膝地跟她说话。不要动。拜托你不要动。她站着，表现出超越以往的冷静和专注，我不知道这是因为她尊敬我——还是尊敬克莱德·提尔曼，以及他对马拥有的某种神秘的影响力。

提尔曼说完了，琴妮开车离去。

“好家伙。”他对我说，仿佛我的名字是“好家伙”，“你一定找了不少肮脏泥巴路来走，才会把马车走得这么脏。”嗯，你又知道什么了？他仔

细看看我的马，然后转过身，朝着他的房子走去。

“往前走，贝儿。”我为她指出回家的方向，“好女孩，贝儿。”

干旱，持续

干旱持续下去。我们最初种的蔬菜当中，有一些——卷心菜，一排豆子、南瓜——已经长大结果，但是其他的却枯萎了，草地也变成褐色。西红柿在藤蔓上死去了。这是叶枯病，比尔·罗伯森说，西红柿种子是他给的。

“你们必须把所有生病的植株全都拔掉，把它们烧毁，免得下一季它又来侵袭你的菜园。”叫我拔掉它们，我做不到。

其中一棵植物似乎没有缺水的问题。这棵蓟长得又高又多刺，一把一把开着柔软的粉红色花朵，看起来它每天都开心地长大了好几厘米。蓟是代表苏格兰的植物，也是金翅雀喜爱的食物。它的枝叶在奥杜邦的《美洲鸟类》^[1]一书里，衬托了这种羽色艳黄、吃种子的小鸟。然而，从史威普牛农的反应来看，你会觉得蓟是一种从地狱的果子里冒出来的邪恶东西。

他们喷农药来毒死它们，用割草机把它们的头切断，拿起用石头磨利的锄头，把它们的根斩断——无所不用其极，只是为了不让它们大量繁殖，吞灭农夫们的大片青草，而它们就是以惊人的速度在这么做。我们这两个初次拥有土地的人则是把屋子后面大约40亩的草地用篱笆围起来，让它们回归大自然。让这里变成一片开花的草原，应该很不错。蓟能引来金翅雀，这种野花正是我们想看到的。

问题在于，蓟并不尊重疆界。那些蓬松美丽的粉红色小球干枯以后，就喷出一团团包着种子的绒毛，随着微风进入新的领域，实践了杂草显而易见的命运。梭罗曾引述一个人——这人用算术计算出这种植物的毁灭潜

[1] 约翰·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 1785-1851)，他是美国18世纪知名的博物学家及鸟类彩绘画家，他在《美洲鸟类》一书里画出435种美洲鸟类的图片。

力——的话：这人推想，假设它有百分之百的萌芽概率，一颗蓟的种子五年后“产生的后代数量不仅足以覆盖整个地球，更足以覆盖太阳系，好让其他植物没有生长的机会”。在一季到两季的时间内，像我们这种不了解状况的唯美主义者，就有可能让做了许多年苦工、拼命拔除它们的邻居前功尽弃。

我们家的蓟长到一个人高，种子饱满繁盛之后，邻居们便开始抱怨。麦可·葛佛瑞有一天就戴着他那注册商标的白色牛仔帽，站在我家前门的露台上说：“我并不想刺探你们这个回到过去的小型实验，但是如果你们完全不处理那些蓟的问题，”他用手指着我们称为“我们的草原”的那片纠缠的杂草，“它就会狠狠地咬你们的屁股一口。”我是否真的做好了计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什么计划呢？

琴妮的母亲拥有的那片牧草地，正好位于我们这片草原的下风处。有一天，琴妮问了我们同样的一件事：我们打算怎么处理这块地？我解释道，我必须洗东西，给菜园拔掉杂草，用我那部生锈的手动式割草机修剪屋子四周的青草，以免它成为蛇的避风港，因此我看不出来，如何能凭着我的手动式工具，修剪我们草原内部和四周地区好几亩的蓟。对不起，做不到。必须先解决生存问题。“这样看来，”琴妮用一种看似假装、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口气说，“它们只有继续吹到我妈的牧场上，她也只有拿着她的锄头，想办法砍出一条路了。”

之后的那个星期六——一个七月的闷热早晨，我看到有个人在草地上，在马路的另一边，手里挥动着一根长柄的工具，高高的杂草让她显得十分矮小。是琴妮的七十岁的母亲姬恩，她正在用锄头砍断蓟的茎秆。

姬恩工作了一整个早上，不停地砍倒这些植物。然后，她休息了一下，走到我们家来，希瑟用长柄木勺从瓦罐里舀了些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她立刻喝了。她的头向后仰，像个渴了的运动员。这个矮小的银发老太太喝了很多水，希瑟和我静静地站在旁边。我往下看了一眼，注意到她的脚。这位女士竟然只穿着帆布鞋来砍蓟。

姬恩在我们的露台上休息，她不停地用她那细细的南方口音说，我们的

水是多么可口，我们是多么亲切，拿水给她喝，还有，她对于自己轻易就喝下了整整两杯水，感到多么惊讶。她没有说一句抱怨那些蓟的话——也没有抱怨它们的下一代，也就是从我们这里散出去的毛茸茸的种子，将在明年夏天迫使她再一次用锄头来保卫她的土地。

姬恩补充了足够的水分以后，便大步走向自己的土地。她还是穿着帆布鞋，完全不害怕碰到蛇的样子。也许是因为麦可和琴妮之前对我的批评，让我产生了疑虑，但是我还是想分辨出来，在姬恩温和的态度底下，是否隐藏着一丝一毫的狡诈？她那种仁慈高尚、不在意辛苦的淡泊坚忍，是否意味着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有罪恶感？还有一个因素让这件事更复杂，那就是姬恩有特林柏家族的血统。她所拥有的马路另一边的那块地，有一度是我们这座农场的一部分，她可说是在这片土地上务农的第七代子孙（琴妮是第八代），他们家的人在250多年前就拥有了这块地。希瑟和我规划我们的野花草原时，没有考虑到邻居。为什么要考虑呢？这是我们的土地。然而，我们慢慢地认识了史威普的居民，对于我们在这个社区里究竟是扮演什么角色，对于社区里的人对我们有哪些期望，我也感到困惑。

对我们来说，跟邻居互动也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希瑟和我都是在小镇长大，在那种有幽闭恐惧症的环境里，每一个人彼此都认识，因此我们特别喜欢谁也不认识谁的纽约。我们有很多朋友。如果我们想跟朋友聚会，就去约时间见面。忙碌的纽约客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史威普，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必须适应邻居随时会顺道来家里坐坐的状况。

邻居们都在讲一个笑话，那就是，我们晓得到你们家一定找得到人。他们没法事先打电话来，他们也知道，基本上我们哪里也去不了。因此人们就过来坐一下。他们开着卡车或越野车，或是骑着脚踏车来，要不就走路来。有一次我听到车道那边传来嗒嗒蹄声，出去一看，是两位女士骑在马背上，站在露台旁边。“我们听说了你们在做这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位穿褐色马靴的女子说，她的灰色卷发垂在安全帽底下，“我们好羡慕！”

我习惯了有隐私的生活，这种情况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因此邻居来访时，我不是每次都表现得很得体。我们忙着为冬天做准备，这些事让我觉得

自己好像《伊索寓言》里的蚂蚁，被放在一群蚱蜢面前^[1]。例如，我虽然很喜欢比尔·罗伯森，但是当他在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来访，有时会让我快要发狂。笑容凝结在我脸上，我从割草机后面跟他挥手，继续往前推，要不就是继续隐遁在谷仓的柴堆里拼命地劈柴，让希瑟去招待客人。

但是我逐渐学会了——我们都一样——放下锄头或洗衣板，到露台上跟客人坐一会儿。我们学会了対有人做伴心存感激，学会了工作是不会跑掉的。朋友走了以后，它仍然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也学会了，对于他们慷慨给予的东西，要怎么回报。来访的人绝不会空手来。在史威普，每一天都是举行聚餐庆典的日子。葛佛瑞夫妇可能会带新鲜面包来，比尔和佩姬带来自己腌的甜菜，伊许塔和莉夏则是带土豆沙拉。尽管我们从未要求别人遵守我们给自己定的规矩，许多人仍主动提供手工制作的蛋黄酱，或是细心地用符合那个时代的蜡纸，盖住装食物的大碗。我们回报的是羊奶、鸡蛋、燕麦饼干和希瑟做的可口奶酪。但是我们很难跟上邻居的脚步。有一天（在蓟害事件发生之前）姬恩送来一些奶油饼干，我们报以羊奶。但是第二天，这些羊奶变成了一升的甜食回到我们手上，这种不加热的甜食叫作“可以喝”的蛋奶糊。伊许塔很喜欢我们的羊奶，她一个星期来两次，把她那个半升的瓶子装满羊奶带回去，但是她坚持要留下一个牛皮纸小信封，里面装了四个两毛五铜板。“作为鲁德读大学的基金。”她说，对于我们的抗议，她置之不理。

最后，查德终于出现了，他送来几袋饲料。我们提醒他说，我们家没有电话。他答应下个月准时来。

不管我怎么努力，有一个人是我怎么也叫不来的，那就是钻井的人。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写了许多封布满墨水渍的信给他，求他来一趟。泵最近有点问题，压了四五十次以后，阻力会突然变大，变得充满弹力，仿佛压下的泵是在对抗一条巨大的橡皮筋。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水就打不出来了。

[1] 《伊索寓言》的故事《蚂蚁与蚱蜢》中，蚂蚁在冬天来临前勤奋工作，蚱蜢却在树下愉悦歌唱。蚂蚁对蚱蜢说，如果不为冬天储存粮食，届时就会饿死。蚱蜢说，我没有时间，我忙着唱美妙的歌。蚂蚁嘲笑他说，如果你笨到整个夏天都花在唱歌上面，冬季就只有饿着肚子跳舞。

有一天，一辆小货柜车开进我们家的车道，是班·劳尔，第二代的钻井人。我在屋子侧面的露台旁边跟他打招呼，他用奇特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这让我感到不安，自从他来我家打掉电动井以后，我们家有许多地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时希瑟和我仪容整洁，家里打扫得很干净，菜园是一排排整齐的刚翻过的泥土，还有刚长成的花椰菜。如今菜园和照顾它的人都显得褴褛破败。希瑟在厨房里汗如雨下，从露台的纱门里伸出一只沾了煤灰的黑手，挥了挥，跟他打招呼。我的头发乱糟糟的，打了许多结，我的脸因为五天没刮胡子，显得很脏。我穿着破烂的、割破的牛仔裤和靴子，打赤膊，因为鲁德吃完早餐后吐在我身上。

“对不起，这么久才过来，”班说，“我本来想，要是很紧急，你们会打电话给我。”

我穿上衬衫，带着班走到泵旁边，他的话让我最深的恐惧得到了证实。

“你的泵没有问题，”他检查好了以后说，“不过你的井快要干了。它不是附近唯一一口快要干掉的井。”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班才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他最近都在超时工作，为农夫们钻新的井，他们担心缺水会让牛群死亡。他迅速地估计了一下便说，我们这口井水位下降的幅度已经超过7.6米。再降个4.5米，我们就没有水可以用了。

快乐，妈咪！快乐，爹地

我们进入了今年最炎热、最窒闷的时期。即使在夜晚，气温也停留在32摄氏度。连微风也不吹了。我们展开这项计划以来，鲁德头一遭伤风，他在考验我们的耐心，频频唱反调、不断发脾气，每一分钟都要我或希瑟抱着他，这是不可能的。随着气温和湿度的上升，我和希瑟的关系也日益紧张。

一天下午，我们在菜园里。希瑟说：“我的花怎么了？”她弯腰查看一块刚翻过泥土的花圃。

“哦，糟了，”我呻吟了一声，“是什么样子的花？”

“是大波斯菊，长得很高，快要开花了。”

“昨天我把它拔掉了，”我说，“我还以为那是杂草。”

“太可惜了。”她把脸埋在手心里，开始啜泣。这是她的花，是我们俩种下的唯一一批赏花植物，是这个被实用性主宰的菜园里仅有的一点令人沉醉的嗜好。她对我们面对的挑战感到厌烦、疲倦，就种了这些花，作为希望的象征。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撑过冬天上，因而无情地把它们连根拔掉。这些大波斯菊是希瑟在这种原始人生活里的洞穴画作，我杀了它们——纵然是无心的，我仍然剥夺了她想借此展现的自由和美。

“对不起。”我的道歉是不够的。

希瑟发现我拔了她的大波斯菊后，一整天都拒绝跟我说话。她踏着重重的脚步，干她的活儿，她闭紧嘴唇，眼光黯淡沮丧。她几乎不看我。

我们开始交谈时，说的都是冷漠的、跟工作有关的事——“还要不要加点木柴到火里？”或是“你打了水没有？”有一天我搬好几捆干草以后，走进厨房，我满身大汗，身上被干草搔得很痒。我发现希瑟坐在那里，轻蔑地读着《华尔街日报》。那是从一叠邻居带来给我们起火用的纸张里抽出来的。我在不远的地方重重地坐下。

“我们能不能谈一下？”我说，“关于你的花，我真的很抱歉。”我还想告诉她，我逐渐明白了——光是躲开冬天的饥饿问题，并不是成功的唯一标准。

“这不只是花的问题，”她放下报纸，面向我，“这是生活全貌的问题。我们感情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用那种宿命的想法去看我们的感情？”我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一种似曾相识的处境：“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地讨论这件做错的蠢事，然后就克服它？”

“我觉得我们不了解彼此，罗根。我觉得你距离我很远。我们完全没有沟通。”

“我还在寻找跟你沟通的最好方法。我知道我有个坏习惯，就是会想来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努力在改。就像现在一样。”

“我们几乎不触摸彼此了，”她说，“我们就像两个单身的人一样，从彼此身边走过。我整天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忙着炖东西吃，忙着把食物装进瓶子里。

“想一想，我们干活的时间有多长，做得有多辛苦！我们不睡觉的时间里，有十分之九是用来照顾鲁德。我们看起来不像会有时间和精力来更加亲近。

“我们在纽约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累得要死，拼命为这个该死的计划做准备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这些话原本应该在我们的1900年计划开始时就要说才对。”

我重新回到一个令人困扰的想法上：也许这个计划是个可怕的错误。由于我们想要逃避安定而画好框框的生活，对于内心躁动不安的情绪，我们提出的解答不是到外国去探险，而是为自己套上更紧的轭，让自己接受成年人的责任与沉闷。我们之所以会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孩子。我们称之为“在家探险”，这种探险不会引导我们前往任何地方。当年我们在厄瓜多尔生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非常紧绷，希瑟深深地渴望飞出去——一个人到智利去，尽管她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也许一段以喜爱旅行和探险——喜爱逃离——的共同兴趣为基础的感情，无可避免地将会毁灭？

鲁德已经醒了，而我们什么都还没有解决。我们笨拙地跟他玩，但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像火柴的烟一样，在我们之间飘忽不去。在我们全神贯注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一排黑云从北方移动过来。现在有一种凉意舔着我剩下的汗滴，不久之前，这汗水还刺痛着我被割伤的地方，占据我全部的心神。

“你看，”我说，“下雨了！”

我们冲到外面。鲁德踩在我们的脚背上。几滴硕大的雨水重重地落在鸡舍的屋顶上。然后雨泼洒下来，仿佛天上有个桶子打翻了，啪啪地重击我们的脑袋和肩膀，敲击菜园里硬邦邦的泥土，雨水立刻汇集起来，形成褐色的小溪，沿着车道流下去。我们没有料到现在会下雨。没有气象报告。没有邻

居来报消息。在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下雨的迹象。

希瑟开始啜泣。我抱着她，我也哭了。在雨水倾泻的时候，放掉一些事是很容易的。鲁德站在那里看，有些不解。“鲁德抱妈咪、爹地。”他说。他的话让我们笑了。我举起他，把他抱在我们中间。我们又哭又笑，来回摇着他。然后，他笑出来。“快乐，妈咪！快乐，爹地！”他说。

“对，快乐的妈咪。”希瑟说。然后，她把嘴唇靠在我耳边，用细微的声音说：“我爱你，罗根。我从来都不想失去你。我们会把这件事完成的。”我啜泣着，用手臂紧紧抱住她，我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是的。是的。是的。我爱你。”



第二部

渐入佳境

第六章 采摘，洗净，去皮，去壳



送给希瑟的手环

雷声仿佛是赛跑开始时鸣放的枪声，我们菜园里的植物也展开了爆炸性的成长，第一次下霜时，各种植物都在饥渴地狂饮。八月初，天空里突然露出一道裂缝，保命的倾盆大雨随即一场接一场地降下，带来了祝福。土豆和青豆一簇簇地冒出地面。南瓜和黄瓜的藤蔓蜷曲起来，在地面爬行，追逐阳光。玉米的茎秆快速地往上冲。

雨水减轻了我们对于菜园和井里水位的忧虑，希瑟和我的脑筋比先前清醒了一些，我们更加努力，想办法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们重新开始聊天，触摸彼此，然而我们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担心会打破一个无法修补的东西。

每天的生活仍然是一份苦差事，各种的活儿占据了我們大多数的时间。我翻开的那本书《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到现在只读了四页。每天晚上，我都靠在竖直的枕头上，就着油灯令人昏昏欲睡的光线读它。每天晚上我都立刻睡着，这本书在几分钟内就能打到我脸上。

但是我们展开这项计划已经八周了，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强。一开始，我

们被许多残酷的现实不停地驱赶。需要水了，我就去打水；要生火煮饭了，我就冲去劈柴。三餐的菜色单调得很——早餐吃燕麦片，还有很多很多的卷心菜。我们脾气火爆，永远落后几步，没做完该做的事，我们总是跌跌撞撞地过完一天。现在我们做事比较有效率了：我们把用过的盘子泡起来，两天洗一次；在洗衣日的前一天多打些水；每次拿起斧头劈柴，就多存一点柴薪。菜园生产的蔬菜种类日渐增加，希瑟用四五种蔬菜做出色彩鲜艳的丰盛菜肴，在盘子里摆得满满的。我们为了三餐而汗流浹背，辛苦做工，我们也逐渐学会了仔细品尝食物的味道。我们不时地找机会休息一小时，作为给自己的奖赏。在这种安静的时刻，我们用来写信，带鲁德散步，或是在吊床上睡个午觉。

我觉得自己比较能掌控环境了，同时我逐渐学会了要承认我对有些事无能为力——例如那场日本丽金龟带来的虫害，或是天气。当我感觉挫折和恐惧涌现心头，我就不断重复一个简单的问题——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这句话能帮助我，让我的心安顿下来。比起一百年前的一个农家可能遭遇到的最坏状况，我们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就让人觉得没有那么糟了。那家人被困在1900年不得脱身。我们却没有。但是我并不相信，我们的处境和他们有多么大的不同。每个人都在面对不确定的状况。到了某个时刻，你就是必须让生活按照它自己的路径发展，面对汹涌而至的事件时，要能放下想控制环境的念头。跟巨人角力的人注定要落败。

因此，八周之后，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像个货真价实的、活在19世纪的人？完全就表面上而言，我不觉得是这样。尽管我们尽全力去做，要把20世纪完全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当我的目光超越了汽车，超越了塑胶制品，超越了邻居们偶尔送来的不合时令的甜瓜，我的确觉得自己活在19世纪。当我高高地坐在马车的坐凳上，穿着工装裤，头戴草帽，或是在劈柴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我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的耐心与自信日益增强，借着它们，我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希瑟的情况也一样。当她做出完美的羊奶奶酪，当她越来越能掌握用木柴炉烤东西的细微诀窍，她也有同样的感觉。

在我们感情的存亡关口，如果她和我待在纽约，我们也许会去找婚姻咨询师。但是我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在八月的某一天，在一座炙热的木柴炉旁边讨论我们的问题。把食物装罐保存的时候到了。

我们尽了最大的力量，来估计需要储存多少食物过冬。这是一个复杂的等式，包含许多猜测——我们夏季的植物会有多少收成，菜园里第一次降霜会造成多少作物死亡，秋天我们能在菜园里种出多少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能储存多少东西（装罐，晒干，腌制，或是存放到地窖里），开春的菜园会在什么时候有收成。还有，我们会消耗——包括所有不请自来的客人——多少东西。

我们把目标定为三百罐食物，这样的话，从十月初到来年的五月，我们每星期就有十罐食物可吃。此外，我们还会在地窖里储存土豆，存放冬季要吃的南瓜，并晾干扁豆和豌豆。随着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冷——致命的寒霜随时有可能降下——我们必须跟时间赛跑，准时完成这些事情。

希瑟是主厨，我是二厨。为了做罐装食物，我多打了很多水，劈了非常多的柴，好让炉子整天轰轰地燃烧。我把很多容量为一升的罐子洗干净，把盖子排好。同时，希瑟熬煮糖浆，加入香料来腌小黄瓜，辣椒、豆子、南瓜、秋葵和小黄瓜的切片堆积如山。让我们惊奇的是，西红柿卷土重来，它们摆脱了腐烂的末梢，每天的产量达到十千克——成熟的西红柿足够做三明治、调味料、沙拉，以及装满一个个的罐子。

一天又一天，炉火熊熊地燃烧，热罐子的大锅嘟嘟地冒泡。厨房的台面上摆着一排排装满食物的罐子，它们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待冷却，我就把它们装在篮子里，拿到地窖存放。在地窖里，有时我必须把罐子重新排列，好让所有的罐子都摆得进去。不管我们有多么疲累，我们都得在这段农作物成熟结果的期间，逼着自己把事情做完。我们的青豆熟了，早该将它装罐。最后收成的几批青豆吃起来已经很老，纤维也很粗。

一天下午，当我把最后一个装满食物的热罐子放在台子上冷却，一面留心等待那“啪！”的一声——这个报信声表示罐子盖紧了，里面达到真空

状态。这时，我用带点嘲笑的口气对希瑟说：“所以，你过生日那天想做什么——除了把食物装到罐子里之外？”

她明天过生日。我跟很多男人一样，总是把买礼物这件事给耽搁了。所以，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我总是漫不经心，买的东西多半没用。我会买一本书，却一遍也没看过；也会买浴盐，到了它们在柜子里结块时还没有启用；我选了毛衣，心里明白，她会在这件毛衣拿去退钱——等于是给她“香蕉共和国”服装店的礼券。也许送礼物的心意是最重要的，但我的礼物通常是迟了的心意。

希瑟过生日那天，清晨下着毛毛雨，稍后转晴，天气凉爽，天空灿烂，展现初秋的信息。我们当然还是在炉子上烧水，准备把青豆装罐。我们在干活儿的时候，伊许塔和莉夏来拿点羊奶，并留下一篮子的好东西——一些鲜花、一张给希瑟的生日卡、手工制作的蛋黄酱，以及玉米粉做的软面包。过了不久，比尔和佩姬带了粉红色香槟和一束插在瓶子里的鲜花过来。“昨天晚上我们摘了一束花，庆祝我们结婚一周年。”佩姬说。“太棒了。”尽管家中劳务繁重，希瑟的心情还是很愉快。

我必须使用厨房——为了给希瑟一个惊喜。就在我准备赶她出去的时候，琴妮来敲门了。“罗根，我需要你帮个忙，”她的表情看起来很严肃，“戴副手套过来。”

一头死掉的小牛躺在她家的野地上，尸体肿胀生蛆。我用嘴巴呼吸，避开那股恶臭。我们合力把腐烂的牛尸搬到卡车上。她要把它丢到树林里，给秃鹰吃。“我可以在山坡顶上跟你会合。”我说，我希望她不要叫我坐她的卡车去。“不，我只需要你帮忙把它搬上车。”她简单明了地说，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口吻。

我回到屋子里，一直没法忘记那头死掉小牛的模样的。由于这幅景象，这一天显得有点肃穆，这种肃穆只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但是突来的杂事让我没有时间多想。我走来走去，忙着为今天晚上做准备。鲁德在睡午觉。希瑟去散步了。

我们在有纱门的露台上吃晚餐，沐浴在凉爽的微风里。铺着洁净蓝格子

桌布的餐桌上，插了一束黄金菊，桌上点着蜡烛——1900年的社交礼仪必须有的，拿果酱罐当酒杯，盛着粉红色香槟，还有我做的，加了罗勒、西红柿和羊奶奶酪的意大利面。鲁德满足地吃着他那盘没有酱料的面条。希瑟很高兴地享受这盘大餐，因为这一顿不需要她来做。

“恐怕今年你只能得到这个。”我递给她一个包着牛皮纸的小盒子，纸上有鲁德的蜡笔涂鸦，纸盒外绑着细麻绳。

她打开盒子，喘着气说：“你亲手做的吗？”我点点头，努力不让自己流露出乐得要命的样子。这是一个手环，用贝儿的鬃毛编成的。

“你怎么知道应该怎么编？”她说。

“就跟我晓得怎么做这里的每一件事一样；就像我晓得怎么做羊奶奶酪，怎么用木柴炉煮东西一样。”

希瑟笑了：“你怎么有时间做？”

“你没有注意的时候，我就溜到库房里去做。”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编好手环的部分。然后，我需要一个扣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思考着，画了草图。有一天，我在给一畦萝卜翻土，突然间，一个染成绿色的圆形东西映入眼帘。我挖起一把泥土，慢慢地、戏剧性地张开手，汗水一滴滴落下。我的手心出现了一个老旧的铜质垫圈——这正是我想要的——它像某些亚洲国家的具有神秘意味的铜板一样，安然地平放在土堆顶上。

希瑟把手环戴上，伸直了臂膀，赏玩它。“我喜欢它，罗根。这个东西比过去你送给我的所有东西，都要来得重要。”

我想永远记住这种感觉。我再也不要吧希瑟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

一辆车沿着车道开过来：伊许塔和莉夏又来了。你们进屋来，带来一阵喧闹，大家相互拥抱，互相祝福。她们拿着一个用擦干碗盘的毛巾包着的布包：那是手工制作的香草冰激凌，放在垫了蜡纸的金属饼干桶里。这个冰激凌刚好可以作为我做的“惊喜”巧克力蛋糕的完美配件。而这个蛋糕则是我生平烤出的第一个蛋糕，是按照我从两本搭配葡萄酒的食谱书里找到的配方做的。

“冰激凌！”希瑟说，“好久没吃到了。多么棒的礼物！”鲁德脸上沾

满黏稠的咖啡色糖霜，他坐在木头高椅子上，用手敲击面前的托盘，开心地不停扭动身体。“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些食物全都是手工制造出来的！”

莉夏的身躯不安地动了动。我正要问他们，是用哪种器具做出这桶冰激凌的，伊许塔就用一种同谋的眼光看着莉夏说：“我很高兴你把‘嗯——’加进了‘嗯——’里面。”莉夏立刻补上一句：“是的，妈，那样很好。”所以，也许它不是手工做出来的。何必多问呢？我心想。毕竟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好”邻居

希瑟和我走出车道，我们拉着红色的儿童拖车，鲁德坐在上面。这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旅行车从童军露营地那边朝着我们开过来。它的速度对石子路来说快了一点，车子猛然转弯，朝着信箱驶去。我们正好站在信箱旁边。这位汽车驾驶猛力踩下刹车，车子在碎石子上失去控制，朝着我们冲过来，车尾剧烈摇晃地走了将近五十米。就在他快要撞上我们的时候，司机重新控制住车子的速度，让车子转了个弯，在特林柏磨坊路的路口慢慢停下来。

“喂！”我喊道。我走向这辆车，看到了车牌号码，然后，它发出尖锐的声音，石子溅到我身上。

我们在商量要不要买特林柏磨坊的时候，曾把这里的童军露营地视为一项真正的资产。营地门口的两根图腾柱，附近的湖，湖边的码头和取下拦绳的游泳区，更增强了我们对新家的四周环境抱着童话故事般的憧憬。全国各州的孩子来到我们住的地方，参加野营活动。我们想象自己跟这些男孩和他们的辅导员愉快交谈的模样。他们甚至有可能对我们的1900年计划有兴趣。童军比较好，我们想，好过土地开发商。

邻居们对我们天真的想法感到好笑。

“童军？好邻居？等着瞧吧。”琴妮说，有一次她发现一辆坐满辅导员的汽车来到她家的草地上，他们撞倒了铁丝网的围篱。没问题，这些辅导员

说。不会有问题的，因为这块地的主人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没想到，他们就是在跟这块地的主人说话。“你等着瞧吧。”他们说。

为期一周的露营活动从六月开始，童军巷自此热闹得像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法拉特布许大道（Flatbush Avenue）。一星期中有三天——家长在星期天送孩子来、星期三是“家长之夜”，孩子在星期六早晨被家长接走——厢型车和崭新闪亮的休旅车沿着附近狭窄的农庄道路快速地开过来。带着拖车、车身写着“百事可乐”或“思科公司”（Cisco）的卡车占用路面，把本地人逼得掉到水沟里。深夜巡逻的辅导员成群走动，惹恼牛只。尽管没有证据，这里的人全都相信，有一户人家的信箱被球棒打烂一事，是那里的辅导员干的。我们的信箱幸免于难，但是比尔和佩姬发现，他们的信箱被弄凹了，然后弃置在中央河的桥下。佩姬请我爬下去，把信箱捞出来。

刹车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希瑟用儿童拖车拉着鲁德到营地去。她想跟他们说这件事，要他们采取行动，改善家长和辅导员开快车的问题。她希望他们知道，现在特林柏磨坊住了一个小孩，他会在这里玩耍。她觉得，童军基于他们所发的誓言——要求自己要做到谦恭、友善和仁慈，一定会做出符合她期望的回应。

希瑟回来后，我听她说，他们的反应跟她想的不一樣。

“那辆车几乎撞上我的家人，而车子现在就停在你们的停车场里。”她对营区主任说。她在营区办理行政事务的小木屋里见到这个人。这个穿卡其布短裤、脖子上系着童军领巾的男人，看起来漫不经心。“那辆车的车牌号码跟我丈夫记下的一样。”她说。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在乎这件事，不过办公室里有个比较年轻的男人，跟着她走进小木屋，在角落里翻找东西。听到希瑟说出车牌号码时，这人说：“是我开的车。”

主任仿佛觉得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他转过身，面向希瑟：“嗯，那么，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走开了，留下希瑟和鲁德面对这位高个子金发辅导员，他大约二十岁。“你不晓得，女士，”他说，他的声音里带有一种自大的狂热，“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一心想找乐子。”同时，他说，

他是在车里其他男孩子不停怂恿的情况下才加快速度。从头到尾，情况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来来回回说了几分钟后，希瑟离开了，对方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过了不久，在一个月光闪耀的炎热夜晚，希瑟和我在前门露台上坐下。鲁德在二楼睡了。山羊的奶也挤好了。盘子洗得很干净。我们单独在一起，兴致很好。我们坐在露台的摇椅上接吻。希瑟脱了衬衫。

“我们这样好吗？”我说，她的答复令我惊讶。她没有开口，意思却非常明白。我把油灯的灯芯调低一点。

不久，我们的衣服就落在露台上。我们移到通往院子的台阶上，这里不是最舒服的地点，但是谁在乎呢？在静默的黑暗中，在户外，只有偶尔传来低声的牛鸣打破这片寂静，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感到狂喜。

然后，从远方，我们听到小小的车声，看到一辆车的头灯闪动的灯束。是从童军营地沿着长而直的石子路开过来的。

我俯身向前，吹熄油灯。“别担心。”希瑟恳求道。但是我没法不担心。刚才那神奇一刻的魅力消失了。即使那辆车的驾驶在月光下看不到我们——我不相信他们看不到——我的心思也已经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隆隆声越来越响。更多头灯的灯光。一辆汽车和卡车组成的车队朝着我们，在石子路上嘎嘎地开过来，车队的灯光照过来，可以见到飞扬的尘土。他们穿过路口，越过我们家正前方的那座横跨中央河的桥。然后我想到：今天是星期三，是“家长之夜”。

新“来客”

即使在我们收割成熟的作物之际，我们也在对抗花园里出现的新威胁。除了日本丽金龟和欧洲来的纹白蝶，现在又多了墨西哥豆瓢虫。我们的菜园宛如战场前线，陷入了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豆瓢虫的幼虫身体柔软艳黄，这种黄跟其他蠕虫的绿色和土豆瓢虫的粉红色混合，染脏我的手指，显现出一

条肉虫内脏的彩虹。“啪”的一声，爆开了！

玉米和豆子刚成熟的时候，一群群乌鸦在河边的树林里徘徊。它们彼此的谈话声让我联想到第三世界的公交车站。我不确定它们是不是在找寻昆虫，还是打算啄食农作物。我不冒任何风险，直接用嘘声把它们赶走。

就在几天前，一只土拨鼠从信箱那边横越我家的车道，到我家来定居。一天早晨，我们一面吃麦片，一面辩论该怎么处理土拨鼠的事。

“我们可以做个陷阱来抓它。”希瑟说。

“农人不用陷阱来抓土拨鼠。”我答道。他们用枪射杀它们，或是训练澳大利亚牧羊犬，要狗用鼻子把土拨鼠从地底下拱出来，咬断它们的脖子。土拨鼠挖的洞有可能会让奶牛的脚“啪”的一声扭断，或是造成拖拉机翻覆。我们没有拖拉机，也没有养奶牛，但是我们有一匹马。此外，这只土拨鼠有可能拿我们的菜园当作早餐店来大啖一番。

“佩姬说，我们应该把它们放生到至少25千米外的地方，”我说，“否则它们会回来。”即使这么做，你仍然是把自己的问题丢到别人的土地上。这样公平吗？我没有对希瑟提起，麦可·葛佛瑞的小麦地也有土拨鼠的问题，他建议用汽油烧死它们。倒下去，点火，“砰”的一声！

“如果我用枪射死它，会怎么样？”我在心中揣想那把生锈的16口径散弹枪，那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借来的，包在牛皮纸里，藏在我们空卧室里的高大松木柜上。

“你要在哪里射死它？”

“我先用陷阱抓到它，然后把它带到山坡顶上。”

“你杀了它以后呢，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希瑟说。

我也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我想到大卫·弗雷格（Dawid Fleig）说过的，关于务农的一句话：你必须学会掌握杀生的时机。今年夏天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完成了我在这方面该做的事——杀死那条蛇，那只大鼠，几十只小老鼠，还有无数的昆虫。老实说，我不太喜欢杀生

的感觉（嗯，不过杀死那些日本丽金龟绝对没有让我辗转难眠）。更让我感到矛盾的是，琴妮的母亲告诉我们，她的子女以前曾收养一只失去父母的土拨鼠，它叫“奥斯卡”。

“奥斯卡的个性好极了，”姬恩用她那拉长的纤细声调回想过去，“她是我们养过的最友善的一只宠物。”奥斯卡喜欢吃盖恩斯的汉堡（Gaines Burgers），有一张它啃着又脆又软甜甜圈店（Krispy Kreme）的蜂蜜糖浆甜甜圈照片，还上过当地的报纸。奥斯卡把他们家撑鞋的模子越啃越小，在涂了灰泥的墙壁里挖洞，躲到隔层的板壁间做窝。“她身上一定很痒，可怜的东西。”姬恩说。到了秋天，奥斯卡在谷仓底下的洞穴里冬眠。“我儿子会大声叫她：‘奥——斯——卡！’奥斯卡就会用高频率的声音回答他，就像鸣角鸮的叫声——呜，呜，呜。他听到奥斯卡在她的地下隧道里朝着他爬过来，越来越近——呜，呜，呜。”姬恩不像一般养牛的农人，在她的土地上，她不许任何人杀死土拨鼠——直到有一次，她踏进土拨鼠的洞里，摔裂了脚踝。从此之后，她就不再禁止别人杀死土拨鼠了。

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我们的这只土拨鼠有可能跑到马路对面，在姬恩的草地上挖了个洞，然后姬恩在砍断从我们的草地蔓延过去的蓟的时候，一脚踏进这个洞，摔裂了另一脚的脚踝！

“这里的农人会用枪打死土拨鼠。”我说。

“对。”希瑟说，“但是农人养了一些动物，就是为了屠宰它们。他们很习惯杀生。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杀生。”

因此，我们不杀死这只土拨鼠，而是试着用臭气熏它，希望它离开这里。一开始，我把半桶酸腐结块的羊奶倒进洞里。我把辣椒煮沸，丢进去。我把尿壶里的尿，倒进它那个洞的前门里。洞口长出一块绿色的霉，这似乎显示，这位土拨鼠先生已经离开这里了，然而它后来总会在信箱旁边或是前院里出现，这些地方草的高度已及膝。它的行踪成谜——直到有一天，我在它那发霉的洞附近走动，一脚踩进他的后门，差点当场扭断脚踝。

所有的生物都想在我们的菜园里分一杯羹，连我们自己养的山羊也不例外。有一天，我抓到甜豆在贪婪地啃噬幼嫩的玉米茎秆。不知怎的，她从

羊栏里跑了出来。“喂！”我尖叫道，“到那边去。”她沿着篱笆蹦蹦跳跳地往前走。我追逐她，弯下身抓住她的后腿，我紧握不放，下巴被踢了好几下。我抓住她的颈圈，把她拉回围场里。围场大门下方有一条雨水冲刷出来的沟槽，我把身体卡在沟槽里的几块大石头上，免得她在扭动中逃走。

山羊们偷吃菜园里的农作物，已经够糟糕了，万一它们溜进摆饲料的房间，那就更糟了。吃太多谷物有可能撑死。为了这个理由，我总是再三查看，确定饲料室的门闩放好了再离开。一般认为，山羊的舌头能够盘卷起来抓住东西，它们会用舌头来开门，因此我们为农场里的几乎每一扇门都装上防山羊打开的特制门闩。饲料室的门闩——位置很高，看起来似乎够不到——从来没有让我担心过。

两只同母异父的山羊当中，甜豆的年纪比较小——她的个头比较小，毛色为棕褐色，光滑得像一头小鹿——她吃了谷子以后，会不停地打喷嚏。我想她可能是把食物从鼻孔里吸进去了，这会让她发出响亮的喘气声，有好几次，她的羊鼻涕喷得我满头满脸的。有时打喷嚏让她同时放屁，就像小象发出吹喇叭的声音。她会站在挤奶台上，我蹲在她身边的圆凳上，突然间冒了出来——唏嘶——扑哧！我顿时遭到前后两声巨响的夹攻。

有一天，这种喷嚏兼放屁的巨响同时夹带了金属盖发出的砰砰声，这个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刚走进菜园，正在专心地拔除两排玉米之间冒出的杂草。希瑟在厨房里。我走到两排豆株之间，查看有没有日本丽金龟时，听到这个声音，便往谷仓那边看过去。饲料室的门是开着的。“羊去吃谷子了！”我大叫。

我从农作物之间跳过去，穿过菜园，打开门，冲向谷仓，嘴里一面喊着：“出去！”我登上两级台阶，走进这个阴暗的房间。山羊、绵羊和奶牛等反刍动物吃了太多谷类会胀气。这些反刍动物的第一个胃“瘤胃”，会因为充满大量的食物酵素而产生许多气体，然后胀大的胃会压迫到肺，导致窒息而死亡。治疗胀气的方法——释出气体——很简单，也很可怕。首先，你要尝试把一条软管塞进这只动物的喉咙里，把管子一直插到它的胃里，同时要祈祷，希望它的胃能突然冒出一阵腐败的恶臭。但是你不能把菜园里浇水

的水管塞到山羊嘴里（碰巧我们只有这种水管），因为它可能会刺穿食道，让动物丧命。

如果你没有水管，你还有最后一个办法——用一把小刀刺进胃里，这个方法称为“刺穿法”。你从动物身体左侧、胸腔后方那里，就在脊椎下方的背部凹陷处刺进去。你将刀刃朝着前方，对准右前脚膝盖的方向，然后旋转刀刃。但是要记住，一定要闭上眼睛，因为喷出来的气体可能挟带着食物和胃液，溅得你一脸都是。即使你成功了，山羊也活下来了，山羊仍然很可能因为刀子没有消毒而罹患腹膜炎。

“出去！”我说，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星星夹着尾巴，从我的两腿之间跑了出去，甜豆飞快地跳到角落。然后，令我惊恐的是，我发现这个狭小的房间里盘踞着一团巨大的黑影。“贝儿！”我尖叫道，她从装谷子的大桶深处跳起来。“出去！”

我本能地大声拍击手掌。贝儿跳跃着，巨大的身体不断旋转，显然受到了惊吓。她会踩扁我，我心想。我伸出双臂来阻挡她，要她停下来。她大声地踏着步子，退到桶子旁边。我纵身跃向她的身侧，她踏着隆隆的步子，从我身边跑了出去。“出去！”我对甜豆说，她像一只偷懒不干活儿的狗，飞快地逃了出去。

一整个下午，我留心这几只动物的情况，注意它们是否出现了症状——痛苦地嚎叫、举止错乱而急躁。但是两只山羊不久就顽皮地玩起头对头顶角的游戏，贝儿则是阴郁易怒，嘴里咕哝着，不停地发牢骚。跟平时没有两样。

贝儿的小探险

暴风雨快要来了，在疏落的雨点中，我快步走向贝儿所在的围场，她已经在这片大草地上吃了许多草，现在我要让她回谷仓前的院子里。贝儿不见踪影。我到马厩查看，心里想着，也许她进马厩了，以便避开苍蝇和下午的

暑热。但马厩里空荡荡的。

“哦，该死！”我尖叫道。我忘了关上大门。我冲到谷仓里，拿起贝儿的笼头和牵绳，奔跑着穿过菜园，从野餐桌旁跑过，进入前院。我来到信箱旁边的时候，看见了她。她沿着童军巷，以小跑步跑向我。在她的后方，大雨从北山上倾泻而下，朝着我们这边侵袭过来。

我冲到她面前，做好奋战的准备。尽管我跟贝儿的关系最近颇有进展，这匹高大的马仍然让我心惊胆战。我只能在谷仓院子的静谧氛围下搞定她。然而在此刻，这只一吨重的动物朝着我直直地冲过来。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我发现她奔跑时，身体呈现某种固定的倾斜角度，就像狗一样。难怪她老往左边歪过去，我想。我知道我应该镇定以对，不该大喊大叫。然而太迟了。“贝儿！”我喊道，“回来，进大门里来！”

她跑到我面前，猛然停下来，头往后仰，鼻孔喷气，眼睛睁得大大的，向下看着我。我的机会来了。我举起笼头，心里非常紧张，手指神经质地拨弄它，脑子里还在想着刚才看到她冲过来的景象。贝儿只需要我表现出这一瞬的迟疑。她从我身边跑开，朝着特林柏磨坊路路口那个写着“停止”的交通标志冲过去。“贝儿！”我尖叫道。然后，我大声说：“哇！”她仍继续向前跑。

贝儿朝着北方跑过去，过了桥，从无果树丛中穿过，在人行道上嗒嗒地前进。我跟着她跑，越来越乏力，我喊叫着，吹口哨呼唤她，嘴里不时发出虚弱的嘎嘎声。大雨倾盆而下，重重打在我的头顶和肩膀上，落到地上，形成无数个小皇冠，把中央河混浊的褐色水面打出许多泡泡。贝儿的优雅姿态让我感到震撼，她没有装上马具，没有拉着马车，没有人在驾驭她。我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收场。我必须去敲琴妮家的门，向她求助吗？我必须坐上她的卡车来追上贝儿吗？

贝儿沿着山坡往上走，她走在这条狭窄道路的中央。我想到那些童军营地的厢型车总是快速冲到山坡顶上。“贝儿！”我大叫，然而我的呼喊只是让她加快速度前进。

最近这段时间，鲁德表现出两岁孩子的唱反调个性，我逐渐学会了

用以牙还牙来处理这种情况。当他不肯跟我去井边，或是跟着我坐在户外厕所里，我会说：“好吧，不要做。”然后我就转过身，冷淡地走开。这个办法通常有用。在此刻，就在贝儿来到山坡顶上的时候，我停下来，转身往回家的方向走。“好吧。”我大声说，“如果你想往前走，就往前走。”贝儿停下来。我加快速度，朝着我们家走去，一面偷偷用眼角瞧她。她转过身，跟着我来了。我停下脚步，她也停下脚步。我往前走，她便跟得紧一些。我转过身，慢慢走向她。她转向另一边，小跑步地走开了。我再度往家的方向走。

最后，贝儿走到我身边。我停下来，往远离她的那一边弯下腰去，假装不在乎的样子，随意拂一拂手臂。现在我们很靠近彼此了，我用安抚的口气从容地对她说：“所以，你的这趟小小探险已经结束了？你觉得高兴吗？算是运动完了？很好。很好。现在该回家了。”我把绳子套到她的脖子上，在脖子底部握住绳子的两端，再把笼头套到她头上。雨哗哗地落下，雷电交加，发出隆隆的巨响。我担心贝儿会受惊，把我撞倒在地，然而她保持镇定。闪电在我们四周闪射，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尤其是在我们从成排的无花果树底下走过，还有过河的时候。站在桥上，我能直接看到山谷另一头的克莱德·提尔曼家的房子，以及晾在外头、被大雨打湿的衣服。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我们，如果能看到，他会对此幅景象有什么看法：一个男人和他的马，在滂沱大雨中缓步前行。

除蓟

经过许多次的调整，我决定把除蓟的事情排到待办事项的第一位。我们来到史威普，是为了与世隔绝，过着1900年的生活，但是我们逐渐领悟到，尽管这里的住宅之间的距离很远，人与人的关系却非常亲近，彼此互相依赖，这其中包括我们在内。还有，如果像姬恩这样的一位老奶奶都能自己到原野上砍蓟，这件事又有多难？

有一天，我拿起一把锄头，跟姬恩不同的是，我穿上工装裤、做工时的衬衫，戴上手套，脚蹬皮靴，来保护我的身体不致受到蓟刺的伤害。我从房子附近开始砍起，这里的蓟比较稀疏，我在原野上砍出一条宽三米的道路，然后折返，紧靠着这片刈痕，辟出一条同样宽度的道路。我把锄头猛力砍进它们连接地面的基部，然后往上一撬，切断它们顽固的主根。

愈接近地面，蓟的茎愈粗。每一丛约冒出十根茎，每根都长成一整株，靠近地面的地方，粗得像小橡树的树干。我把锄头举到头顶，使出最大的力气压下来。它砍入地面，有时发出脆硬的干裂声，仿佛切碎了刚冒出地表的生菜；有时发出沉闷的回弹声，撞击我手臂的骨头，让我的脑子在头部里像弹珠一样撞来撞去。这些植物倒下去的时候刺到我，刮伤我的脖子和脊背，我扭动身体，避开它们。它们长得越茂密，我越是愤怒。我狂暴地砍下去，把锄头当作大刀来狂挥乱舞，将这些手脚并用向上攀爬、想要抓住我的带刺士兵们打倒在地。我停下来喘口气，查看四周原野上的情况，不禁感到丧气。我发现，这里的蓟似乎突然间又长出来了。它们长得到处都是。

几小时后，我不做了。这时我已满脸通红，气喘吁吁，身上沾满杂草，皮肤被刺穿衣服的蓟扎得阵阵刺痛。穿帆布鞋来砍蓟？她的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在不使用有骷髅头标记的剧毒农药的情况下，我们实在很有可能从头到脚被这种植物彻底吞没。

布鲁克林的老朋友

八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朋友来看我们。某天，凌晨三点，他们的车开进我家车道。希瑟和我点起油灯，甩去睡意，下楼去欢迎他们。大卫·韦劳勃和梅若·史瓦兹，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八岁的伊里亚斯和五岁的莉莉（两人都在后座熟睡），还有他们家那只年老的哈士奇犬，它从这辆黑色的富豪旅行车里，以满怀青春热情的姿态一跃而出，爬到挡泥板上。

希瑟拥抱梅若。“欢迎来到美好的旧日时光。”她说。

她是希瑟之前的主管。是她说希瑟“你疯了”，竟然肯过这样的日子，去当一个浑身泥巴的农夫的妻子。现在她要来这里看看她的看法是否正确。

梅若很幽默，很有自信，偶尔有点傲慢专横，是个百分百的纽约客。她从小住在皇后区的一栋鸟瞰中央公园大道（Grand Central Parkway）的房子里。她和大卫都是斗志旺盛的律师，心里都有远大的理想，对于公益方面的工作都很热诚。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直住在布鲁克林。这让我想到，我们可能惹上了大麻烦。他们要来这里待上八天，难道他们期望我们提供什么娱乐节目？我们必须把食物装罐。他们这几天也许在度假，但是我们可没有放假。

第二天早晨，梅若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一面把咖啡倒进杯子里，一面说：“我们不会变成你们的负担。”他们家的人言行一致，他们的行动清楚地显示，他们是来干活的。他们没有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是立刻进菜园去拔除杂草，摘出一篮篮的青豆。他们坚持要孩子加入，并且用21世纪不可或缺的一个好东西——虫子软糖（gummy worms）——作为奖赏，来激励孩子干活。

但是有时候，连虫子软糖也被摆到一边，有一次伊里亚斯从两排农作物之间抬起头来，手里拿着一颗青豆说：“喂，这些东西生吃比煮熟的好吃多了！”

他们埋头干活儿，不怕犯错，而他们有时候的确会弄错。他们拔掉的草当中，有一半是农作物，此外，他们还将一把斧头的把手摔裂了。不过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甚至共享一把夜壶。

事情是这样的。浣熊的攻击行动开始了。一晚接着一晚，一排接着一排，它们几乎毁掉了比尔·罗伯森所种的甜玉米抽出的每一枝新穗。我们的玉米成熟了以后，浣熊们便转移目标，来到我们这里。每天早晨我都发现有些茎秆倒下，玉米穗被撕开，玉米粒被啃过。我一整个夏天都在盼望种出甜玉米，我该怎么做，才能阻止这种夜晚发动的突袭呢？到今天我还是不明

白，它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玉米到什么时候算是成熟了？

当然是靠嗅觉。

当一只鹿差点毁了我们种的那些刚长出来的苹果树时，一个邻居说，草原狼的尿能赶走鹿。如果你认识任何一只草原狼就好了。于是我开始想，不知道人类的尿是否能驱走这些吃玉米的小偷？

大卫和梅若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玉米田四周到处撒尿，白天至少尿四次；每天早晨还把夜壶里的尿倒在这块地的四个角落上。如今菜园闻起来跟纽约谢亚棒球场（Shea Stadium）的男厕一样臭，但是这个策略似乎效果不错。我们收获的甜玉米不但够吃，还能送些给罗伯森家享用。（佩姬用平日的诚挚口气说：“你是尿在茎秆上，还是尿在茎秆旁边？”）这件事对我的行为产生了增强作用。纽约市律师的尿真了不起，成分真丰富！

我们的这几位来自布鲁克林的朋友，在许多方面对我们产生了强化作用。他们激励了我和希瑟，让我们得到我们需要的鼓励，如此我们就能撑过夏季最后一段的辛苦时光。我们这座小农场就像一座工厂，他们帮助我们达到产品的额度——采收、洗干净、去皮、去壳；劈柴、打水；挤山羊奶、驾驶手动式割草机割草，还有洗衣服。大卫和梅若每件事都至少做过一次。他们泡冷水澡，使用户外厕所，两人没有发出一句怨言。

我们的朋友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吃了一顿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晚餐。每个人都泡过澡，穿上干净衣服，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昂。我们在野餐桌上铺了一张棉质格子桌布，在桌子的四角摆了几个盘子和两瓶红酒来压住桌布，免得被阵阵微风掀起来。晚餐是大卫和梅若做的——米饭、胡萝卜、蒸青豆（孩子们吃生的），还有从多元农场买来的一整只鸡，在木柴炉里烤熟了。这样丰盛的飨宴精彩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更重要的是，这些食物跟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辛勤工作联结在一起。

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不在用餐前做谢饭祷告。我甚至觉得，我再也不会认识那个我开口祈求的对象。然而在这样的一顿大餐面前，经历了这样一个夏天之后，一个人不可能不心怀感激。卷发的莉莉用甜脆的娃娃音唱出希

伯来语的感谢歌，伊里亚斯与她相和，他非常专心，不想唱错歌词。这首歌的谦卑之美让我感到震撼。“我们感谢上帝，”大卫翻译给我们听，“为了光，为了食物，还有为了酒。”

“阿门。”我举起酒杯，声音因为激动而哽咽，我喝下一大口红酒，心里想，我们向谁祈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了什么而祈求。

孩子们终于睡了，我们借着油灯的光洗碗。我们这几个大人来到前门的露台，这个星期当中，这件事已经成为一种晚间的仪式——在黑暗中啜饮苏格兰威士忌和井水。希瑟和我坐在摇椅上，梅若和大卫坐在露台秋千上。我们说说笑笑，不时停下来，倾听河两边的鸣角鸮互相呼唤的声音。

“你知道吗，”梅若说，“当我告诉我那些朋友说，我们今年夏天准备到这里来度假，他们说，‘干吗要去？’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现在我知道了。”

“守护天使”

四季当中，我一直最喜欢秋天。不过在城市里，秋天细腻的魅力往往被水泥和钢铁建筑掩盖了。城市里的夏天仿佛总是一下子就直接进入冬天。如今我们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白天都在户外活动，我们逐渐习惯了去观察季节变换的讯息：夕阳照射的角度变了，风的味道不一样了，老鼠来回奔跑。一天早晨，我在挤牛奶的时候抬头往上看，发现燕子不见了。天空没有燕子在绕圈子，或是俯冲下来；没有燕子以八字形路线飞舞，没有燕子栖息在电线上，或是在谷仓里叽叽喳喳聊天。我会想念有它们做伴的时光。

在季节的带领之下，我们也在作一些转变。我们决定把扁豆拔起来，让秋天的菠菜、甜菜和萝卜有更多生长的空间。刚开始拔的时候，我们感觉有点难以下手。我们先前将扁豆的种子埋进土里，现在它们茎秆粗壮，叶片油绿，钱币大小的豆荚在枝头慢慢变得干燥，成为冬季的存粮。我凑近了看，看到虫子啃出来的小洞和刮痕，叶片被吃个精光，这是虫子求生存的迹象，

然而我也看到嫩芽和新生的细小豆荚。它们还在生育后代！我用力一拔，惊讶地发现，这些植物是多么顺从地被拉出来，拔起时，它们的须根发出清脆的啪嗒一声。它们尽了自己的职责。它们光荣地死去，不像杂草那样，紧抓住土壤不放。

有一天，我们的马蹄铁匠来了，他每隔几个月就会来我们家修剪贝儿的蹄子。他说：“我听说今年将会会有一个‘老式的’冬季。”

“你是指什么？”我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咯咯地笑，“不过听起来这个冬天会很冷。”他跟许多老人家一样，会从毛毛虫身上观察到当年冬季是否寒冷。毛毛虫的毛越黑，这年冬天的气温就越低。或者他会观察黄蜂窝的位置：黄蜂把窝筑在越高的枝头，或是谷仓屋檐上越高的地方，这一年的降雪量就越大。

不久以前，我还会对这种预言轻蔑以对，但是现在我不那么有把握了。我学会了敬重这种乡野的智慧，它们是由贴着土地生活的人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克莱德·提尔曼深深地了解马儿的习性，就像鸟儿深深地了解风。他帮助我改变了我的看法。以前我确信有很多事绝对是那样，然而现在我不那么确定了。例如，现在我相信，我们的确有一个“守护天使”。九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这位“天使”的小小白色旅行车停下来。伊许塔从车里出来。

“这是你们的羊奶钱，亲爱的。”伊许塔说，她把一个小牛皮纸信封交给希瑟，把装羊奶的空玻璃瓶交给我。“还有一个东西，是给你们俩的。”几罐1829年生产的啤酒，在一个褐色纸袋里互相撞击，发出叮叮的声音。

然而还有更多的好东西。一样样从她的篮子里冒出来，好像小丑从金龟车里跳出来：一盒葡萄干，给鲁德的；一罐自制的蛋黄酱（“我没有拿很多来，因为不能存放太久。”）；一些香蕉（“吃这个可以预防坏血病。”）；一个拳头大小的裸麦面包，用蜡纸包好，再用绳子系住；一小块正方的水果蛋糕（“我有个住在马里兰州的朋友用她家的家传食谱做的，这个可以摆一段时间。”）；一个金属大碗，里头放着一块切好的樱桃派（“我们吃不完这个。”）；还有一条粉红色的小毯子（“送给你们。如果鲁德觉得冷，你们可以用这个包住他。”）。希瑟把伊许塔的玻璃瓶装满羊

奶，又给她一个有金属盖的玻璃罐，里头装了山羊奶做的里科塔奶酪，还有一些刚烤出来的燕麦饼干。

令我产生这种想法，让我觉得内心的怀疑得到证实，真心相信伊许塔的身上带着魔法的原因，不只是她的慷慨给予，还有她那天使般的纯真面容、恒久存在的欢愉、眼睛里的光芒，以及她那奇特的名字。最令人惊慌失措的是，她有一种在离奇的时机突然出现的本领。不久前，鲁德突然说他想吃香蕉，在此之前，鲁德从未说过他想要什么。五分钟后，伊许塔开车把香蕉送来。我们的马蹄铁匠第一次来我家修蹄时曾说，我应该让贝儿的蹄子清干净。“用什么清呢？”我问。“用清理马蹄的蹄钩。”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蹄钩”这玩意儿。第二天，不知情的伊许塔来拿羊奶。她把她父亲的黄铜蹄钩带来了，这是她的传家宝。“我想你们可能用得到这个。”她说。她的眼里闪烁着光芒。

此刻伊许塔转过身，准备离去。希瑟抱着满怀的礼物：“你要进屋来喝点茶吗？”

“哦，我得走了，亲爱的。”她沿着石子路往下坡走，走向她的车。她停下来，头倾向一边，大声说：“你们看！”她用手指着天空，天上布满云朵，宛如无数朝着天堂耸立的纪念碑。一排低云闪耀着橘色的光。在相反的方向，一条管状的云朵发着青玉的冷光，从天空的这头延伸到那头，宛如海面的一排波浪。

伊许塔的脸焕发光芒。“看那个！”她用女学生的欢乐口气说，“还有那个！”我们沉默地站在那里，欣赏了几分钟，凝视各种色彩逐渐加深。

伊许塔叹了口气，然后说：“我好喜欢云。”

第二天早晨，云朵消失了。天空是灿烂的蓝，空气沁凉。我走到大水桶旁边，舀出一桶水，看到一片干枯的枫叶旋转飞舞，落到水面。

秋天来了。

第七章 来自未来的消息



恐怖分子挟持了飞机

我坐在露台上，剥去玉米的外皮，鲁德在我脚边，拉扯剥下的外皮，把丝丝缕缕的玉米穗扔到剥好的玉米堆里。希瑟在厨房里煮汤，想要在冰封的严寒时期来临前，先把我们的豆子、南瓜、西红柿和秋葵吃完。冬天可能在任何一天来临。空气变得更加凉爽，更加清澈，这个信息让我们心中的紧迫感越来越强。尽管第一次降霜的平均日期是一个大约的指标，我们仍然无法确知，严重的霜冻会在哪一天来袭。

车道那边传来引擎的吼声，一辆吉普车停下来。这是卫斯理和克莉斯托·特拉克赛尔夫妇的车，他们住在琴妮家旁边。他们走过来，脸上的表情看来沉重而严肃。

“你们听说了吗？”卫斯理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老天，他们的儿子雅各布出事了。

“听说了什么？”希瑟说，她站在厨房门口，用擦碗的干布擦干双手。

“电视台全都在报这个。”克莉斯托说，“恐怖分子挟持飞机撞上了世

贸大楼^[1]。”

“老天，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卫斯理打断她，话语从他口中涌出，“他们撞了五角大厦。有一架飞机在匹兹堡摔了。汽车炸弹也爆炸了。这真是一个重大的时刻。”

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三辆汽车开进我家车道，我们跟特拉克赛尔夫妇、琴妮和佩姬抱在一起，试着去了解这些只有在噩梦里才可能发生的事。佩姬的脸上一直保持着“我绝对不哭”的坚忍笑容，嘴唇紧绷着，不允许它颤抖。鲁德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跑到她面前——“佩姬！”——她勉强地笑了笑。这件事将会对鲁德的一生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在双子星大楼进行伤员分类。”佩姬说，“本·拉登说不是他干的。有一个巴勒斯坦团体说是他们干的。”

“老天，这件事让我愤怒极了。”卫斯理说，他是个蓄胡的高大男人，年龄与我相仿。他的职业是焊接工人，不过他也猎捕鹿和熊，还养了一群猎犬。在寂静的夜晚，我们不时听到狗吠。“我从来没有想要杀死一个人的欲望，”卫斯理用浑厚的拉长口音说，“但是我可以我的这双手勒死干出这件事的人。”他举起双手，握紧拳头，手臂左右摇晃。“我要把他们的眼珠子挖出来。”

然后，他睁大了眼睛。“你以前也住在纽约，”他说，“我敢打赌你在那里认识很多人。”

很多人，我想。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大卫和梅若，他们的工作地点距离世贸大楼都只有几条街。

“我敢打赌这件事会让你想要看电视。”卫斯理说。

对。然而也不对。天杀的，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件事太怪异了，太突然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打电话给一些人。”我对希瑟说。

她还没来得及答话，卫斯理就说话了。“过来用我家的电话，”他说，“你们不会真的只关心你们这个微不足道的计划而不愿打电话吧，对不

[1] 指“9·11”恐怖攻击事件。

对？”他用激将法挑战我。“打个电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们想要的时候，你们随时可以回到那个生活去。”

一整天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想，卫斯理的想法是不是对的。也许看电视新闻和使用电话真的没那么要紧。就像他所说的，在如此重大事件的阴影笼罩下，我们的计划突然显得“微不足道”。难道我们对自己的亲友没有责任？难道我们不该像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把全部心思都转到这件事情上？在一个需要人民关心的时期，我们是否转过身去，拒绝拥抱自己所属的时代？

就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转过身去了，我们感受到的无力感，会不会因此而更加强烈？如果我们留在纽约，此刻我可能会去做义工，帮忙搬运救难物资，或者捐血。在这里，我们只能想象，这个乡村地区的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只能把日子继续过下去。我们确实这么做了。

我们每天做着跟以前一样的事，心里觉得很空虚，有种怪异的感觉。农庄的宁静似乎蕴藏着一种反讽的意味。纽约怎么会突然间天旋地转，遭到死亡和狂暴毁灭的侵袭？然而在这里，一切都是纯真无邪、稳定而平静——小鸡在窝里吱吱叫，我提着装满奶水的桶子走过小径，猫一路跟在我后面等着喝羊奶，鲁德拿着铁铲戳到泥土里玩。

我们在晚上试着提笔写信，但是写出来的字句平板乏味，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不写信，而是走到寒冷的屋侧露台上，面对面坐下来，一面啜饮波本酒，一面大声读出《傲慢与偏见》里的段落给对方听。

伊许塔在9月13号的早晨来访，带来玫瑰花和四颗大而有斑点的火鸡蛋，这个新奇的东西暂时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在露台上，把豆荚里的豆子剥出来，将玉米的皮剥掉。这时，黛博驾着一辆白色运货小卡车抵达我们家，她是位开过音乐会的长笛家，也曾以养猪为生。十年前她从艾奥瓦州搬到这里定居，之后以养马为生。她在餐桌上留下一叠报纸。报纸上那些令人吃惊的、色彩鲜艳的图像盯着我们：曼哈顿高楼之间的狭窄街道起火燃烧，布满灰烬，地铁的墙上贴了许多失踪者的照片。几万张寻人启事。我们让她和伊许塔带些鸡蛋、羊奶和青豆回去。交换这些简朴的礼物让我们心情稍霁。

我们没有打电话给亲友，也没有看电视，我们只是固守单调的日常工作，留心信箱里是否有信。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我不确定这种心情是听天由命，还是仰赖信仰，但是某种东西帮助我忍耐下去。我撑下来了，没有科技产品的帮助，没有怀着一种错觉，以为每分每秒跟上新闻，或是跟人用电话联系，就能掌控自己的环境。我向来不是个有耐心的人，然而我个性里的某个部分已经改变了。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由于我的生活里不再有21世纪的设施让我分心，我变得平静下来；同时，大自然的强大力量，让我产生谦卑之心。就像天气的变化、恐怖分子的这些攻击行动，远超出我的掌控范围。我所能做的只是紧紧把握住每天的例行工作所带来的单纯确定感。

就拿为炉子生火这件事来说吧。一天早晨，我把炉子里的灰烬铲到一旁，放入散发甜香的樱桃木，这时，一阵奇特的欢乐感淹没了我。我凝视窗外的山峦、谷仓。小鸡在它们的鸡舍里，用爪子搔刮坑坑疤疤的地面，我凝视这座完成了使命的菜园，觉得世界末日的天气仿佛已经来临。就技术面而言，我们被推向某个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而此刻我们在这里，把种子播到泥土里去，用木柴烹煮食物，提着水桶来来去去。

这件事会带来什么结果？有人谈到经济发展艰难、核武器恐怖主义，还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展开这项计划时，股市已经开始走下坡，纳斯达克指数跌了几千点，而今这股所谓的邪恶势力也对美国发动攻击，打倒了象征美国强大经济力量的双子星大楼。就最令人难过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计划头一次让人觉得是务实的。伊许塔是怎么描述它的？合情合理？是否有一天我们真的会需要靠着这些技能，才可以存活下去？我想到以琳农场那个阴森森的地下防空洞，不禁打了个寒战。

尽管我们的目标有一度跟以琳农场的这群人有些类似，我们却是在很久以前就走上跟他们不同的路。当他们在地窖里蹲下来，做好一切准备，等着应付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心中似乎有一种阴暗的动力驱使他们这么做。我们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寻找重生。那幅令我恐惧的未来景象在我心中慢慢消退，留下的是果断与坚决的意志。我们当然是有所作为。这些攻击行动让世界各地的人重新评估自己生命中的优先级，许多人把家庭、朋友、信仰和

善行放在粗糙拙劣的物质主义前面。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想达成这个目标，尽管在某些人眼中，这件事不过是一场游戏。我头一次了解，希瑟的祖母克利丝汀每年为何要做那么多的罐装食物，要把几百罐食物储存在床铺下和衣柜里——她所住的农庄没有地窖。然后，她把大部分的罐装食物送给别人。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永远不会知道，”她解释道，“明天也许就会发生另一次的经济大萧条。”当时我有礼貌地点点头，心里却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疯狂。至今我仍然不认为，她的这道小小防洪堤能够挡得住经济大萧条的巨浪。但是她尽了全力，让自己觉得安全一些——磨炼自己在困境中的能力，把心思放在基本的生活要务上，同时帮助其他人。希瑟叫她“嬷嬷”，她可能有84岁了。她可以住在镇上占地十亩大的房子里，迁出她的农庄。在这样的农庄里，如果经济衰退，一个有农业技能的人仍然有机会存活下去。然而她坚持在农庄里过着独立的生活，借着独立的生活，她试图理解这个世界，一个日益疯狂的世界。

“挡泥板”被困

我们不是唯一一种在为冬天储备东西的生物。大老鼠在谷仓里走动，在挤奶台的谷物木箱里留下点点粪便。我在晚上去挤奶时，它们便拖着脚走开。小老鼠在我们刚长成的果树树干上拦腰啃掉一圈树皮，于是有一天，我花了一早上的时间，用我在谷仓里找到的铁丝网，把这些果树的树干包起来。在制作保护网的过程中，铁丝网刺破我的手掌。小老鼠也在吃我们地窖里的苹果、奶酪，还有大卫和梅若夏天来的时候留下的一条香肠。我甚至在晚餐餐盘上发现小脚印，原来它们用瓷盘子来磨牙。

有一天，我小心翼翼地把放着奶酪饵的老鼠笼放到谷仓的屋椽上——我很仔细，不让这块结实的、装了弹簧的奶酪有半点损伤——这时，我听到库房后面传来一声猫叫。我从篱笆上面看过去，看到挡泥板爬到约六米高的树上。“出了什么事，女孩？下不来吗？”我觉得惊讶：挡泥板的攀爬技巧差

劲极了。她有两次被卡在露台的屋顶上，我不得不从鲁德房间的窗子爬上去救她。

第二天，我又听到挡泥板在哀叫，于是我明白，她真的下不来了。我跳过篱笆，从泥土松软的河岸小心地滑向下方12米的地方，这棵树立在河边的浅水里。要小心，我想。然后我叫道：“在这里，咪咪。下来这里，挡泥板。”嗡嗡嗡！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东西，从高处朝着我俯冲下来。我蹲伏下来。嗡嗡嗡！又来了一个。我抓住一根嫩枝。然后我看到了它们——红黄相间的大黄蜂，每一只都有我的大拇指那么大，它们从一个树洞里蜂拥而出。我伏下身子，猛力拍打，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坡。我的左脚滑了一下，左边的膝盖跪到地上，然后我站起来，用力拍打蜜蜂，并且笨拙地用手撑住篱笆，跳了过去。我朝着谷仓奔去。当我停下来时——不断喘气，慌乱狼狈，还好没有被叮到——它们不见了。

次日，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一面因为灰尘而打喷嚏，一面在谷仓里的一叠壁板当中翻找最合适的板子。这些板子是用白杨木的树干切割而成，质地很轻，每块板子至少有六米长。我把一些长钉打进其中一块板子的末端，借着跷跷板的原理，把板子从篱笆上方送过去，一路推送到河边。然后我也爬到河边，我的动作很快，免得惊扰到大黄蜂。我举起板子，直到它靠在这棵树最低的枝丫上，并用钉子将木板固定在树干上。我把木板的另一头放在河边的地上。

“来这里，挡泥板，这里有一条很好的坡道。现在下来吧。”我用甜腻的声音说。第一只大黄蜂钻进我的头发里。“走开！走开！”我说，用痉挛的手拍打乱糟糟的头发。我把一些猫饲料放进一个空罐子里。除了我的声音之外，这棵树的树洞里还传来活力充沛的嗡嗡声。“走到这块板子上。该死！”我说，我的臀部不停摆动，空出来的那只手努力挥舞。她动也不动。

又过了一天，希瑟把我们的一只小猫斑鸠琴带上山坡，将它摆在篱笆上。“把挡泥板带过来！”她说，这只年轻的虎斑猫沿着树干往上爬，来到挡泥板被困的树枝上。它就像在做示范一样，慢慢地往下方退过去。“你看，挡泥板，一点也不难。”希瑟说。斑鸠琴又做了一次，往上爬，再往下

倒退回去，但是过了不久，许多大黄蜂出现了。挡泥板在树枝上慢慢往前走，发出悲惨的叫声，然后盘蜷身体，躺在树枝连接树干的凹处。

在树上待了六天以后，挡泥板身上的皮松垮垮地垂在骨架上。她的眼神急躁易怒，眼球四周泛出黑色。她只是坐在原地，像一只缩在壳里的乌龟。

据说大黄蜂到了晚上会睡觉，所以，在第七天的午夜来临前，我展开了拯救挡泥板的行动。在我记得的最近一段时间当中，这天晚上是光线最暗的一晚。我提了一盏油灯作为武器，又从地窖里取出我们仅有的几罐鲑鱼中的一罐。我辛苦地走到篱笆旁边，然后安全地爬下这段土质松软的陡坡，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大黄蜂在飞翔，而是河边树叶摆动的声音。我的想象力开始发挥，迅速地联想到一条生物链，从负子鼠、臭鼬到浣熊。卫斯理·特拉克赛尔（Wesley Truxell）曾经在这片山区看到过熊，而熊很喜欢鲑鱼。我提起油灯，斜斜地看着这块约一米长的光晕所照之处。我在河边，一面努力让身体保持平衡，一面想象究竟是什么东西蹲伏在那里，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无法甩开有一头熊在附近的想法：咧开嘴的痴呆笑容，利齿映入眼帘，腐烂的恶臭口气，还有——“砰”的一下，重重打下来——这头野兽用爪子攫取一顿鱼肉大餐，一拳把我推下悬崖，使我摔在底下的岩石上。

嘎吱一声。又是嘎吱一声。

“啊——！”我喊道。我的脚滑了一下，手臂——提着油灯的那只手——猛地往外伸，想抓住东西来稳住自己。我丢下油灯。它“砰”的一声落在石头上，熄灭了。四周的黑暗吞没了我。

“哦，老天！”我尖叫一声，手脚并用地向山坡上爬去。这项拯救行动失败了。

隔天，我没有看到熊现身的迹象。没有任何东西出现的迹象。

希瑟觉得是一只负子鼠。

“我根本不喜欢那只猫。”我对希瑟说。挡泥板会欺负那些小猫。她的个性冷淡，被宠坏了。她会趁着你不在场的时候，从装着洗净衣物的篮子里捞出一个枕头套，或是一件你从里面拿出来、特别放在旁边的衬衫，然后，

她就舒服地躺卧上去，宛如一位被放逐到海外的公主。皮克和斑鸠琴的个性活泼友善，爱玩，爱逗趣，挡泥板跟它们不一样，她的性情乖戾，它们一靠近羊奶盘，她就发出嘘声，赶它们走开。“我知道她讨厌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她总该下来了吧。”

“也许这是某种绝食抗议，”希瑟说，“也许她也怕那些大黄蜂。我只知道，我们不能让她就这么死去。”

“我知道，”我说，“只要走到谷仓附近，就会听到那凄惨的哭声。”

到了第八天，一辆绿色的休旅车开进我们家的车道。是威尔·摩尔，他住在镇上。他送来200多千克的苹果，他称它们为“19世纪的苹果”。这些苹果是在一座废弃的果园里摘的。这座果园位于弗吉尼亚州西南部他家的一片土地上。苹果装在纸箱里，个头小，而且变形了——在人类对它们进行基因改造后，它们显得不完美。下星期他和他的家人要回到那座果园，用我父亲给我的一部19世纪生产的、做苹果酒的榨汁机，来制作苹果酒。七月的时候，威尔曾带来三个用大锅子制成的冰块，连锅子一起送过来，看看我们能否保存下来。我们把冰块装在一个填了木屑的木箱里，放在地下室保存。结果到了第三天，剩下的冰还足够泡一大壶冰茶。

威尔的年纪与我相仿，我们买下特林柏磨坊后，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他。威尔是个客机飞行员，有两名子女。他有一度几乎抛下一切，打算跟妻子凯西一起搬到阿拉斯加去。最后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在西雅图定居。如今他们回到威尔的家乡，在后院养鸡，体会农场生活的滋味。

“希瑟跟我提到的那只猫在哪里？”威尔说，他的个子很高，头发硬而直，穿着浆过的白色网球装。他要去参加网球比赛，球赛半小时内就要开始。“我大概不能做什么。我只是想看看她，可怜的东西。”

我们往谷仓走去，一路上，我把这件事的经过简短地叙述了一下。

“所以，你知道，”我说，我们走向篱笆，“那棵树就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威尔就闪电般地跳过篱笆，就像网球场上的冠军跃过球网。“小心大黄蜂。”我说，但是他没有在听。他冲下河堤，全部的心思都放在那棵树上。

“喂，这棵树可以爬上去。”他说，他伸手攀住低枝，把脚靠在树干上，迅速地往上爬，完全没有注意我在底下，徒劳地张大嘴看着他。“来这里，咪咪，可爱的咪咪。”威尔说，一面偷偷看着挡泥板，她已经跳到这棵树最高的一根树枝上。也许是因为他正好位于蜂窝的上方，也许是因为他身上穿着温布顿网球赛选手穿的炫目的白色网球装，大黄蜂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又往前爬了三米。再爬了一点五米。挡泥板发出惨叫。太简单了。他一把抓住她！他用一条臂膀圈住猫，借着另一条臂膀爬下去，但是挡泥板蠕动着爬到他肩膀上，爪子抠进衣服，威尔缩起身子。

我站在树下，大黄蜂们已经开始在我们身边嗡嗡地飞舞。威尔悄悄地把这只骨瘦如柴的猫交给我，自己从树枝上跳下来。直到我们回到屋里，我才放她下来，希瑟看着挡泥板，再看看威尔的白衣服，现在它沾满了泥土和树皮碎屑。“你做到了！”她说。他的手臂和脖子上都是猫抓的血痕。挡泥板已经瘦到皮包骨，她的眼眶深陷，从来没有看过她这样萎靡不振。

威尔对我们的盛赞感到不好意思，他朝着车道走去。“我该走了，”他说，“要不然球就打不成了。”他开车离去时，我想到18世纪英国知名海军将领纳尔逊勋爵（Lord Nelson）的名言：“不用在意谋略，直接朝着他们冲过去就成。”

鲁德决心要大便

“9·11”恐怖攻击发生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日常生活里必须做的事情让我们不至于一直想着这个悲剧。我们收到信，获悉我的兄弟和他的妻子，还有大卫和梅若都平安无事。就像美国的其他地方，我们这个山谷里的小小的角落，为了这件事感到悲痛。邻居们偶尔会送来报纸，提供这件事的后续发展。来自纽约的其他邮件陆续寄到。无论何时，只要看到来信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我们就慢慢撕开，完全不敢预料信上写着什么样的消息。我们读着朋友写来的信，信上详细描述悲惨的细节，死尸烧焦的恶臭，

如雪片般落下的、含有油脂的灰烬。我们读到朋友的朋友不幸丧生。“如今我仍会在清晨惊醒，打开收音机，觉得会有报道指出，有个人炸毁了林肯隧道。”梅若写道，“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将笼罩在恐惧的乌云下成长，我感到非常悲伤。”她的儿子伊里亚斯觉得很困惑，经常哭泣。他的学校在斯洛普公园区（Park Slope），他的班上有三个同学的父亲在这个事件中丧生。

鲁德年纪太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们都觉得他还不懂，我们反而觉得轻松。我们已经有忙不完的事，要让他既能融入我们的1900年版本，又能克服一般两岁小孩的成长挑战，例如训练他不需要大人喂他吃东西，还有自己使用茅坑。一天晚上，鲁德哭着醒来。“外头的厕所。”他说，但是外面一片漆黑，而我此刻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穿上外衣，套上我那双恶臭的靴子，点起油灯，一路走到厕所那边。那里有臭鼬趁黑四处走动，舔食猫碗里剩下的羊奶。“夜壶在这里，”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大大。”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外头的厕所大大！”他反抗地说。

“不，鲁德，”我说，“我们夜里用夜壶上厕所。”我的睡意甚浓，这时我想不到要用前后一致的态度来教小孩，也顾不到要公正地对待孩子，我只想爬回床上去。夜壶就在这里。这跟到外头上厕所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鲁德今年两岁。许多专家花了一辈子来研究两岁小孩，试图揭开两岁小孩脑子里的秘密。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提出理论。无论这个年纪的小孩脑子究竟在转些什么样的念头，现在的他决心要大便，而且要去户外厕所上大号。我实在没法责怪他，因为是我们教他去那里上厕所的。所以，听到我拒绝他以后，他就大哭大叫，赖在地板上拳打脚踢，用头去撞松木地板。

夜里的如厕争执是很辛苦，虽然鲁德在没有幼童塑胶便盆作为训练工具的情况下，很顺利地过渡到不用尿布的阶段，然而我们还是经历了一些无可避免的意外事件。有一次，就在我全神贯注地处理小鸡的事情时，鲁德在鸡舍旁的草丛里蹲了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理解到他在干什么，他已经开心地玩

起自己的大便来。还有一次，他在清洗室的地上拉出一条大便，然后，这个完全不经大人协助、由他独立制造出来的产物，让他看得目眩神迷。

就像许多两岁大的孩子一样，他也很能从粗俗的行为里得到乐趣。一天晚上，我们跟麦可和维多莉亚·葛佛瑞夫妇一起吃晚餐，在油灯的温暖光线之下，我们谈了各种有意思的话题。这时，就在我们暂停说话的时候——大家在咀嚼食物——鲁德在他的木头高椅子上扑哧一声，放出一个响屁。我把这个声音的响亮程度比喻成电锯发出的声音，只是1900年的时候电锯尚未问世。

这件事让麦可想到，有一次他问一个印第安人朋友说，纳瓦霍族（navajo）的人在吃晚餐的时候万一放了响屁，这人接下来会怎么做。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麦可说下去，他说，这位朋友用纳瓦霍语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抑扬顿挫，包含了一连串柔和的元音和带着喉音的子音。

“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麦可？”希瑟问。

“它的意思是，我放屁了！”

希瑟的外婆

我们用一名卖私酒的男子的名字，将我们的孩子取名为“鲁德”。这人把私酿的威士忌卖给亚拉巴马州北部的煤矿矿工。他把这些酒藏在卡车上的一个秘密隔间里，隔间上方堆着许多鹤嘴锄作为掩护。这个传奇人物鲁德·荷姆斯（Luther Helms）生于19世纪末期，据说他有一次跟警方发生激战后安然逃逸。另一次他用枪击中一名警长的下巴。希瑟认识这个人，她是她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希瑟的外婆——要来我们家看看。她随时都会到。

伊迪丝·拉薇尔·荷姆斯·蕊德来了，她穿着一身黑——黑鞋、黑袜、黑长裤、黑色棱纹高领毛衣，戴着一副嵌有小粒假钻的黑框眼镜。她伸伸腿，舒展长途坐车的劳累。她意味深长地看看农庄，再看看谷仓。她已经85岁了，她的年纪大到足以回想起当年的户外厕所、木柴炉，以及没有电器的

生活。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她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不是渴望回到过去，就是在重新评估过去的生活。也许两者皆然。

希瑟从纱门后面走出来。“嗨，外婆。”

“嗯……”拉薇尔答道，她张开臂膀，拥抱希瑟。

希瑟的母亲吉妮说服了她的外婆，让老太太愿意陪她坐十一个小时的车过来——展开一趟带有浪漫情怀的旅程，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里，而她们或许宁可彻底忘怀这种方式。

拉薇尔听力不佳，然而她太固执，不愿意让任何人修理她那故障的助听器。结果是她总对着别人大声喊叫，别人也对着她大吼。她们俩来到我家的头三十分钟里，她和吉妮大声口角，为了她们从亚拉巴马过来的途中为何迷路而争执不下。

不久，拉薇尔的怀旧之旅就开始沿着她的记忆，朝着过往延伸而去。她最先注意到的几个东西当中，有一件就是我们的清洗室。“我们在屋子后面的露台上洗手。”她说，“洗完以后，就把水泼到栏杆外面。”她和她的姐妹们每星期必须用沙子把杉木条捆成的木桶刷一次。“这件事很辛苦。一点也不想再来一次。”我提着几个桶子去挤羊奶时，她也一起过来。她的眼光探索着谷仓里结了蛛网的木柴。“我爸爸养了三四头奶牛。”她还记得这件事，不过她现在完全没有为山羊挤奶的欲望。

她父亲，也就是声名狼藉的那位“鲁德”，有许多不同层面的生活，他是个私酒贩子，也是个农夫。希瑟还记得，他的身材挺拔，《圣经》不离手，还有一对闪亮的蓝眼睛（我们用他的名字为我们的儿子命名后，逐渐了解到他有许多不同的面向）。20世纪30年代，他带领驷队，将田纳西河谷管理局^[1]兴建大型水坝的预定地上的障碍物一一清除。该计划为美国南部带来

[1]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进行的计划中最著名且最成功的一项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规划了一些代理机构来帮助经济受创地区，其中一个机构就是成立于1933年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田纳西河谷常面临水灾、森林滥伐及水土流失问题。该局借由教导较佳的耕种方法、重新种植树木及兴建水坝来减少这些问题。这个机构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负责产生及贩卖过剩电力、创造就业机会及保存水力。

电力。当时南方的都市地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享有电力设备，然而只有百分之十的农村居民有电可用。

“有一年过圣诞节，爸爸对我们几个姐妹说，因为天气太坏，所以圣诞老人老公不能来。”那天吃晚餐时，拉薇尔说，鲁德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布满皱纹、被油灯照亮的脸上。“所以我就没有把我装礼物的长袜挂起来。到了圣诞节的早晨，我的姐妹们的长袜全都装满了好东西。我伤心死了。”拉薇尔顿了顿，喝了一小口水，“爹地要我穿上鞋。我去穿鞋的时候，发现鞋子里装了各种娃娃和礼物。这是我所碰到过的最美好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圣诞老人老公怎么会知道我的鞋子摆在哪里。”

鲁德迷惑地说：“拉薇尔‘奶奶’以前是小孩？”

“当然是，”她说，她朝着鲁德弯下身子，“而且我是个可恶的小孩。”她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脚：“抓到你了！”鲁德跳了起来，“奶奶”捧腹大笑。

尽管她很能享受住在这里的生活，“奶奶”仍然很重视她习惯的做法。她的习惯包括有电灯，到商店里买食物，还有看电视。她总是习惯性地寻找电灯开关，却总是找不到。一天晚上，希瑟哄鲁德睡觉时，发现拉薇尔跌跌撞撞地拿着蜡烛准备下楼。在黑暗中，通往户外厕所的那40级阶梯，看起来充满了危险。

现在我们有人照顾小孩了，希瑟和我打算驾马车出游。我从谷仓那边上了马车，马车后方的载货区有两把草叉互相撞击，嗒嗒作响，我在屋子的正前方让她上车。她握住我的手，坐上马车。我们的眼神相遇。我发誓，我真的觉得这就像19世纪的求爱场面。

“你知道，”希瑟靠过来，“自从去威尔逊家的派对以后，你就没有载我出来走走了。”现在没有鲁德坐在她身上，她看起来比较轻松，即使贝儿因为看到了这座桥，步子突然变得急促起来。如今我们把许多事都抛在身后——夏季的菜园，制作罐装食物。这个计划刚展开时的那段笨手笨脚的日子，忧虑和疲惫让我们的内心变得阴暗，各自蜷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9·11”事件不仅让我们的1900年计划的重要性变得明确，它也提醒了我

们，让我们醒悟到，我们是多么幸运，还能拥有彼此。

希瑟把头靠在我肩上，贝儿稳稳地踏着步子往前走。一群野雁排成人字形，飞过我们头顶的天空，它们的叫声彼此不协调，带着金属的质地，好像一首现代风格的管乐演奏曲。北山路两边的树木闪耀着秋天赭色、艳黄与火焰般的橘黄。

马车从比尔和佩姬家旁边走过，看到他们的房子，让我想到这对夫妇。这对邻居又让我联想到，我有件事要问希瑟。

“你记不记得梅若在这里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她谈到人们喜欢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给别人听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

她点点头。希瑟和梅若共事的时候，两人共同负责小额资本方面的司法改革计划，做得非常成功。她们的诀窍是训练一些专家，而这些人必须渴望分享自己的知识，愿意在不收费的情况下付出。梅若借着她们的经验，来说明我们对史威普居民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我们需要帮忙，梅若解释道，而邻居们拥有这些技能。种菜、养马、烹饪，你能想到的事，他们都擅长。

“她说得对，”希瑟说，“每个人都喜欢有人需要自己。”

“但是一定不只是这样。你想想看，他们来了这么多次！带来这么多礼物！我知道他们不是为了得到山羊奶而这么做的。”除了这么多南瓜面包，这些人到自己家的地窖里翻箱倒柜地寻找，把久已为人忘怀的老东西拿来送给我们——一些核桃饼干，两个洗衣盆，甚至有一套完整的1990年一整年的《国家地理杂志》。我们必定在他们心中引发了某种骚动。

“这跟公平交换没有关系，”希瑟说，“可惜那次你不在场，伊许塔听到有人把史威普这里的做法称为‘以物易物’时，她简直气疯了。对她来说，计算给人什么和收到了什么，会彻底毁掉与人分享的那份喜悦。”

“对，有道理，”我说，“但是作为承受如此盛情的对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让我觉得，我的处境好像很匮乏。”我想到我对自给自足的看法是如何的偏差，不禁为之失笑。

“他们想参与我们所做的事，成为这件事的一部分，”希瑟补充说，“我们变成了这个社区的核心。你也看到了，‘9·11’事件发生后，有多

少人到我们家来。之后他们继续来看我们。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非常简朴，这一点提醒了他们，让他们察觉到生活里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来到目的地，也就是葛佛瑞家尽头的一座谷仓，这座谷仓孤单地矗立在草地上。我跳下马车，把谷仓的门推到一旁。干草棚里堆满了一捆捆的稻草，我们需要用稻草铺在菜园里准备过冬。有几十捆干草的细绳已经被老鼠咬断，地上散落着脱落的稻草。麦可说，我们可以把松掉的稻草统统拿走。互利的行动，我心想，而且有睦邻的功效。我们用草又把稻草运到马车后面的载货区里。不久，我们的稻草就堆成一座高塔，从坐凳下方开始，堆成一座小山，两侧还撒出了一点稻草。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一只秃鹰，这片山谷里很少出现秃鹰。我们停下来，看着这只大鸟停在树上，然后飞起来，越过山丘，消失无踪。

“往前走，”我对贝儿说，一面用舌头发出一声，“咱们回家去。”在我的心中，我试着把这个字再说一遍，“家”。我头一次感觉到，这个字似乎很贴切。

“家”这个字也在“奶奶”心中回荡。拉薇尔来到这里已经两天了，但她对四周的环境仍然不太了解。她的听觉、视觉和行动能力都在退化，生活越来越依赖现代科技。我们早该想到这一点的。一天晚上，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明显。吉妮带她去外头上厕所时，拉薇尔脚绊了一下，摔了一跤。“你在干什么！”她不满地说，“你怎么会带一个85岁的老太太来这种地方？”听到她平安无事——没有摔断骨头——我们都松了口气，但是她自己被这一跤吓到了。事实上，我们全都被吓了一跳。

第二天早晨，在吃早餐的时候，吉妮宣布了一件事。“我们要提早走，”她说，“妈妈必须回去了。”

吉妮努力地用欢乐的口气问她妈妈：“回去的路上，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蒙蒂塞洛停一下？”

拉薇尔从餐桌对面看过来，望着希瑟，她的嘴巴动起来，无声地说：“我一点也不想去蒙蒂塞罗。”

“嗯，”希瑟大声地说，“一开始你也不想来这里。但是我敢打赌，你

很高兴你来了。”

“我的确是想来的，”拉薇尔说，“我简直等不及要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晓得到这里来住会有些困难的地方。但是现在我离开家太远了。”

鲍伯和艾默斯

有一天，我去葛佛瑞家农场拜访的时候，马车的其中一个车轮裂开了。我把那辆耷拉着的马车留在那边，牵着贝儿，推着这个裂开的气轮回家去，我心里想着，我的马车生涯才刚开始，不知是否会就此结束。

第二天，我把自尊摆在一旁，将这个裂开的气轮吊在肩上，走路去克莱德·提尔曼家。我没有别的选择。对于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气轮裂开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修好它。在他养的那条狗的猛烈吠声中，我把气轮靠在旁边的树干上，走过去敲门。

这个老人打开门，我跟着他走进一间肮脏的厨房。艾伦坐在厨房旁边的客厅里，她的面前摆着一具助行器，一个塑胶托盘放在助行器顶端，以胶带固定，盘子里摆满揉皱的面纸团和药瓶。

“你的马在哪里？”提尔曼说，他对着我咧开嘴，露出恶意的笑容，他嘴里的义齿闪着光。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我用手指着窗外，“我的马车有个轮子‘爆胎’了。”

他往外瞧，看到那个裂开的气轮。这时，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们走到外面去检视它。

“你做了什么？轮子里嵌进了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在我家车道上，也曾经把气轮的轮辐弄断过。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候，谁都有可能碰到。你没法知道的。”

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克莱德·提尔曼是在安慰我吗？

“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他继续说，“我最近在代顿附近有事情做，帮人烧掉一片灌木林。我会顺道去‘柏克荷德’那边一下。”他说的是那个门诺派教徒开的马车用品店，“跟老板商量看看，修好那个车轮要多少钱。”

两周以后，在十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克莱德·提尔曼开着他的小卡车来到我们家的车道，坐在车里没下来。我从厨房的门出来，他将头伸出车窗外。“柏克荷德打电话来了。他已经把你那个车轮修好了。”他的义齿啪啪作响，显然这位老人家今天心情很好。

“他的动作真快。”我很高兴不久就可以重新驾着马车出去了，“你还在那边做事情吗？”

“没有了，不过我得去剪个头发。”他望着后视镜，努力地拢一拢头上的白色卷发，“现在我可以载你过去，我只要在半路上到理发店去一下就好。”

我没有说话。

“嗯，提尔曼先生。”我希望自己不要让他觉得无礼，或是不知好歹，“我们的这个不用汽车的计划，也包含不能搭便车在内。”

他摇摇头，咯咯地笑出来。“如果有人可以替你拿过来，那样也很好。”

“他说要多少钱？”

“他没有说。他只说车轮修好了，然后就挂掉了。柏克荷德不喜欢在长途电话里讲太久。”

比尔·罗伯森在代顿附近的一所大学教数学。两天后，他帮我把修好的车轮送过来，车轮换上全新的辐轴和轮圈，都是用光滑而没有上漆的岑木做的。全部的费用是136.5美元，大约是一个全新汽车轮胎的价钱。

过了不久，我骑脚踏车到克莱德·提尔曼家，送去一袋苹果。我到的时候，发现这位农夫在他家前院里训练他的那两匹马。他把它们的牵绳系在车道旁的柱子上，朝着我走过来。

“谢谢你帮忙修车轮的事。”我把这袋苹果交给他。

“那是什么？”提尔曼鼻子喷气，一面用手指着我那辆靠在树干上的脚踏车，它的把手、篮子和镀铬的轮胎防护盖看起来有点娘娘腔。“你的马呢？”

“在家里。”我说。

“在长肉。”他咕嘟着说。

他这两匹马可一点也不肥。它们的身形很高，身上的肌肉如波纹起伏，而且它们比贝儿还要粗壮——这件事是我无法想象的。它们喷着气，蹄子重重地踏在地上。铁链做的挽绳和马车前的双条横杠，把它们连接到他设计出来的、让马学习拉车运货的一件训练器上：这是一辆滑橇，底部有着工字形的钢杆作为滑行装置，上面装着一排有两个座位的绿色塑胶公交车椅，椅子底下是一块褪色的橡木板钉成的平台。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设计，我用欣赏的眼光看着它，就像一个汽车迷偷偷看着邻居的古董卡车。

“上来吧。”他说。

我坐到公交车椅上，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兴奋。提尔曼在我身边坐下。

“往前走。”他大叫一声。两匹马往左边踏步，滑橇随着它们的脚步在草地上旋转。它们吃力地往前走，马蹄铁踩进泥土里，溅起的土块如雨点般落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位置很低，低到我的头就在两匹马的“排气管”下方。其中一匹马开始大便的时候，这幅情景变得更可笑。潮湿的绿色粪便不断喷漏出来，扑哧扑哧地落到地上。

提尔曼用两条宽皮带作缰绳，让这两匹马按照他的意思走动。他弯着手臂，让缰绳紧靠他的身体。他那粗短的臂膀晒成古铜色，手臂上布满尘垢，看起来像一部机器，而不像肌肉与骨骼组合而成的血肉之躯。

有一会儿，我们俩都没有说话。只听到嗒嗒的马蹄声，铁链的当当声，双条铁杠发出的低沉金属声，钢制的滑行装置溜过草地的咝咝声，还有两匹马的口鼻穿透马嚼子，发出的含糊而潮湿的喘气声。几10个问题——关于马匹、器材、训练方法——从我心中涌出来，但我一句话也没说。要从克莱德·提尔曼这里得到信息，需要耐心和技巧。爱默生曾在文章中谈到梭罗时说：“他知道，向印第安人提出问题，就像盘问水獭或兔子一样。”面对提尔曼的时候，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它们叫什么名字？”我终于问了，但我觉得，我好像阿拉丁可以许三个愿望，却没有好好把握第一个愿望。

“‘鲍伯’。”他朝着左边那匹马点点下巴，“还有‘艾默斯’。”

又沉默了一分钟左右。

“艾默斯是从达顿附近的一个亚米希人那里得来的。”提尔曼主动说，“他不想要这匹公马了。他说，这匹马把他的膀子扯痛了太多次。”

这个理由听起来很奇怪，有点无关紧要，仿佛想卖一辆车的理由是雨刷的声音太吵。还有，提尔曼的臂膀看起来强健而稳定。

“你说艾默斯会扯痛他的手臂，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哇。”提尔曼说，他的声音几乎像在低语。他把缰绳的皮带交给我。我还来不及提出任何一个蠢问题，他就加上一句：“往前走。”于是我们的滑橇往上抬，向前方行去。不久，两匹马就开始以小跑步前进，它们仿佛觉醒过来，滑橇则是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

“你要让它们走，”提尔曼咕哝着说，“让它们干活儿。”

我用力拉扯皮带，两匹马慢下来，它们的头向后仰，脚下用力，溅起更多的草皮。我觉得我的两只手臂显得很笨拙——刚才向外伸的时候，手臂张得太开，现在又靠得太近——但是我不敢松开缰绳。一块块泥土直接打上我的脸，打进我的头发里。我的手臂上的二头肌和三头肌感到刺痛。不久，疼痛变得非常剧烈。这跟星期天驾着贝儿出游完全不一样。

跑完一圈以后，提尔曼一条腿的膝盖往下跪，开始协助我驾驭这两匹马，他小声地叫了一声“哇”，让两匹马停下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把缰绳交给他。我们坐在公交车椅上，两人都没有说话，这段尴尬的沉默可能持续了十分钟之久。然后，他让两匹马走回谷仓前，在另一辆滑橇旁边停下来。

这辆滑橇上面装的不是公交车椅，而是叠高的七个水泥块，重量共有一点八吨。这就是克莱德·提尔曼赖以谋生的事情——用负重马来举重。每年的夏天和秋天，他和艾伦都会带着他们的马去参加弗吉尼亚州和邻近数州举行的比赛，看看谁的马能拖着最重的水泥块走，把它们拉到七米高的地方。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这个嗜好时，对这项活动完全没兴趣。在泥土地上拖着水泥块往前走？多么无趣的事。但是在我过了四个月的1900年生活后，我

开始理解，用负重马拖着东西往前走，绝对不只是一种老式的拖运方式。这件事包含了人和动物之间的一种深厚关系，而这种关系正在迅速消失。拖拉机出现后，不再有工作留给这些四条腿的大力士做，然而过去在大片的土地上，它们曾为人类担任清理农地的工作。一个人也许喜爱他的拖拉机，但是他永远不会凝视它的眼睛，心中深信它有灵魂。这段期间，我逐渐了解我的负重马，如今我了解得比较深了，我觉得我跟提尔曼，跟这种古老的传统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联结，不管这种联结多么细微。

我们从巴士椅上下来。提尔曼用一只手拿着两条皮带，另一手伸出去，把铁环从滑橇上解下来。他对着鲍伯和艾默斯轻声说话，一面领着它们来到这座拉着两吨重水泥块的滑橇的前方。他松开手，让铁环落在滑橇上。这项换橇过程显得毫不费力。

“大多数人做这件事的时候都需要帮忙。”他说，这是我听到克莱德·提尔曼所讲过的话当中，最不谦虚的一句话。借着他那充满魔力的触摸——粗野的威吓，一个认识他的人说的，提尔曼创造出一种马戏团一般、违反常理的负重马，力大无比的巨兽却像小型宠物狗般平静温驯。

我向后退一步，很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让两匹马站一会儿。然后，没有虚张声势的准备动作，没有发出驾着马拖东西的人惯有的指令，“各就各位！准备好了！出发！”他只是对着两匹马小声地发出命令，“往前走。”

两匹马显然知道即将发生的事，它们猛力向前冲，力量之大，如果是拖着刚才的公交车座椅滑橇，这股冲力早就把我们拉得向后翻了。但是它们此刻拖的是压在软土上的两吨重物，两匹马用尽所有的力气踏着步子，四条腿狂暴地扭动，唾沫和尘土四溅，却无法往前迈进一寸。只有提尔曼动也不动，他蹲坐在滑橇的另一头，把帽缘轻轻往下压，挡开射过来的草皮。他的脸上深深印着一抹蒙娜丽莎般的微笑，除了漠然，这是他展现的少数几个表情之一。他驾着这部滑橇，脸上有一种极为古老、远比1900年还要古老的神情。事实上，他看起来是永恒的，宛如千万年前的一个刻在石壁上的人。

是谁

已经有两天了，狂风呼号着穿过我们这个山谷的小角落，如同一列鬼影列车，打断枫树的枝条，把铁皮屋顶吹得嗒嗒作响，以尖锐的哨音在屋子的缝隙里逡巡，吓坏了动物们。这风也让我们害怕，风声不停，我们也心烦意乱。我在厨房的时候，听到清洗室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我冲过去，发现地上满是碎玻璃。强风把玻璃窗吹破了。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提着油灯到后院的篱笆旁去刷牙。最近的天气虽然比较冷，我仍维持着这项夜间的仪式。月亮尚未升起，在黑暗中，空洞的风声和树枝的断裂声显得更加恐怖。油灯虽有玻璃罩，里面的火焰仍然闪烁不定。我迅速地刷好牙，担心脑袋会被断落的树枝击中。当我抬起眼光，我看到草地上有光。

三道光束并排挥动，好像搜救小组在寻找落难的人。一开始，我觉得他们是童军营地的人，但是从我们这片山坡是看不到营地的。不管是谁，这几个拿着手电筒的人是站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的？

我考虑是否要朝着他们走过去，但是风快把我的油灯吹熄了。我不想困在黑暗里进退不得。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安稳。每一种唧唧声与嘎吱声，每一次门扇的砰砰声，每一根树枝拍打房子的啪啪声，都让我觉得好像有陌生人进来了。童军营地已经很久没有活动了，我们没有看到那边有人在办活动。麦可·葛佛瑞有一次在午夜过后，在琴妮的土地上抓到几个青少年在狂饮啤酒，但是她的土地范围很广。相形之下，我们这座占地16公顷的农场就像一座宽敞的后院，很容易就能走过去查看。我以前也曾经是小镇的啤酒少年，我绝对不会把车停在距离人家的房子这么近的地方。同时，我也不会带着手电筒出去玩。

在这样的一个刮大风的夜晚，怎么会有人在我们家的草地上晃来晃去呢？

第八章 枪声响起



这，属于我们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在厨房里吹熄油灯，准备上床睡觉。这时，两辆卡车隆隆地开上我家车道。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座外缀满闪烁的黄色灯串，车身看起来好像一棵圣诞树。一名男子下车，朝我们走过来。

“好一阵子没有见面了！”他发出低沉的吼声，站在厨房门口，没有要进来的意思，也不让我关上门。“我们要在谷仓后面放狗出来。”

我举起火焰闪烁不定的油灯，想把他的脸看得更清楚一点。一张粗壮的脸，还有一头黏嗒嗒的及肩金发，大约三十岁，身上散发出啤酒和香烟味。在他的后方，在第二辆卡车引擎粗哑的空转声中，传出阵阵笑声。

“麦可搬走了。”我说，我知道了，他把我看成之前租下这个地方的人，“你要做什么？”

“我们是来打浣熊的，老兄。”他说，仿佛觉得我很愚蠢，竟然连这个也不知道。

“也许你们以前可以在这里打猎，但是现在这里属于我们了。”

“是吗？”他说，“你一定是刚买下这个地方，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打了十年的浣熊了。卡尔·考克斯说我可以这么做。”卡车里传出狗叫的声音。他转过头去，看看卡车后面的笼子。“闭嘴！”那些猎犬继续狂吠。

“现在这里不是卡尔在管了。这座农场分开来卖掉了。”

“该死。”他说，“我们只是想把车子停在谷仓后面，带着狗到河边去。”他再一次转身吼道：“闭嘴！”

希瑟的声音从我身后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她一手提着油灯，另一只臂膀把鲁德抱在腰侧。他的头靠在她肩膀上，用小拳头揉着困倦的睡眠。

“这些人要到谷仓后面去猎浣熊。”我说，“以前卡尔掌管这里的时候，让他们这么做。”我转过身，面向这些猎人。“我不同意。现在我们有匹马在谷仓里，还有几只山羊在里面。”

“喔，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山羊。”他不高兴地说。

“听着！”我说，我觉得这件事实在荒谬，我竟然在晚上十点的时候，在漆黑的厨房里跟人争执不休。“现在时间不对。明天白天再来，到时候我们可以谈一下。”

“难道这条河也是你的不成？”

“不是。我不知道它属于谁。有个叫乔·威尔逊的农夫把那片土地租出去。你必须跟他谈。”

“乔？他是我的朋友。你有他的电话吗？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我们没有电话。”

他用狐疑的眼光望着我。他像个孩子一样，就是不肯罢休。“算了吧，老兄，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东西。我们只是把浣熊赶到树上。我们不会杀死它们。”

“你的大名是？”

“唐尼。”

“让我告诉你，唐尼。”我说，我希望他离开我们家的厨房，我想，如果他是乔的朋友，也许他不是个坏人。“这座农场的后面有一扇对开的门。

你可以从那里进去。”我向他描述那个地点，说明他们可以去和不可以去的地方，他不耐烦地点着头，仿佛在说，好啦，好啦，混账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在床上躺着，一连好几个小时，我竖着耳朵，倾听这两辆没有装消音器的卡车来来去去的声音。每隔一会儿，卡车的头灯就照上我们卧房的墙壁，然后光线又移开。有一刻，我从床上起来，看到这群人在比尔和佩姬家对面的田野里，用手电筒四处搜寻。前几天拿着手电筒照的就是这些家伙。

我终于睡着了。

“砰”的一声！

我猛然坐起来。我跳下床，冲到房间的另一头，我踢翻了夜壶，尿泼到我腿上，溅湿了地板。我来到窗边，心脏怦怦地撞击肋骨。我听到吼叫声，声音越来越响。我看到闪烁的黄色小灯沿着马路快速移动，渐行渐远。

“刚才是什么声音？”希瑟不高兴地说。

“那些打浣熊的猎人。”

第二天，我发现了他们追捕的猎物——在我们前院最远的边缘，有一个“州政府野生动物管理区”的大型褐色标志。铝质的标志凹陷下去，从中央散出放射状的疤痕，这是猎枪近距离射击的结果。我几乎忘了最初我对这种热爱射击的美国南方乡下人的恐惧。史威普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亲切友善。但是这件事提醒了我，让我察觉我们依旧是生活在一个人们手上有枪的国家里。我同时意识到，我们仍然是外地人。

“不给钱就捣乱”

几天后，鲁德和我正在有纱门的露台上，把食物装进木箱里去。这时，罗伯森家的绿色汽车开上我家车道。比尔下了车，佩姬留在乘客座上。我伏下身子，跟她挥手，她也对着我挥手。我发现她脸上化的妆比以前浓了很多。太浓了，我想。她用指尖拉拉一些插在花瓶里的花。

“谢谢你帮我们喂猫。”比尔一面轻声说，一面递给我一瓶梨子果酱。他和佩姬上个周末去参加儿子就读的大学举行的“家长周末”活动。他们俩看起来累坏了。

“我们想明天晚上跟你们一起吃晚餐，”我说，“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太累……”

“我不累。”他立刻说。他走向佩姬，说了些话。她昂起头，睁大眼睛瞪他，仿佛在无声地说：比尔！我已经准备走过去跟他们说，延后几天再聚，我们这边完全没问题，这时，他转过身来，脸上流露痛苦的神情。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坏消息。”他用湿润却毫不畏惧的眼光直直地看着我，“我长了一个东西，已经拿掉了，是恶性的。”

“哦，比尔。”我握紧了手上的蜜饯罐头。

“明天我要再去一次，看看是不是全拿干净了。”他说。

我想到不久以前，有一次我们到他们家吃晚餐，那天佩姬告诉我们，她有个好友最近得了癌症。“她是个斗士。”佩姬说，她的神情流露出她那强烈的苏格兰人自尊。她的这位朋友把自己的抗癌奋斗经历向朋友公开，经常对此事说些机智的笑话，并恳求朋友为她祷告。“她这种态度是最棒的。你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站在那里，不确定该说什么，我在想，不知道比尔——一个如此敏感的灵魂，一个如此注重隐私的人——会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过了不久，我们去看比尔和佩姬。那天是万圣节，我们决定带鲁德去要糖吃，这个“不给糖就捣乱”的做法源自中世纪的英国，当时穷人挨家挨户乞求食物（在莎士比亚的《维洛纳二绅士》中，史毕德责怪他的主人“哭哭啼啼，像个万圣节的乞丐”）。我们不确定，在1900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州的乡村居民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但我们不能错过这个全家同乐的机会。

鲁德打扮成“彼得兔”的造型。就像故事中那只淘气的小兔子一样，他穿着一件漂亮的蓝色厚呢外套，扣子上包着金色的锡箔纸假装是黄铜扣子，用一个羊毛作的球当作兔子尾巴，用清理烟斗的细长毛刷，外面包上布，作为兔子耳朵，然后在脸上画上兔子的胡子和一个粉红色的鼻子。全部的装扮

出于希瑟之手，造型非常迷人，远胜去年在商店里给鲁德买的南瓜装。他看起来真可爱，我们等不及要让人看看他，因此我们三个走路过去，我们穿着厚重的衣服来抵挡寒气，还拿了一个纸袋，准备等一下装糖果。

我们不知道今日的弗吉尼亚州农民是否还维持着“不给钱就捣乱”的传统，因此我们事先对几位住在附近的邻居说，我们可能会去敲他们家的门。其中一个就是琴妮。我们首先就去她家。我们沿着马路往前走，很小心地走在路边。天上悬着滚圆的橘色月亮，仿佛是为了这一刻而定做的。月亮从琴妮家的山坡上升起。不久，我们就站在她家门口，敲敲防暴风雨的外门上的玻璃，拉直鲁德的耳朵，提醒他等一下要说什么。

琴妮一开门，他就大叫：“不给糖就捣乱！”然后，他举起一路上啃个不停的一截粗短的胡萝卜说：“我有胡萝卜。”

“你当然有。”琴妮笑着说。她把手伸进篮子里，抓出一把糖果，扔进鲁德的纸袋。我们跟她聊了一下，然后摸黑走到比尔和佩姬家，我让鲁德骑在我的肩膀上。佩姬戴着高而尖的黑色宽边帽，比尔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癌症的字眼，我们也绝口不提。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鲁德身上，他把胡萝卜塞进紧身外套的口袋里，对他的糖果发动攻势。几个月前希瑟和我就商量好了，我们虽不用相机，却不能禁止其他人拍照。于是佩姬拿出她的全自动相机，给鲁德和他的胡萝卜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她抓起一把糖果，放进他的纸袋，今天晚上可能只有他一个小孩到他们家来要糖果。不久，我们就离开了，鲁德坐在我的肩膀上，灰白的满月高挂天空，照亮我们的路。

“我们去提尔曼家吧。”希瑟说，“他们看到鲁德，会很高兴的。”

“你觉得他们会希望有小孩去要糖吗？”我在心中揣想艾伦昏昏沉沉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助行器上的托盘里摆满药瓶子。

让我们惊讶的是，克莱德和艾伦今天心情都很好，看到鲁德来了，他们忙成一团，赶紧把糖果塞到他的纸袋里。最后我们终于回到家中，我疲倦极了。为了敲邻居的门要糖吃，我们走了将近三千米的路，一路上我的肩膀上还扛着一只重达13千克的大兔子。

坏消息

那些猎浣熊的人来我们家的一星期后，乔·威尔逊开着他那辆挂着“农场用品”牌子的小货车来了，他太太爱迪也来了。我提到那些浣熊猎人的名字时，乔的脸皱起来，并且用手摸摸他那垂下的八字胡。我描述那个人的模样，爱迪说：“哦，那是某某人的儿子，我想不起这人的名字来。他住在这条路的上边。”

“对。”乔说，“他开着一辆老旧的灰色卡车，车上装了圣诞灯，还摆着一个装狗的箱笼。”除了运狗，乔说，这些进入他人土地狩猎的盗猎者，还用这些箱笼把抓到的鹿盖起来。

“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你们是老朋友。”我说。

“哦，上帝。”乔呻吟了一声。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闹事添麻烦的人吗？”

“他不是添麻烦的人。他只是游手好闲。没法定下来做一份工作。或许他可以弄到跟你我差不多的位置，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假设他的意思是，这人若在接受福利津贴的情况下，可以达到这种状况。

乔说，这家伙跟他借用过一次马拉的运货拖车。然后他又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自行“借用”了一次——而且没有归还。最后乔不得不打电话给唐尼，要他把拖车还来。还有一次，爱迪抓到他和一个同伴在他们家谷仓附近偷偷摸摸地走动，谷仓旁边存放了许多卷铁丝网。唐尼暴躁地说：“我需要一点作围篱的东西。这些东西，乔要卖我多少钱？”爱迪坚定地答道：“这些东西不卖。”他和他的朋友从头到尾一直贪婪地盯着眼前各种昂贵的农场设备。“他们的样子让我神经紧绷。”爱迪说。

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坏消息。这家伙听起来像个小偷。

每隔一阵子，到了深夜，我会看到一辆装了黄色小圣诞灯的卡车，隆隆地从我家旁边开过去。不再开枪射击，至少目前是这样。我在想，第一次的开枪可能是喝醉了打着玩，或者是提出一种警告，一种懦夫的表达方式，仿佛在对我说：不要惹我。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对他开放后门，但我没法打

电话通知他。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就像三只不会飞、只能浮在水上的鸭子，很容易被敌人击中。

冬天的储备

冬天朝着我们大步而来。九月的几个寒夜震撼了夏季的菜园。十月初的一阵严霜将菜园彻底击倒，一种浓郁的气味从逐渐变黑的植物堆里升起，宛如它们吐出的最后一口气。干旱卷土重来，展开报仇行动。干涸和它所带来的大群蝗虫蹂躏我们的秋季菜园。如今草地已经干枯，我用耙子在那棵山核桃树的四周耙地，清出一块环形的土地，这样我们就能轻松地捡起山核桃的果实。耙子在地上制造出静电，光线一闪一闪，啪啪作响，我心想，这么做有可能引发火灾。

菜园停工之后，我让小鸡出来吃蝗虫大餐。它们大口吃掉了鸡舍里的每一只蝗虫和每一根青草。尽管它们每天都有很多糊烂厨余和结块的羊奶可吃，但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啄食活物作为点心更让它们开心了。它们特别喜爱爽脆的蝗虫。我知道这一点，因为之前在秋天的时候，我们种的萝卜没有收成，让我感到挫折，于是我把这些虫从干枯的玉米茎秆上捏下来，扔到尘土飞扬的地上，然后，在这片宛如竞技场的泥巴地上，小鸡们像狮子一样，对着这些身上仅有薄薄盔甲保护的小动物扑过去。如今小鸡们可以自由走了，看到蝗虫四处跳跃，它们不禁狂奔乱跑，发出欢乐的咯咯叫声，享用这场丰饶的盛宴。

说我们的夏季花园产量丰富，应不为过，然而此刻我们等于是自己在收成作物限制下，来变化出各种美味的食物。我们超越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储存了不只350罐的食物，包括玉米、南瓜、秋葵、腌制的酸黄瓜、用茴香调味的腌青豆，还有西红柿和青豆各一百多升。我们做了30罐的黑莓果酱，50升的苹果酒，把14升的土豆存放起来，还有南瓜、冬南瓜和洋葱。干燥的扁豆和紫花豌豆，我们也分别储存了半升。为了节省时间，我

们让这些豆子在植株上晒干。然后把整株植物拔起来，把豆子连壳摘下，用纸包好，再用树枝用力打纸包，为豆子去壳。有时候我会走到地窖里，关上门，站在那里欣赏。我们很自豪，也觉得自己很幸运，然而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储存的这些食物够不够过冬。如果我们让山羊和鸡保持健康的状态，且能继续生产，我们就会有鸡蛋和羊奶可以食用，但是我们不能再种出新的蔬菜了。再过几星期，当我们打开第一罐西红柿，我们就开启了一个为期半年的物资配额阶段。

我们虽然担心冬天的食物和水会不够，担心逐渐迫近的寒冬，也担心那些猎浣熊的人，这些忧虑虽然扰乱了我们心中的平静，但是希瑟和我，从我们展开1900年的生活以来，就以这段时间最感惬意。邻居们带来有关阿富汗战争和炭疽病扩散的恐惧——有个朋友看到一些男人穿着类似白色太空装，站在镇上一间被警方封锁的办公室用品店前面。这让我领悟到，我们全家是多么幸运，可以团聚在这片宁静的16公顷土地上。如今我们不但能轻快且有效率地完成烹饪、清洗、劈柴和照顾马匹的工作，炎夏带来的种种压力也减轻了。不再需要浇水、拔草，跟家畜奋斗。不再采摘收成，辛勤装罐。我们从地窖里走出来，拖着一个装满食物和半升苹果酒的大篮子，篮子里的东西全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感到自豪，觉得有安全感。这些食物比银行里的钱好多了。

我无法压制内心的感激。从我的少年时代到现在，我头一次在心中默默做感谢的祷告，不像以前那样，因为某些神学的细节而中途打住。希瑟和我有时趁着鲁德睡午觉的时候做爱。我们的卧房就在他房间的隔壁，所以我们到客厅。由于没有沙发，我们脱光衣服，把百衲被铺在地毯上，躺上去，一面留心聆听，如有伊许塔的吆喝声万一突然在门口响起，或者比尔·罗伯森突然带着一条南瓜面包来敲门，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赶紧把衣服穿起来。

一天下午（我们可是衣着整齐的），麦可·葛佛瑞来我们家坐坐。我们站在有纱门的露台上，他说：“你们听到了吗？”

我竖起耳朵，寻找鸟叫声。麦可经常突然中断谈话，告诉对方说，有一

只北美黑啄木鸟，或是有一只山雀正在“菲——啞，菲——啞”地叫。但是这一次我听不到的是啄木鸟啄木头的咚咚声，而是钉锤砰砰的敲击声。这声音停了，然后是电锯的尖锐声。声音是从克莱德·提尔曼家传过来的。

“听到了。”希瑟说，“我经常听到那个很吵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我们住在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那条路的旁边。”

“那个是精密切割的声音，朋友，”麦可咯咯地笑道，“克莱德先生在建造另一座库房。”那天下午，我走到提尔曼家，看到他坐在一辆铝制折叠椅上啜饮樱桃可乐。他的大拇指包着绷带，绷带里泛出血来。他用钉锤敲打的时候，不小心打到的自己的大拇指，麦可说。克莱德的脸扭曲了一下，继续敲打，血滴下来，凝结成一小块发亮而微凸、夹杂木屑的血块。

“我听到敲敲打打的声音，”我说，“需要人帮忙吗？”

提尔曼露出他的那种高深莫测的笑容，这个笑容里既没有愉悦，也没有嘲弄。“我累死了，”他说，“这栋屋子比我想的还要花力气。”

我将他的答复解释为“需要帮忙”，于是我站在旁边。提尔曼把樱桃可乐喝完了。他将可乐罐丢到椅子旁边的地上，交给我一把短柄斧头和一把钉子。在这位惯做粗工的老人面前，我有点不自然地把屋顶用的金属波浪板碎片，用斧头的刀背作为钉锤，将它们钉在这座小屋的侧边，小屋目前只搭建出简陋的骨架。这件工具用起来并不顺手，我担心万一敲到大拇指，我就没法保持现在这种坚忍不拔的态度了。然而不久后，我就找到了一种节奏，每根钉子最多只要敲个五六下，就能把钉子打进去。过了一会儿，提尔曼又喝掉一罐汽水。“你要喝冰的饮料吗？”他问。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这栋库房里有一座烧木柴的锅炉，经由埋在地下的水管（这些水管说明了，我们为何经常看到一团团燃烧木柴所产生的、如小猫步履般轻盈的烟雾），为提尔曼的房子提供热水。这是一栋彻底功能性的建筑，完全用回收的材料搭建而成，只有钉子是从店里买来的。提尔曼拆下一根电线杆，用电锯垂直对切，拿来当作小屋四角的柱子。他的这些七拼八凑的小屋看起来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杂草堆。

提尔曼的手受伤了，没法把钉子在光滑的金属波浪板上固定。他再一次敲到那根包着绷带的大拇指，他停下来，大拇指在空中轻轻颤抖着，他的脸上有一种扭曲的神情。如果排除他嘴里说出的脏话，他实在很像一个被上帝符咒镇住的传教士。锅炉在一旁喷出阵阵烟雾。

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扔了五罐樱桃可乐在折叠椅旁的地上。我对他说，我必须回去了，他的态度一如往昔，没有任何反应，不向我致谢，也不跟我道别。于是我转过身，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

枪声

有一天的黄昏，来复枪的枪声传到屋里，把窗子震得嗒嗒作响。猎鹿的季节来临了，我们不时听到山坡上和附近的农场传来零星的枪声，仿佛突然走进了一座战场。但是这晚的枪声比之前的都要响，希瑟和我赶紧跑到露台上去看。我看到一辆黑色小卡车的模糊形影，它没有打开头灯，慢慢沿着童军巷开走。然后，头灯打开了，卡车加速前进，冲过了写着“停止”交通标志的路口。没有看到圣诞灯。不管车上的人是谁，这人大概都是把枪管从车窗里伸出去，朝着外头开枪的。

“我快抓狂了！”希瑟说。

过了一会儿，我从挤奶室提着羊奶回来的路上，看到一辆车的两个头灯在我们农场对面的树林坡地上扫射，仿佛在搜寻什么。我把桶子放在清洗室，一把提起油灯，朝着马路大步走去。我还没有走到我们家的车道，这辆卡车——也许就是之前的那辆车——就开走了，然而他们看到我了。至少他们知道，我已经在注意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院子里，这辆黑色小卡车从我们家旁边开过，沿着童军巷朝山坡上开过去。我从信箱旁跑过去，沿着这条死巷往前走。这一次我抓到他们了。

我走了不到一百米，就看到三个男人和一只狗站在我们的原野上。我轻

手轻脚地走过草地，尽量以快步而非奔跑的脚步，穿过高高的草丛。我不想把他们吓跑。我觉得紧张，心跳加快，呼吸急促。他们看到我以后，三个人散开来，其中一人等我过去。

走到距离他们大约十五米的时候，我说：“喂，你们在干什么？”

“我朋友昨天夜里射中一头鹿，它往这边跑过来了。”

“对，我们听到了那一记枪声。”我试着让急促的呼吸平稳下来，我的怒气越来越强，“他可不是从车窗里开枪的吧？”

“不是。他得到许可，可以在那片土地上打猎。”这人大概四十五岁，说话时声音柔和，带着调门很高、阴郁而拉长的口音。我尽量表现出镇定的态度，但是几星期来累积的恐惧和愤怒——对于那些侵入他人土地狩猎的盗猎者，对于那些打浣熊的乡下人，对于我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对抗他们——终于爆发了。

“那片土地是谁的？”我要看看他的话是否属实。

“我不晓得。”他不高兴地说，“我朋友可以告诉你。”

“你叫什么名字？”

“提姆。”

“你姓什么，提姆？”

“迪顿。”

“提姆·迪顿。”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说。

他的沉着消失了：“你自己去问他。”

“你不能告诉我吗，提姆？”

“我觉得你在盘问我。”

“你看起来好像很心虚的样子。”

“我会离开你的土地，”他说，“但是不要再问我任何问题。”他往山坡下跑过去，跳过铁丝网的围篱。他的两个同伴已经来到马路上，站在小卡车后面。我扫视他们三人，没有人带枪，我这才松了口气。

我不希望他们就此上车离去，因此大声说：“你们在找什么，我能帮忙吗？”

一个穿铺棉迷彩工装裤、看起来像“长发版”桑尼·波诺^[1]的男人停下脚步。“是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我们正在找一头鹿……”

“谁射中了那头鹿？”

“我。”这位“桑尼·波诺”说。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起话来似乎有点发音的障碍。他的眼睛——跟我说话时——怪异地看着另一边。他让我想到我认识的一个人，这人在一项营建工事的意外中，脑部受到损伤。我没法继续生气下去。

“听着，各位，”我说，“我太太和我听到了这记枪声。我们被吓到了。之后我又看到你们在我的土地上走来走去。如果你们事先来我家说一下，得到许可之后再去做，这样会比较好。”

他们跟我道歉。然后我们站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尴尬得要命。我迈开步子，沿着马路走去。

“坐上车吧，”“桑尼·波诺”说，“我们送你过去。”

“不，我不能坐，”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宁可走路。”

“大剪刀”不见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已经摆脱了这些猎人的烦扰，但是有一天，在我挤羊奶的时候，一辆不是经常出现的蓝色小卡车开到我家。我看到卡车上有一个狗笼，全身的神经顿时绷紧。我把两只山羊关进羊圈里，把手插进口袋，走到卡车旁边。两个男人下了车：开车的人剃过发的头顶刚冒出头发，另一人满脸横肉，金发蓬乱。

“你是唐尼，对吗？”我朝着长发的男人，用手比出手枪的姿势。

“对，”他说，“今天早上你没有听到一只抓浣熊的狗在叫吧？”

[1] 桑尼·波诺 (Sonny Bono, 1935-1998)，美国歌手、演员兼唱片制作人，曾任众议员。他生前提倡著作权保护期限应无限制。知名的著作权延长法案就是为了纪念他。

“没有。”

“我们昨天晚上出来，结果有一只叫‘大剪刀’的猎犬不见了。它的个性很好。”

“我会留意。”我说。

唐尼扫视农场：“你买下了这个地方，对吗？”

“对。”

“你是本地人？”

“不是，我们是从纽约搬来的，”我换了个话题，“听着，唐尼，我跟乔·威尔逊谈过了。他说他不准任何人在那片土地上打猎，所以你们必须另外找地方放狗。”

那天稍晚，这个剃光头的人又来了。他脸上的线条刚硬，眼神急切，下巴有几条疤痕。“你还是没看到‘大剪刀’？”他问，“这只该死的狗花了我一千块。”他前一晚整夜都在找它。“我叫戴尔。”他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我握了这只手一下，然后对他说，我会留意。

去杀鸡

同一天，另一辆小卡车隆隆地驶进我家车道。这辆红色小卡车后方的载货区上装了小巧的车顶帐篷。我认出了这个车顶帐篷，不禁微笑起来。

“你吃鸡肉吗？”一个有着老祖母亲切神态的妇人下了车。莉兹·罗斯的个子矮小，白发在头顶盘成髻，她的牛仔裤和连帽长袖运动衫是两种不同的紫色。她带着一个肤色微黑的男孩一起来，这男孩大约十二岁。

“我不吃我们养的鸡，如果你是问这个，”我说，“它们是养来下蛋的。”

“不，我不是问这个，”她说，“你吃素吗？”

“希瑟吃素。为什么问这个？”

“你愿意帮我的朋友姐特·梅克利宰杀一些公鸡吗？她会把你杀好的三分之一的鸡送给你。”

莉兹跟她先生杰克住在附近的一座占地数亩的土地上，她用农人的姿态站着，上身向后仰，两手插在口袋里。讲到一半的时候，她稍微调整了一下身体的重心，放了一个屁，屁声清晰，却不算很响。她没有脸红，没有说请我原谅的客气话，也没有转而谈论青蛙或其他话题，仿佛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放屁是天下最自然的事，而这样的事，尽管有争论的余地，的确是再自然不过。“姐特瞎了，”她说，“嗯，几乎全瞎了。她的一只眼睛边边看得见，可是看到的颜色全都是模糊的。大概是五年前开始的，在她动过心脏手术以后。”

莉兹是个极为能干的女人，从来不会显出忙乱的样子。尽管她很忙——在大学教烹饪课，担任监狱囚犯的营养咨询顾问，并且负责种出全家人要吃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装罐与贮存——她永远有东西可以给别人，无论是洋葱幼苗的球茎、南瓜面包，还是腾出时间帮助别人。她身边的男孩叫奈杰尔，他每个星期天来帮她做事。

莉兹和杰克是史威普的“海伦与斯科特·聂尔宁夫妇”^[1]。这对夫妇满脸皱纹，富于机智，致力推动社会正义——就像回到乡下以农耕为生，并撰写《美好生活》^[2]这本书的聂尔宁夫妇所倡导的想法——克罗斯夫妇几十年前从中西部搬过来，在此建立了远离主流的生活。他们是务实的人，生活中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尽量保存下来或重复利用。他们的土地上是一堆堆的水管、柱子和塑料容器，一卷卷生锈的铁丝如杂草般纠结着，旁边是温室和破烂的小屋。杰克是个电工，总是神采奕奕地在修东西。初次见到鲁德的那天，他就开车回家，几小时后送来一根扫把做的玩具马来——缰绳是晒衣绳做的，马的耳朵用小块的皮革制成，用塑料瓶的瓶底做成马的眼睛。马头顶上的那块褐色的木渍还没有干透。

[1] 海伦与斯科特·聂尔宁夫妇(Helen and Scott Nearing)，美国20世纪60年代晚期兴起的“回归自然运动”的先驱。两人于1952年离开纽约市，到缅因州乡间展开历时60年的农庄田园生活，提倡素食、反战、自给自足、倡导社会正义与和平主义。

[2] 《美好生活》(*The Good Life*)，聂尔宁夫妇的知名著作还包括《活出美好生活》(*Living the Good Life*，另译《农庄生活手记》)，以及《美好生活续记》(*Continuing the Good Life*)。

“可是我没有杀鸡的工具。”我说。

“你得在晚上过去，因为那时候才抓得到，”莉兹不理睬我的话，“她有个儿子跟她住，但是他不肯干这事儿。他说他忙得没时间，这话我可不信。”

夜里看不到，没法过去，所以我在白天先去姪特·梅克利的家。下午的时候骑脚踏车过去，车篮里放了一副帆布手套，我的肚子因为紧张而感觉怪怪的。一个大个子、面容却很孩子气的男人不高兴地替我开门。他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看起来可能有四十岁了。我察觉到自己的身上也很脏，而且头发乱糟糟的。“梅克利太太住在这里吗？”我问，“我是你的邻居。我是来处理那些鸡的。”

“妈——！”他叫道，一面回转身子，慢吞吞地往空间不大的屋子里头走。他用手指了指一个坐在厨房餐桌旁的妇人，然后走进隔壁房间里。我听到电视机里有人在讲话和大笑，看到屏幕的蓝光，像一团团没有炸开的黯淡烟火，微微地照亮那阴暗的房间。

“莉兹·克罗斯说，你需要人帮一点忙。”我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姪特·梅克利跟她儿子不一样，她非常迷人，跟我讲起话来一见如故，仿佛我们是多年老友，从午餐时间就开始谈，一直聊到下午。虽说是聊天，事实上，是她在讲，我在听。她谈到她养的鸡，还有草原狼从山上下来，蹑手蹑脚地走到鸡舍旁边；她谈到她离婚后买下的这片土地，谈到她的泉水，在干旱的时候，那泉水仍涌流不停歇。她仿佛是用嘴，而不是耳朵或鼻子，来弥补她看不见的问题。我对她的健谈很能接受，因为谈话延后了杀鸡的时间。我脑中全是我以前听过的扭断鸡脖子的经过。如今我自己也养鸡——也知道它们会长到多么大——我无法想象自己斩下鸡头的情景。

“你看看我，一说就说个没完，”她说，“你可能还有事情要做。咱们去找那些鸡吧！”

她拉着我的臂膀，好像我是一个初次参加社交舞会的少女。我慢慢领着她走出去。她的个子矮小，尽管年事已高，眼睛也看不见，精神却很好，脸上带着欢快的笑。

我带着她绕过几棵空地上的核桃树。

“我还是少女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核桃树，”她说，“有一次我问我妈说：‘妈，天堂里有没有核桃树？’她说：‘没有。’我对她说：‘那么我不要上天堂。’”

一阵拍动翅膀的声音，伴随着受惊的咯咯声。

“是公鸡在叫吗？”姐特问。

“我必须承认我的无知，”我说，“我不会分公鸡、母鸡。”我之所以来到这里，只是因为我称为“农村声望”的这个东西，它跟“街头声望”^[1]有点类似，却也不太一样。由于我们在这片土地以农耕为生，人们都觉得，我们对于农村生活知之甚详，然而这不是实情。就连莉兹·克罗斯也没有用木柴炉煮东西吃，她也没有驾着马车和马来来去去。其实莉兹什么都会做——包括把汽车引擎拆开来，变成一堆螺帽、螺丝钉和各种零件，然后把它们重新拼装起来（杰克·克罗斯告诉我，她有这个本事。他说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丈夫对妻子的纯粹的自豪）。我虽然学会了若干1900年的技能，但我的乡村生活履历表上，还有一大堆事情有待学习。无论如何，莉兹还是来请我帮忙，要我为这位瞎眼的老太太宰杀这些公鸡。

“哦，公鸡头上的鸡冠比较大。”她实事求是地说，“它们的侵略性也比母鸡强很多。”

我们走进鸡舍，这里有20只鸡，包括各种体积、身形和颜色。它们惊惶地叫喊着，翅膀拍出一阵足以阻塞肺脏的含毒烟尘。

“小心，”她说，“它们可能会使坏。”

我戴上手套，把一只看起来像公鸡的鸡追赶到角落。趁着它还没有把我的眼球啄出来，我从它的肚子底下一把抓住它的脚，倒过来拎着，将它拿远了，免得它拿我的小腹当作靶子发动攻击。我们往山坡上走去，那边有个扁平的矮树干，旁边摆着一把斧头。

“切断脖子就好。”姐特抓住鸡头，“不要切到我的手。”我用左手紧紧抓住两只鸡脚，右手拿着斧头。我试着集中心思，但是她的嘴巴还是说个

[1] 街头声望（street cred），在新潮与时髦方面受到年轻人认同的街头名声。

不停。

“公鸡的头被切掉以后，还会走上好一阵子，”她说，“切了就立刻松手，否则你会被溅得一身都是血。”

我举起斧头，斧头很重，我的手臂不断摇晃。

“我希望人类不会这样。”她说。

“会怎么样？”我放下斧头。

“被杀死以后，还会走来走去。那样很可怕——在打仗的时候，你会看到尸体在走来走去。”

“我很确定人类不会这样。”我举起斧头却发现，她还没有讲完，于是我再次放下斧头。

“我讨厌战争。我们现在在打的这场战争，让我非常生气。”她指的是美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入侵阿富汗的事。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邻居总会让我知道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投票，所以我真的不能说什么。”

“为什么不投？”

“我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我们不相信选举。”

我决心赶紧做完这件事，于是我不再问问题。不久，我们的交谈就逐渐停止了。

“可以了。”我重新举起斧头。这只鸡的脖子被压在树桩上，身体不断扭动，令人同情。我让这把沉重的铁斧落下。它弹了起来，仿佛我刚才切到的是塑料水管。公鸡的眼睛暴突。我再次举起斧头。“砰”的一声，鸡头落到地上。

我向后退一步，丢下公鸡的身体和斧头，刀刃差一点就切到自己的脚。公鸡跳起来，抖抖翅膀，表现出得到自由的姿态，鲜血从它的脖子里不断喷出来。然而，它仿佛突然领悟到，有一件可怕而不能挽回的错误发生了，这只鸡大为惊慌，不停地拍动翅膀，跳来跳去，发出无声的尖叫。它喷着血，往山坡下翻了个筋斗，然后重新站好，试着飞起来。它看不见了——比瞎眼还要糟糕——这只鸡撞上一棵树，像弹珠一般，往另一个方向弹开。它跳来跳去，转圈子。我的天！怎么还不结束？

它终于不动了。于是我们去追其他的公鸡。第二只跟头一只一样，也是跳跃着走来走去。到了第三只鸡的时候，我的手松得不够快，鲜血喷到我的脸上，还有我的长裤和靴子上。姐特热情地向我道谢，我只能跟她说，我不带一只死鸡回家，作为替她服务的报酬。

我浑身是血，踩着脚踏车回家的途中，看到一条白褐相间的漂亮猎犬，它用充满警觉的神态小跑步地越过一片草地。我想到这只公狗的主人那张有疤痕的脸，我心想，继续往前骑吧。假装你没有看到他。但是我做不到。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也许是因为我刚才去了姐特家帮忙，或是之前我碰到了那几个冒失的猎鹿人，我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小区。这里像个大家庭，除了欣赏它的优点，你也必须包容它的缺点。

“大剪刀！”我大叫一声，这只狗停下来，竖起耳朵。“大剪刀！过来，孩子。”它看到我了，但是它没有朝着我走过来，而是向相反的方向跑开了。

投票日

投票日到了。尽管1900年时女性还没有选举权，希瑟和我仍决定去投票。姐特·梅克利之前说的话，让我更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俩虽然都有投票权，但是投票所设在万米外的一所农村高中里，我们缺乏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驾着贝儿去，她有可能在穿越铁道的时候把腿给摔断。因此我们将脚踏车的轮胎打满气——这一次我们要骑一辆在拍卖网站买的脚踏车，戴维·韦劳勃在我们家的时候，替我们修好了——我们打算吃过午餐后出发，请佩姬帮忙看鲁德一下。

这是我们展开这项计划以来，第一次离开宁静的史威普，我们俩觉得既兴奋又紧张。我们喘着气，骑进这所高中的停车场，把脚踏车放在礼堂旁边的草地上。我们轮流走进布帘后面，拉下投票机的拉杆——几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回到脚踏车旁边。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座加油站，加油站的屋顶上装

了一座玻璃纤维做的水牛塑像。我们对于已有五个月不曾踏进一家商店感到惊喜，其实商店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走另一条路回家，这条路比较近，但是比较陡，路面也没有铺过。我的脚踏车脱链了，我不得不把它放平了，用一块石头当作钉锤，把链条装回扣链的齿轮上。上坡的时候，我至少有十次跳下脚踏车，走一段路再重新骑上。终于爬上最后一座山坡了，我滑向下坡，回到家门口，满身尘土，精疲力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投票费这么大的力气，大到刚好符合了投票本身的重要意义。

我笑了

吃晚餐的时候，那辆载着狗笼的蓝色小卡车开进我家车道。那位名叫戴尔的浣熊猎人下了车。“还在找吗？”我从厨房里走出来。

“是的，先生。”他用一种跟上次不一样的尊重口气说。我正要告诉他我看到了大剪刀，这时，他突然说：“你听！”

我听到远方传来狗吠声。

“他逃到树上去了，”戴尔说，“我知道他一定是。”他开心地说，由于缺乏睡眠，他看起来非常的兴奋、焦虑，带着歉意，又说了几次“先生”来表达善意。他问我们，能否让他走到谷仓后面，把他那条值一千美元的狗带出来。我们已经把两只山羊关在羊圈里准备过夜。贝儿可能去草地上吃草了。

“当然，”我说，“但是要记得，不要忘了把那边的门关上。”

“哦，当然不会。”他咧开嘴笑，伸出一只手表示谢意，然后，他戴上了一个漂亮的头顶照明灯，把电池的带子扎在皮带上。“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很好。”

我笑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我是这个地方的一分子。

一小时后，我听到狗吠声，然后是卡车引擎的轰轰声，最后是狗笼的嗒嗒声。他把车开出了我家车道。

第九章 回家过节



爸妈来了

古罗马学者瓦罗^[1]把一年分成六个季节：准备期、播种期、耕种期、收割期、贮藏期和消耗期。两千年后，到了1900年，这时的农民还没有机械化的设备可用，他们基本上还是遵循同样的时序过活。岁末将至，我们的夏季蔬菜也安全地贮存在地窖里，这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消耗期，这是个休息与欢庆的时期，在这个阶段——至少在瓦罗的时代——屋子外头已经没有什么辛苦的活儿等着做了。

在特林柏磨坊，我们试着种下的最后一批绿色蔬菜已经枯萎，华盛顿·欧文^[2]所描述的“金黄绚丽的秋季”（golden pump of autumn）光荣退下舞台，留给大地的是一片沉寂灰败。我们的收割期和装罐期都很成功，

[1] 瓦罗（Varro Reatinus，又称Marcus Terentius，公元前116—前27年），古罗马诗人及百科全书式散文家，阅历丰富，博学多闻。作品有《论农业》、《论拉丁语》等。

[2]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著有《李伯大梦》。

这让我们松了口气，但是我们对于未来几个月仍然感到焦虑。我们贮存的食物够不够？木柴和灯油够用吗？邻居们还记得1993年冬天史威普的罕见景象，当时住宅篱笆的柱子被积雪整个淹没。那种严酷的环境，我们有能力处理吗？夏季的生活是一种挑战，但是冬天才是真正的考验。这种逐渐累积的焦虑感让我快要受不了了。我担心冬天会让我们生活体系里的某种未曾料到的缺点——打井水的泵被冻住了，家禽、家畜冷出病了——暴露出来，使得我们这项计划被迫终止。或者，我们只是过着悲惨的生活——冷得要命，被困在屋里达三个月之久，家里还有一个蹦蹦跳跳的两岁小孩。

到目前为止，我们多出来的那点自由时间，全都用来处理为了这段假期而做的种种准备，以及用来招待来自城市的客人。我们那些朋友脑子里的想法似乎都一样——远离都市，到雪伦多亚谷来享受一个秋天的假期。（吃新鲜的蔬菜！坐马车！观赏风景！关掉手机！）接连好几个周末，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芝加哥、纽约、加州、亚拉巴马，宛如来自现代化社会的使者。有一对夫妇带着他们刚饲养不久的一只伯尔尼兹山地幼犬一起来，另一对夫妇带着他们刚出生的婴儿过来。希瑟一个亲戚的丈夫来了以后，一定要我去看看他那辆新的厢型车上装的卫星导航系统。

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这些朋友，不过他们的来访也让我想到一些问题：来到这里的客人并没有宣告要加入我们的这场“时光之旅”，但是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自己种种的1900年生活规则强加在他们身上？如果他们带来了美味的奶酪、加州葡萄酒或纽约“H&H贝果店”的贝果，这样算不算作弊？还是客人带来几样吃的东西，可以弥补我们地窖里消耗的食物？我们在史威普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两难处境：冒着让这些善意的人觉得我们不合群的危险，极力坚持自己的规矩？还是在这些规矩上让步，随着这些规矩带来的聚会，享受群体和睦的感觉？不过有时候，这种想法实在太折磨人了，足以让我想说：请把贝果递给我。

我们之前还担心，这个计划开始后，我们会觉得孤单寂寞，现在想起来，那样的忧虑实在可笑。

同时，我们在准备迎接另一批完全不同类型的客人——我们的父母。

对于我们决定不过21世纪的生活，我们俩的朋友或是困惑不解，或是热情支持，但是我母亲和希瑟父亲的反应则是震惊、失望与害怕（我父亲和希瑟的妈妈则是困惑多于兴奋）。我的父母要来过感恩节，希瑟的父母来过圣诞节。这些假期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他们面前呈现我们的1900年生活。我们希望他们见到的景象能够让他们放心。

我们面对的是跟朋友来往时同样的两难处境，这一点殆无疑义。随着我父母来访日期的逐渐迫近，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具体：我母亲会在我们用的水槽里洗澡吗？她会去使用户外厕所吗？我父亲能忍得住不用手机吗？他要到哪里去找插头，给他的呼吸器充电？

我父亲七十岁，名叫约翰，是个退休的病理学家。他患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种疾病让他在睡着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止呼吸一下子。为了在睡眠时不要停止呼吸，他每天晚上一定会打开一部小型机器，让这部机器的马达把空气打进覆盖他口鼻部位的透明胶质面罩里。他去欧洲旅行时，带着这部机器同行，就连到厄瓜多尔亚马孙河的偏远地区旅游，在河畔的高架屋住宿时，也带着它一起去。但是在1900年弗吉尼亚州的乡下，在电线问世的三十年前，他这部机器毫无用武之地。因此他决定住进距离这里有25千米的一家汽车旅馆，在那里，他可以安心入睡，不必担心自己会窒息。我母亲名叫“妮妮”，她住在我们屋里多出来的、一个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她把一个保鲜盒放在房间的角落，当作夜壶。

她愿意来看我，让我感到钦佩。她是个城市人，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后来在波士顿和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镇读书。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对我的选择感到怀疑。我为什么不再上教堂做礼拜了？读完大学后，我为什么要跑到非洲去？难道我不想找份踏实的工作，像是做个银行主管或保险推销员，拥有公司的福利和保障？为什么我不做这些工作，而要辛苦地写作，想成为一个作家？还有，为什么要去纽约？为什么要住到这么远的地方，住在这么狭小的公寓里？用这几个句子把她的否定态度浓缩起来，会让人觉得她既挑剔又专横。其实不然。这种负面的感觉只是存在那里，就像她喝过的玻璃杯上留下的粉红色唇印，那是在烛光下洗碗的时

候看到的。我母亲的态度虽然改变得很缓慢，但是她慢慢学会了忍受我的决定，我们也一直相当亲近。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打电话去，告诉她我们要进行这项计划时，她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我必须承认，我让她措手不及，她完全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做。听到我说，我要告诉她一个“重大消息”的时候，她或许在想，应该是希瑟又怀孕了。我对她说，我们要搬走了。她的口气变得欢快。终于——我几乎能听到她心里在说——他们终于要离开纽约了！“重点不在于我们要搬到哪里去，重点在于我们要住进什么时代里去。”我向她解释这项1900年生活的实验内容。她的声音里带着怒气：“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父亲在加州的一个小镇长大，他对我们的计划感到兴奋，他的兴奋并不是来自我们选择去面对一项挑战，也不是因为这项计划打开了一扇窗，让大家看到旧日的生活。他之所以对这件事兴致勃勃，是因为它给了他一个修理老式用品、尽情享受这些玩具的机会。他是一个喜欢收集没有用处的物品的人，也热爱逛古董店。他和我母亲开着一辆小卡车到这里来，车上堆满了他收集的疯狂物品——把两人使用的推拉锯，一根将近两米长的原木树干（要试试这把锯子用的），一辆山羊拉的木制拖车，还有一个装满旧日厨房用品的大盒子，其中包括木制柠檬榨汁器，以及一部在平炉爆米花的生锈爆米花机。尽管我们没有柠檬，也没有平炉。

他们来到这里的第一个早晨，父亲来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洗过澡，刮好胡子，看起来比我母亲安适得多。他的汽车旅馆房间里有送水果篮，他从那边带来一个橘子放在餐桌上。这个礼物让我眼睛一亮，但是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拿，我那抱着鲁德坐在餐桌旁的妈妈，立刻把橘子拿到面前，轻松地开始剥橘子皮。

“你们俩何不带鲁德去散散步，”我说，“我的事情做完以后，就来找你们。”

希瑟已经开始煮感恩节的晚餐。她有好多事要做，因为炉子很小，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炖锅、煎锅和烘烤食物的器皿，因此必须一样一样来。今天早上她要做南瓜派和面包。我喝完咖啡后，就开始帮她的忙，然后再到谷仓里

干活。

希瑟把一块木柴丢到用来做早餐的炭火上，用力关上炉子的门，把风门调整一下，然后开始做派皮。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坚定，印花围裙裹着她那苗条的身躯。她的自信让我感到惊奇。不久以前，她还很怕使用木柴炉。她觉得，懂得这具炉子机械构造的人是我，劈柴的也是我，因此给炉子生火这件事，也很自然地落到我头上。如果我去挤羊奶，或是去井边打水，希瑟会在有纱门的露台上叫我回来，给炉火里加一根柴。有一天她正要把一些比斯吉的面团放进烤箱里烤，炉火却越来越微弱。她把头伸到窗外：“罗——根！”当时我必定是在听不到叫声的地方。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放进木柴的门，向后退一步，把一根柴像射飞镖一样地扔进这扇小门里，炉火熊熊地燃烧起来。然后，她又扔进一块较大的木柴。不久，烤箱的火就足了。她的比斯吉烤得很成功。从此她再也没有叫我回来给炉子添柴。

“你帮我把那个南瓜切开好吗？”希瑟问，她在揉面团，两条手臂沾满面粉。

我把一块木制切菜板拿过来，用我们最大的一把刀朝着南瓜中央切下去，这个南瓜由一个1824年之前就有的“祖传品种”^[1]授精，品种名称是“古铜色奶酪”（Tan Cheese），是我从地窖里拿上来的。我把南瓜子挖出，并刮除南瓜子上的瓜肉。

“佩姬来过了吗？”我问。

“我没有看到。”希瑟把柔软的面糊倒进两个烤派的平底锅里。希瑟邀请佩姬和比尔来跟我们一起吃感恩节大餐，因为他们的小孩今年都不回来过节。

“我得跟比尔商量一下，”佩姬说，“二十年来，他每年都要烤一只火鸡，前两天他又买了一只重达五千克半的火鸡回来。”同时，比尔拒绝接受罹患癌症的事，他不肯承认自己可能需要接受放射线治疗，也不认为应该用开刀来除掉肚子里那个葡萄柚大小的肿瘤。他们虽然很喜欢跟我们相聚，但她觉得他可能

[1] 祖传品种（heirloom variety），是由自然授粉，即由风媒、虫媒等传粉，而非人工传粉的品种。

会心情低落，不想过来用餐。如果他们要来，我们会准备很多吃的。

然后，希瑟把对切的两块南瓜切面朝下，放在烤盘里，将烤盘推进烤箱。她把南瓜子放在一个大碗里，拌点油和盐，在平底烤锅里铺平了，放进烤箱里一起烤——作为餐后的爽脆点心。希瑟一直很擅长烹饪，但是在纽约的时候，她有事业要追求，后来又生了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烤面包和派，当然也不会在厨房里变花样，创作新的菜肴。如果她是生长于一个什么方便对象都没有的家庭，也许她会很习惯料理三餐。但是她母亲就像许多那个时代的母亲一样，发现了许多减轻家务劳苦的其他选择：厨房电器及用品、洗衣机和洗碗机、冷冻食物与包装食品。在那个时代，越能迅速处理的东西，大家越是喜欢。对于希瑟来说——下班后赶回家，半路上买条法国面包，回家配意大利面吃——节省时间通常是唯一的做法。

一百年前的典型农妇不能选择便利的生活，不能一脚踢开那个缺乏便利设备的生活。希瑟当然也不能这么做。有时她会站在鸡舍外，手指不耐烦地敲出嗒嗒的声音，等待某一只母鸡下蛋，好让她拿去做餐点（有一次做布朗尼巧克力蛋糕的时候，她不耐烦了，探手到一只母鸡的屁股下拿鸡蛋，被母鸡狠狠啄了一下）。去年六月，我们以为我们即将展开为期一年的非强制性节食，但是借着我们拥有的有限的食材，希瑟成功地应对这项挑战，凭着活力与创造力，每天做出三餐，一个星期七天都做。我们这一生从来没有吃得这么好过。这是真的，一开始我们消耗了很多卷心菜（多到我再也不想捏死一只卷心菜上的毛毛虫，这并不是因为捏死虫的过程令人感到恶心，而是因为它们的内脏会散发出卷心菜的味道）。同时，鸡蛋仍然频繁地出现在许多菜里，不过它们很新鲜，味道也好，我不介意多吃点蛋。但是希瑟真的在每天三餐中用许多种食材做变化，做出汤（南瓜、咖喱西葫芦和小扁豆、玉米浓汤）、沙拉（田园生菜沙拉、菜丝沙拉、土豆沙拉）、法式咸派、面包布丁、浇西红柿酱汁的面条、烤根茎类蔬菜、南瓜煎饼、玉米布丁等。她经常用烤箱烤吃的——卡士达布丁、派、饼干、蛋糕、比斯吉和面包。她还做优格和奶酪，包括一种加了香草调味的山羊奶酪，它的味道不输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生产的山羊奶酪。她甚至做了一些古怪的东西，比如说，包着花生酱脆

皮的小扁豆派，这是她从19世纪的食谱上学来的。

然后希瑟也对做面包发生了兴趣。对于希瑟来说，用酵母发酵的面包是另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从她耐心揉面团的模样看得出来，这件事让她感到自豪。在我们那位回归田园、也担任囚犯咨询员的邻居莉兹·罗斯的协助下，希瑟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学做面包，有些面团做得太湿了，粘在揉面团的板子上拿不起来。有些又太干了，发酵发不起来。莉兹已经做了50年的面包，她坐在那里，看着希瑟揉面团，直到面团的每一个步骤都弄对了。希瑟说，莉兹是个真正的女人，她的意思是，莉兹什么事情都会做。“烤面包就像生命中的许多事情，”莉兹对希瑟说，“一旦你抓到窍门了，这件事就会变得很容易。”

到目前为止，希瑟已经掌握了诀窍。她的面团一发起来，她就把它打出一些小洞，让它扁下去，并且剥成小块，把每一块压成小饼，然后将边缘往中央的部位翻折过去。做好了以后，她把20个面团在托盘上排成两排，等着它们变成蓬松、有嚼劲的面包。不久，烤面包的香味就跟烤南瓜的香味和烧木柴的烟味融合在一起，炉灶也会摆上炖锅，里面装着沸腾冒泡的食物。我大口喝下咖啡，吻了希瑟一下，拿起水桶，现在我得去外头干活了。希瑟用毛巾擦擦面团，当的一声打开送柴火的小门，加进一些木柴。这是一天的开始，她的厨艺时代也正揭开序幕。

感恩节

感恩节那天的早晨，希瑟的心思仍然放在烹饪上，尤其是那只五千克重的火鸡——她第一次做烤火鸡，而且是用木柴炉的烤箱来烤。事实上，她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只火鸡身上，因而完全没有想到其他的部分。

“你要在火鸡肚子里塞什么？”我母亲问。

“哦，糟糕！”希瑟说，“我忘得一干二净。”

“别担心！”我母亲立刻开始采取行动，“我来处理这件事。”她的确

在处理了。她拎着一个篮子出去，回来的时候，篮子里装着黄褐色的树叶、几根松树的枝子，还有地窖里拿出来的两个小南瓜。

比尔·罗伯森也许不想跟人聚会——后来知道，他在前一天动了第二次手术，不过他和佩姬还是来了。他们当然没有两手空空地来做客。比尔为这顿大餐做了蔓越莓沙拉，佩姬做了糖土豆。比尔比平时安静，他的脸上一直挂着勉强的笑容，来掩饰刚动完手术的疼痛。趁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旁，给我看他身上挂着的尿袋。

我们认识比尔和佩姬虽然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像我们的家人一样。他们请我们到家里享用他们新摘与贮存的田园蔬菜，他们帮我们带鲁德，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种菜知识，让我们带些19世纪作家的小说回去看。他们知道我们非常想念以前听音乐的时光，有一次就邀请一位当老师的朋友到家里来，请他们在他们的露台上弹奏吉他，唱歌给我们听。请比尔夫妇来过感恩节，是因为我们一直想找机会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很感激他们来一起用餐。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激我们的身体健康，生活平安，菜园丰收，地窖里装满食物，还有亲人远道来访。我的兄弟比尔和他的厄瓜多尔籍妻子米歇尔从布鲁克林过来。他们在客厅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希瑟和我悄悄溜到厨房。

“真的太棒了！”她趁着我们要大家帮忙摆餐盘之前对我说。她的眼睛看着放在桌上、装在大碗和盘子里的菜肴，为了这一顿，她已经忙了好几天。

“我的意思是，去年春天我们连怎么播种都不知道，现在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感恩节的意义。”

眼前的景象足以让大家惊讶到喘不过气来。厨房的每一个能摆东西的平面上都摆了菜肴：装在大碗里、热腾腾的玉米布丁，撒上碎迷迭香的烤土豆、青豆，还有米饭和熬煮的勾芡肉汁；冒着热气、用碎鼠尾草调味的玉米面包在平底烤锅里。这些鼠尾草是希瑟播种、收割，扎好了晾干的；还有酸黄瓜，蘸了芥末的鸡蛋，罗伯森带来的蔓越莓沙拉和糖土豆；希瑟的发酵面包，还有几个鲁德做得歪七扭八的面包；希瑟烤的两个南瓜派，还有一盘火鸡切片，在我们的烤箱微微冒烟的高热烘烤下，这只烤火鸡达到了完美的程

度，热气让鸡肉逐渐收汁，把希瑟所做的调味料都吸进去了。

我们九个人手牵着手，围着餐桌而坐。坚强忍耐的比尔·罗伯森不让自己身体的不舒服显露出来，他祷告感谢这些菜肴和我们的友情。我对创造出自己盘中丰盛食物的造物主感到敬畏。我想到希瑟对我说过，她的祖母克莉丝汀对食物表现出浓厚的情感。每一次希瑟和我去探望她时，她都会做出一大桌菜肴，还让我们带很多罐她做的无花果酱、德国泡菜和亲友间知名的手工脆片花生糖回来。我发现，希瑟过生日那天，我也在做同样的事。而现在，我们的面前摆着丰盛的餐点——带着爱心播下种子，带着爱心烹煮成菜肴，带着爱心端上桌来给大家吃。我举起酒杯。

“敬希瑟。”

转变

不，我母亲并没有在那个原来是家畜用的长形水槽里洗澡，但是她对这项1900年计划的看法显然有所转变。“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会这么好吃。”感恩节大餐结束后，大家正在慵懒地休息时，她说。我们在前门露台上的摇椅上来回摇晃着（没有电视可播放美式足球赛，让大家待在室内）。但是我们之所以变得慵懒，不单是因为丰盛的食物，还加上生活步调不再紧凑匆忙，身边不再老是有分心的事物。我们慢慢享用食物，喝苹果酒，和邻居互访。鲁德坐在拖车上，我母亲拉着拖车，沿着石子路散步。她是个艺术家，画了许多张奶牛、谷仓和山峰的画。我父母很快就跟比尔和佩姬建立了感情（我偶然看见他们在低声地交换电话号码，以便在家里出现紧急情况时相互联络）。我确信，经过“9·11”攻击事件后，他们看待我们这项计划的态度改变了，他们更能欣赏我们找到的这个史威普小区了。

几天后，我母亲跟我说了些话，证明了我之前的想法。当我们在我家车道旁道别，她抱抱鲁德，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和希瑟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创造出了一个美好的生活。”

鲁德发烧

我的亲人离开后不久，有一天我早晨醒来，发现鲁德站在我们床边。“起来！妈咪、爹地的床床！”他的两只小手朝着我们伸过来，这双手很烫。我把手心放在他的额头上。发烧了。

要是在纽约，我们可能会给鲁德吃一颗儿童止痛药，然后送他回床上睡觉。我们会安心睡去，心里想着，如果到了明天早晨他还是不舒服，我们就带他去我们家那条街上的诊所看医生。但是在此刻，我满脑子都是我妈在这里的时候，对我说过的一些话。

当时她在看一本小说，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阿帕拉契山的一个村子里。“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他们的生活跟你们多么相像，”她说，“那个洗手间，那座井，还有油灯。”然后她描述一个有关小孩发烧的场景。这男孩的父母在夜里抱着他下山，来到一位医生的家里，但是医生什么都没做，只给了他一些咳嗽锭。他们回到家中，孩子就死在家里。我无法摆脱那个景象，这对夫妻抱着注定要死的孩子，走在黑暗孤寂的山路上。

我的心思飞快地转到我们那辆停在草地的汽车上，如今这辆车已经成为老鼠们的小旅馆。那是之前麦可·葛佛瑞跟我走上山坡，去看我们的这片牧草地时，发现了鼠群的出没。我们从这辆被杂草淹没的旅行车旁边走过——我这双专心于1900年生活的眼睛几乎没有发现到它的存在——麦可探头往车里看了一眼，轻轻叫了一声：“老天爷，哎呀！”老鼠们在车里走出纵横交错的路线，车子的座椅上鼠粪点点。

“哦，不妙。”我呻吟了一声，把乘客座位打开，鼠尿的臭味让我退了一步。冷气口上挂着丝丝缕缕的碎纸片。方向盘旁边的置物柜里，汽车登记的文件（已经过期）和保险数据（已经取消保险）也被咬碎。在车子外面，雨刷下方的通风口上，稻草做的窝从通风口里面戳出草来。我们打开车盖，麦可摇摇头说：“我早就晓得会这样。”引擎附近许多互相缠绕的好几种色彩的线路，大概有半数被咬断了。引擎旁的凹陷处，都筑了稻草和纸片做的窝。“哦，好吧，”我“砰”的一声，关上引擎盖，“这个问题明年夏天再

来烦恼吧。”

希瑟站在鲁德的床边，就着油灯的柔和光线抚摸他的头发。我们都觉得害怕，因为我们已受到制约，习惯依赖医生，同时，我们也被宠坏了，习惯一有事就要立刻取得协助。要走到哪一步，我们才能为了孩子的健康竖白旗认输，打破自己定下的规则？我们在布鲁克林拟订这项计划时，也想到过同样的问题。鲁德经常有耳道感染和喉咙发炎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准备抗生素？最后我们选择不这么做，我们想赌一下，我们觉得，一旦他离开了充满细菌的托儿所以后，患了病应能自行痊愈。到目前为止，鲁德还没有生过病。

要是在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可能必须面对严酷无情的结局。带孩子出门看病，让孩子暴露在寒气与湿气之中，可能会造成病情恶化。你必须驾马车出去，把医生接来，让医生到孩子的床边看诊。即使医生来了，情况也不见得好转，因为医生基本上对大多数的重症无能为力，包括病毒性和细菌性的感染在内。医生的黑色医疗包里装着吗啡，来减轻病人的疼痛，还有治疗疟疾的奎宁，以及碘酒、石膏和各种药糊。今日用这些东西来治病，多半会被看成江湖郎中的伎俩。有些医生身上还带着类似木匠的工具包，里面装着截肢用的锯子。1900年的时候，只有百分之十的医生上过大学。

第二天，鲁德不肯躺在床上休息。他下了床，跟着我们在屋里到处走，他的嘴里还是哼哼唧唧的，不过有些时间他也在玩耍。一开始我们担心他会把自己累倒，但是如果他真的很不舒服，他的身体自然会强迫他去休息。不久我们就发现，鲁德的发烧不会威胁到他的生命，也不会威胁到我们定下的规则。两天之内，烧就退了，于是我们立刻省下了气力，不用再争辩、讨论是否该打破我们的规则，带孩子去给21世纪的医生治病。

水果蛋糕和圣诞树

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希望进入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注意力

会绝对集中，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这种转瞬即逝的时刻，溜冰的人会溜得比较快；高尔夫选手会把球打得很远，需要跳跃的时候，他们会跳得比过去都高。在这种时刻，时间停止了，奇迹发生了。有一位作家把它称为“时间里的甜蜜位置”^[1]。

这项计划早期遭遇的种种困难，包括笨拙地握着缰绳，双手因为使用种菜的工具而磨出水泡，还有向对方怒吼着发出指令，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在时间里找到了属于我们的甜蜜位置。温德尔·贝瑞所说的，人类的那种“对于未来的那种奇特、几乎神秘不可解的渴望”，已经在我们心中消散，至少暂时是这样。我们对于自己重新创造出来的这个过往的生活，有了足够的自在感与安全感，因而可以把精神和体力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我们已彻底进入瓦罗所说的消耗期，户外的事情减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希瑟用一罐罐保存在玻璃罐里的食物来烹煮三餐，在之前的种种工作完成后——播种、摘取、“啪”的一声切开、再切成薄片，这些收成都密封在玻璃罐里了。我不再害怕寂静。那些讨厌的流行歌不再在脑中萦绕不去。它们消失后的安静，加上不再有科技产品分散心神，让我能在生理与心理两方面都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景观：夜间星辰移转，麝鼠在结冰的河面上滑行，几百张蜘蛛网在清晨薄雾中闪闪发光，宛如显现在草丛中的一条盘旋蜿蜒的灿烂银河。

我们的餐厅里摆着一座巨大的铁制暖炉，24小时燃烧，我从来没有烧掉过这么多木柴。但是经过几个月来无数次的劈歪了柴、敲坏斧头把手、肩膀酸痛不已之后，我终于掌握到劈柴的诀窍。劈下去的时候，脑子不要想着怎么劈才会成功。先暖身，动动肌肉，集中心思，找到一种节奏，然后几乎是盲目地把斧头举到头顶，让刀刃经由直觉而感受到在橡木的每一圈年轮里盘旋蕴含的能量，“啪”的一声，伴随空心的咔嚓声，木头炸开成两半，碎木块滚动溅射，空中弥漫着一股波本酒饱含单宁酸的厚实香气。

我对自己强健能干的双手感到惊奇，对自己的耐心与干劲感到讶异，这

[1] 时间里的甜蜜位置 (*The Sweet Spot in time*)，书名，作者为John Jerome。

种状态跟我在纽约时越演越烈的急躁心态恰好形成对比。在这个年节时分尤其明显。

在纽约的时候，从感恩节到除夕，每当这个强大的年节旋涡把我们卷进去，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都不得幸免的时候，我就变得暴躁易怒，冷嘲热讽，看什么都不顺眼，年年如此。今年我们把所谓的旧日圣诞节精神——过节前拥挤推撞着去买各种用品和礼物，造成信用卡大量支出；在机场排长长的队伍等候办理登机手续，队伍如同腹泻的肠道一般抽搐扭动——换成了远比旧日更为古老的另一种圣诞节精神。到目前为止，我的心情与过去迥然相异，这里的情况也都很顺利。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早就开始为这段年节假期准备各种事情。那是在九月，当伊许塔送来一块水果蛋糕的时候。这可不是那种装在红色圆形铁盒里，送到家门口，拿起来沉甸甸的、含有残留的放射性物质、加入荧光色染料的糖渍水果丁蛋糕，这是一块湿润的黑色水果蛋糕，是一个朋友用她曾祖母自创的祖传食谱做成的。它的味道香甜、浓稠，带有大地的朴实感，我吃了一口，咽下去，它浸润我，如同一首优美的诗篇。

伊许塔说，如果把这块水果蛋糕吸足了白兰地酒，再用布包好，就能摆上好几个月都不会腐坏。在1900年的时候，能否把食物好好地贮藏起来，让它们从生长的季节维持到下一个季节，有时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当然也意味着，人们是仅仅能够存活下去，还是有办法过得不错。能够把一块掺了水果碎块的蛋糕从夏天保存到严冬，几乎就像施了魔法一般的神奇。这就像在自己家的地窖里，留住了一缕温暖的阳光。

然而今日还有谁记得老式水果蛋糕的魔法呢？几乎没有人记得，因为冷冻、化学性防腐剂和塑料真空包装的方法延长了糕点甜食的保鲜期限，使得这种能够摆上好几个月、以百分百天然方法制造的甜品，不再为人们所需要。然后，食品工厂开始大量生产水果蛋糕，用红色圆形铁盒包装，这种做法等于为水果蛋糕这个甜品之王敲起了丧钟。如今水果蛋糕给人的感觉，最多也只是正餐之后的欢乐高潮罢了。

感谢我们回到过去的这项实验，让我们再度对水果蛋糕有了需求。这

种需要，伴随着麦安德丽老奶奶掺了酒的美味配方，唤醒了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就施魔法的角度来说——水果蛋糕带来的欢愉和实用价值。我们觉得，水果蛋糕逐渐成为一种象征，代表了过去生活里包含的种种细微的喜悦。然而，在现代社会大步前进的发展下，这些喜悦早已走样，被轻视、被忽略、被遗忘。伊许塔九月来访后不久，我们就决定发动属于我们自己的水果蛋糕复辟行动。

这件事说明了，我们家厨房工作台上为何摆着24个长条形水果蛋糕。它们都是用粗棉布包裹扎好，整齐排放，宛如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它们被摆在地窖的一个椭圆形大盆子里好几个星期，并加入各种佐料调味。现在希瑟把白兰地——这瓶酒是戴维和梅若送我们的礼物——滴到每一块蛋糕上，浓烈的甜味弥漫在暖和的厨房里。她轻轻地把蛋糕翻面，让蛋糕的背面吸足酒汁，然后把蛋糕一一放回蜡纸上，将它们重新堆在大盆子里，然后再摆回地窖里，等到要送人当礼物的时候，再取出。

这些水果蛋糕只是我们为了今年的圣诞节所做的许多准备工作之一。希瑟把一颗土豆刻出的圣诞树图案当作印章，涂上绿色的颜料，盖在纸上，做成圣诞卡，她这几天都在盖她的圣诞树印章。在圣诞饰品方面，我们把今年春天积攒下来的手工艺品材料摆在餐桌上：木质圆珠、线轴、缎带、荷叶边、胶水。我们用老式服装使用的别针来制作玩具兵人偶。鲁德和我拉着他的拖车走到院子里，捡拾云杉的球果和包着种子的柔韧黑色荚壳。回到屋里以后，他帮我把胶水滴到球果上，包住，然后撒上土豆淀粉当作白雪。我们用装潢房子用的细针在球果顶端钻洞，将它们用线穿成一串挂在树上，你瞧，多么好看啊。玛莎·斯图尔特^[1]要是看到这个，一定会伤心得要命！这些黑色胶质的种子荚是大自然制作的现成饰品，它们的星状放射形小球连接着僵硬蜷曲的茎秆，形状像一个倒过来的字母J——简直是天然的挂钩！我们原本想把蔓越莓和爆米花做成环挂起来，但是后来想到，等我们睡了，老鼠们会在夜里爬上去大快朵颐，才打消这个念头。

[1] 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美国知名居家生活节目主持人。

许多年前，比尔·罗伯森在这里种了40亩的白松和云杉。当时他觉得，有一天也许可以把这些云杉当作圣诞树出售，来贴补当老师的收入。但是种植圣诞树需要经常修剪树枝，而且必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卖钱，因此比尔就不再管这片林子了。如今它长成一片浓密到无法穿越的森林，覆盖了他所拥有的十公顷土地的南端。这些树木多半很高大，要不就是长在没法走进去的树林深处。但是我在这片森林的边缘看到过几棵比较小的树。比尔说，欢迎我们砍一棵带回去。

我们去砍圣诞树的那天，天气寒冷，天色灰暗。我站在谷仓里，把衣领竖起来抵挡强风，牵着贝儿来到马车旁边。过去我从来没有砍过圣诞树。我将一把斧头和一把锯子丢到马车后的运货区，还带了一些麻绳。从七月间我们全家去参加威尔逊家的派对以后，我们就没有一起坐马车出来游玩过。经过那次狂野的行程后，我们认为让鲁德坐马车，的确有些危险。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当作例外状况来看待。我们要去的地方并不远。同时，我们对于要砍一棵树回家当圣诞树，感到非常兴奋。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的圣诞饰品需要有个地方挂起来，让它们闪闪发光。

鲁德对于坐马车感到非常兴奋，不过贝儿开始小跑步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冷。不久她就拉着马车，走进罗伯森家的那条短而陡峭的车道。他们的汽车挡住了路，因此我要贝儿向右走，越过菜园的那块地——如今这里是一片干燥、空荡荡的土地。比尔从厨房走出来，我把贝儿系在篱笆的柱子上，比尔走到这边来。

在比尔的协助下，我们选择了一棵两米高的挪威云杉。手拉锯很快切断树干，留下一块平整精细的平面。我们因为天气寒冷而冻得不停跳跃，也没有留在那里聊天。感谢比尔的帮忙，我们把这棵树扎在马车后面的运货区上，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鲁德暖和地依偎在我和希瑟中间。

每一棵圣诞树都像是为了它们所在的位置定做的。它们让松杉的清香弥漫整个房间，并且带来一种璀璨的期待感。然而今天让我们觉得特别不一样的是，我们跟我们的这棵树所生长的土地，跟种下这棵树的那个人，跟砍下这棵树的这个严寒的冬季，跟把树运回家所花的力气，深深地联结在一起。它挺立

在我们的客厅里，枝条伸展，散发清香，手工制作的圣诞饰品挂在树枝尖端，显得沉甸甸的。我们的这棵谦卑、形状稍微有些不完美的云杉，照亮了我们的家。它所散发的光华，远超过任何一棵修剪得毫无瑕疵的圣诞树。

礼品手作

这段年节假期带来的焦虑感，我们并未全然幸免。今年我们不用购买各色圣诞礼物，改成用手工制作所有的礼物。希瑟和我合力制作了一本手工书——《1900年的一天》，送给我那七岁大的教女，她叫海瑟，住在里士满市。我负责文字的部分，希瑟画了好几张美丽的水彩画，赋予这本书鲜活的生命。同时，希瑟自己制作装礼物的纸袋，装了水果蛋糕、南瓜面包和黑莓果冻送给朋友。她骑脚踏车分送礼物，踩着踏板在史威普上坡下坡，来来去去，穿了厚厚的衣服来抵挡寒气。邻居顺道来访的时候，她就让他们带些姜汁饼干、装在玻璃罐里的酸黄瓜，或是苹果酒回去。她甚至装了八个小纸盒的好东西——果冻、水果蛋糕——寄给外地的亲友（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人会取笑希瑟的水果蛋糕）。由于天气寒冷，我们都不想去邮局那么远的地方。有一天联邦快递的送货员给我们送来一个包裹，我们试着请他帮忙把东西带到邮局去。“你们得打电话叫他们过来。”他站在厨房后门的门口，眼光扫视着我们的木柴炉，还有晾在炉子旁边架子上的一大堆洗好的衣服。

“我们没有电话。”希瑟说。

“你们去过镇上吗？”

“没去过。”“对不起，我帮不上忙。”他含糊地说，一面快步走向他的卡车。

我们是自己制作圣诞礼品，不过1900年的时候，一般家庭当然会到商店里为彼此买礼物。在圣诞节假期前后，一般商店都会从天花板挂上玩具和饰品，将橙子、椰子、肉豆蔻和其他有异国风情的农产品，摆成几何图案作为装饰。孩子们在长袜里发现的通常是搪瓷娃娃、玩具兵、折叠小刀，或是小

梳子搭配小镜子的组合。尽管当时的圣诞节商业化的程度远不如今日，但19世纪后期出现的许愿书邮购目录，让这个基督教的节日更趋向物质主义。有一天，我拿起1897年西尔斯百货公司的目录翻阅，试着想象我若活在那个时代，会想给我的家人买什么当作圣诞礼物。

给希瑟的东西，我看到了金银细丝手工的珠宝饰品、卫生纸和药膏；在假发类，有一块隆起的卷发，叫作“巴黎式刘海儿”。给鲁德的东西——在这本786页的目录里，儿童礼品数量甚少，这件事相当程度地说明了，这些年来人们对儿童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在索引中列为“玩具”的礼品有六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扫一般地面的玩具扫帚、扫地毯的玩具扫帚、玩具保险箱、仿铁质颜色灰暗的玩具熨斗、玩具大行李箱、玩具马车——连这些马车看起来也像是为了干活用的，而不是为了得到一点乐趣。

而家里的男主人呢？送他们的礼物有脚踏车、长枪、豪华的马车。今日人们拿来送礼的DVD，相当于当时魔术幻灯投影机，它是用煤油灯作为光源，把一张颜色深暗、低分辨率的幻灯片投影到墙上。购买的人可以把《圣经》里的场景或一些滑稽的图片投射出来，例如一个人骑着一头猪。也有展现黑暗面的场景。有一个系列的图片名叫“酒吧里的十个夜晚”，它包含以下的画面：一、叙述者来到“镰刀和麦捆”酒吧。二、乔·摩根跟“神经病特莱蒙斯”在一起。三、威利·哈蒙德被人带着染上赌瘾。四、法兰克·史莱德杀了他的父亲。

我不太喜欢这种互赠礼物的活动。这些没有意义的送礼行为，以及伴随而来的浪费与浪费后的罪恶感，往往会引发我内心的吝啬性格。但是当我接到一片以邮寄方式送来的吉列牌锋速三（MACH3）刮胡刀试用品时，很讽刺，我心中充满了物质性的渴望。它装在一个没有商标的纸箱里，纸箱约有录像带大小。这个造型圆滑、闪闪发亮、有三重刮刀的装置，代表了刮胡刀科技最新、也是最重要的进展。我想要它，我想得要命。但是我没法摆脱一件事，这件事时时刻刻折磨着我，那就是我不能用这个东西。我没有将这把刮胡刀丢掉，而是藏在一个公文柜的抽屉里。偶尔，当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我会含情脉脉地看着这个银色的对象，目光在它的产品说明上流连不

已，例如“润肤紧滑条”和“舒适的边缘”让一个男人“少刮几下，就能得到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这么贴近皮肤的刮胡效果”。包装盒上的法文说明更具有诱惑力。“所以，锋速三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你的脸上滑动，带来柔润的触感！”

我对现代生活的抱怨从来不包括刮胡刀在内。每隔五天左右，当我坐在桌前，面对着那盆装了清水的缺角搪瓷盆，还有那把“割喉”刮胡刀的时候，我忍不住觉得有点荒谬。把锋速三拿起来用就没事了，我脑中有一个声音说，这样就可以结束这场血战。当我们的另一种完美选择已经出现了将近——还没有完全达到——百年的时候，何必要求自己经历这样痛苦的折磨呢？吉列牌刮胡刀公司创办人金·吉列（King C. Gillette）在1903年推出全球第一把钢制刀片的手动式安全刮胡刀时，当时男士们就在争相购买这项产品，即使它的零售价高达五美元，占一般劳工周薪的一半。如今我却不愿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抗拒了这项诱惑，把它连包装盒一起塞进抽屉，走开了。

希瑟的双亲

希瑟的双亲约翰与吉妮在圣诞节的前几天，开着一部轿车来到这里，他们带来的东西非常之多，把车身压得微微颤抖。车子里悬挂着大小袋子，厚呢衣服、皮鞋和靴子，同时，他们带来许多圣诞礼物（包括送鲁德的一套塑料高尔夫球具）、圣诞树的饰品、一袋袋的日用品、几箱希瑟的祖母做的果酱，还有两个巨大的冷藏盒，里面装满了猎捕得来的野生动物尸体，它们全都是约翰某一次到外地打猎或捕鱼成果。他把死尸放在冷藏盒里随身带着，从美国的这一端带到另一端。

约翰·希金波森，他是个猎人、养马人、打高尔夫球的人，也是个律师——他有充分的理由对我们这项计划感到怀疑。他小时候在亚拉巴马州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他们全家人都下田耕作。成年后，他努力摆脱了辛苦种地的生活。希瑟和我头一次向他说明这项计划时，我几乎听到他心中不停回荡

着一个声音：“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要把花了这么多钱接受的教育抛在一旁？你们付菜钱完全没问题，为什么要自己去耙土，吃自己种的食物？为什么要剥夺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条件？为什么要剥夺你们儿子原本所能享受的一切？

约翰和吉妮来到我们家的第一天晚上，两人正在努力适应我们这栋粗糙的乡村居所。我们坐在煮菜的炉子旁边喝茶。约翰是个英俊的男人，有着大波浪的褐色头发，说话带着低沉的南方拉长口音。他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十一岁的时候，他是怎么用骡子耕地，怎么替家里的两只奶牛挤奶（再加上邻居的一头奶牛，他们付他一星期1.5美元的挤奶费）。还有，做完家事和农事以后，他会去兼差，开着一辆“法摩尔牌”（Farmall）拖拉机，为一位农夫把泥土翻松。“他会给我送来燃油，还有一点吃的，然后把我留在那里，我会做到凌晨两点。”约翰说。这份工作，每天的薪水是一美元。他还帮人摘棉花，由压实的棉花称起来的重量计算薪水，天还没亮，趁着露水还没干以前就要出门，“这个时候棉花比较重”。约翰在四个孩子中排行最长，他帮忙母亲经营家族农场。他父亲身体不好，长年卧床。他们有一座菜园，保存根茎类蔬菜的地窖里，摆着一排排金属盖密封的玻璃罐食物。他们用绳子绑着水桶，从井里打出地下水。他们在住家旁的空地上挖了洞作为茅坑，约翰很痛恨这个茅坑。17岁那年，他离家到纽奥良，想加入国营的商船队当船员，却因为年纪太小而未能如愿。到了18岁，他终于得以逃离务农的生活加入空军。之后又上了大学，念了法学院，成为一名成功的小镇律师。他还拥有一个头衔，就是他那一州出庭律师协会的会长。

在亚拉巴马州，约翰养了两匹马。它们的名字是“黑男爵”和“恐惧之神”。他在选拔预赛中骑着其中一匹马，带着他的猎鸟冠军犬，以充沛的活力让一群鹌鹑受到惊吓而从地面飞起，这让他比赛中得到很不错的分数。如今我明白，这两匹马象征着约翰从拉着骡子耕地的卑微处境提升到有闲阶级，达到具有支配力的地位。而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他的女儿在优越的环境长大，在全国顶级的好学校里接受教育，结果她丢下了洁净、高压力的智库工作，投入必须勤劳劳作、直接面对收成后果的小农生活。尽管约翰可能不

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我仍觉得，衡量他是否成功的一个最伟大的标准，就是他的女儿可以选择回归农村，享受田园之乐。

由于约翰是养马的人，他很关注贝儿，非常期待驾着马车出去走一趟。这个主意让我有点紧张，不过第二天我仍给贝儿套上笼头，把她的牵绳系在谷仓里的柱子上，准备让她拉马车出去。

“你有马梳吗？”约翰看着贝儿。她肚子上的毛沾着泥巴，背上的鬃毛结了块。她的鬃毛已经开始形成梳不开的死结。我在库房小屋里四处翻找，最后找到一把我在本地农村合作社买的、梳理粗硬头发的梳子。这不是一把马梳——我甚至不确定马梳是什么东西——不过我们可能必须拿它当马梳用了。

约翰用平稳、有技巧的方式给贝儿梳毛，她立刻接受了他。他每次骑马出去走过一趟以后，都会用水管在马儿身上浇水。他说，今天出去跑回来以后，我们得找个水桶，装满肥皂水，给贝儿洗个澡。

不久，我们就出发了，我们走的是一段长约八千米、风景如画的环状路，去程是沿着中央河往前走；回程则越过一条美丽的山脊。吉妮跟我坐在坐凳上，约翰弓着身子坐在马车后方运货区的一张临时凑合着用的长椅上。我们走到一座横跨路两边的农场旁，两边立着一栋农庄和几栋小库房小屋。贝儿踟躇不前。哦，糟了，我想。又是一座小屋。

“向前走，贝儿。”我努力保持镇定。

她抗拒缰绳的指挥，显然她一步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我用树枝轻轻拍打她，她往前跃起。“啪”的一声！有个地方出问题了，车轮的轮轴歪向左边，车轮底端倒向贝儿身侧。

“哇！”

贝儿再次向前跃起。

“嘿！”约翰在后面大叫一声，然后，他突然跳到前面来，仿佛从一辆起火燃烧的汽车里跳出来。他扶着吉妮，让她下了马车。我留在马车上，握着缰绳。贝儿慢慢平静下来。约翰检查马车受损的地方——两条缰绳的皮带裂开了——就在这个时候，贝儿猛地向前冲过去。

“让开！”约翰喊道，他跑到吉妮面前，粗暴地把她推到一旁，这时，贝儿拉着马车冲进了路边的水沟。

我拿出包扎东西用的细绳，开始修理马车。这趟驾马车出游的旅程结束了，我们让马车掉头，朝着回家的方向行去。

这趟马车之旅让我很失望，但是约翰和吉妮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他们俩卷起袖子，立刻投入了1900年的生活。吉妮为我们的圣诞树带来一些老式的圣诞饰品，又帮着希瑟准备圣诞大餐。我们向自己保证，圣诞大餐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像那顿感恩节大餐一样，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约翰回到他十六岁时辛勤工作、想要让他刻苦的母亲高兴的模样。他劈柴打水，用干草喂马和羊。在谷仓里，他帮忙我在喂食室和羊圈之间，用钉锤建造了一座牛栏，修好了谷仓大门的门闩。尽管断裂的缰绳让我们暂时不能再驾着马车出游，我们还是为贝儿做了一些事。约翰教我如何为她洗澡，修剪她的鬃毛。有一天下起倾盆大雨，我甚至看到约翰在修补谷仓屋顶漏水的地方。“你有没有排水沟用的钉子？”他问道。

之前我希望展现自己驾驶马车的本领，让约翰刮目相看，但是赢得他的心的，似乎是我们这里的平淡生活，这种情况就跟我们的宁静生活改变了我母亲对我们这项计划的看法差不多。生活里的例行事务，木柴燃烧的气息，夜晚油灯的柔和光晕，一定是在他心中引发了怀旧的感觉，让他回想到自己生命中那段贫困却单纯的日子。约翰可能很不喜欢农庄的辛苦，但是那段经验塑造了他的价值观，那段时光让他成为今天的他。他很了解这一点。从他对母亲的崇敬，从他回味那段艰苦时光的时候，他的口气里流露出来的自豪，就能看得出来。他和吉妮为希瑟这个独生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我可以体会到，当他们听到我们要进行这项1900年的计划时，那种感觉就像脸上挨了一记耳光。但是从许多方面来说，结果跟他们料想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个计划让我们沐浴在爱的怀抱里——我想约翰已经开始了解这一点了。

送给鲁德和希瑟

现在是圣诞夜，而我还没有开始为希瑟和鲁德制作圣诞礼物。好几个月以前，我就决定用一把削皮的小刀，还有我在麦可·葛佛瑞家看到的刨工台，制作手工木雕送给他们。这意味着我必须先把刨工台造起来。所以，一个多月以来，在麦可的指导下，我在干活的时候偷偷摸摸地溜走，把一块橡树的原木切开，跟劈木板的斧头和短柄的斧头一起藏起来。我在木板边缘凿出四边形的榫孔，把要插入榫眼的凸榫磨光，削出栓头，用力转动曲柄，凿出小孔。我终于做出了刨工台，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圣诞夜就要结束了。我转过身，面向着我制作的礼物。

我用小刀雕刻，用砂纸磨光，直到天黑，在油灯的微光下，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矮人精灵，独自待在这栋寒冷、杂乱、老鼠奔窜的库房里。我的手腕很痛，背弯久了很酸。我的毛衣沾满木屑，宛如沾满肮脏的雪花。但是我坚持下去，决心要在圣诞树下放一件给鲁德的礼物。这是他度过的第一个真正的圣诞节——至少是他第一年晓得现在是圣诞节。

天亮的时候，我跟平日一样早起，将两个木柴炉点起火来。温度计显示，现在是零下七摄氏度。约翰和吉妮在客房睡着，可能冷得要命，因为暖炉的暖气几乎没法传到那个房间去。圣诞节要吃的那只鹅“约翰”^[1]在南达科塔州就装进袋子里，现在它的肚子里已经塞了好料，放在一口大锅里，在低温的天然环境下冷藏，等着进烤箱。我从边缘结冰的水桶里拿了些水，把咖啡壶放到炉灶上。咖啡壶结了冰，发出清脆的叮叮声。我靠近烧柴的灶口，缩着身子，揉搓着起泡的双手，用嘴巴朝着双手呵气。

鲁德一醒，就冲到圣诞树旁边，找到了用质地很轻的菩提木雕成的、哈克^[2]所乘的小木筏。组成这些木筏的木条每根大约零点六米长，用麻绳绑在一起。木筏上有一根桅杆与帆桁，一片麻布做的船帆，并且用蓝色印花大手

[1] 鹅“约翰”（Christmas goose John），美国人的圣诞大餐为烤火鸡，英国为烤鹅。

[2] 哈克（Huck Finn），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著《顽童历险记》的主角。

帕绷紧了作为甲板。当他开心地拿起这艘筏子来玩时，我不禁眉开眼笑，高兴得像个孩子。

希瑟的礼物体积比较小，也没有木筏那么精细——是一副黑胡桃木刻成的筷子。我在筷子旁边附了一张纸条。“既然我们住在许多树棍子中间，”纸条上写着，“我想你应该会喜欢有一副属于自己的小棍子。”

第十章 严冬

寒流

大自然在除夕夜送来一阵来自北极的强风。我们凌晨醒来（1901年了？），气温停留在零下十摄氏度上下。希瑟的父母已经回去了，他们带走了我们送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农场上种植出来、由我们保存下来的食物，其中包括一盒送给希瑟外婆的果酱，过去我们从来没有送过她罐装食物。假期结束了，现在寒气紧紧攫住我们，让我们浑身颤抖，好叫我们注意到它的存在。

过年时来袭的这道寒流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挟着狂风来的。由于直到1939年，南极探险家保罗·希普（Paul A. Siple）才提出“风寒指数”^[1]的理论，在1900年的时候，农人只能像我们一样，靠着抱怨和诅咒，而不是靠着具体数据，来认知冬季逐渐增强的寒带气旋。夏季的微风是我们的老友，它让我们感到凉爽，吹散蚊虫。如今这风成了我们的敌人，它像一把寒

[1] 风寒指数（Wind Chill Index），当天气寒冷及刮大风时，人体产生的热量会被风迅速吹走，因此人会感觉温度比实际温度低，此种“感觉温度”即是“风寒指数”。

冰做成的刀片，切穿过这片小小的山谷，戳入门窗的缝隙。当我们鼓起勇气走出大门，它像许多小针，刺痛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住在距离我们家八万米的杰佛森说，这种无孔不入的冷风就像“把一股令人丧气……既沉重又带有压迫性的寒气，压在人们的心上”。我把有洞的地方用大头钉钉上、木块封死，睡前把报纸塞在洗手间的门底下。在谷仓迎风的那面墙上，我用钉子钉上锡板，盖住没有玻璃的窗洞。然而动物们仍然抱怨个不停。狂风把飞到半途的鸦群吹得七零八落，院子另一头的鸡几乎被吹得离开地面，像沙漠风滚草的草团一样，在地面飞舞滚动。我偶尔晚上凝视夜空，会期待天上众星被吹得四处乱转。

现在天气变得寒冷，我们都穿着长长的内衣，外罩铺棉帆布外套，这是一家1889年成立的公司生产的衣服，到今天这家公司还在制作衣服。我的脚上穿着羊毛袜，当我穿着这双穿起来有点痒的袜子，就会提醒我，我可是费了很大工夫，才找到这种袜子的。去年冬天，在一家户外用品店，也就是那种贩卖高档防水外套和轻质帐篷的商店里，我向一位年轻的店员求助：

“你们有没有卖羊毛袜？”

“当然有。”他一面用轻快、高亢的音调说，一面领着我走向一座旋转的袜品立体展示架，“就在这里，先生。”

我看看这些袜子，发现只有一种含有羊毛的混纺袜，它的牌子叫“聪明的羊毛”（Smart Wool）。“你们有百分之百羊毛做的袜子吗？”

“这就是羊毛做的。”他说。

“这是‘聪明的羊毛’做的，”我说，“我需要‘笨’一点的。”

“对不起，您的意思是——？”

“不要合成的材质，”我说，“只要普通的羊毛，那种穿了会痒的。”

“哦，这就没法子了。现在他们不做这样的东西了。”

最后我和希瑟还是找到了这种袜子。我们也找到了普通羊毛做的手套。最近这一阵子，连南方吹来的风也是冰冷的。我比前一段日子更常穿着羊毛袜，戴着羊毛手套——而且老是觉得痒。

一个世纪之前，一般的农夫就是在寒冷的早晨醒来，强迫自己离开温暖

的毛毯，套上冷冰冰的外衣，脸盆架上的脸盆结了冰。他把这层薄冰敲碎，盛水洗脸，走出去，到户外小屋上厕所。在我们家里，冬天的早晨也差不多是这样。

在一扇结了霜、有月光照进来的窗户旁边，我迅速地套上我的衣服。楼下暖炉里的火不是熄灭了，就是只剩下一缕细烟，屋里的温度可能低于冰点。我点亮油灯，鼓起勇气走到屋外，去释放我的膀胱——我的牙齿因为寒冷而互相撞得嗒嗒作响，随着喷出的热腾腾的尿液，白雾般的水蒸气冉冉上升——水桶里的水结了薄冰。我敲碎它。尽管寒气侵入骨髓，每天早晨我还是觉得神清气爽，心情愉悦。我停下脚步，吐出的气息立刻结成冰晶。天色开始泛红，我侧耳倾听远方的牛群哞哞低鸣。有些日子里，东方的云朵如波浪般起伏翻腾，晨光映照河面，让这条河宛如一条橙色和粉红色的熔流，在梧桐倾斜的枝干下缓缓流动。

我开始在早晨固定花一段时间阅读。我把暖炉和煮菜的木柴炉生好火以后，就缩着身子坐在厨房的炉台旁边，倾听木柴爆裂的声音，一面让身体吸收热气，一面读书。展开这段生活后，我得到一种崭新的专注能力，这种能力让我感到惊讶：我很快地看了狄更斯、哈代、王尔德、霍桑、欧文、威廉·豪威尔斯^[1]的书，还有托马斯·杰斐逊的书信集，以及几本1900年出版的小说，包括查尔斯·维德尔（Charles Waddell）的《雪松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the Cedars*），德莱塞（Dreiser）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这本书会让乡村地区的一般读者感到震惊^[2]）。同时，我还读了几本19世纪问世、人们遗忘已久的畅销爱情小说。

今天早晨我低着头，鼻子凑在（因为油灯的灯光微弱）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3]。不久，我就被带进男女主角玛吉和汤姆·托利威

[1] 以上皆为19世纪知名作家。

[2] 《嘉莉妹妹》，该书男主角乔治原本生活富裕，爱家爱子，却因爱上女主角嘉莉愿意放弃一切，当时出版商认为这种情节伤风败俗。

[3]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该书描述的是19世纪英国乡村地区弗洛斯河畔，在一个小磨坊成长的女性玛吉艰难的一生。

家“左侧的客厅”。我“当”的一声打开炉灶的铁门，火光和热气涌到我脸上。我把一块木柴丢进火里，用火钳把它推到里面去。有一刻，我凝视烧得橙黄的木炭，看着那珠宝般璀璨摇曳、令人惊叹的光芒，整个人动也不动，直到咖啡的香气和咖啡壶发出的嗒嗒声让我跳了起来。我倒了杯咖啡，加了浓稠的羊奶。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便把昨天吃剩的玉米面包浸满油的褐色脆边剥成小块，放在碗里，加进一汤匙蜂蜜搅拌——我把玉米面包的脆皮视为一种稀罕的美食——然后再度在炉子旁边坐下，回到托利威这家人旁边。不久，希瑟和鲁德起床了。蛋在平底锅里煎着。我提起桶子，往挤奶室走去。回来以后，我会跟他们一起坐在餐桌旁边吃早餐，喝我的第二杯咖啡。

过了一会儿，我们也许会看看书，写几封信给亲友。冬天来临以后，希瑟和我开始把之前就该回复的信件一一回复。我们给亲人和离开市区的朋友写长长的信，信笺上溅满墨渍。我们写下感谢函，还有其他主题的短信，寄给邻居。这些信历经八万米路程抵达夏洛茨维尔，经过分类，然后越过蓝岭山，送到距离我家只有三千米的朋友家。

就像今年的其他活动一样，写信、收信也有它特有的愉悦情调：老式钢笔的钢制硬笔头与笔管、漏得斑斑点点的污渍，与潦草的字迹——希瑟和我的中指都磨出了老茧。写完信以后，必须用吸墨纸把墨渍吸干，让信纸干透。在信封上写字也得经历同样的步骤，整个过程可能要花掉半个早晨的时间。然而这个过程是有回报的，不时看看信箱里是否有来信，接到信件时心里的兴奋，让我觉得写信实在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有谁会来信？信上会写着什么新的信息？我们一看到信，就能看出是谁写来的——我们的朋友蔻克的字体短小方正；我父亲写字会拉出许多环形线条，兼有医生写诊断书的潦草；伊许塔的字整整齐齐，非常老式，跟她送给我们的食物外头包着的蜡纸一样老式。我会先把信默读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读一次，仔细体会每一个句子，有时又大声地读上一遍，念给鲁德或希瑟听。你可以一面讲电话，一面开车或搅拌浓汤，但是写一封信需要全神贯注地投入，而这种极度的投入会展现在完成的作品上。我父亲是不能一刻没有手机的人，刚开始听到我们要进行这项计划时，他几乎无法想象如何能忍受一整年都不能打电话跟我们联络。但是

他慢慢适应了这种情况。他经常写信来，他的任何一封信里所包含的内容密度与诚挚心情，远超过十通不专心交谈的电话。

冬天迫使我们更贴近自己的家。气温降低后，邻居们也很少来家里坐了。经过了夏季种菜，秋季把食物贮存装罐，感恩节与圣诞节的丰盛分享，如今大家仿佛都进入了冬眠期。我们也随着动物们的脚步蛰伏下来。家成了我们的洞穴，木柴炉散发着热气，冒出的橘色火光照亮我们的房间。吃晚餐的时候，我经常疲倦得头都抬不起来，有时趴在盘子旁边，就这么进入梦乡。

尽管我们觉得家里很舒适，我们仍努力跟阴郁的氛围搏斗。1900年的生活与四季密不可分，我们这一年的冬天也一样。如果去年夏天繁盛的众生——野草、蚊虫与各种啮齿类动物，每一个生命都在拼命争取资源——让我们觉得烦恼，今日周遭的死寂更是环绕在我们身边。枯枝向下伸展，宛如瘦骨嶙峋的手指。不再听到小鸟婉转歌唱，取而代之的是风的呼啸。曾经翠绿的菜园，植物全都凋萎，只剩下枯枝被风吹得嗒嗒作响。一天晚上，我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恐怖的尖叫挣扎声，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有一只负子鼠死在露台上，尸体嵌在地板的木片中间。负子鼠不会冬眠。它们会另外找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做窝，这个地方通常是人类住房的地下室，这一只当时一定是想到地下室去，半途中被我们的某一只猫咬死。冬季刚开始的时候，鲁德和我在院子里发现一只死掉的山雀，我们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掩埋它。我拿了把铲子，我们走到枫树旁边。我挖了个洞，把这只鸟放进洞里。鲁德说：“这里就是它睡觉的地方。”我原本正在用铲子填满这个洞，听到他说出如此纯真的话语，不禁感到震惊，停了下来。艾吉^[1]写道，他的祖先“在泥土地下层层叠叠地躺卧，宛如包在毛毯里的婴儿”。我几乎能听到鲁德小小的心灵在想：爹地为什么把泥土撒在一只睡觉的鸟身上？

无论如何，做家事能让我们专心，不去想其他事。我在寒气中挤奶，手指阵阵刺痛，但是两只山羊的乳房温暖了我的手。到了晚上，我借着油灯的

[1] 艾吉（James Agee，1909—1955），美国小说家、诗人、编剧家、记者，也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评论家之一。他的自传式小说获1956年普利策奖。

光线挤奶，我让两个桶子轻轻相撞来赶走老鼠，这些老鼠靠着挤奶台下面散落的谷粒过活。尽管我们已经把大水桶挪到屋里的洗手间内，我还是经常要把动物专用喝水桶里的薄冰敲开，舀出大冰块，不时再倒些水进去。由于有两座炉子要烧木柴，最近我每天又多劈了些柴。

希瑟在屋里洗衣服，在洗手间漂洗与扭绞衣服，屋里还是很冷，气温经常只比冰点高一些。她把衣服挂在靠近木柴炉的木架上。天气稍微暖一点，她就到屋子外头洗衣。有一日天气较暖，她刚把床单洗好，在外头晾干，打着旋涡的北风突然来袭，气温又突然回降到零下六摄氏度。等到我们想起还有床单晾在外面，床单的两面已经冻结黏合在一起，硬得像纸板一样。我试着把床单的边缘拉开，它就像美工纸一样地裂开了。还有一次，我忘了在一阵寒气来袭前，把泡在我们那个洗澡水槽里的尿布拿到屋里去，结果变成了一大块冰冻的脏尿布——我们叫它“尿布棒冰”。即使在洗手间里，还是花了三天，这个大冰块才完全解冻。

一天早晨，寒冷的空气刺激着我的鼻子，就像鼻子用力吸到辣椒一样。我嘎嘎地踩着地上的冰，穿过一片因为结霜而变硬的牛尾草，那些草啪啪地打在我穿了工装裤的小腿上。我走到井边的泵打水，但是没法打上来。水管结冰了。我必须用水桶从井里打水上来。

我的确这么做了。从井边到家里，提了七趟，水一路溅出来，把裤子打得湿透。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一个美国家庭而言，平均每人每天用水量为380升。我提水的来回距离为两百米，两手各提一桶水，总共走了将近1.5千米的路，才为我们的大水桶注入约50升的水。

由于干旱的问题持续存在，我们的井这次只打出了将近50升的水。我们这里降下的雨水不足以补充地面下蓄水层需要的水分。如果水位再降个三米，我们就会无水可用了。跟史威普当地的农夫们讨论缺水问题，并不能减轻我的忧虑。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干旱。河流水位降得非常低，乔和爱迪·威尔逊夫妇担心它会整个冻住，这样他们的奶牛就没水喝了。我们的朋友黛比和华特的牛是在结冰的浅塘喝水，他们俩的问题才真的很严重。

“我们那口井里的水，连吞颗阿司匹林都不够。”华特对我说。他们愿意花

大约一万块美金来钻一口新的井——只是跟钻井工人登记要这么做的人实在太多，他们还得等。不久之前，琴妮喂完她的牛以后，带了些啤酒来我们家坐，在我家吃了碗墨西哥辣牛肉末。我们正在逗鲁德玩——“再给我喝一口”。他恳求地看着我手上的奶瓶。这时，我提起了旱灾的问题。琴妮喝了一大口啤酒，当她放下啤酒罐，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这儿必须快些下点雨，或者下点雪，”她说，“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万一继续缺水下去，大家就会撑不下去。没草给牛吃。之前的牧草地也长不出草来。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养牛了。”

之后又有两次，我来来回回地提水——加起来总共提着水走了三千米路——终于把塑料水管的螺丝松开，把总长约一百米的水管拖到地窖里。第二天冰全化了，我又拖出水管来接上。天气寒冷的时候，每一次打完水，我都得把水管里的水放干净，免得它再次结冰。

就算地窖里也不安全。这座地窖有部分空间高于地面，且有四扇窗户。理想的状况是，罐装食物应该贮存在10摄氏度到21摄氏度的环境。一天早晨冷风来袭，气温降到个位数，地窖里浸泡的罐装食物开始冰冻起来。

食物冷冻后会往外撑大，导致封罐的部分破裂，让食物腐坏。有些食物坏掉了你会注意到，但是食物里有肉毒杆菌，却不容易察觉到，而这种细菌会使人中毒。它吃起来、闻上去都没有味道，肉眼也看不出来。

肉毒杆菌会制造肉毒杆菌毒素——它是人类所知的、毒性最强的物质——在氧气浓度低的环境下，它会大量繁殖。大多数肉毒杆菌中毒的来源是家庭自制的罐装食物。人们有时误以为这种疾病是中风，因为它会造成肌肉瘫痪。瘫痪的部位从眼皮开始，眼皮会出现下垂的现象，然后它在体内往下走，影响说话的能力，造成吞咽困难，手臂不听使唤，胸口肌肉紧缩，然后蔓延到横隔膜。患者会无法呼吸，最后窒息而死。这种毒素的毒性极强，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四分之一茶匙的肉毒杆菌就足以杀死一百万人。1991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向联合国视察小组承认，该国已大量制造肉毒杆菌结晶，总量比足以杀死全人类的量还要高出三倍。

我发现感染肉毒杆菌的案例十分罕见时，并不特别感到安慰，因为我

又想到，我们这对城市乡巴佬在这里假装过着一百年前的生活。每打开一罐封过的食物，都会在我心中引发新的疑虑：我们煮玻璃瓶消毒的时间够不够长？封盖的地方是否有了裂缝？

我发现地窖里的温度降到冰点后，立刻用碎报纸和木板封住窗户。于是地窖的温度计指针升高了，回到四摄氏度左右。

“不能碰的木头”

火灾是进入严冬后的另一项威胁。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的农村，在城市消防局服务范围以外的远方，人们靠着生火来煮食物，来取暖照明，烧热水洗澡，让洗好的衣服床单不致结冰。每一户人家都面临家里发生火灾的威胁。希瑟的父母来我们家过圣诞节的时候，谈到他们家以前在冬天发生火灾的不幸事件。当时吉妮才两岁，她家的房子——她父亲在这栋房子里出生——在一夜里化为灰烬。她母亲因为吸入浓烟而昏厥，还好她父亲抱着妻子和三个孩子，逃到了安全的地方。约翰的祖父母所住的农庄在1945年烧毁，他们这一家就没有那么幸运。当时约翰九岁，住在距离他家不到一千米半的一栋没有电的房子里。

“当我们知道那边发生火灾以后，我们立刻就在那天夜里沿着石子路往那边跑过去，”约翰对我们说，“当时邻居已经开着他们家的黑色雪佛兰两人座汽车，把克莱德送到医院去了。”克莱德是约翰的舅舅，当年才十一岁大，他是“嬷嬷”克莉丝汀的小弟。约翰和克莱德形影不离。“我们是最佳拍档。”约翰说。那天晚上，壁炉里的煤变冷了。克莱德觉得火熄了，就洒了些煤油上去，轰的一声，煤油爆炸，油罐子起火燃烧，火焰将他团团包住。“他们说，他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五都受到灼伤，”约翰回想道，“克莱德死前的一刻，一直哭着要见我。”

有时候，我在上床前把木柴送进这座大而热的木柴炉的时候，他们讲的这些事就会涌上心头。我把炉子的那几扇沉重的门打开，尽量多塞些木柴进

去，然后关上门，让这堆木柴因为有门缝漏进去的空气，得以慢慢燃烧。这个动作叫作给炉子堆满柴。要是运气够好，火就会整夜燃烧，明天早晨就会有足够的、烧得火红的煤，可以用来生新的火。如果运气不佳，我就得重新开始生火，等一段时间，屋里才会变暖。为了避免第二种情况发生，我把木柴炉塞得满满的，有时甚至必须用脚把木柴踢进去，把脊背压在灶门上，才能把灶门关上。通常炉子里的火会熊熊地燃烧一会儿，然后火势逐渐减弱，转为闷烧。每当我上床的时候还会听到熊熊的炉火声，我心里总觉得不安，不放心把一个装满火焰的铁箱留在那里，彻夜无人看顾。

在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烟的味道把我熏醒了。整栋房子里都是烟，呛得我的眼睛刺痛。我点起油灯，走到楼下察看。一打开餐厅的门，一阵浓烟让我呛咳起来。我拉起衬衫下摆盖住口鼻，压低身子走进来，以为会看到火焰涌上四面的墙壁。还好只是因为炉子的通风口冒出了浓烟，烟雾又从门缝里渗了出去。

希瑟也醒了。她站在门边，一手抱着鲁德，一手在揉眼睛。然后，她看看炉子。“是那块‘不能碰的木头’吗？”她用责怪的口气问。

“对。”

“我就知道，”她一面咳一面说，“你只是想要报复。”

我把这块沉重的洋槐木称为“不能碰的木头”，它硬到可以把斧头的木质把手震裂。几个月前，我试着把“不能碰的木头”劈成小块的时候，吃到了苦头。现在每当我们有男客来家里住，就会看到对方不顾我的警告，拿斧头用力朝着这铁块般的木柴劈下去。我一次次地把这块木柴抛到柴堆后方，但是到最后，它总会回到劈柴的树桩上。举起你的锤子，把铃敲响，证明你的男子气概^[1]！

我觉得，这块密度甚高的木头里面，一定蕴藏着很大的能量——对，我也许就是想要报复——我把“不能碰的木头”放进灶炉的柴堆里。结果这块

[1] 美国游乐场常见的一种游戏，玩的人高举木槌，重击凸出于地面的打击点，打击点后方有一直立的力量测计，以滚珠计算敲击力。测计的顶端装有一铃，敲击的力道越强，滚珠升得越高，力道足以让滚珠升至顶端敲响铃的人，可得奖品。

木头再一次击败了我。它烧得非常慢，使得炉子里热力不足，无法将烟推到烟囱外。如今风又把这些烟吹回屋里。假使我们不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就会在一个寒冷刮风的夜晚，被逼得逃到外头去。

“别管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我一面喊，一面跳上窗台，“我们必须让空气进到屋子里来！”

我打开前门。强风吹进来，纱门往上跳，而后落下，连接门框的铰链松开了。希瑟放下鲁德，打开后门。风像一列运货火车般隆隆地冲进来，啪啪地从她的睡袍边穿过，吹落墙上的月历和明信片，吹得炖锅嗒嗒作响，一个空玻璃罐从脸盆架被扫到地上，许多玻璃杯摔得粉碎。在黑暗中，油灯的火焰明灭不定。鲁德大声尖叫。这幅情景就像恐怖片的紧张场面。

“关上！关上！”我喊道。她关上了，快步走过去抱起鲁德。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大声说。我们可以泼水到炉子上，但是炉子可能会裂开。专心想，专心想。在狂风吹打屋子，烟雾腾腾翻滚的时候，要专心真不容易。这可不是那种你坐在营火旁，感觉有点不好闻的烟味的时候。它又浓烈又肮脏，像个排毒的气口，从我的舌头上往里喷，让我的胃绞扭变形。我把头伸出窗外，大口吸入新鲜空气。

然后我想到，屋子外头的那座原本给家畜用的水槽，里面还有一些肥皂水，是我们洗澡的时候留下来的。“我们可以把这块木头弄出来！”我说。

“什么？”

“把鲁德摆到高椅子上。等我准备好了，你就把洗手间的门打开。”

鲁德没有说话，他的身体摇摇晃晃，眼睛却睁得很大。希瑟让他坐在他那张木头高椅子上，给他绑上安全带，他穿着小小的红色连体裤，脸上露出迷惑的神情。这里为什么黑黑的？妈咪和爹地在做什么？早餐在哪里？

我戴上防火的皮手套，打开灶门，将这块冒烟的木头一把拿出来。它很重，我的力气不够大，真担心可能会拿不住，而掉在松木地板上。我要报复？这个浑蛋已经赢了，它想烧掉这栋房子。

“开！”我大叫，希瑟“砰”的一声把门打开。狂风吹袭这块木头，突然间，它就像在汽油里泡过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火星纷纷射向我。我迅

速向后退，走出去，把它扔到水槽里。它掉进水里时余烬四溅，落到干燥爽脆的草地上。我舀起一桶水，把水洒到附近的地上。赤着脚，穿着内衣，我闻嗅着，检查地上每一处可能发生火灾的地方。我四处查看，又检查了水槽里的木头，它还在冒着火星。我把水槽摇晃了几下，让水淹没它，它滋滋地冒出蒸汽。我浑身颤抖，回到屋里。希瑟正用给炉子送柴的铲子，把地板上的火星铲起来。炉子现在不冒烟了。

我们决定睡到客房去，那里距离炉火和烟雾最远。希瑟和鲁德先过去，我留在餐厅里，让餐厅再透透气。

等我上床的时候，我的脚沾满尘土，衣服上有浓浓的烟火味，像刚离开火场的消防员身上的味道。已经快到我该起床生火煮早餐的时候了。为了不让热气散掉，我们把睡觉的这个房间的门关上了，房里还是非常冷，加上房间的两侧都有窗，感觉上好像住在一艘迎着强风的船的船头。我还在咳嗽，情绪也太激动，无法入睡，便就着油灯的光看看书。风啪啪地拍打着这栋房子，嗒嗒地敲扣屋顶。我一直等待着，总觉得家里有一扇窗的玻璃会被吹碎。

“风是不是在打屋顶？”鲁德问。他依偎在希瑟身旁，还是觉得害怕与不解。

“是呀。”我说。我揉揉眼睛。

“你怎么了，爹地？”

“我的眼睛热热的。”

“你眼睛里是不是有火呢？”

“不是，我的眼睛是因为被烟熏到而觉得刺痛。”

“就像被蜜蜂叮到一样？”他说。

“不，甜心，”我低声说，“爹地没事。睡吧。”我吹熄油灯，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现在没事了。”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屋外，去看泡澡的水槽，水槽里躺着那块被烧成黑炭、一半露出水面的木头残尸。我把“不能碰的木头”拿到车道旁边。“再会啦。”我举起它，扔了出去。沿着路边，它滚下山坡，掉进了河里。



鲁德在洗澡。（Nini Ward/摄影）

新的仪式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段短暂的冬季时光，我们的活动范围也变小了。这个温暖的住所，还有六个月以来，第一次意外降临在我们身上的自由时间，慢慢地让我们的精神昂扬起来。我们在木柴炉旁边喝茶谈天，想到哪一首儿时小曲，就努力哼出来。希瑟经常烤饼干和面包来吃，香味弥漫屋内。她和我继续回信，与早该提笔问候的朋友笔谈。同时，我们仍朗读19世纪的小说给对方听。

新的仪式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最喜欢的一项仪式是，在冬日的木柴炉旁边洗热水澡。我们三天洗一次澡。泡澡的那个晚上，吃过晚餐，我会把洗澡的水槽从外头推到厨房里，给炉台的双口炉添柴，把两大锅的水烧热，直到两股蒸汽如圆柱般冉冉升到天花板上。鲁德先洗，我们帮他耳朵后面洗干净，他笑着，啪嗒啪嗒拍着水玩。洗好了以后，我们把他抱上床，然后开

始泡澡，热腾腾的大锅嘟嘟冒泡，油灯和蜡烛闪着微光。热水让我们全身变得暖和起来，疲惫的肌肉慢慢松开。薰衣草肥皂的香气萦绕在房间里。到了这个时刻，玻璃窗已经蒙上一层薄雾般的水汽，把我们与屋外的黑暗隔开。我们在这座大炉子前面擦干身体，如同小鸟烘干自己的翅膀一般，我们把擦身体的布朝着炉子张开，让热气包住自己赤裸的身体。洗好以后，我们钻进拼布百衲被里，身体洁净，皮肤发红，古董床的床架吱吱作响，我们忍不住小声地笑出来，又希望鲁德不要被吵醒，然后进房来。

我们很喜欢这温暖的家园，努力不让寒气把我们变成这栋房子的囚犯。我会把鲁德抱起来，放在肩膀上，我们到森林里去散步，寻找鹿的踪迹；我们把小圆石头扔向结冰的河面。皮克和斑鸠琴在结冰的地方溜冰，像冰上的曲棍球选手一样，用爪子去打小石头。冬天的第一场雪真是美极了。

在这里，没有上班或上学的事情可取消，也没有因为汽车被大雪阻挡而无法出门，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地上覆盖着一层毛毯似的白雪。不过这种天气还是让人觉得，这一天是白雪皑皑的。我让鲁德坐在一部枫木做的小雪橇上，拉着雪橇跑。他皱着鼻子，两条短腿缩在鼻子下。我的皮靴底部已经磨平，没有任何摩擦力，因此，一整个早上，我努力地拉着雪橇，试图走到谷仓和水井泵旁边，但是过程中至少摔到地上三次。我用粗麻布把脚上的靴子包起来，在脚踝的地方绑紧；我的头发蓬乱，胡子七天没刮了，看起来好像狄更斯小说里所描述的捡破烂的人。我和鲁德和雪橇以“之”字形路线从草坡的一边滑下去，雪花飞溅，拍打着我们的脸庞。每滑下去一次，鲁德都尖叫着说：“还要！”然后，鲁德突然领悟到，雪是一种冰冷的东西，于是这件乐事结束了。一分钟前，他还朝着雪堆里冲撞挖掘，现在他却把两条臂膀僵硬地摆在胸前，对着雪堆发出尖叫，仿佛它们是外星球来的异形，即将对他发动攻击。

这些雪在地面一段时间，才逐渐融化。又降了一次雪，希瑟用一个大碗，装了许多新降的粉状雪花，将它与奶油冻混合在一起，做成了雪花冰激凌。我们喜欢看着披一身鲜艳红衣的北美红雀落在洁白的雪地上，在长了向日葵的园子里四处啄食。尽管我们会摘下向日葵的种子，准备做葵瓜子吃，

但仍有许多种子掉在地上，让北美红雀搜索捡食。就像某种解读密码的覆盖物，雪地表层的确能显示出各种动物的足迹——臭鼬、浣熊、郊狼。在夜里，这些足迹纵横院落，从河边延伸到猫咪喝奶的猫碗旁边；从草地延伸到堆肥箱，越过谷仓的院子，来到鸡舍。这只是大自然在用一种方式提醒我们，纵然冬季，它仍然活力充沛，持续地在运作。

近来我没有驾车带贝儿出去。倒不是因为天气冷，而是我对那些劣质品越来越感到焦虑。去年春天我刚买下整套马具不到一小时，贝儿肚子上的那条皮带就断了——这是一个恶兆——到现在为止，至少又有三条皮带断裂，固定缰绳的几个铁环当中，有一个铁环也突然折断脱落。

更让我警觉可能会出问题的是我们的马车。一开始，我对这辆马车的构造发出惊叹，这些木头做的各个部分——轮辐、细杆与车轴——是如此薄细纤长，却又是如此耐用。然后我发现，它们并不耐用。在经验丰富的人手里，这辆马车可能可以作为星期天出游之用。但是经过了 my 过度使用和拙劣修补，我没有好好对待它——一个车轮碎裂，车轴上的一根细杆尖端裂开，把包着钢片的木轮内侧凿出许多凹痕。无论何时，只要我驾着它上路，我就会担心听到马车的某些部位爆裂开来，或是“啪”的一声断掉的声音。

那天早上，我们上了马车，驶向罗伯森家的时候，事情真的发生了。当时希瑟和我把鲁德带去托给他们，好让我们去邮局办事。我们让鲁德在他们家门口下车。

“我们一小时之内就回来。”我对佩姬说，“如果一小时后我们还没出现，那就表示我们可能碰到机械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出发了，希瑟和我对于家里还留着一具烧着柴火的炉子感到紧张，但是难得有机会离开那栋房子，我们觉得很兴奋。就二月初的时节而言，今天的天气再好不过了——阳光普照，气温是七摄氏度——美好的天气让我对马车的忧虑减轻了一些。我们从伊许塔身边走过，停下来跟她打招呼。麦可·葛佛瑞从我们后面开车过来，一面跟我们挥手，一面把他的小卡车开到路旁的草地上。我们的马车进了邮局停车场，希瑟下了车，走进邮局。“牛仔”乔·威尔逊的车开过来，他摇下车窗。

“你好，邻居。”他说。

在邮局停车场跟人聊天，让我觉得很开心。我坐在我的宝蓝色马车上，乔坐在他崭新的香槟色小卡车里。但是从眼角余光里，我看到至少有六辆我不认识的汽车，在赫威特路上呼啸而过。我不喜欢开车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跟别的车千钧一发地擦身而过。有一次一辆坐满男童军的宝马汽车飞快地开上琴妮家的那片山坡，当时贝儿载着我，正用小跑步从对面的方向上坡；这辆车紧急转开，几乎撞上我们。又有一次，一辆漂亮小型车的引擎发出高转速的呜呜声，这辆车的驾驶显然在学前世界赛车冠军马力欧·安德烈蒂（Mario Andretti）的开法，沿着史毕特勒斯森林（Spitlers Woods）的弯道火速前进。还好驾驶及时看到我的马车，将车头转个方向，开上铺着碎石子的路肩，从我们身边扬长而去。

乔开车走了，希瑟回来了，上了马车。我在停车场的边缘停下来，让三辆汽车先走，然后再驾着马车，走上这条车辆很多的马路。贝儿看起来很疲倦，精神涣散，对于这条路也不熟悉。她左右摇晃，前一分钟还拉着右边的车轮走上长着青草的路肩，下一分钟又拖着左边的车轮走进对面的车流里。结果是，我们前进的速度变得很慢。一辆运送干草的超载卡车隆隆地从我们后面开过来，几乎碰到马车的尾巴。

“你要靠边停吗？”希瑟说。

“没有路肩可以靠边，”我说，“只有请他保持耐心了。”

然后我看到在铁路的边坡旁边有一条车道，通往一座铺着碎石子的狭小空地。我驾着马车走上这块空地，卡车呼啸着从我们旁边绕行而过。“可恶的家伙。”我低声说。

贝儿还是烦躁不安。我则是全部心思都放在如何让马车掉头上面，就在这时——轰轰轰！——有个东西把我们身边的空气吸走了。原来是一列火车，一列闪闪发亮的银色美国国铁列车，几乎是从我们头顶上方隆隆地开过去。

贝儿用后腿直立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脑袋左右扭动。希瑟连声尖叫。贝儿正要向后退时，我转头向后看，发现有一辆汽车也朝着我们开过

来。“往前走，贝儿！”我大叫，她往前走了一步，刚好让这辆车开过去。然而她没有空间可以转身，只能走上铁道的边坡。我努力让她的脚步走稳，这时，一声刺穿耳膜的尖锐哨音从空中凌厉地传过来。

贝儿吓坏了。我们紧紧抓着马车，以便保住自己的性命。贝儿跳起来，拉着马车往前冲，车轮发出刮擦的尖声，马车下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部位，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些零件蹦射摔落。之前我们打算在这种时刻跳下马车逃生的计划，现在看起来不可能做到。贝儿退回到马路上，我拉拉左边的缰绳，低声吼道：“呀！往前走！”她向前一跃，开始沿着与火车平行的路面往前奔跑，试图追上火车。希瑟坐在我身边，睁大了眼睛，显得非常恐惧。我猛力拽了拽缰绳，希望它没有裂开。但是不管我发出什么指令，不管我用多大的力气拉扯缰绳，贝儿就是不肯放慢速度。突然间，贝儿年轻了十岁，她体内的每一条肌肉都充满了弹性，她拉着马车往前跑，仿佛拉的是一个玩具。我们在马车上晃得东倒西歪，她跑向一道堤岸，几乎要把马车拖下去，我看到堤岸下有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在等着我们。这时，我察觉到自己太过惊慌，便抓着缰绳，跳了起来。然后我想起克莱德·提尔曼说过的话：“要让它们走，让它们干活儿。”

我紧紧拉住缰绳，手臂放低，稳住了。我试着说些话来安抚贝儿。火车继续从我们身边经过，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这声音怎么老是不停？——然而贝儿的身子摆正了，速度也慢了些。我们的弯道就在前方。我要贝儿朝着这片碎石子斜坡走去。她照办了，而且速度更慢了一点。不久，最后一节车厢也开过去。在听得见心跳的静默中，贝儿用小跑步拉着马车向前行去。

玩滑板长大的男人

一天下午，在马车会出问题的恐惧心理驱使之下，我准备去提尔曼家找他。我多穿了几件衣服保暖，也给鲁德穿得圆鼓鼓的，然后带着他一起去。艾伦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他在那里。”她用手指着那个黝黯的房间。鲁

德紧紧抓住我的大腿。提尔曼脱下了靴子坐在他的休闲椅上打瞌睡，电视机开着。然后他醒来，看了我们一会儿，一面用手搔抓从法兰绒衬衫的胸口戳出来的一丛灰白的胸毛。鲁德松开手，走到电视机前面，在这栋杂乱衰朽的房子里，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影像和声音显得特别有生气。鲁德站在距离电视屏幕约五十厘米的地方仔细看着，仿佛被催眠了一样，屏幕里有几个扬扬自得的人穿着滑雪板，在雪坡上搞笑逗趣。

“你喜欢这个，对不对，孩子？”老人咯咯地笑，“我们的电视在哪里，爹地？”对于我们拒绝在家里放一部电视，我不知道提尔曼心中真正的看法。他曾对我说，他孙子对驾马车失去了兴趣。提尔曼说：“电视的确毁了那孩子。”

我向他说明来此的目的。我打算造一部运东西用的滑橇，因此需要借用他那套训练马匹做工时使用的马具——这套设备附有一条坚固的横向铁杠，有牲口肩部的垫套和颈轭。我要用他的马具来取代我那副细长易断的马具。

“明天我必须用它来运些干草，”他说，“吃过晚餐再来。带你的马来。”

“好的。”我说。我转过身，面向电视：“过来，鲁德。该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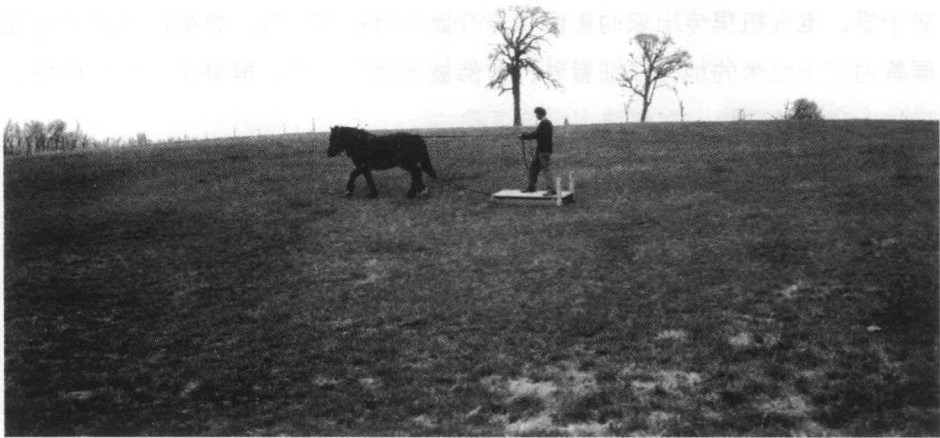
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鲁德，走了。”他动也不动。我抱起他来，他拳打脚踢，大声尖叫。我抱着他走到屋外，让他坐在我的肩膀上，走路回家。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驾着马车到他家去。“你要的是那样的东西吗？”提尔曼一手拿着樱桃可乐，另一手指着一部跟他的滑橇模样相似的橇子，只是这部比较小，上面没有装公交车椅，而且是用松木的粗糙原木做成，而不是用钢条组成。

我停下脚步：“嗯，是的，但是我要大一点的橇子。我打算建一个东西，要用它来运送石头和篱笆的柱子。”

“哦，我还以为你只是想要一个能载着那孩子四处跑的滑橇。”

突然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部滑橇是你特地为我做的？”我说，“今天做的？”



这是一个玩滑板长大的男人，最后跟他的马绑在“冲橇”上的样子。“冲橇”是我在1900年的运动。有时我伏下身子，以保持平衡；有时拉拉缰绳，控制贝儿的方向，我仿佛回到十多岁溜滑板的日子，心中充满喜悦与骄傲。（Michael Dolan/摄影）

“对，嗯，”提尔曼有点不自在地说，“你一直没有来，我也没别的事要做。”这时我领悟到，他所说的晚餐，其实是指午餐。好几个小时以前，他就在等着我出现了。

“这一部对我来说太合适了。”我感动得不得了。

他走进谷仓，拿了一副沉重的马具出来。这套马具有交叉的铁链和厚厚的皮革，看起来好像连南北战争时期的弹药箱也拖得动。“这副马具，”他说，“是我爷爷的。要小心，拿下来以后，不要把它随便乱堆，不然下次你就要花很多时间解开它。”

他伏下身子，在贝儿的脖子底下，扣上老旧的颈轭。贝儿用头轻轻推他，他也用额头顶回去。

贝儿的马具套好以后，提尔曼把缰绳交给我，要我带着她走到滑橇旁边。我再一次察觉到，我走在她后面，手里紧紧抓着缰绳，就像第一次驾着

她拉的马车。贝儿的头向我这边转过来，但是我拉拉右边的缰绳，坚持我的立场。“哇！”我说，我的口气里带着一种平静的权威语调，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她服从命令，站直身子，等我发出下一个指令。

提尔曼把缰绳的铁链钩在滑橇上。

“上去，驾着它走。”他说。

“往前走。”我说，她迈开步子。我跳上滑橇，就像赛跑选手起跑时，脚边溅出一阵泥土，笑意在我脸上蔓延开来。

年轻的时候，我曾想象自己会溜滑板。在我体能状况最好的时期，我可以把车轮轴装在扫帚柄上制成滑板，在我们家附近的U型场地滑行，尽管我的滑板技术一直不高明，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溜滑板的活动里得到的感受，是一种独自进行的追寻，是精神上的巡航与割转，而不是竞争求胜。我所需要的只是我的滑板，一条人行道，加上一片坡地。对于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来说，这种感觉就像飞上了天。

此刻我伏下身子，以免失去平衡，这匹马拉着我越过铺着碎石子的谷仓院子。我被拉回了那段溜滑板的日子。也许我现在的速度只比快步走快一些，然而我已进入浑然忘我的状态。冷风刺痛我的脸颊。我拉拉左边的缰绳，紧急转弯——完全不担心车轮会刮伤，或是马车会翻覆——我驾着滑橇回到提尔曼面前，心中充满胜利凯旋的兴奋与欢欣。

险遭劫难

我把我的这项新运动称为“冲橇”——一部分是冲浪，一部分是滑雪橇。在草坡上冲橇。回到我家的草地上，我戴着羊毛帽和手套，站在滑橇上，滑过干枯的草丛。我用缰绳轻打贝儿身侧，“快步走，贝儿！”我转了弯，越过一片山坡。我拉拉左边的缰绳，贝儿身上的肌肉绷得更紧，我的身体像滑水的人一样，歪向另一边。滑橇歪向一边的扶手，我努力稳住自己的重心。“哇。”我说，一面慢慢停下来。

冲橇让我跟贝儿产生一种联结。除了感受到一种对她的了解，如今我只要把马具拿起来，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感觉到它的重量，听到它的铁链互相撞击的当当声，我就会充满期待地加快脚步往前走。这件事的本身非常有趣。我不必担心疯狂的汽车驾驶，轰轰开过的火车，更不用担心马车的车轮会出问题。贝儿的精神也很高昂，尽管我催她跑上山坡的时候，她的嘴里还是会咕哝着抱怨几句。她太胖了，是吗？等着瞧吧。

我不想在史威普的马路上冲橇，因此新滑橇不能算是我比较精良的交通工具，但是它在农场附近的确很好用。最近有几天气温回暖，可以在外头做事，我就驾着这部滑橇，像开着一辆小卡车一样来来去去。一百年前的农夫使用一种类似的平底橇来运送石头，这种滑橇叫作“石船”（stone boat）。我把堆在谷仓里不用的建材——一块块钻井工留下的煤渣空心砖，做篱笆的包工留下的许多根篱笆柱子运走。贝儿看起来比以前健壮了。

有一天，提尔曼顺道来我家，要我把堆在我家谷仓后面的旧木材和铁板给他一些（显然他需要这些材料，去造另一部滑橇）。我把握住这个机会，让他看看贝儿的本领。她和我也许没有本事去参加本郡游乐会的马匹拉力比赛，但是她的辛勤工作让我感到自豪。这一切都要感谢克莱德·提尔曼这位芳邻。

今天下午他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两排义齿没有敲得嗒嗒响，来表现轻快的心情。近来的干旱问题让他焦虑不安。“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他咕哝着说，“问题出在该死的有太多人在星期天还在工作。”

我正要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星期天工不工作跟干旱问题究竟有何关联时——他又说：“我告诉你他们一定要停止做哪一件事。他们一定不可以再上月球了。如果我们一定要上月球，就会建一条路通到那里去。”

“这件事怎么会影响到天气呢？”我问。

“他们开大火箭穿过大气层。他们不需要这么做。在以前，只要你看那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朵乌云，”他用手指着那个方向，“要是你不赶快跑到特林柏先生家那栋旧库房里，你就会浑身湿透。但是现在这些乌云就是不动。还有那些大喷射机，总是看到它们飞过天空留下的痕迹。他们也在乱整

这些云。这样是不对的。”

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他，所以我说：“来看看贝儿吧，”她站在挤奶室的门边，身躯沐浴在阳光里，“她的身材很结实，对不对？”

“什么？”提尔曼哼了一声。

“贝儿。她看起来很结实，对不对？最近我经常用你给我的那部滑橇，让她拉着做工。我也给她节食。”

他“啪”的一声，拍了她的侧腰一下。“好家伙，”他说，“这里全是肥肉。”

我不让自己因为提尔曼的评语而感到丧气。贝儿和我继续冲橇。我们开始探索我们家后面的那片原野，寻找适合用来砌墙的大石头，我打算造一道挡土墙。有一天，我们把一些石头运走后，我驾着没装东西的滑橇回家，准备再运一趟。这时，我转弯的速度太快，滑橇冲进一道车辆留下的轨迹，往侧边翻覆。我的脚滑了一下，身子摔下去，撞到滑橇的厚木板。缰绳从我手中飞走。“哇！”我一面喊，一面小声地叫痛。就在滑橇快要辗过我的身躯时，贝儿停了下来。我让自己镇定些，但我的身子仍在发抖。贝儿受到了惊吓，在原地踏步。“别紧张，女孩。”我说。我一面揉着肩膀，一面伸手把缰绳捡起来。

在我们进行这项计划期间，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劫难。我遭遇过几次小小的灾难：推一辆堆满木头的独轮手推车的时候，擦破了小腿的皮；鼻子撞上木钳子，撞裂了鼻梁骨；手和脚也曾因为辛苦工作而流起水泡。有一次磨刀，差一点就切下一根手指。冬季的寒冷逐渐退去——至少目前是如此——我们三个都没有食物中毒，也没有长冻疮。我没有被贝儿踢到，也没有从马车上被抛下来，对此我深怀感谢之情。尽管这部滑橇比马车安全，我还是要小心。我们跟刚开始进行这项计划的时候一样，决定不上医院接受治疗。

第十一章 交配的季节



希瑟的疼痛

春天来了。从掠过衣领的暖气流，从琴妮家那片山坡东北边阳光的微微移动，从枫树枝头冒出的第一批嫩芽，我感觉春天来了。这些嫩芽怯生生的，宛如浴池边的人用脚尖试探池水的温度。知更鸟三三两两穿梭林间，一面在草地上啄食，一面提防敌人。就连趴在谷仓向阳那面墙上的一群苍蝇也扰动了我的心，尽管我知道，我迟早会受不了它们不停发出的嗡嗡声。

我检查我们的食物库存。还有六打罐装的西红柿、青豆、玉米和酸黄瓜摆在地窖的置物架上。箱里剩下的几颗土豆已经发芽，冒出细长发亮的枝条，不过我们还有几个南瓜和一些冬南瓜，这些南瓜已经开始出现即将腐烂的色斑，之前我们晾干的那些豆子和豆荚也一样。我们的干货——米、麦片、咖啡、茶、糖粒——情况还好。如果现在还有一些卷心菜倒是很不错（截至目前，我已经克服了自己的神经质洁癖）。不过我们试着贮存卷心菜的努力失败了。以前的人有时候会把卷心菜埋在地底下，四周用一层层的松针铺成衬垫，等到冰雪融解，泥土解冻，就要尽快用铲子把卷心菜挖出来。

我们没有采用这个方法，而是用了我们读到的资料上介绍的另一种方法——摆在地窖里。我们连根拔起12棵卷心菜，把它们倒挂在地下室的屋梁上，它们垂下来，好像切掉头的死鸡。但是我推想，我们的地窖大概温度不够低，因为几个星期过后，这些卷心菜就发出恶臭，滴出脏水来。

我看着柴堆，心里估量着，不确定这些木柴够不够用。尽管今年冬天不算太冷，我们还是一捆又一捆地烧着柴来煮东西吃，或是让屋子里保持暖和。万一木柴用完了，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也许可以到附近的树林里寻找枯枝。我们虽然担忧木柴不够用，近来也一直在担心没有足够的雨水，但是我们的心情还算不错。从我们开始进行这项计划以来，头一次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完成它了。

一天早晨，我们的这种自信遭到了挫折。当时希瑟从户外厕所走回屋里，她的脸色灰白，用手扶着厨房的门框，撑住自己的身体。

“怎么了？”我的大腿上摆着一本麦尔维尔^[1]的小说《泰皮》，身旁的茶几上摆着一碗吃了一半的麦片。

“又来了。”她说。

“什么东西又来了？”

“那种痛。痛得好厉害，我差点昏过去了。”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的疼痛。从一月以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发作了。我们一直试着不去管它，但是我不确定现在能不能继续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

“嗯，”我说，“你可以骑脚踏车去诊所看病。”

“骑一万米的路去？”她问，“骑我们家的脚踏车当中的一辆车去？”

除了路远，她能去的地方只是一家乡间诊所，里头仅有一位全科医生看诊。如果这间诊所不能让她看诊，这位医生只会把她转给另一位专科医生诊疗，这就是现代社会医疗体系的实际情况。希瑟咬着食指的指甲。

我停了一下，没有说话。“比尔和佩姬可以带你去看医生。”

[1]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美国19世纪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著有《白鲸记》、《泰皮》（Typee）等。

“我知道。”她不自在地看着别的地方。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害怕去面对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的朋友蔻克和麦可在两个星期之内，就会从纽约过来看我们。他们来了以后，可以送她去看医生。她的疼痛可能不要紧，可能跟去年春天吃了某种药有关。她自己是这么说的；也可能跟卵巢囊肿或子宫内膜异位有关。我们不知道原因。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没有答案。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我们都没有提到“癌”这个字。提起这种绝症，似乎显得愚蠢和过度疑惧，但是我心里想着这事，或许她也一样。七年前，医生从她母亲的卵巢里取出一个核桃大小的恶性肿瘤。然而我们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觉得必然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或许什么事也没有。

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她的疼痛消失了，然后我的心思就被其他的事情占据。举个例子，在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希瑟、鲁德和我发现，这是我们自去年秋天以来，第一次重新回到菜园。我已经习惯了穿一大堆衣服来抵抗寒气，如今换上了T恤和工装裤，觉得自己几乎像赤身露体一样。我们要种一些豆子，这一次我决心要一雪前耻，改正去年春天所犯的错误，让豆子成功地长大。

我用戏剧性的口气清了清喉咙，对着他们发誓说：“这个计划结束之前，我们会吃到青豆！”希瑟正在锄地，听到这话，她抬起眼来看我，点了点头。

感谢这个漫长而干旱的冬天，让菜园的泥土地上布满干枯的稻草和杂草。我把枯干的玉米茎秆和有一个个人高的猪草从泥土里拔起来，把根上的泥土打掉。我挖出了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六根胡萝卜，这是去年夏天最后一批丰收的成果，但是它们已经皱缩到不能吃了。很难相信，仅仅在半年以前，这块荒地还是一片碧绿。你可以挽着一个空篮子走进去，五分钟后出来时，篮子里已经装满丰饶的蔬果。那是一个奇迹。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许多有学问的人仍然相信，植物是自发性地从泥土里冒出嫩芽，这是一种上帝力量的展现，因为种子可以在泥土底下，以静止状态蛰伏许多年，所

以不必播种，植物就能自己长出来。但是当人们不再这么想的时候，种子的状况仍然令人感到惊异：每一种植物长大成熟的模样——它们的体积、形状、色彩、包含的营养——都包含在一颗小小的、有斑点的实体里面。

我用锄头挖着泥土，发现泥土底下有着能让生物存活的湿气，我的锄头搅动了泥土，激发了希望与敬畏之情。我停下来，渴望这种强烈的感受能进入我的生命。我希望它进入我的骨髓，让我永远记住这种感觉。

“真好笑。”希瑟说，她埋下一排种子，给刚播下的豆子浇水，“去年夏天这样的动作我做了好多次才熟练，现在我的身体自动做了，好像跳舞一样。有人说，脑子会忘记事情，身体却永远记得。”

再一次跟她一起播种，感觉真好。种下去的是无限的可能性。春天无视干旱的问题，在各个角落爆发出新生命。大大小小的生物不停地在四处调情、交配、产生下一代。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各种动物当中，这种行为以鸟类和蜜蜂表现得最明显——鸟儿互相追逐，发出尖叫声，拍动翅膀去戳撞配偶；蜜蜂在淡紫色的丁香花丛间嗡嗡飞翔，如同迪斯科舞厅里的单身男女一样，挤在一起跳舞。

必定有某种东西同样扰动了希瑟的心。她斜睨了我一眼，带着挑逗的口吻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对不对？是一起洗澡的日子。”

以前在纽约的时候，我们曾为了要重建1900年的生活，两人各自要做出哪些牺牲而争论不休。有一件事希瑟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不要在1900年生小孩。”一个世纪以前，分娩是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当时白人女性的平均寿命之所以只有48岁，黑人女性只有33岁，部分原因就是许多妇女在分娩时丧命。1900年的时候，百分之九十的女性在家里生产，每十万个分娩的孕妇当中，就有一千人死亡。这个数字高得惊人。

希瑟是百年来医学进展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明。生鲁德的时候，经过七小时痛苦地用力使劲，她被推进一间消过毒的明亮手术房。我抚摸她的头发，在她耳边低声安慰，同时，一群带着蓝色面罩的陌生人在一片垂在她腰部上方的布幕后面为她开刀。紧急接受剖腹手术，让她保住了性命。

我们都想要第二个孩子，但是我们决定等到这项计划结束后再生老二。

希瑟为了我们的实验停止服用避孕药。不过，为了避免意外怀孕阻碍这项计划，我们准备了保险套——否则我们必须禁欲一整年。1900年的时候已经有这玩意儿了，只是当时的保险套是用绵羊的肠子做的，或是用厚厚的、重复使用的硫化橡胶制成。

上个星期我们效法那些小鸟和蜜蜂，没有用保险套。我们想生老二，因此希瑟的疼痛更让我担心。这个问题会不会让她不能受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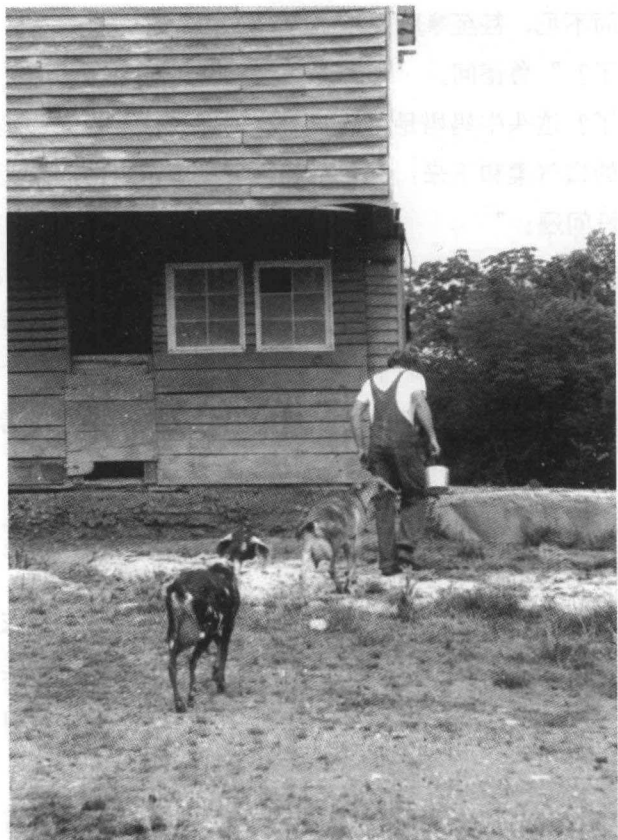
“星星”在寻找爱情

一连好几天，星星不停地发出不舒服的咕哝，经常低声哀叫，好像快要死了。我并未看到她的身体出现乳腺炎的症状，但是她的下体流出带血丝的液体，她沿着篱笆往前跑，脊背颤抖，又把背靠在篱笆柱子上揉搓。她的身体显然很痛。会不会是阴道感染了某种病菌？这个毛病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吗？如果我们请一位兽医来给她看看，我们可不可以违背自己的规则，让她使用20世纪30年代才问世的抗生素？在我几乎让挡泥板在那棵树上丧命之后，我不愿让我们的山羊星星病死。不能让任何生命死去，不能在我的守望看顾下发生这种事。

第二天早晨，我挤完羊奶回来。星星咩咩的叫声回荡耳际。我突然放下水桶，转过身，面对希瑟，她正在喂鲁德吃吐司。“我们必须给星星做点治疗。”我说。

“你何不去看看卡拉会怎么说？”希瑟说，她指的是卡拉·爱莫瑞，她是《乡村生活百科全书》的作者。

我翻开这本书关于山羊的部分，眼睛不禁亮起来。“喂！你听听看这个。”我说，然后我大声读出第710页的内容：“母山羊发情的时候，可以辨识出这种情况，因为她会整天不停地叫，沿着篱笆来回地跑，看起来很想跑出去的样子，还会频繁而挑衅地摆动尾巴。如果你仔细看，她的下体会流出点点血迹，阴唇和阴道也会变得红肿。”



甜豆与星星把我误认为她们的母亲，跟在我身后。（Nini Ward/摄影）

“星星不是要死了。”希瑟说，“她是在寻找爱情。”

对于我们养牛的邻居来说，生小牛的季节开始了。像琴妮和姬恩，这段日子是最忙碌的时节。他们整天开车沿着篱笆来回走，手里拿着望远镜，计算新出生的小牛数量，同时注意即将临盆的母牛是否出现难产症状。有一天，希瑟、鲁德和我越过山坡，提着一篮南瓜面包和鸡蛋去琴妮家。琴妮刚帮忙母牛生下一头体型过大的小牛。她耗尽了力气，牛仔褲上沾着泥土和血迹，长长的黑发整片黏在脸上。她把这头奶牛和她的小牛关在农庄旁边的一处牛栏里，暂时让它们跟其他牛分开。但是小牛拼命努力，想要站起来时

候，母牛却视而不见，甚至拿脚踢小牛。

“它怎么了？”鲁德问。

“它怎么了？这头牛妈妈是个笨蛋。”琴妮说，一说完，她就发现自己讲了脏话。她的口气柔和下来：“它不晓得该拿这个可怜的东西怎么办，但愿小牛的心脏没问题。”

琴妮说，麦可·葛佛瑞不久前打电话向她求助，请她教教如何清理一头母牛分娩后排出的胞衣。他养小母牛（没有生产过的母牛）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今年是他第一次让母牛交配生育，而且他坚持要严格遵守有机的做法。

“必须把这头牛的身体清干净。”琴妮在电话里说，“然后得给它吃点盘尼西林。”

“我的做法是不用盘尼西林的。”麦可答道。

“你的做法会怎么处理一头死牛呢？”琴妮反击道。

在小麦地，在这些事已经完成后，她把这团肮脏血污的胞衣丢到地上。

“你看看！”她说，“它几乎烂掉了。”琴妮不怕说出她的想法。她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她不会因为麦可很有魅力或很富有就放宽自己的标准，让他任意而为。

生小牛的季节让她精神紧张，她自己也承认。不过从她偶尔表现得有些粗暴的态度来看，人们会觉得琴妮真的很关心她养的动物。就在昨天，她走路到我们家来。她身上的工装裤很脏。她拜托我留心她在马路对面点火燃烧的那堆东西。“我发现一头死掉的小牛，一个这么小的小家伙。”她倦怠地说，两手张开，比出那头小牛的身体大小。“我们不知道它是哪头母牛的孩子，也不知道生产的经过。如果我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

支持与友善的距离

今年春天的第一条蛇在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出现，蛇都是这

样，灵巧利落地迂回前行，潜入它们身边的环境。当时鲁德放了一只母鸡出来，我正在追赶母鸡，结果差点踩到这条蛇。一瞬间，它突然出现在那里，在谷仓院子的石子地上伸长了身体。我感到惊讶，但我并不害怕。这是条黑蛇，它会吃我们的食物。但是有人说，黑蛇会赶走响尾蛇和铜斑蛇。所以我转过身去，走开了。因为我认为，黑蛇是跟我们同一国的。

对于男童军，我就不能这么说了。

在童军露营活动的淡季，营地那边虽然大多数时间都很安静，但是周末的定期活动仍在举行，像低气压一般，扰乱着史威普的宁静。有一次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举行露营活动，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从住家旁边迅速驶过（每一辆汽车开过这座桥的凹处时，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有一辆车掉进了这条路再过去几百米的一条深沟里。我们从窗口就能看到它。驾车的人平安无事。我们一直等，觉得他会来借用电话。

这些周末活动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这些汽车轮流离开营地。我们站在前院里，看到琴妮正骑在她的马上，黑发扎成马尾。她那只澳洲牧羊犬“德克斯特”在马的脚边跑动，吠叫着，四处闻嗅，寻找老鼠的踪迹。一辆红褐色的厢型车从对面飞快地朝着她开过来，车子的尾巴卷起一阵烟尘，宛如公鸡的尾巴。他们之间，仅仅隔着一个阻挡视线的弯道，弯道旁边是陡峭的堤防。她看不到这辆厢型车，这辆车的司机也看不到她。

我和希瑟赶紧跟司机比手势，要他减速，并跟他大叫：“开慢一点！”车子开到转弯的地方，他踩了刹车，车轮打滑。他的车尾剧烈旋转，朝着琴妮和她的两只动物冲过去。厢型车冲到距离他们只有几米的地方才停下来。尘土继续飞扬，连我们也被呛得咳嗽起来。琴妮紧闭双唇，眼睛里冒着怒火，她要她的马转过身来。

“先生！”她说。他的车窗是开着的，但他不理睬她，车轮继续转动。他从“停止”的交通标志旁边冲过去，迅速地开走了。

“你相信天下有这样的浑蛋吗？”她说，“在提尔曼家旁边，另一辆车也差点撞到我。”过了不久，有一天，鲁德和我在前院里。有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一个男人下了车，扶了扶他的丝框眼镜，朝着我们走过来。他是几

个月前曾经来过我们家的那位童军主任。当时他有意买下我们家约四公顷的地，准备把这里改建成一个可以开会的地方，还要建停车场，以及“让妈妈们感到方便”的营地。他猛地伸出一只手——仿佛这只手把他的身子往前拉过来——用低沉的声音大声说：“尤金·吉布森。”

“是的，我记得你。你好吗？”我谨慎地说。我察觉到自己身上穿着肮脏的剪短了的毛边牛仔裤、肮脏的T恤，还有满脸的胡楂，这让我感到不自在。

“你……努力的目标……进行得怎么样了？”他的眼光四处逡巡。

“我们很好。营地那边情况如何？”

“很好，”他用吹嘘的口气说，“忙得很！我们在进行一项小小的营建工程。”

“我们看到那些卡车了。”我说。我们的运气很好，这次他们只是把餐厅整修一下，而不是进行重大的扩建工程。扩建的计划仍未定案。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一个忙。”吉布森继续说，营地准备在几个星期之内，主办全州童军大会——有六百个不同年龄的老少童军将要在我们家后面举行聚会！因为有些人有气喘或心脏有问题，他希望我们同意，让他们的一架救生用直升机停在我家房子后面的野地上。“只是为了预防紧急情况。”他向我保证。我直接的反应是：什么？要我帮这些人的忙？他们飞快地开车来来去去，完全无视于小区民众的存在。他们眼中的史威普，不过是一道巨大的减速路障罢了。但是，尽管我的眼前浮现休旅车挤满马路，到处是穿着卡其布短裤、结着领巾的退休人士等景象，尽管这些景象让我的心往下沉，我还是想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让我开口拒绝他。不帮这个忙是不对的。

“当然好，”我对他说，“你可以用那块地——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希望你不会用到。”

“谢谢你的支持。”吉布森又猛地伸出他的手。他看起来好像一个政客，由于一再重复说同样的话，那些话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然而他还是能够让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对他这个深具价值的目标有所帮助。但是我的许可不是为了表示支持，而是一种单纯的友爱邻居的表

现。我想对他说出这句话，但我没有开口。让他自己领悟吧。

掉进柔软的草堆

春季的家庭大扫除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不过今年我很想把谷仓和谷仓里的畜栏清扫干净。我一铲一铲将九个月来堆积的粪便，从畜栏运到菜园，在菜园中堆成一座小山，让它成为堆肥。以前我觉得，天然肥料是不用花力气就能得到的，后来才明白，我必须辛苦做工，这些粪便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畜栏清干净以后，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用叉子把多年来撒落在秣草棚地面的干草，从二楼推到下面的畜栏里。

这堆草足足有三米高，几乎碰到二楼的秣草棚。我大声喊在菜园里的希瑟和鲁德：“要不要来看我跳草堆？”

“你确定这样做不会危险吗，罗根？”

“确定。会很好玩的。”我想象自己落在这个柔软、有弹性的草堆里的景象。如果错过这次的机会，下一次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从高处跳进草堆里。

我的确掉进一个柔软的草堆里，但是我的身体没有弹起来，而是陷入一大团干草屑里。这个草堆非常浓密，有一瞬间，我几乎以为自己会窒息。我挣扎着爬出来，吸一口空气，吐出草屑，接着剧烈咳嗽，嘴里喷出夹着干草和灰尘的唾沫。身体也好痒。我伸手到内衣里，搔抓整个身躯。此时，希瑟已经笑倒在地上。

“再来一次！”鲁德尖叫。

我困难地呼吸着，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袜子里的干草一一拔出来。

要不要打电话

半夜里，希瑟发出痛苦的呻吟。她点亮油灯，坐了起来。

“你肚子痛？”

“对。”她呜咽着说，“痛死了。”

“对不起，亲爱的。”我觉得很无助。

她蹲下去，在夜壶里小便。躺回床上以后，她吹熄油灯。在她不时发出的呻吟声中，我们努力让自己入睡。

第二天早晨，阳光从玻璃窗里照进来。她躺在床上，深思地眨着眼睛。“我必须看医生。”希瑟的语气明显地透露出，她的确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她觉得很痛。我们俩都很害怕。同时，我们都在担心，都不想打破我们的计划中最神圣的一条规则，那就是：我们不能搭车或开车。

我们耗尽了力气来规划这段1900年的生活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健康方面出现重大危机的问题。开始进行这项计划以后，我们也一直没有正视这个问题。最近这段时间，当我多次想到希瑟疼痛问题的严重性，我要羞愧地承认，我们一直在逃避罹病的问题。我们的这一年就快要结束了。难道她不能等到结束后再去看医生？但是我又想，我到底是怎么了？对我来说，我们的这项计划非常重要，但是希瑟的健康比这个更要紧。

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运用1900年的技术和设备过得很好。同时，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不管是个人，还是夫妻之间。我们更证明了，无论你怎么努力，也无法百分之百地重建过去的生活。现代化的生活已经印刻在我们的生命里。即使我们建立一道墙，把自己和汽车、塑料制品和过季的水果隔开，21世纪的科技设备仍然像一片防护网一样，在那里等着我们。

我们坚守自己定下的规则，做出卓越的表现，但是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坚守规则会变成非常愚蠢的行径。我想，我们正在面对这样的关键时刻。

吃早餐的时候，希瑟用清晰坚决的口气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打电话给那间诊所，要那里的护士告诉我该看哪位妇产科医生，然后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医生，约时间看诊。”

“好，”我说，“什么时候打电话？”

“今天就打。我会试试看，希望能预约，下周就去看。如果蔻克和麦可

不能带我去，我会请黛博带我去。”

我们当初之所以决定保留电话线的接头，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万一鲁德出事，或是家里发生紧急状况，就能立刻用电话求救。现在希瑟需要跟医生预约看诊。她可以走到比尔和佩姬家，使用他们家的电话，她也可以把我们的电话线插上。结果她选择在家里打这通电话。

她打完以后，我问：“怎么样？”

“约好了，星期一早上十点去看。她问我，我是不是怀孕了。我说，我不确定。她觉得这个答案很奇怪。我告诉她，我上一次的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她说：‘嗯，那么说，你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了。’”

也许希瑟怀了孩子。怀孕能解释她的身体为什么疼痛吗？她开始寻找怀孕的迹象——乳房肿胀、胸口有灼热感、胃痛。尽管她的小腹的确明显地开始隆起，她还是不确定。

“我敢打赌你怀孕了，”我试着表现出乐观的样子，“你有小孩了。我们是一直都想要孩子的。”

准备就诊

寇克·华许和她的先生麦可·多伦从纽约曼哈顿开着一辆借来的萨博敞篷车来到我们家。他们俩宛如未来的具体象征——时髦的衣服、色彩缤纷的系带球鞋，以及银色框的太阳眼镜。我有点嫉妒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走在时尚的尖端——我从来不是那种赶流行的人——而是因为他们身上的衣服是那么干爽，那么洁净。

我们彼此拥抱，寇克俯身下去，跟鲁德打招呼。他紧紧抓住我的大腿，鲁德很少表现得这么羞怯。“鲁德看起来像不像一个圆圆的派？”她说，她想到一年前他们来看我们的时候，她说了一句类似的话，让我们捧腹大笑。当时我们正在准备开始进行这项计划，他们来的时候，曾经帮我们给菜园翻土。他们俩都惊叹说，我们的这个农村小男孩长大了这么多。

蔻克是我在纽约的第一个室友。她在底特律市一个富有人家的市郊住宅区长大的，在她成年之前，她的名字叫“希拉”。从她告诉我的许多事情来看，“希拉”这个名字十分符合她当时的身份，也就是典型贵族大学预科生^[1]的调调。十多年前我跟她搬到同一户公寓里当室友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蜕变，从一个热衷社交的名媛转变成为一个与我真诚相待的朋友。同时，她也从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转变成一位有自信的作家。她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蔻克，这是她祖母的名字。她的祖母个性充满魅力，却又高傲专横，这位长寿老太太过了充实的一生，她的人生横跨整个20世纪。

蔻克拉着行李走进客房后，希瑟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告诉他们这件新事情——我们这件可能发生的新事情？”

“随时都可以说。”我想起我们向亲友宣布，希瑟怀了鲁德以后，他们是多么兴奋。希瑟在跟蔻克散步的时候，提起了这件事。蔻克听了感到惊喜——也很关心希瑟要去看医生的事——她说，她很乐意开车带希瑟去医生那里。

同时，我们努力地不去想看医生的事，努力地跟这两个朋友共享快乐时光。我们在我们家后面的林子里健走，走到那片群山环绕的牧草地。我们把那片草原称为“回声坡”。在那里，我们大声喊着：“牛粪！”和“鲁——德！”然后聆听山谷传来的回音。我们去玩冲橇。我们大啖希瑟做的食物——烤南瓜、绿色的豆类、瑞士甜菜、米饭配青豆、手工面包配奶酪，还有一个樱桃派，是用去年夏天威尔逊家给我们的樱桃做的。这些食材当中，有一部分是蔻克和麦可帮忙我们埋下种子，由于他们参与了播种，我们觉得这些食物更特别、更有意义。

我们分成两组，写下纸偶影戏的剧本。那天晚上吃完晚餐后，为鲁德演出这两出戏。我们用美工纸剪出各种角色，粘在医疗检查用的压舌板上，再用油灯的光，把纸偶投影到一面宽阔的白墙上。麦可的职业是演员，他和我演出的剧情是，一个名叫“鲁德”的男孩被龙卷风吹走。为了寻找“澳洲内

[1] 典型贵族大学预科生（preppy），指穿着牛筋布衬衫配毛背心或V领毛衣，下半身搭配卡其裤，热衷运动、交际和度假的美国贵族大学预科生。

陆的奥兹王国”^[1]，（我们用澳洲口音说：“你好吗，伙伴。”）这个名叫“鲁德”的男孩想要回家，在找寻回家之路的途中，在黄砖道上遇见了一只胆小的鸡、一只诡计多端的猪，还有一只愚笨的山羊。希瑟和蔻克的戏描述挡泥板这只猫在新泽西州一处上流阶层市郊住宅区长大的，从小吃的是法国鹅肝口味的猫食肉酱；另一只猫皮克的兄弟斑鸠琴喜欢晒太阳，是个到处留情的花花公子。皮克发现他的兄弟斑鸠琴失踪后，挡泥板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皮克一起去找斑鸠琴的下落。（“我非去不可吗？”挡泥板咕哝道。她宁可接受去爪子的酷刑，也不想鼓起勇气，走进那片可怕的森林。）鲁德大声咀嚼爆米花，嘴里发出欢乐的尖叫，听到他喜欢的台词，就跟着说一遍。我心想，怎么会需要电视呢？

蔻克和麦可来我们家住的这段时间里，他们那辆借来的敞篷车一直停在车道上——一个具有双重意义、来自未来的典型产物。过去的十个月当中，我们看过很多辆汽车经过，但是我们不允许那些车辆进入我们家的土地，因此我们并没有很注意观看那些车辆。然而这辆萨博轿车一方面是希瑟得到解救的象征，一方面是一种严重的昭示，明白指出我们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没有坚决不用1900年之后问世的科技产品。每一次我从这辆汽车旁边经过，总会忍不住用提防的眼光看它一眼。

上床睡觉前，希瑟忙碌地来回走动，为了隔天早晨看医生做准备。她拿出钱包、支票簿和保险文件，把它们放在门边的地板上。第二天早晨，她显得很紧张。她把每个房间都收拾得很整齐，再一次检查鲁德的布尿布准备得够不够。

蔻克站在车子旁边等她。希瑟和我站在有纱门的露台上。

“我很害怕。”她说，“我觉得医生可能会看出什么来，好像我藏了一个秘密不让人知道。”她说。我们亲吻对方，深深凝视彼此的眼睛。她趁着泪水尚未决堤前，赶紧显出忙碌的样子，用抹布把脚上穿的黑色木鞋沾到的

[1] 澳洲内陆的奥兹王国（Wizard of the Outback），该剧模仿美国知名童书及电影《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后者描述主角桃乐丝被龙卷风吹走后，与失去智慧的稻草人、失去心的铁樵夫和没有胆量的狮子等三位伙伴前往奥兹王国，寻找回家之路。

泥巴擦干净。她的牛仔裤很干净，上身穿了一件白衬衫，那是她特别留着，准备在特殊场合穿的。这可真是一个特殊的场合。

“别担心。”我说，“我很高兴你要去看医生。至少我们可以知道问题在哪里。”

“对，”她说，“也许是好消息。”她转过身，准备离开。还没走到纱门边，她就往回走，来到我面前。“罗根，如果我过了几个小时还没回来，你不要担心我。要是怀孕了，他们可能会要我到医院去做超声波检查。”我听得出来，她的口气里怀着希望。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样的情况不过是一个下午的例行事项。约了去看医生，坐到车子里去。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件事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心理创伤。

没有怀孕

三小时后，这辆萨博轿车开进我家的车道。蔻克还没有让车子熄火，我就站在车子旁边等了。

“怎么样？”我对希瑟说，她坐在乘客座上。

她的脸色阴沉：“他们没法告诉我是什么问题。”

“什么？”我问，“你不能做个检查怀孕的尿液检测吗？”

“不要烦我。”

“我进屋里去了。”我恼怒地说。

“罗根，不要这样。”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交谈。“怀孕的检测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希瑟说，“他们觉得我的尿可能有点稀。后来我去了医院，他们给我验血。等到下午四点，他们会知道结果。我必须打电话去问。”

鲁德睡午觉的时候，她跟蔻克和麦可去外头散步。我在我们家门口的草地上看书打瞌睡。4点25分，希瑟打电话过去。我在走廊里等消息。这时，

我听到她在哭。检查结果是阴性反应，她没有怀孕。

我们拥抱了很久，两人都在流泪。然后希瑟说：“下星期三下午3点半，我要去听结果，看看我身体里长了什么东西。”

心情不太好

四天后，蔻克和麦可离开我们家，回纽约去。我看着他们的车子开过中央河上的那座桥，我开始觉得，每一次看着亲友开车离开我们，我都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我们被困在炼狱里——一座我们自己建造的炼狱，只是我们允许其他人来探监。

“蔻克和麦可在哪里？”鲁德说，他刚从午睡中醒来。

“他们走了，”我为鲁德感到难过，“你还记得，不久以前，我们已经跟他们说再见了吗？”孩子是健忘的，过了一会儿，他就专心地玩起装在镀锌桶子里的积木，他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但是对于希瑟和我来说，我们很难轻松看待眼前的情况。“你的心情如何？”我上前拥抱她。

“不太好。你呢？”

“半斤八两。”

第十二章 回到未来

希瑟看诊

春天进入繁花盛开的阶段。北山的侧面开始变绿。鸟儿的翅膀在人们头顶飞过，在树枝间穿梭，数量繁多，歌声绕梁，感觉上好像是它们在看我们，仿佛我们——被困在这片山腰的坡地上——住在为人类而设的鸟园里，你也许可以把这个地方称呼为“现代人鸟舍”。鹿从小山那边长途跋涉下来啃叶子，也吃我们的果树嫩枝。我们用生鸡蛋把鹿赶走，并非是拿鸡蛋丢它们，而是将鸡蛋加到一升的水中，摇晃均匀后，把蛋汁泼洒在果树的树枝上。野生的芦笋又长出来了，它们沿着篱笆，从葎草丛里冒出来。每过几天，我们就沿着附近的路往前走，去折十几根芦笋回来蒸了吃，品尝那种青草般的新鲜滋味。

新的季节确实来临了，希瑟和我感觉到，我们俩都在转变。我们心中为一种感受所扰动，这种感觉混合了兴奋与惊恐，因为再过一个月，我们的计划就要走到终点。就许多方面来说，我们的目光开始望向不可知的未来，它包含无尽的可能性，要是跟展开一整年没有现代化设备的生活相比，我们现

在面对的可能性更让自己害怕。一年前，我们全部的心思都放在1900年的生活上；如今我们很难不让自己的思绪回到我们所属的21世纪，不去想未来充满不确定的岁月。

希瑟腹部的疼痛还是找不出原因，这件事让我们暂时转移了注意力，也造成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天早晨，吃过早餐后，我正要把餐垫收起来时，希瑟大声吼叫，叫我不要收。“不是直接把它们摆回去，”她说，“我都是把它们拿到外面去抖一抖，然后才收进来。”

“我已经抖过了。”

“食物的碎屑在哪里？”

“在地板上。”

她生气地摇摇头说：“这样它们全都跑到地板缝里去了。”

“我来扫地，”我说，“到底是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

希瑟没有答话，她走进洗手间去刷洗盘子。我听到锅子撞击的当当声，还有玻璃杯几乎被敲碎的叮叮声。过了一会儿，她从清洗室探头出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试试看，把我们那部车子开动一下。”

“为什么？”

“为了我要去看医生。我们已经作了妥协，打破了我们定的规则。发动一下自己的车子，跟着医生也差不多。”

“不要！”我摇摇头，“我们根本不应该留着那辆车，而且它哪里也去不了。它的引擎一塌糊涂。老鼠把电线都咬断了，你还记得吧？”

“那我该怎么办？”希瑟问，“黛博不能带我去看医生。她和华特要把他们的牛带到西弗吉尼亚州去。”

“我们等等看，会想出办法来的。”

要用这辆车的想法仿佛一片滑溜的斜坡，我像在斜坡顶端，要拼命抓住1900的生活。然而，当我们已经打破了不坐汽车的规则以后，继续坚持这项规则又有什么意义呢？

到了最后，问题的确解决了。黛博和华特延后了去西弗吉尼亚州的行程。希瑟约了看诊的那天下午，黛博开着她的那辆灰色富豪汽车，进入我家

车道。希瑟刚在厨房泡完澡，头发还是湿的。上车之前，希瑟对我说：“我没有拔掉电话线，这样万一我必须找你，才能联络到你。”

我停了停，心里想：她留着电话，是为了要打给我，告诉我她得了什么样的毛病。“好。”我说。

过了一会儿，我在家里找钢笔和墨水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缄默无声的电话。它的电话线盘卷在松木地板上，这幅景象让我感到惊惧。它随时会响起来，为此我坐立不安。我给鲁德换上干净尿布，这时，我听到车声，立刻往窗外望。

“怎么了？”他察觉到我很焦虑。

“没事。”

过了一会儿，鲁德用他的口琴吹出一些高音。我冲到电话旁边。我失魂落魄，快要崩溃了。

到了吃晚餐的时候，希瑟回来了。外头有点冷。我把手臂环在胸前，给自己保暖。我忍住要冲到她面前的本能，往后退了一步，等她说出详细的经过。

“完全没问题，”她说，“就他们所知是这样。”她向黛博道谢，跟黛博说再见。我们走进屋里。

“妈咪！”鲁德大声唤她，跑过来拥抱她。

“嗨，甜心。”她说。从她脸上流露的轻松笑容，我看得出来，她心头卸下了一个重担。“今天下午你和爹地过得开心吗？”

她把鲁德放到地上，拥抱我。她的肩膀柔软而放松，她并不急着松开手，让我走开。“医生认为，我肚子里长的东西是囊肿。”她向我说明。一种常见而无害的囊肿，可能会自行消失。这是好消息的部分。坏消息是，囊肿造成的疼痛跟她每个月的排卵时间同时发生。“所以我们必须在我肚子最痛的时候亲热，好让我怀孕。”

农场欢乐日

我们的好运和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仿佛互相联结在一起——谁说不是呢？——希瑟听到医生对她宣布这个好消息以后，天也开始下雨了。降雨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坏消息是，干燥坚硬的泥土形成许多水道，使得雨水直接流进我们家户外厕所的那个坑里。坑里的东西——卫生纸、一个破掉的啤酒瓶，还有大便——全泡在水里，升到坑的最顶端。从木头坐垫中看上去，原本情况还好，只是先前一片黑乎乎的东西，如今却变得清晰可辨，好像一个装满屎尿的便器，在水肥车来收粪水时不幸成为漏网之鱼。雨下了三天两夜。在地面涌流的大雨中，我举步维艰地走到户外厕所旁边的坡地上，挖了一条水沟，把附近的雨水引到坡地下方。暴雨过后，草地的低洼处淹水了，河水的水位高涨，颜色混浊。水流冲激的声音宛如汽车隆隆地驶过高速公路。

好消息则是，雨水让井水的水位升高，让菜园里的新枝得以解渴。河水的水位慢慢降下来以后，鲁德和我把他的玩具木筏放到河面上玩。我们用长树枝拨动木筏，让它避开河里的木头和树根，顺利地向前漂流。

鲁德过三岁生日之前，雨水及时停了。我们邀请我们认识的每一个小孩来家里玩——共有六个孩子——在家里举行了一场名叫“农场欢乐日”的派对。我们用大捆的干草当作凳子，举行了一场让鸡赛跑的比赛。每一个孩子负责催促一只身上绑着缎带的鸡，要它尽快冲过终点线。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鲁德可能是全美国唯一一个表示过生日时想吃水果蛋糕的小孩。不过希瑟觉得，这些孩子的家长可不希望自己读幼儿园的子女，在我们家大口吃下酒精浓度高达百分之二十的甜食，因此希瑟没有做水果蛋糕，而是烤了一个糖霜柠檬蛋糕给孩子们享用。

鲁德从一个在布鲁克林区一家托儿所里度日的儿童走到今天，他的改变之大，令我们难以置信。他穿着他那件小小的工装裤，里面是格子衬衫，褐色的头发被剪成“披头士”合唱团成员“马桶盖头”。鲁德会捡鸡蛋，学着算算有几个蛋，然后把鸡蛋一个一个地放进网篮里。他会爬到篱笆上，叫



鲁德在三岁的庆生会上玩耍。我们邀请所有认识的小孩来特林柏磨坊，举办小鸡赛跑、野餐，并享用自制蛋糕。（Nini Ward/摄影）

贝儿过来；她走近了，他却跳下篱笆，躲在我的腿后面。他把身边自然界的事物彻底地吸纳到他的心中，对此我感到惊奇。现在他已经听得出六种鸟类的叫声，包括北美红雀的叫声“皮嘀—皮嘀—皮嘀”，还有猫头鹰发出的尖锐颤音。

有一天，我们一面沿着童军巷走，一面采野芦笋。天气很暖和，四周很宁静。“嘘，”我说，“你听。”一只蟋蟀在长满草的水沟里鸣叫。我伸手折下一小根嫩枝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我把树枝放到他的鼻子底下，让他闻一闻。“是雪杉。”我说。

他闻了闻：“它的种子在哪里？”

我们往上坡走，看到一对蓝知更鸟停在一根篱笆柱子上。公鸟鼓起肚子，母鸟翘高尾巴的羽毛。公鸟往上飞，在空中流连了一下，然后拍动翅膀，在母鸟头顶的上方往左边飞一下，再往右飞一下。它把这项仪式重复做了几次。不知道为什么，鲁德一直在旁边哧哧地笑。“它们在干什

么？”他问。

“它们在求偶。”

“它们在求‘耳’？”他问。

“求偶。”我咯咯地笑。

我们往前走，他哧哧地笑：“那些蓝知更鸟在求‘耳’。”

之前我提到过，我希望他知道牛长什么样子——真正的奶牛，而不是图片里的奶牛——我也希望他能听得出活生生的动物的叫声，而不是听着儿童玩具里微芯片播放出来的，模仿牛鸣、猪打呼噜、小鸟啁啾的电子声音。有一天他在户外厕所上大号。“大便看起来是不是这样？”他的一只手握成拳头，给我看。

“嗯，是的，有点像这样。”我说。

他把两个拳头并排靠在一起：“这是马的大便。”

“是的，这是。”我顺着他的逻辑说。

“这是牛粪。”他把一只手摊开，放在户外厕所的凳子上。

“没错！”

我想去——另一个地方

母亲节那天，希瑟说她觉得“有点乏味”。

“心情沮丧？”

“与其说沮丧，还不如说是觉得自己身上很脏，很油腻，觉得身上的毛发没有刮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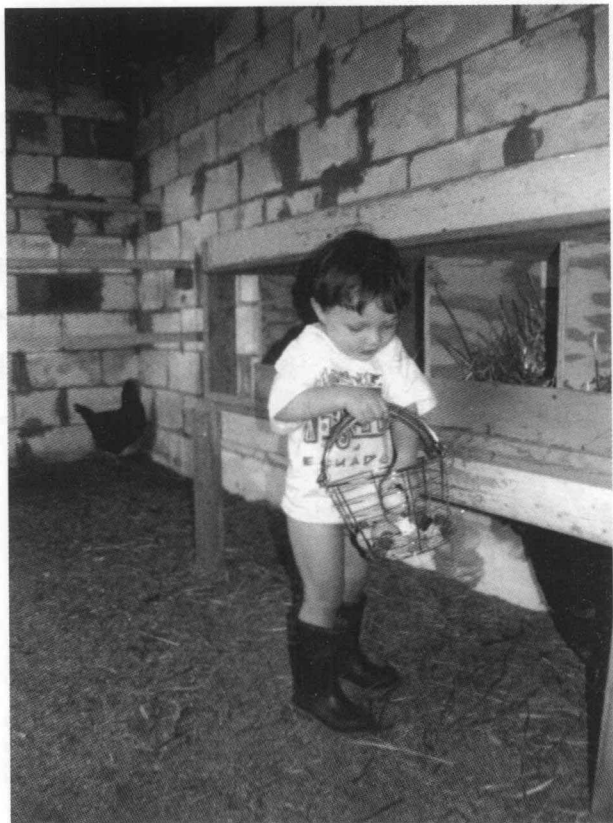
“我不觉得你身上油腻，”我拥抱她，“而且我喜欢你的长头发。”

“就算是腿毛长你也喜欢？”

“喂，你很美，包括腿毛，还有你的全身。”

“我已经准备好，要冲个热水澡了。”她说。

我也准备好要用热水淋浴——还有吃冰激凌、听音乐——但是未来让我



鲁德在鸡舍捡鸡蛋。他因此学会了数数，并知道鸡蛋易碎。
(Nini Ward/摄影)

觉得很紧张。去年夏天，我以为，在我们的这项计划即将结束时，我们会在这里狂喜地迎接未来。但是现在我们心里的感受不是狂喜，而是焦虑，我们对即将来临的重大改变感到焦虑。一种倒错的文化冲击。这种感觉我体会过两次，分别是在结束肯尼亚和厄瓜多尔的生活，返回美国以后发生的。要回到你一直都很了解的生活里，是一件难度较高的事，因为回去以后，初期的新鲜感会很快被磨损殆尽，然后你就不能不面对未来。

我不仅喜欢、更怀念许多小东西，像是胶带和保鲜盒。在这里我所穿戴的衣物，每一件都有破洞——衣裤、外套、工作手套。我靴子上的缝线已经

柔肠寸断，我用铁丝来缝合裂缝，看起来很酷——晚上提着羊奶桶，在铺着碎石的谷仓里走动时，我的鞋子会发亮——直到铁丝弯曲的部分磨穿了，鞋边留下的铁丝被锉得尖尖的。这些尖头刮伤了地板，也刺破我的脚。我不得不用钳子把它们拔出来，重新缝一遍。

希瑟想念的是浴室的磅秤、刮体毛的剃刀、隐形眼镜、洗发水和润发乳、润肤液、莱卡弹性运动紧身裤、维生素，以及含有高蛋白的点心棒。我想念我的双头刮胡刀、牙线、垃圾袋、巴萨诺瓦风格的爵士乐CD，还有格雷厄姆·格林^[1]的小说。我们都很怀念厨房水槽，以及有自来水可用的日子，在那样的日子里，水从水龙头里源源涌出，沿着排水管，靠着地心引力流下去。我也怀念旅行的时光。近来当我坐在记忆的火车里旅游，就会回到我们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港的一栋房子里度蜜月时，院子里洒下的斑驳阳光。我还去了墨西哥的海滩，吃早餐、喝啤酒，一整天看着人们在海边冲浪；还有南非风景绝美的海岸，我把我们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连鲁德也觉得，我们好像是被关在这里。有一天，他把一块积木放在脸颊侧边说：“哈啰？”然后，他靠着想象，开始跟他的祖父母聊天。还有一次，他午睡醒来，哼哼唧唧地说：“我想去——另一个地方。”

“我知道你的感觉，亲爱的。”希瑟说，她想到，鲁德年纪虽小，却已经去过巴黎、厄瓜多尔，还有美国加州和缅因州。“你想去哪里呢？”

“比尔和佩姬家。”

猎杀了一只土拨鼠

这是一条古老的、叙述性的、凭借经验得来的概略性法则：如果第三场戏里有人开枪，在第一场戏中，就拍到枪放在壁炉台上的画面（由于我是一

[1]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20世纪英国小说家，作品甚多，著名的有《文静的美国人》《恋情的终结》《我们在哈瓦娜的人》等。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超过20次。

个聪明的讨厌鬼，我会温和地反抗大学里作文课老师的说法，这种老师会宣扬契诃夫^[1]式的写作原则，认为一开始要先写壁炉上方挂着一条剑鱼标本；从剑鱼的尖嘴可以联想到，这出剧的结尾一定会发生杀人事件。在本书前面我提到过，我在一个高高的柜子顶端藏了一把生锈的、用牛皮纸包好的散弹猎枪。现在这把枪分成两半，摆在库房的工作台上，在几把小刀、一些木雕，还有几个装着钉子的锡制烟草罐旁边。

去年秋天，麦可·葛佛瑞发现我那辆旅行车里面到处是老鼠以后，我开始在那辆车的车厢里和引擎四周摆上捕鼠器。每个星期我都去看看捕鼠器，把死掉的老鼠扔进高高的草丛。上星期我用力打开引擎盖，准备检查里面的捕鼠器。当我举起引擎盖时，一只大大的、毛茸茸的褐色东西突然从电池旁边跳了起来。它露出牙齿来吓唬我，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然后潜入引擎旁边的缝隙里。“啊——！”我发出尖叫，“砰”的一声盖上引擎盖，我跳了起来，赶紧往旁边跑。“该死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拿了一根树枝，走回车子旁边，谨慎地看着车子的底盘查找着是否有动物在车里跑动的迹象。我压下引擎盖的开合扣门，轻轻打开引擎盖。我举起树枝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爪子和利齿的猛烈攻击。一切都很平静。它躺在那里，淹没在一堆软管中间——茸茸的黑毛，灰色的脚形状有点怪异，脚趾很长。负子鼠？它的体型太大了。浣熊？不管是什么动物，都不能住在这辆车里。

我用树枝戳戳这只动物，它缩得更深了，陷入引擎深处。没有东西从底盘里跑出来，我只好算了。我回屋里，没法解开这个新出现的动物谜题。我虽然努力让自己活在当下，不去想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重返21世纪的生活，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适应那个社会？

我相信那只动物是浣熊。我向比尔·罗伯森借了一个捕兽笼，希望能抓到它，把它送到这片树林最远的角落放生。结穗的季节已经过去，让它去别的地方找麻烦好了。

[1] 契诃夫（Chekhov, 1860-1904），19世纪俄国文学家暨剧作家。

然而它不是浣熊，而是土拨鼠。现在它在等待，它很害怕，身上血迹斑斑，被关在比尔的捕兽笼里。我则是站在库房旁边，目光停留在这把枪上。

我脑中的思绪飞快地转动，内心充满冲突。我想到几个月前希瑟和我因为发现前院有个土拨鼠挖的洞而争辩不休。此刻我想把这只土拨鼠放生，但我不希望它再回到这辆车的引擎里。我不想射杀它，但是我也不希望让它到别处去挖洞，使得我的邻居或他们养的牛踩到而造成危险。最近我跟贝儿冲橇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草地中央有一个土拨鼠挖的洞。如果贝儿踩进去，摔断了腿，我们可能就必须射杀它了。大卫·弗雷格说过，你必须学会分辨，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动手杀死一个生命。这句话在我脑中回荡。我不知道1900年的农夫会不会像我一样，面对生活里种种棘手的责任时，表现出踌躇不前的态度。但是我又问自己，除掉一只土拨鼠，这件事真的是我的责任吗？

对于这个问题，此地的农夫会给予肯定的答案。我们已经领会到，杀死土拨鼠就跟用捕鼠器抓老鼠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老鼠会在贮存食物的房间或地窖里跑动，啃食奶酪。几天前，希瑟和我在前院里，琴妮隆隆地开着她那辆吉普车过来，旁边跟着她的狗德克斯特。她跳下车，把一只貂的尸体扔在地上。

这只貂的毛皮结了泥块，利齿上沾有血迹，左边的眼球掉出来，靠着一条带着黏液的细丝垂挂着。琴妮剧烈地喘着气，因为德克斯特杀了这只貂。这只体型很大的幼犬半年前在跟鲁德玩的时候，曾经轻轻咬过鲁德的小鸡。琴妮对着我们露出惊骇的笑容（过了一会儿，转成开心的大笑）。“好孩子，德克斯特。”琴妮说，德克斯特拨弄着貂尸，仿佛在玩一个破布做的洋娃娃。“如果德克斯特是老狗，我会叫它住手。但是因为它必须学会咬死土拨鼠，它在咬的时候，我不能让它觉得害怕。”

她继续说：“昨天我跟我母亲通电话。有一只土拨鼠从你们家院子这边跑到她那里去了。德克斯特去追它，它竟然爬到一棵树上去了！”

“结果你怎么做？”希瑟问。“我拿扫把丢它。”琴妮说，一面示范她如何把话筒用耳朵夹在肩上，继续跟母亲聊天，同时，她把扫把当标枪用，

试图刺中这只土拨鼠。“这个办法没有用，所以我放下电话，拿了我的猎枪，把它从树上打下来。德克斯特追着它跑，最后咬死了它，”她顿了顿，“然后我把它烧掉了。”

我在库房里找到猎枪，把枪管装到枪托上。我花了五分钟的时间摸索，才把这两个部分装在一起。小时候，每次我用枪打过鸟以后，都会很自然地将这把16口径的散弹猎枪拆开，擦干净，再重新装在一起。在那段日子里，我跟枪支建立了一种单纯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们家有半打以上的枪，包括猎枪、手枪，还有一把22口径的来复枪。有一次，我参加完夏令营，回家的时候，我自豪地带了一堆被子弹打穿的纸靶，手臂上戴着美国军方二等射手的臂章。当时人们觉得，使用枪支是完全合理的行为。

往后的年月里，我几乎忘记了用枪打猎的事。对于杀戮性的运动，我向来自来缺乏热情，最后甚至失去了兴趣，我几乎要正式宣布再也不打猎了。如果你住在城市里，不打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搬到乡下来住，采用1900年的农耕方式后，有一些复杂的问题便产生了。在我们为了这项计划做准备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举棋不定：是要坚持不猎捕、不杀生的原则，还是要为了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不时拿起枪出门去，打些东西回家当晚餐？有一次，我去探望父母，现实获胜了。我不愿意猎杀生命，但我还是将那把老旧的散弹枪和一盒子弹包起来带走——以防万一。

此刻我打开这个盒子时，手指微微颤抖。我已经很久没有打猎了，已有很多年没有听过砰砰的枪声，没有感受到散弹枪的后坐力了。我倒出两枚子弹到一本杂志上，把其中一枚塞进枪膛里，然后我走出小屋，大步走过谷仓边，来到牧草地上。

在捕鼠笼旁边，我看着这只身上长满硬毛的小动物，看了好几分钟。它的体型很大，爪子和牙齿尖锐的程度超出我的预料。我拿起笼子，往前走了大约30米的距离，打开笼子的门，还来不及举起枪，这只动物便从山坡上跳跃着往下跑，朝着篱笆那边飞奔而去。我开了枪，没有打中任何东西，雷声般的巨响和火药粉末的味道，把我带回二十年前的时光。然后我往前跑，把另一枚子弹上膛，将枪管指向土拨鼠逃去的方向。我差点击中篱笆。慢慢

来，我想，你就要做出一件蠢事了。土拨鼠的短腿迅速跑动，它爬到篱笆底下，沿着林木茂密的山坡往下跑去。我把枪管从铁丝网的洞里穿过去，瞄准，然后开火。这只动物翻滚着。它躺在那里，身体不断抽搐。我站住了，从篱笆旁边俯身往下看。我把最后一枚子弹装进枪膛，枪管朝下，对准这只无助的动物。必须让这一发子弹有点价值。“砰”的一声！直接命中。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确定土拨鼠已经死了，才走回库房。刚才我体内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已经消失了。我走到半途，贝儿瞪着我，她的耳朵竖起来，鼻孔喷气。

我将这把枪拆开，把它们藏回库房，然后朝着我们家走去。希瑟正在把晚餐摆在野餐桌上。鲁德把一块餐巾布塞进上衣的领口里面。“嗨，鲁德，”我强作欢笑着说，“你在做什么？”

“吃东西。”他的手里塞满玉米面包。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背叛了我试图表现出来的欢乐情绪，因为希瑟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对我露出同情的笑容。

“嗯，”我的肩膀颤动，耳边仍然萦绕着枪声，“办好了。”我走进屋里，心里仍然觉得，这件事没有真的了结。杀生是一种残酷的行为，不管理由有多么正当。我无法摆脱那幅景象——被困在捕兽笼里的土拨鼠，它那血迹斑斑的爪子和充满恐惧的眼神；我一打开笼子的门，它就慌张地逃出去；还有死前它的身体最后的痉挛，把树叶摩擦得唰唰作响。我要承认，我心中的悲哀有一部分来自那个童年的自己，那个可以用枪打下天上飞的野鸭、心中充满兴奋与自豪、完全没有罪恶感的自己，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必须学会分辨，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动手杀死一个生命，我心想。但是知道何时应该动手杀死一个生命，并不表示能够轻松自在地做出这件事。

然而，吃晚餐的时候，我的心情好多了。我看着鲁德，看着他那双纯真无邪的蓝眼睛，看着他对所有加了牛油的烘烤食物表现出一种纯粹的热爱，在这样一个孩子面前，谁会心情低落呢？

角色交换

有一天，希瑟对我说：“我们何不找一天交换角色做做看？”

“你的意思是——？”

“我们已经能掌握自己每天要干的活儿，但是我觉得很无聊。我来做你的事，你来做我的。这样对我们都有益处。把现有的情况打散，重新组合一下。”

我好不容易才做到自在地接受和掌握自己每天要做的工作。老实说，我太懒惰了，不想改变现有的做法。“我不想这么做。”我说。

“别这样！”她说，“怎么？你没胆子吗？想到要洗衣服、床单就怕了？”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计划快要结束了。”

“不要紧，还是可以交换。”

我终于让步了。“你想什么时候换？”我问，“下个星期？”

“不，”她哼了一声，“明天就换！”

开始交换角色以后，我发现她的角色有许多好处——睡到很晚才起床，不用管羊的事，一整天都不用做那些令人腰酸背痛的劳务。但是第二天早晨，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不知道等一下要做什么，这让我心里不高兴，感觉自己有点暴躁。我给鲁德穿好衣服，把床铺好，倒空夜壶，把鲁德用过的尿布浸泡在装了肥皂水的桶子里。在这段时间里，希瑟看着炉火，添些柴进去，煮好咖啡——还在那里看起来！

早餐是我的分内工作。煮麦片。我才刚把用过的碗端走，就到了煮午餐和晚餐的时间。

在这段期间，希瑟带鲁德去干早晨的活儿，包括到井边打水，给菜园里的植物浇水，还有喂动物们吃东西。她回来时不高兴地说：“你是怎么搞定那两只山羊的？”

“怎么搞定？”我忍着笑说。

“她们一直扑到我们身上来！我不得不把鲁德放在我的肩膀上。她们跟

着我们到井边，不管我对她们说什么——嘘，下来，走开，”她吐出一口深长的气，气急败坏地说，“你是怎么搞定那两个讨厌的东西的？”

“我猜她们知道不可以惹我。”

“鲁德，爹地做了什么，让那两只山羊不黏着他？”希瑟问。

“他拿一个桶子，朝她们扔过去。”

不久，我就开始有挫折感。我汗流浹背地准备餐点，把生菜剥好，洗干净。然后，我开始洗衣服。希瑟很仁慈，她列出的待洗清单上只有袜子一项。我把这些袜子扔进洗衣服的水槽里，加了肥皂，仔细地把滚水浇上去。一团紫色的水扩散开来。“哦，不好了！”我尖叫了一声。我把手指伸到烫水里，试着把深色袜子捞出来。

“怎么了，爹地？”鲁德在菜园里喊道。

希瑟说：“发生了什么事？”

“袜子在流血。”

“你没有把深色袜子和白袜子分开来洗吗？”

“没有。”我继续在水里摸索，要摸到深色袜子并不容易，因为此刻水槽里的水已经变成暴风雨来临前乌云的深灰色。笨到极点，我想。难道我已经把洗衣服时最基本的注意事项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重新来过，把有颜色的袜子堆在水槽左侧，白袜子（现在已经变成灰袜子了）堆在右边。加进更多的肥皂。我再一次把滚水倒到那堆深色袜子上。“啊——！”我大叫一声，袜子开始掉色。我又忘了洗衣服的第二条重要原则：深色的衣物要用冷水。

平时我不是个高明的厨子，但是今天，我一切都表现得很精彩：一盆新鲜的沙拉，手工墨西哥面饼内包瑞士甜菜馅的卷饼，山羊奶做的奶酪，还有一盘西红柿汁酱料。

“在外头干完活，我的精神好好。”希瑟快活地说，我们坐在有纱门的露台上吃午餐。

“到了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看结果。”我咕哝道。我在心里揣想，她用铲子铲马粪、用叉子叉起干草、到井边打水和用力劈柴的模样。

到了晚上，希瑟累坏了，我也一样。我们都觉得烦躁不安，并不觉得这一天的生活令人感到满足。我很感谢她没有坚持再做一天。那天晚上，鲁德上床睡觉后，我们在屋子侧边的露台上啜饮波本酒，念书给彼此听。然后，由于希瑟觉得她在排卵，我们便到二楼去，干那件绝对必须干的活儿。

两星期后，希瑟的月经来了，我们都几乎崩溃。我们开始努力生小孩的时间并没有很长，但是，为了这项1900年的计划，我们已经延后了怀第二个孩子的时间，因此到了现在，每一次的延迟都是很大的打击。她腹部的疼痛问题会不会是造成不孕的理由之一？我们没有花什么力气，她就怀了鲁德。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走进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在网络搜寻引擎的关键词空格里打上“不孕”或“卵巢囊肿”的字眼，这种情况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挫折感。

散步

我过36岁生日那天，希瑟一整天不停地做东西给我吃——早餐吃松饼，奶油糖霜柠檬蛋糕——配上伊许塔送的香槟。鲁德给我做了一张生日卡，在白纸上用橘色的笔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希瑟也做了一张卡片给我，她在卡片里夹了一张清单：今年你学会了36件事。我非常感动，才读到清单的头几个事项，像是“驾马车”、“制作刨工台”、“把浣熊赶出菜园的玉米区”和“看得出干草和稻草有何不同”，我就开始追念这段即将结束的时光了。她还送我一幅铅笔素描，画的是我们家的谷仓。我在心中也列出了一张希瑟学会的事情的清单，并将“画铅笔素描”这一项加在清单里。

我还休工了一天。

我决定去散步——只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而散步。对我们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事。第二天吃完早餐后，我出发了，带着一条可以当头巾的大手帕，戴着我的宽边帽，身上带了一把美工刀，还有一卷铁丝，以防鞋底破裂的地方绽开来。我很兴奋要去远足，仅仅靠着走路，又能离开每日例行的活计。但

是我也感觉到，离开家人的身边，自己应该受到责怪。已经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希瑟、鲁德和我每天守在彼此身边，我虽然只在白天出去走走，一喊就能回来，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不久，我的心思就被史威普乡间的美丽与宁静所占据。之前我到邮局投过票，我也去过萨拉丁农场和伊许塔家，但是在这段接近一整年的时间里，我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往那边去过——朝着镇上走去。我觉得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像第一次见到，发芽的玉米株，刈过草的原野上零星点缀着刚捆好的干草，还有有木框窗户的砖造古老农庄。在史威普那片山坡的顶端，空气里混合了忍冬的花香与家畜粪便的恶臭。我扫视眼前辽阔的山峰，注视V字形的“水牛沟”。除了远方偶尔有一辆拖拉机从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开过，更远处还有一座广播台的发射塔高高地矗立在那里，我几乎可以说是置身于一块1900年的风景里。这时，一阵隆隆的车声吵醒了我的白日梦，我转过身，看到一辆卡车飞快地朝我开来。我赶紧往旁边跳，躲进沟渠里，跟这辆车擦身而过。我差一点就要被这辆美国农业协会的化学液体运输车碾成肉饼。

“去他的！”我大喊。我转过身，怒气冲冲地看着卡车开走。我身上没有带皮夹，没有身份证件。要是再过来五厘米，现在相关人员就会在这里捡拾尸体的牙齿了。

我走到下一个弯道，两辆橘色的高速公路局卡车隆隆地驶过，卷起的风把我的帽子吹走了。现在我知道松鼠对汽车有什么看法了。

下一辆开过来的车子，是一辆破旧的小卡车。它慢慢爬上山坡，开到我身边，停了下来。一位满头银发顶着草帽、皮肤粗糙的老先生从车里伸出头来：“你只在散步，还是想搭个便车？”

“只是在散步，谢谢。”

我走向一个朋友——约翰·佛斯特的家。我们开始过1900年的生活后不久，我认识了约翰，但是他住在史威普的另一边，因此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他偶尔会来我们家坐坐。上一次他来我家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会去看他。

不久我就离开大路，走上一条铺着碎石的岔路。走在这条岔路上，不再

有车辆来往的问题。我往约翰家的方向看去，看到一栋摇摇欲坠的农庄。那是他年迈的邻居凯瑟琳的房子，她是一位农夫的遗孀，约翰告诉我，她家至今仍未接自来水，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惊奇。每星期约翰会开着他的小卡车去她家几次，把水装在牛奶瓶里送去，她会让他带一些热腾腾、锡箔纸盖紧的餐点回去。

我在一棵高耸的白橡树旁边转进一栋房子的车道，爬上山坡，找到了约翰。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黑色T恤，坐在他那栋木屋的露台上。他有一头怒张的黑发，一副太阳眼镜戴在头顶，正在用手工将一件老旧铁制工具磨得光亮。

“你来的时候，路上情况如何？”

“很危险。我差点在马路上丢了性命。”

“如果发生那样的事，那可是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

我听别人提到过，约翰的房产范围有多大（他不是那种爱夸耀的人）。此刻我坐在他家露台上，啜饮着冰水（杯子里的冰块是他招待我的简单生日礼物），扫视他的土地——北山的辽阔景致、这栋房子手工打造的石灰岩地基、古老的栗木建材，以及差点被灌木丛覆盖住的房舍等，一切尽入眼帘。

约翰年近五十时，用双手建了这栋房子。二十年前，当他还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处快速发展的市郊地区经营一家苗圃时，他买下了这块四公顷多的土地，还有这片土地上的一栋凹陷的木屋。此后他周末就到这里扎营，辛苦地把木屋盖起来。他早早就退休，跟妻子莎拉一起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他用废弃的木材，在旁边又建了一栋同样是一层楼半的木屋，并用木材和玻璃建造了一条走道，把两栋房子连在一起。在房子北边将近一百米的地方，就是一片胡桃木树林旁边，他另外盖了一栋小木屋作为客房，屋子里有壁炉和睡觉的阁楼。另一头有一片草地，可以看到远处有一座木造谷仓。约翰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建造这个地方。这里是他的代表作，是他气定神闲地慢慢做出来的。这些房子的比例非常完美，每一样东西的设置都恰到好处。不知情的人很可能会以为，这些房子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

如果克莱德·提尔曼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了先人的务农技能与价值观，约

翰，一个在华盛顿特区市郊地区长大的婴儿潮成员（1972年他曾用六美元买了门票，到RFK体育场欣赏英国摇滚乐团“滚石合唱团”的表演），则是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约翰年轻的时候，曾以195美元，用搭便车的方式横穿美国。在那之后，他开始来这片谷地探望祖父，他祖父在这里经营一家养牛的农场。他会在每个星期五，跟州际公路上的车流奋斗，开三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坐下来聆听这儿曾经发生过的种种事情。历史就是约翰的宗教。他在一把手工打造的椅子上、在一条锻造的链条上找到了真理和美丽——可能还有卓绝。他能像埃及古文物学者研究象形文字一样，看懂古老建筑物的建材与上面的图案。有一次，他认出我用来当作鸡舍台阶的石头，原本是以前立在我家前院的磨坊上的磨石碎块。“有时候，”当我们沿着一条草地上的小径，回到他的木造谷仓前面时，他说，“我觉得我应该早生个几百年才对。”

几个小时后，我们回到露台上，跟莎拉和他们的两岁女儿凯蒂一起吃三明治。跟约翰相处，让我心里一个很久以前就存在的问题浮现出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在乎过去的一切？这话听起来可能让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从来不是特别喜欢历史。事实上，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发誓，如果可能的话，一门历史课也不要修。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它是死的东西。我修艺术、英国文学与英文作文，以及哲学方面的课程，已经很吃力了。若非学校规定要修一门美国历史，我可能会实现这项对自己的承诺。结果大学四年当中，和历史相关的课程我只修了一门。我得了D，不及格。从那时起，我对历史所持的态度趋于软化。殆无疑义，我一定是有了这种改变，否则今天我不会在这里，打扮成1900年的一个满身泥土的农夫四处走动。但是在某些方面，我仍然在跟过去挣扎。

我摇晃玻璃杯，杯中的冰块发出当当的声音。我转过身，面向约翰：“为什么要看重过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你若仔细思考就会发现，我们拥有的仅仅是过去。它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地方，”他说，“而现代社会的人完全不晓得自己正在往哪里去。”

“这么说，过去是一种导引，让我们知道怎么过生活了？”我问。

“我不觉得应该让过去来决定未来，但是过去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人类跟其他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当中，有一项就是人们会把文化一代代地传下去。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跟过去有所联结。借着先人走过的长久足迹，我们可以找到自己。”

他说，那些不在乎过去的人会失去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他们对土地、对人道精神、对他们自己，都不会关心与敬重。约翰的话让我仔细思考我自己领悟到的东西——希瑟和我学会的技能，我们体验到的艰难和喜悦，这一年我们在美国这个偏远地区结识的人们。这些事唤醒了，让我感受到过去的力量。我想到克莱德·提尔曼和他直觉性地紧抓缰绳，带领他的负重马前行；我想到麦可·葛佛瑞和他的刨工台，比尔·罗伯森和他的祖传品种西红柿，莉兹·克罗斯和她回归田园的耕作生活；还有戴维·弗雷格，他用融合古老智慧和创业精神的态度，不断追寻人生的意义。我想到那些充满魅力的水果蛋糕，还有科技进步的无情脚步。我们或许能轻易地遗忘过去，但是过去并没有死去。它活在每一个人心。重点不在于回到过去的某个时期，而在于让我们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因为这段经验而变得更加丰富。借着尊重过去，我们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现在——还有未来。我心中的忧虑，担心我们全家为什么要搬离纽约；我心中的恐惧，害怕自己因为无法面对现实而逃避，害怕自己没有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责任，让家人置身于危险的环境之中。这些忧虑和恐惧都是自己的妄念。实行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不是逃避，而是探索盘古开天以来，人类就必须面对的种种实际状况——食物、水、大自然、邻居组成的小区。实践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在绵延不绝、无法分割的历史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阳光慢慢西斜——我该回去了。在《泰皮》里，梅尔维尔用充满青春活力的华丽辞藻写道，对任何一个喜爱冒险的人来说，“一种反方向的倒退动作……会让人心中产生难以形容的厌恶感”。我也无法忍受走回头路，所以我没有冒着被碾成肉饼的危险，走回那条干道上。我朝着未知的领域走去，尽管这么做会让来回16千米的路程又增加了8千米。我离开约翰家之前，他对我说，途中会看到一座南北战争爆发前就存在的磨坊，那是少数没有被北

军摧毁的磨坊之一。“仔细看看那座磨坊，”他说，“它是你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丽的东西之一。”

关于农场的构想

我们进行这项计划的动力并非来自怀旧的情绪，但是这项计划还没有结束，我们心中就对这段1900年的生活体验充满怀念之情。希瑟看到一朵金针花，回想到我们第一天展开计划的情景，那天琴妮骑在马上，送来的就是一束金黄色的金针花。有一天，我们把鲁德放在床上，让他睡午觉，我们完成了上午的工作，蹑手蹑脚地走上二楼，进入客房，滑进被单里。完事以后，我们都没有说话，我察觉到我们俩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言语的了解，我们都明白，再过不久，这件事也会改变。我会重新为了工作而变得忙碌，电话会铃铃地响，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开车进城或出城。

然后，我们就得面对烦人的现实问题，思考如何才能养活我们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心中一直有一个构想，就是成立一家手工制作山羊奶酪的农场。去年夏天我们跟戴维·弗雷格聊天的时候，他提到想为更生人建立一所手工乳制品的学校，这个构想给了我们灵感。我们有这片土地，还有谷仓。只要再接受一些训练——或许到法国去进修几趟——我们就能让希瑟做奶酪的能力更上层楼，她现在已经做得很棒了。这样简直完美到了极点：等我们回归21世纪以后，我们可以运用在1900年的生活里学到的东西，去建立新生活。

然而这个构想有两个问题。

一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我把最后一块浇了橄榄油的山羊奶酪让给希瑟吃。这些山羊奶酪大部分是我吃掉的。

“你吃吧。”她的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笑容。

“为什么？”我说。

“我不能吃。”

“你不能吃？这个好吃极了。”

“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玩意儿了。几个月前我就不吃山羊奶酪了。我也不喝羊奶了。”

我愣住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我一直在做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你的缘故。”她坦承，“我不希望你发现我不吃这些东西了。我觉得你会失望。”

“因为我们那个农场的构想？”

“对。”

我放声大笑。

“有什么好笑的？”她说。

“我也得承认，”我说，“你不喜欢羊奶奶酪。我也没法忍受那两只山羊！”

活马拉坏车

我们的1900年计划还有几天就要结束了。我从谷仓旁边走过，走到那栋倾斜的库房后方，来到我们那辆车旁边。汽车钥匙在我的口袋里叮叮作响，我往车窗里瞧，里面都是碎纸和粪便，不禁摇摇头。我打开车门，听到一阵响亮的嗡嗡声，看到一个纸做的蜂窝随着黄蜂的飞舞上下起伏，这个蜂窝固定在车门铰链旁边的车体上。有两只黄蜂从窝里盘旋着飞出来察看。我让门开着，小心翼翼地退开，接着打开另一扇车门，又看到角落里有一个蜂窝黏附在车门附近。剩下的两扇车门也一样，附近各有一个蜂窝。

那一天，莉兹的先生杰克·克罗斯来我们家，给我们送来一些他们多出来的卷心菜苗。“黄蜂？”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大声地说，“你知道把黄蜂赶出蜂窝的那个老法子，对不对？把一条死鱼挂在一桶水的上面。黄蜂会去吸吮鱼身上渗出来的液体，然后它们就飞不动了，最后会掉到水桶里淹死。”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没有鱼。”我说。

我没有这么做，那天晚上，我提了一罐汽油，回到车子旁边。在月光下，我小心地把每一个小蜂窝敲掉，让它们落到装汽油的铁罐里，然后把罐子的盖子盖上，直到蜂群死掉。

第二天，希瑟和我用力敲打车子的两侧，重重拍打坐垫，希望吓走其他动物。我看看引擎盖底下，没有土拨鼠。我松了口气，把电池接上，心里抱着矛盾的希望，一方面希望汽车不要发动，一方面却希望它能动起来。没有机会。它彻底死了。

我们都静默了一会儿。

“我想到了，”我开心起来，“贝儿可以拉它！”

“什么？”

“她只需要把车拉到谷仓里。从那边开始一路都是下坡。我们可以让车子滑到车道上，在那边修理——把老鼠屎清干净，把断掉的电线接起来，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打电话叫拖车公司开卡车来拖去修理。但是我们必须让车子离开这片原野。”

多么完美。一匹活生生的马拖着一辆没法发动的150马力的汽车。

那天下午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天气很热，空气窒闷。我带着贝儿从库房旁边走过，苍蝇成群地绕着她飞舞。我们的车正车头朝下坡停放着。贝儿必须把车尾拉到山坡上，好让车子靠地心引力冲下去。希瑟让鲁德坐在这辆金牛座的后座，给他绑上安全带，自己坐上驾驶座。

“车里臭死了，”希瑟说，“车窗摇不下来。”车窗是自动控制的，没有电池，车窗就动不了。现代社会各种设施的便利性就只是这样。

“只要往上拉七米多就好了，”我说，“我们只需要拉到那里。”我把贝儿缰绳的铁链挂到车尾保险杠下方的钩子上。这时我发现，对于冲橇来说，这是要往前跨出多么难的一大步，就像小联盟的棒球选手直接去打大联盟的比赛一样。我低声对贝儿说：“你现在要拉两吨重的东西，女孩。让提尔曼先生为你感到骄傲吧。”

“我好了！”希瑟说。

“往前走！”贝儿的四只脚试着往前走，然后猛然停住，这个不动如山的物体让她感到吃惊。

“往前走！”她再一次试着往前拉，然后又停住了。

“走啊，贝儿！”这辆金牛座轻微地摇晃了一下，“呀！”我一面发出指令，一面啪啪地甩动缰绳。她努力向前，耳朵竖起来，她那巨大壮实的身躯左右摇晃，但是她似乎被身上的马具钉死在原地。这辆车仍然动也不动。

“哇！停下来，贝儿。”

我把缰绳横摆在她背上，走过去仔细察看汽车的车轮。每一个车轮都深深陷在雨天时所形成的轮沟里，现在泥土又变硬了。她绝对没法把车子拖出这几个深坑，拉到山坡上边。

我解开贝儿的缰绳，带着她走到前面去。希瑟和鲁德下了这辆充满恶臭的车，透透气。车头保险杠下方的深沟里长满青草和蓟。我踢踢这堆植物，跪下来，把头伸到车子底下，看看有没有可以钩住缰绳的地方。我伸出手，盲目地摸索保险杠后面这块空荡荡的空间，想象这里很可能住了一窝响尾蛇——那么多的老鼠，很可能吸引它们来这里做窝——我祈求上天，希望我之前碰到蛇的时候拥有的好运，能帮助我度过这一次考验。

我没有摸到能钩住东西的地方，但是我的运气的确不错。我把连接缰绳的J形钩子钩在保险杠的边缘上。希瑟和鲁德重新就位，我再一次对贝儿说：“往前走。”

这一次，由于坡地的斜度，车身从原本停放的位置跳了起来，开始往前动，被地心引力拉着走，只是走错了方向。1.5米、3米。贝儿感觉到缰绳松了，她停下脚步。车子继续往前移动。

“哇，”我尖叫道，“哇！哇！”

希瑟终于刹住了车。

我怒气冲冲地看着挡风玻璃后面的她。

“怎么了？”她说。

“你停的地方离她的脚只有这么一点点的距离。”我喊道，一面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对着她比出约二点五厘米的距离。

“我们正在往前走，罗根。是你跟她说‘哇！’的。”“不，我不是在跟她说‘哇！’我是在跟你说‘哇！’”就在这一刻，贝儿翘起尾巴，拉出一坨热腾腾的、青豆色的大便，粪便就喷溅在引擎盖的正中央。

我们捧腹大笑。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试了一次，但是这一次，缰绳的铁链从保险杠上掉了下来。同样的事情一遍遍地发生，每一次我弯下腰去，重新把钩子钩在保险杠上，贝儿就用她的尾巴拍打我。“不要这样，贝儿！”她把我的帽子打掉了，我说：“够了！我们来试试看，从车子尾巴的钩子那里再试试看。”

然而这片山坡太陡了，实在爬不上去。我们决定不要直接拉上七米，而是沿着草地往下走，然后以U形路线折返，从一个坡度比较小的地方重新上去。希瑟一手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后视镜，另一手拉住开着的车门，这样她才听得到我的话。

“准备好了吧？”我说，“往前走！”

到了此刻，贝儿已经完全被搞糊涂了。我们做这件事已经做了将近一个小时，她却只拉着车子往前走了几米。我跟她在滑梯上练习的时间已经有好几个月，在这段期间，我要她带着我在草地上奔驰，满足我对溜滑板的幻想。不管提尔曼说她怎么肥，如今她的身材已经变得结实，而且她渴望奔跑。

现在她受够了拉不动这个巨大的银色泡泡。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因为这一次，当我“啪”的一声抖动缰绳，要她往前走的时候，她猛然向前一跃。贝儿利用这片对她有利的斜坡，开始跑起来，她的两只前脚齐步向前，宛如一只巨大的黑色长耳野兔。希瑟发出尖叫。鲁德也在尖叫。我握着缰绳，跟着贝儿拼命地跑。车子砰砰地开过凹凸不平的地面。我的帽子也飞走了。这时，我看到前方有一条沟渠。“哇！”我尖叫了一声，用力拉住缰绳，然后大喊：“刹车！刹车！”

贝儿停下来。车子也停了下来。希瑟从车门里出来，弯着腰放声大笑。我也笑个不停。鲁德开心地尖叫。“你在拖车屁股！”我对希瑟说。“还要！还要！”鲁德说。我们又拖了一次，这一次速度较慢，不像上次那样疯狂。我用力拉住缰绳，要贝儿用走的。她奋力走上山坡——拜托，现在可不

要停下来——她来到山坡顶端。我们大声欢呼，拍拍贝儿，庆祝这次的行动得到成功。她真是个好女孩！

一百年后，再见

最后一天，我们做了些什么事？睡到很晚起床，休息一整天，庆祝这项计划即将结束？不是的。我们照样挤羊奶，到井边打水，打扫房子，拔掉杂草，铲马粪，用草叶盖住菜园的小径，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同时，我们也为重新回到21世纪的生活做准备。约翰·佛斯特来我们家，帮我把一些动物在这辆金牛座里做的窝移走，把咬坏的电线剪断。我们从引擎四周挖出来的稻草，足够塞满一个床垫。他把电池带走，充好电送过来。我们虽然哪里也不去——要到明天才行——我还是不能抗拒坐进驾驶座的诱惑。我把钥匙插进钥匙孔，试试看能不能发动车子。它发出嗒嗒的声音，发动起来。我让引擎转了一会儿，关掉，然后把钥匙放到口袋里。

那天傍晚时分，希瑟举起双臂，摆出胜利的手势。“哇呼——！”她喊道，“今天我把我那张清单上要做的事情全都做了。这可是头一回。”

那天晚上吃晚餐的时候，除了米饭和豆果之外，我们实现了我之前发的誓，就是在这项计划结束前，都要吃新鲜的英国豌豆。我们只吃了几叉子的豌豆，这次的收成不好，我知道。但是至少我们做到了！我们播下种子，培养耕作，摘下这些豌豆——在今年漫长的生长期当中，它们是最早的一批收成——因此它们可以在此刻滋养我们。如果说我从我们的1900年体验中带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对种子所创造的奇迹的一种欣赏态度。希瑟和我证明了，一小堆装在信封里、用橡皮筋捆住的种子，可以喂饱一个三口家庭一整年。同时我们也证明了，一个构想——无论看起来多么像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只要用丰富的想象力加以落实，都能展现奇迹般的成果。

随后，我们去亲吻鲁德，跟他说晚安。我们微笑地低头凝视他，对他暗示说，明天早晨将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尽管他不明白这

些话的含意，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晚上仍然充满了神奇的魔力，就像圣诞夜一样。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极为疯狂的梦，”希瑟说，我们在屋子后面的枫树下刷牙，“我梦到那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决定提早把电话线插上。只差一天了。我想。我只想确定电话能用。结果电话响起来，我慌成一团。”

“你接起来了没有？”我问。

“接了。另一头有个声音对我说：‘抓到你了！’”

我们爬上床，幻想未来要做什么。我们沐浴在这个计划带来的成就感里，同时，我们建立了一个家，这让我们觉得很有安全感，所以此刻我们不担心未来。我们在银行里还有钱，虽然金额比我们希望的少一些，但还够装修房子之用。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彼此。未来的每一件事都会自然地各就各位。

希瑟转过身，面对着我。“一百年后再见啦。”她说。然后，她吹熄了油灯。

尾 声

我对种子怀着很大的信心。若能让我相信你有一粒种子，我就期待奇迹的出现。

——亨利·梭罗

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纪两星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派对，邀请在我们1900年的生活期间，帮助我们渡过各种难关的邻居们。有55人前来参加。

我们从谷仓里拖出一捆捆的干草当作坐凳，在我们先前用来洗澡的水槽里放进冰块，泡了许多瓶啤酒和汽水。我们播放一张草根蓝调的CD作为背景音乐。夕阳逐渐落到北山下。我们站在前院聊天，吃烤肉夹吐司，还有卷心菜丝沙拉。

我从谈话的人群中离开，整理一下内心的思绪。我想说几句话，对今天在场的客人表示感谢。但是我的注意力被鲁德吸引住了，他满脸笑容，跟一个朋友从一捆捆干草上跳下来。他对我们这一年的作为了解了多少？他现在是比以前更快乐？我们返回现代社会的头一天早晨到镇上去，他开心地尖叫着说：“爹地，篱笆柱子在动！”我们带他去一家咖啡屋吃贝果，稍后

去“莱特乳品店”吃薯条和装在纸杯里的冰激凌。这是一家拥有五十年历史的免下车餐厅，我们开玩笑说，它在20世纪中叶开张，可说是我们回到21世纪的中途站。有一刻鲁德问我，我挤到薯条上的黏黏红酱是什么东西。我不自然地解释道，它叫西红柿酱。这时，旁边那桌的一家人听到了，盯着我们看。我几乎能听到他们在低声地说：这个小孩是个什么样的怪物，怎么连西红柿酱都没看过？

我走到前门的露台上，用装啤酒的玻璃瓶敲敲手上的结婚戒指，要大家注意我这里。我穿着一件干爽洁净的衬衫，由于我从抽屉里把那把吉列锋速三刮胡刀拿出来用，一年以来，我的脸头一次光滑得像婴儿的皮肤一样。

“谢谢大家的光临。”我紧张地开始说了，我的嘴唇颤抖着，仿佛随时都会呛咳起来。“我们叫了外卖的食物，这样希瑟就不必用我们那座木柴炉煮东西了。已经一年了，她每天要做三餐，现在她有资格休息一下。”

这些笑声和这些熟悉的笑脸——葛佛瑞家的人、琴妮和姬恩、威尔逊家的人，还有萨拉丁家的祖孙三代——让我的心情变得轻松。我看到克罗斯家的人。我看到佩姬和比尔——比尔的癌症处于缓解期，他看起来比生病前还要健康。唯一没有到的是克莱德·提尔曼——他没有来，我真的很难过。还有伊许塔，她是我们的守护天使。她跟女儿莉夏出门旅行去了。不过，守护天使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太远的。

“我们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继续说，“我们确信，我们一定可以种出足够的东西来喂饱全家人，可以用木柴来让我们的房子保持暖和，可以在洗衣板上刷洗衣服。但是在1900年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层面我们没有把握能够彻底重现，那就是友爱邻人的小区精神。”

我说，在1900年的时候，还没有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联邦医疗保险制度。那时的社会安全网络就是亲人和朋友。我说，当我们从纽约市刚搬到史威普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在美国的农村地区，睦邻精神仍然完好存在着。该死！我们甚至不确定，这里的人肯不肯跟我们说话。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孤独度过这一年的可能性。幸运的是，实际状况与我们的期待恰恰相反。

“我们不可能在这一年里失败，”我说，“我们的邻居——你们每一个人——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失败的。谢谢你们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个小区的一分子。”

我说完以后，佩姬手里拿着一个纸盘子说：“我们住在这里二十五年了，因为有你们，我才认识了一些以前一直不认识的邻居。”莉兹·克罗斯用她特有的直率口气附和道：“我要谢谢你们。你们把我们联结起来，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区。”



客人离去后，我们开始收拾清理，希瑟用一只臂膀环住我的腰：“你刚才在派对上说的话，我很喜欢。”

“我还以为我说的时候，情绪会太激动。”

“他们都不会介意的。”

“我知道。”我说。我转过身，面向希瑟，紧紧拥抱着她。

她把嘴唇贴在我耳边说：“我绝对不希望自己忘了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她低声说：“我是指我们的事。”

“绝对不希望。”我说。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生命来提醒我们，我们有多么相爱，这个生命将在今年冬天来临。这场以贝果和免下车餐厅买来的薯条招待客人派对举行的几天后，希瑟提着几个超市购物袋，到自助洗衣店里把一大堆脏衣服洗干净。然后她在一家药房顺便买了验孕剂。结果是阳性的，她怀孕了。我们估算的结果是，这孩子可能是历来第一个在1900年受孕、百年后才降临人间的新生儿。

后记及其他



后 记

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纪的头几个月当中，在某些时刻，我们三个都很享受面对21世纪而产生的纯粹狂热感。一天早晨，希瑟对鲁德说，我们那天早餐要吃小贝果。鲁德说：“好！它们是从菜园里长出来的吗？”还有一次，她给了他一部用完即丢的立可拍相机。希瑟高兴地看着鲁德一张张地拍，记录他那天的生活。我则是处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我们的农庄里，有时我一面就着烛光，在镀锌的水槽里洗盘子；有时我大口吃着巧克力点心棒，用一部装电池的手提式音响，大声播放桑巴舞的CD。

我们已不需要遵守之前定下的规则，因此我们重新拥抱现代化生活的种种便利设施。我们开始定期去自助洗衣店洗衣物，买装在保丽龙盒子里的外带食物。我们用打电话的方式跟亲朋好友联系，而不是写信。我们的邻居杰克·克罗斯是个有执照的电工，他给我们家装了几个临时插头，借给我们冰箱和微波炉，这些东西原本放在一辆停在他家山坡顶端，目前没有在使用的住房型大拖车里。

我们原本可以按个按钮就煮好一壶咖啡，为什么要黎明即起，给木柴炉生火来煮咖啡？当我们能用微波炉做晚餐，为什么要忍受午后炉旁的炙热？我们挤出羊奶，放在装牛奶的纸盒里冰进冰箱。我们养星星和甜豆是为了得

到羊奶，而不是为了要她们来帮忙控制杂草的生长。因此我们把这对同母异父的姐妹花卖回给“山羊女士”。她可以让这两只母羊继续生产羊奶。我们听说，上次在姐特·梅克利家没有被我的斧头砍断脖子的那几只鸡，都被郊狼给弄死了，于是我们把家里的12只母鸡装在箱子里送给姐特。然后，我们一家三口便出发去海边度假。当我们要到外地去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家里的动物？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现代化社会给了我们一个礼物，那就是省力——现在我们可以出远门了。

希瑟和我从开始实行这项计划的时候，心里就很明白，我们会在一年后回到21世纪，但是我们心里并没有准备好要回去。以冷冻食品加热作为晚餐，从商店里买来鸡蛋，开着汽车来来回回地跑动——我们原本的想法是，这些都是权宜措施，等到我们能把这栋农庄装修成符合今日社会的标准，就能再做调整。房子装修好了以后，我们就能把我们学到的、自给自足的农作方式中最好的一部分，跟我们最怀念的一些事情——能够冲热水澡，有洗衣机、台灯，能够听音乐——融合在一起。我们会再买一窝小鸡，让它们住在鸡舍里，我们会在菜园种菜（尽管不会种很多菜）。我们会继续从事我们的手工种菜和捏死小虫的有机耕作方式，也仍然制作装在有金属盖的玻璃罐里的罐装食物，只是现在我们用现代化的煤气炉来煮熟与消毒。以后我们不会挤羊奶来喝，不过我会留着贝儿，驾着她去滑橇，让她拖运石块，以及给菜园翻土。

然而，横跨两个时代的生活远比选择其中一个还要困难。原本每天有很多必须干的活儿，现在都不用做了。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一艘失了舵的船，不知何去何从。之前我们心中的那股修禅般的专注力消失了。不久，家里的账单就越堆越厚——汽油钱和汽车的保险费、水电煤气费、长途电话费，还有一大笔装修房子的费用。我把我那部计算机上的灰尘擦干净，装了拨号式上网后（每个月又多了一项开支），我重新开始为一些杂志写稿，让我们有些收入。

我们都变得更忙了。邻居们不再常到我家坐坐。也许他们来过而我们不在家。有一次我们在伊许塔家吃午餐，一个朋友愁眉苦脸地说：“我想念你们。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她的话是对的。有一段时间里，我们仿佛得了产后忧郁症。一天晚上，

吃完晚餐后，鲁德随着歌手约翰·普莱恩（John Prine）的歌曲摇摆身体。希瑟露出忧虑的神情。

“你还好吧？”我问。

“还好。”她说，她的口气听起来很悲伤，“我觉得有点疏离。我很想哭。”她哭了起来，在音响播放到一首名叫《一个巨大而愚蠢的世界》（*It's a Big Old Goofy World*）的歌曲时，她不停啜泣，肩膀抖动。在普莱恩（John Prine）的许多歌曲当中，这首根本不算是哀伤的歌。

“亲爱的，你觉得出了什么问题？”

“他有一整年都没有听音乐，”她一面啜泣，一面看着鲁德，“可是他那么喜欢音乐。”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预计在那年二月出生，所以这是一个装修这栋房子更重要的理由。我全心投入，雇用六个包商，为房子装设电线、自来水管、中央暖气系统，并且整修松木地板，还加盖出一些空间。装修房子在生理上和精神都造成很大的耗损——在金钱方面也一样。由于施工时尘土飞扬，希瑟没法让鲁德在家里四处走动，所以我们在镇上租了一户公寓，在那里住了四个月。我们花光了在布鲁克林存的最后一块钱，就搬回去住，尽管生活在结构墙和尚未完工的夹板中间，但我们又可以吃到自己家里煮的食物了，尽管有一段时间，希瑟经常发现她忘了关煤气炉，但这是因为有一整年的时间，她都是在一座从来不关火的木柴炉上煮东西的缘故。鲁德进了幼儿园，由希瑟开车接送，单程就要30分钟。我们的女儿伊莉亚特在一个暴风雪来袭的日子来到人间。我们的生活再次陷入狂乱状态，排满了各种预约的事项，赶着在各种截止期限内做完事情，还有去旅行、回复电子邮件、接一通又一通的电话。我自由接案的收入不够我们开销。不久，另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房屋抵押贷款——逐渐吞没了我们心灵的宁静。



第一个讯息是官方发出的房地产通告。希瑟在超市拿了一张通告回家。

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就摆在有一半空间尚未完工的早餐室的餐桌上，这张通告蕴含着意义深远的种种可能性。我开始读它的内容。一天晚上，就在我们的1900年计划结束刚超过一年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件无法启齿的糟糕事情。

“如果我们把这里卖掉，搬到镇上去，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这么做能解除一部分的压力，我会搬走，”希瑟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彼此。”

“是的。”我说。我领悟到，我们上一次决定大幅改变我们的生活时，谈话的口气跟此刻多么不同。“我们有彼此。”

过了一个星期，飓风“伊莎贝尔”重击弗吉尼亚州沿海地区，它迅速吹向内陆并带来暴雨，许多树木被吹倒。到了那天的黄昏，我们新接的电力宣告中断，我们不知所措。家里没有手电筒，不过有一盒蜡烛和几盏油灯，然而令人无法置信的是，整栋房子里一根火柴也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黑暗中靠在一起。我咒骂自己太疏忽，没有做好准备。我弯着腰走进狂猛吹打的暴风雨中，坐进我们那辆车的前座。我浑身滴水，试着用车上那个泛着樱桃红火光的点烟器，点燃一根装在玻璃盒里的蜡烛。

这个办法生效了。这个房间沐浴在一些蜡烛芯子的光晕里，让希瑟和我觉得放松。我们想到我们曾经在同样的金色烛光旁边，度过365个夜晚。就跟那段时间一样，此刻我们没法看录像带，不能听音响，也不能打电话。除了聊天、做爱和睡觉之外，没有什么事可做。那天晚上，这三件事我们全都做了。同样的，在那天晚上，我们做出决定，将要搬离特林柏磨坊。如果我们在这项追寻俭朴生活的过程当中，学到了一点点的道理，那就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连这栋房子和它四周的16公顷宝贵的土地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必须放手，让它们离开。

跟贝儿说再见特别难。克莱德·提尔曼作了安排，把她卖给附近史道顿镇上的边疆文化博物馆。在那里，有一些穿着古代服装的人会重新演出早期欧洲和美国的农村生活。贝儿成为弗吉尼亚州政府的一位员工，她做的事跟之前她为我们做的事情差不多，只是现在她跟其他负重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们随时都能去看她。我们跟这家博物馆商量好这事之前，博物馆的动

物训练员曾经打电话来，询问贝儿的情况。“她绝对可靠，是贝儿教会我怎么驾马车的。”

我们找到一个人，她想买特林柏农场。这位女士很重视灵性，在做拯救老马的工作。我们也开出价钱，想在镇上买下看中的一栋房子。总之，我们在史威普过了多彩多姿的三年时光。我们搬走的那天，由于忙着打包，我们的情绪一直压在心里，直到最后一刻才爆发出来。希瑟开着我们那辆车，走在前面。我把院子里的几件玩具捡起来，绑在沉甸甸的行李下面。我会开着这辆卡车，跟在她后面走。希瑟和我彼此拥抱，跟这里道再见。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

“妈咪！妈咪！”鲁德大叫，他从打开的车门里看着她。

“不要紧，甜心。妈咪只是觉得难过，”她擦去泪水，露出笑容，“我会怀念这座农场的，只是这样而已。在这里，我们有许多美好的回忆。”

一小时后，我从伸缩梯爬到树上，砍断给鲁德玩的、用绳子做的秋千——为了庆祝他的三岁生日，我亲手做的——我用短柄的斧头砍断秋千的麻绳，然后我靠在枝丫上，让眼泪流下。我忍不住想到，这些记忆将会逐渐褪色，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把过去的某些部分抛在脑后。



这是四年前的事了。从那时起，我们在新的小区里安顿下来。我们从一个极端摇摆着来到另一个极端——从高科技、全球各地奔忙的都市生活，来到充满汗水与辛勤苦干的农村生活——我们的钟摆在途中的某个地方静止下来：在一个小镇上。这件事带有反讽的意味，因为仿佛只是昨天，希瑟和我还在拼命想办法，要离开自己长大的那个小镇。然而小镇的生活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也改变了。史道顿有两万五千人口，是个充满活力的安静小镇，从18世纪以来，小镇保存得十分完好。这里风景优美，气候温和，有许多文化活动；这里有一座国际知名的莎士比亚剧院，还有很多家花三美元就能享受一杯咖啡的好地方。这里有久住的居民，也有搬来不久的人。我们散步到小镇各地，尽量

买当地农民市场的东西。如今我们不再有16公顷的草地和薊要清理，我们的院子只有零点一公顷大。我用老式的手动式割草机修剪草地。

如今我们的生活轨道绕着两个精力充沛的小孩转动。鲁德现在读四年级。他还记得去拉猫的尾巴，在草地上摘黑莓，到鸡舍取鸡蛋，还有在一间小木头房子里上大号的事。当时他觉得，马桶底下仿佛是个无底洞。他对1900年生活的怀念大致上就是这样。我们的体验有没有让他转变成为一个热爱大自然的男孩呢？答案不算是肯定的。除了对鸟类和昆虫有兴趣之外，他那好奇的心灵也渴望了解机械或电子方面的事——玩具、遥控汽车、旧的时钟——他用螺丝、起子和老虎钳把这些东西解体。他把我们的CD播放机拆成一堆零组件后，我笑了（终于笑出来），因为我领悟到，鲁德与现代科技的关系可能跟我与现代科技的关系并无不同。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现这种关系。我们的女儿伊莉亚特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虽然她仅仅在母亲的子宫里体验到1900年的生活，但奇怪的是，她经常从外头带些石头和豆荚回家，最近更开始在一本笔记簿上记下对野花的观察，而这些花正是当时我们靠着那本原野指南书辨认过的野花。事情的进展实在有趣。希瑟开始考虑回到职场的时候，并不确定能否找到延续那些年国际经验的工作。这时，镇上的一所女子学院开始实施一项崭新的、希望能唤醒全球社会的计划。他们任命希瑟担任这项国际性计划的主任。这份工作不仅福利很好，暑期也可以休息。由于这所学院的校园就在我家对面，她每天只要走112—114步就能往返学校，步数取决于当天她想穿哪双鞋。

生活里出现的这些活动意味着，我们很想跟史威普的那些朋友见面，但是我们做不到。不过只要想到他们就住在20千米外的地方，我们就感到安心一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今年春天，我们跟伊许塔和莉夏说再见。她们厌倦了维持农庄所需要花的力气，还有这里寒冷的冬天，便卖了农庄，搬到佛罗里达州去。我们向麦可和维多莉亚·葛佛瑞夫妇的农场买吃青草长大的牛屠宰后卖出的牛肉，向威廉和夏妮·韦勒特夫妇买酵母面包。他们不久前搬到镇上来，开了一家面包店。我又开始把全部时间用来写文章。每当电子邮件堆积如山，许多文章的截止期限让我半夜挑灯疾书（这只是一种比

喻），我就会开车到史威普，到约翰·佛斯特的木屋，到那里去思考我的想法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为何如此之大。他和我会聊到很晚，一面讨论印第安人、森林演替，或是让附近的某一条河继续流动等话题，一面把木柴扔进炉火里，或是在橡树林里散步，对着身边几百只闪烁飞舞的萤火虫发出惊叹，仿佛布满星辰的天空有一小块松脱坠落，飘向人间。

尽管希瑟和我在回到过去的这段旅程中，心灵得到了成长，但重新展开现代化的生活以后，我仍不时与压力和生活中种种令人分心的事情搏斗，有时也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的金钱经济所困。我怀念生活在铁栏杆以外的那段独立自主的时光。如今我不再挤羊奶、劈柴、到井边打水和驾马车。自从我们搬离那座农场以后，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建个菜园来种菜。我们家之前的屋主是镇上有名的园艺天才。她住在这栋房子的25年中，把这里的每一棵黄杨木和每一畦麦门冬之间的土地，都用各种观赏植物加以装饰——丁香、藤绣球、马蹄莲、茉莉、郁金香、在菱形图案上攀墙的英国常春藤——然而没有蔬菜。这是一座美到令人屏息的花园。我们搬来以后头几年的夏天，我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除草，用草叶覆盖树根以保持水分，以及修剪多出来的枝叶。但是由于今年春天食物和燃料价格持续上扬，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对经济感到焦虑不安的气氛里，于是希瑟和我展开一项视“花园族”为异端的行动，把房子旁边的一片常绿植物连根拔起。我们跪在地上一一起做，两个孩子在旁边射水枪，不时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天黑后，我们在地上挖洞，用铁锹翻动肥沃的泥土。我们种下西红柿、辣椒、茄子和几种香草。在希瑟旁边种菜，两只手插在泥土里，让我突然回到我们1900年的春天，让我再次感受到大地的许诺。对于我们的家用开销来说，这片沙滩浴巾大小的菜圃所能得到的收成帮助有限，但是我从那座农场学到的道理是，即使是最微小的行动，也能昭示独立的精神。趁着希瑟没注意的时候，我悄悄埋下一把花种——粉红色与红色的大波斯菊——我把这把种子埋在蔬菜种子旁边的松软土壤里。只要我没忘了这事而把它们给拔了，等到今年夏天，它们就会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2008年6月12日

希瑟的改良黑水果蛋糕食谱

这份食谱是马里兰州的洁妮·爱尔德的。她养了一头泽西奶牛，自己动手做牛油——在21世纪依然如故！她的好友伊许塔·亚贝尔把这份食谱给了我们，在我们家掀起一阵对水果蛋糕的狂热。我把这份食谱稍作修改，让它符合我们的口味。希望你也喜欢它！

希瑟

10个鸡蛋

450克牛油

450克面粉

450克糖

900克洗过的带籽葡萄干

450克去籽葡萄干

900克黑醋栗（currants）

900克柠檬片（citron）

2茶匙肉桂

2茶匙肉豆蔻（nutmeg）

二分之一茶匙肉豆蔻（mace）

二分之一茶匙丁香

一个平底大玻璃杯的黑醋栗果冻或葡萄果冻

一个小玻璃杯的白兰地、朗姆酒或威士忌

这份食谱总共包含2700克的黑醋栗、葡萄干和柠檬片，我把它改成：

450克黑醋栗

450克切碎的杏子干

450克葡萄干

900克干果：山核桃（pecans）、核桃（walnut），或者两样都加

我还加了以下三样东西：

3-4汤匙柠檬汁

3汤匙香草

250克的罐装黑莓果冻，用以取代黑醋栗果冻或葡萄果冻

用手将这些材料搅拌均匀，在烤盘上铺一张牛皮纸（我用蜡纸取代牛皮纸），把搅拌好的糊料铺在牛皮纸上，再拿一张纸轻轻覆盖在材料上，盖住顶端大部分的区域即可（这是为了避免蛋糕顶上的那一面被烤焦）。用250度在烤箱里烤2-3小时，直到蛋糕顶上的那一面几乎要裂开。一份材料可以做出六条中型的长条水果蛋糕。

为了保存这些蛋糕，我把粗棉布泡在白兰地里，再拿出粗棉布，用它包住水果蛋糕，然后放在有封盖的容器里储存一个月。要放到一年也可以。每个月都去查看一次，看看粗棉布上的酒是否干透。干透了，就重新把棉布浸泡在白兰地里，然后拿出来，把蛋糕包好（酒就是防腐剂）。

致 谢

没有其他人的帮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那个时代。

首先，我们要感谢在史威普认识的人：他们不仅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加入，还努力投入我们的计划，送我们西红柿苗，把清洗东西的水盆和夹碎核桃壳的胡桃钳借我们用。他们教我们如何烤面包，如何修补皮革，如何建造刨工台。这些事情多到无法描述。为了这些帮助，也为了他们给予的友情，希瑟和我要向以下的人表示感谢：佩姬和比尔·罗伯森及他们的子女莎拉和威廉，伊许塔·亚贝尔和莉夏·富尔顿，维多莉亚和麦可·葛佛瑞，莎拉和约翰·佛斯特及他们的女儿凯蒂，法兰西丝和比尔·休伊，安和约翰·希尔斯，琴妮和姬恩·霍夫曼，玛莉艾丽斯和卡尔·考克斯，萨拉丁家族（泰瑞莎、乔伊、瑞秋、丹尼尔和露西尔奶奶），爱迪和乔·威尔逊及他们的子女蒂娜和汤米，克莉斯托和韦斯利·特拉克赛尔，黛博·麦康乃尔和华特·希尔顿，莉兹和杰克·クロス，卡拉和法兰克·培瑞纳特，克里斯·米勒和他的家人，还有夏妮和比尔·韦勒特及他们的女儿艾迪森。不管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转变，走上什么样的弯道，我们心中有一个部分将永远留在史威普。

在雪伦多亚谷，还有很多人跟我们结为好友。他们不时来看看我们，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他们子女的名字写在括号内），我们致上深深地感谢：卡西和威尔·摩尔（安娜和西泽琳），米亚和吉米·基里翰（伊莎、汉纳和吉米），乔儿和彼特·艾索史塔德（朱丽叶和克莱儿），比莉·琴·班克斯，金姆和佛莱德·鲍尔（乔许），还有凯尔·强森。感谢多元农场的学徒克里斯·葛温和戴维·弗雷格，还有洁妮·爱尔德的曾祖母传下来的水果蛋糕食谱。水果蛋糕万岁！

我们很感谢那些远道而来，欣然使用我们家户外厕所的朋友：梅若·史瓦兹和戴维·韦劳勃（还有伊里亚斯和莉莉），关珊珊和肯尼·史培尔斯，及独特无比的琼恩·史培尔斯，劳拉和汤尼·戴维斯（麦可），西泽琳·皮休和特洛伊·荷勒，莎莉和华克·麦凯，莎拉·里昂和她的朋友巴比，毕翠丝和乔治·金恩（乔治、查理和威廉），巴比·荷克，苏珊·霍夫曼（艾默特），玛格丽特·林克，梅根·葛登和彼德·尼曼（伊莉萨和安娜），唐娜·爱佛迪森和克莱格·查帝，还有安德丽亚和比尔·盖斯勒（玛莉卡琳和瑞秋）。

希瑟和我都有非常体谅我们、支持我们的亲人，这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真心地感谢我的父母妮妮和约翰为我所做的一切，还有我的兄弟比尔，为了给我们的鸡盖鸡舍，让它们免受风吹雨打之苦，他的大拇指在施工时整个断落。我们还要感谢比尔充满冒险精神的妻子米歇尔。同时，我们要感谢我父亲的兄弟汤米·沃德和他的夫人凯尔，他们来陪伴我们，还带来自己做的美味罐装食物。还有希瑟的父母吉妮和约翰·希金波森，以及特别来看我们，跟着我们回到过去的“奶奶”拉薇尔·瑞德。还有“嬷嬷”克莉丝汀·希金波森，她没有来到我们家，但是她的精神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鲁德当时年纪太小，没法拒绝参与1900年的生活。伊莉亚特差一点就赶上了。我很感谢他们每天给我带来的喜悦，我希望他们能慢慢学会欣赏与感激自己在家族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

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对于我的朋友与精神导师狄恩·金的感谢。他给我起步的机会，让我成为一位以写作为业的人。他一路上引导我，连这本书也是

在他敏锐的观察之下逐渐成形。他的写作才华，他的坚忍毅力，他的善良仁慈，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点，使得他像灯塔般照亮我。我还要感谢狄恩的妻子洁西卡·金（她是这座灯塔的基石！），她在我的草稿接近完成阶段时，仔细阅读稿子。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家人——哈泽尔、葛瑞丝、韦拉和诺拉——他们突然现身于特林柏磨坊，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并带来许多欢乐。

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暨作家查理·史莱克。他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本书的初稿，给我意见。他不仅指出不够流畅的段落，还提出极为高明的意见，帮助我修正不够成熟的地方。我对他的写作能力感到敬佩。作家蔻克·华许是我的好友，她看了我的草稿后，给了我一些无比宝贵的意见。更重要的是，早在我写下这些章节之前，她和丈夫麦可就卷起袖子帮忙我们翻土，那块地后来成为我们的菜园。我们很感谢他们伸出援手。

同时，我们要感谢艾丽斯·里昂哈特和“蓝岭小区大学作家组织”（Blue Ridge Community College Writer's Group）的成员，以及凯瑟琳·皮休和杰利·贝林森。他们帮助我把草稿的笔调调整得更精致。我要感谢“弗吉尼亚州创意艺术中心”（Virginia Center for the Creative Arts），该中心为我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让我在那里工作。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暨作家吉姆·坎伯。他慷慨地跟我分享他对出版业的观察，其中包括一项关键性的建议：要把书摆到书店的架子上，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别忘了享受途中的一切。我还要感谢爱丽和约翰送给我们的鲜花。

我很感谢班贝拉图书出版公司的发行人葛林·叶菲斯，还有该公司负责本书的编辑莉亚·威尔森，她仔细看稿，做出周详的评论，使得我呈现出最佳的写作成果。我还要感谢班贝尔公司的编辑助理艾瑞卡·勒维特，她为本书撰写文案，还有珍妮弗·汤玛森，她帮忙校对，负责本书的营销工作。我也要感谢该公司的产品经理亚拉·阿布艾塔一路上引导草稿的进行方向，让我们共同创造出一本外观精致的新书。

茱蒂·瑞恩是作家最希望拥有的那种经纪人。她不仅敏锐、富有洞察力，忠诚到极点，而且有她为伴是最开心的事。我要致上最深的感谢，为了她对这本书充满信心。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希瑟，她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写这本书的人是我，但是我们在这段1900年的经验里，一起分享了所有的体验。我是何等幸运，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伴侣，她既美丽又聪慧，对人关怀体贴，愿意用木柴炉烧一整年的菜。你可以说是因为英仙座流星雨的关系，但是我深信，那天在亚拉巴马州，在那个决定我们往后命运的夜晚，由于这些星星的出现，使得我们俩的关系调整到了适当的位置，进而决定终身相许。当这些星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让我们配成一对，苍穹就喜悦得爆裂，吹起响亮的号角。只要我们拥有彼此，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心中的灿烂烟火。



北航

C1677529